

1200414570-2



1200414570

解读神秘

申振钰 张小林 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序

《解读神秘》一书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详细地揭示了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特异功能”现象、伪气功现象、法轮功邪教现象。这个工作很有价值,给我们提供了在精神文明领域进行深入反思的大量材料。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三项重要任务。我们在注重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我还是那句老话:“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价值,而且对于广大公众和青少年提高识别能力也是很有意义的。

任继愈

目 录

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	任继愈(1)
——谈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	
psi 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	于光远(10)
对“特异功能”、伪气功、邪教论战 20 年纪事.....	申振铎(31)
酒不醉人人自醉,功不迷人自迷	
——神秘体验四人谈	
.....	何宏 孙倩 申荷亮 申振铎(141)
灵魂是否存在	
——关于有神论与无神论对话	
.....	申振铎 李申 何亮 孙倩 李东松 郑念(155)
追根溯源话神功	
——关于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文化分析	
.....	申荷亮 秋实(166)
气功“外气”是人体特异功能的变种.....	申振铎(176)
中国现代灵学运动的三次浪潮	
——传奇、作伪、走邪.....	申振铎(207)
关于中国青少年对神秘现象态度分析的对话	
.....	秋实 申荷亮(214)
无神论在美国.....	王珍(231)
用科学的态度认识世界	
——与一位基督教人士的对话.....	黄 炜(242)
评《转法轮》	
——兼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钟科文(256)
后记.....	(279)

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

——谈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

任继愈

新的鬼神信仰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进行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我国的经济实力正在一步步地壮大，科学文化水平正在一步步地提高。但是，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脚步声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鬼神迷信的沉渣正在假借科学和民族文化的旗帜重新泛起，损害着中华民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前，新的鬼神信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 违背科学常识，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

近几年来，有人公开宣扬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正”宇宙之外，存在着一个由我们的亡灵组成的“负”宇宙，如此等等。

众所周知，近代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成就，就是证明了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神灵是不存在的。这样的思想成果使人类从有神论的长期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开动自己的脑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了超过以往多少代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近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世界观的武装，就不会有近现代一系列的文明成果。因此，无神论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也是一切近现代科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假如我们仍然相信鬼神存在和灵魂不死，不知道求助自己的力量和智能，而向神仙皇帝祈求解救，只能永远当奴隶，就不会有现代社会。

近年来所出现的新的有神论的重要特点,是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新有神论者说的正负宇宙,不过是借用了正负物质说。然而,负物质也是物质,而所谓由亡灵组成的负宇宙却是个纯粹的臆造。他们说的可以用某种仪器把人们以前活动的信息重新显现出来,不过是借用现代科学术语的招魂术。他们宣称,可以用现代的照相技术拍出神灵的照片,或者拍出从人体释放的所谓光明体或某种意识体的存在,宣称可以用电脑来预测人的前途和命运,都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为历史沉渣张目的典型事例。

(2) 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

如果说宣扬鬼神存在是说在人体之外、在宇宙中存在着一一种神秘的、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那么宣扬超自然、超物质的意念能力,就是认定在人体之内存在着一种神秘而巨大的力量。这种说法宣称,人与人的心灵可以跨越遥远的距离发生感应,凭意念可以移走或搬动物体,凭意念可以超越物质的障碍和时空的局限,从密封的容器内取出物体,或者产生只有物质才具有、才能产生的甚至非常强大的作用力。宣扬者称,只要按他们的办法去做,就能获得这种超自然的能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曾经认为,君主或者巫师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所以不仅奉他们为领袖或人与神的中介,甚至把他们直接尊奉为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也在提高,人们逐渐认识到,人不具备超自然的能力,于是这类神祇也被整个社会抛弃。然而这类神祇从未断绝,正如人类之中会出现返祖现象一样,当代那些自称或被称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物,也就是新的神祇。而有些所谓的“大师”,也确实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

(3) 贩卖伪科学,宣扬真巫术。

伪科学或真巫术最典型的事例,是骇人听闻的外气效应。有人宣称能在远距离发功,实现只有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实现

的化学反应；他们发出的外气可以改变导弹的航向，破坏正常的通信系统；经由他们的外气处理过的食品、饮料或生活用具，都具有医疗、保健等等特异的功效；他们凭借外气可以治疗疑难杂症，可以透视物体，可以探矿、找矿，甚至可以呼风唤雨。

气，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使用极其广泛，同时又包容庞杂、含义模糊的概念。大到云雾中的水珠、风沙中的尘埃、致病的细菌，小到微观世界中的量子，都被人们归在气这个范畴之内。气这个概念反映了古人对于世界比较粗浅的认识水平。气也是表示物与物相互作用的中介的概念，神学思想家把它推广到天人之间，认为人的行为善恶都能够凭借气使天发生感应，而且这种感应不论距离远近。宋代以宋徽宗的国师林灵素为代表所自称的呼风唤雨术，就是这种感应论的诈骗实例之一。他们宣称凭借自身发出的阴气或燥气，就可以感应天气下雨或是放晴。当前所说的外气现象，在古代被称为禁咒术，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巫术。施术者宣称，若善于行气，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外，使火不燃烧，使河水倒流，使蛇虎潜踪，使疾病不起，甚至可使敌军的刀剑难拔，射出的箭再倒射回去。当前关于外气现象的说法，除了一些现代科学词语的包装，没有增加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4) 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未曾中断的文化传统，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只能弘扬精华，不能弘扬糟粕。但是这些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风水，招亡魂，滥修小庙，向神灵求雨、求药，种种消沉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猖獗起来。在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义下，进行占卜、算命，并且把这种腐朽的算命术叫做预测科学。《周易》原本是一部占卜书，经过古代易学家们的不断阐释，使它成为一部文字简明、内容繁富的文化典籍。它的生命力在于不断淡化书中以占卜为目的的神学迷信，强

化对世界和人生哲理的探讨。但是，现在却有人把其中的糟粕说成精华，把迷信叫做科学。

新的鬼神信仰活动种类繁多，不必一一列举。事实上，这些封建迷信活动往往是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伪科学和新鬼神说的结合。一些所谓“大师”，不仅相信鬼神，而且也自称为神；那些宣扬鬼神存在、自称或被称为神的人物，同时也从事伪科学活动，贩卖伪科学学说。

新有神论的理论伪装

历史经验表明，巫术活动总是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不断改换着自己的装束，惯于利用当时科学的理论成果，并加以歪曲。当前，新的有神论的各种虚妄论调之所以能够招摇过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宣扬者采用了一系列理论伪装。他们的理论伪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盗用实践标准这一科学命题，把“实践”错误地理解为“眼见为实”，对眼前的错觉、幻觉以及魔术师的表演都信以为真，当做客观事实。

实践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科学的权威性在于经得起检验，在同样条件下，用同样方法，能得到相同的结果。而科学骗子往往用非科学的手法，利用现场观察者对科学的无知，运用魔术加骗术，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某些“大师”及其鼓吹者，打着科学实验的旗号，却拒绝严格的科学实验。他们玩弄的障眼法的表演，根本不是科学实验，与实践毫不相干。

一些自称预测大师的算命先生，常常利用许多所谓占算准确的“事实”来证明算卦的灵验和有效。事实上，在对吉凶成败这两种对立因素或此或彼的选择中，根据数学概率原则，总会有一半是猜中的。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求卦者总是希望得到自己所企

盼的结果，也总是倾向于记住与自己的希望相符合的结论，而在面对面对接触的情况下，人的表情、动作，都能够传递信息，经验丰富的江湖术士巧于从求卦者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于是，占算的准确率又会提高许多。然而，这并不是各种占算术本身的准确。算卦实践的某种准确度，决然证明不了算卦术的真理性。

算卦术是巫术的一种，它的前提，是承认神灵的存在。算卦所借助的那些道具和五行、干支等符号系统，和占算的内容没有必然的联系，人们认为它们可以占算吉凶，是由于首先认为其中渗透着神灵的意志。古代的人们用这样的方式去预测前途，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的、反复的实践使古人一步步地认识到，算卦术是不可靠的，古代医学家早已指出，信巫不信医，病治不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也警告，靠占卜打仗，将导致亡国。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只有依靠科学的理论，依靠获得尽可能多的情报和信息，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人类千百年来来的实践，不仅获得了足够丰富的认识成果，而且批判地认识了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工具。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认识到人自身的感官往往容易被假象所迷惑，因而不能仅仅依靠它们来认识真理。于是发明了种种科学仪器，来补充和延伸感官的功能。借助这些科学仪器进行科学实验，所得出的结果往往和感官所得出的是不同的。如在视觉中，太阳是东升西落，绕着地球转；实际上，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类似的例子，每个受过现代中等教育的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但是，一些人却硬要人们仅凭肉体感官承认他们魔术表演的事实和对这种事实做出的解释。当有人揭露他们的骗局，指出眼见未必为实时，他们反而指责揭露者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实践。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事实和实践，在严肃的科学面前，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2) 宣称发现了当代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实”，而他们对这些“事实”的说明是最新的、更高的科学。

科学需要发展，发展是科学的生命。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

会科学，都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科学的历史表明，发展往往是由于人类扩大了自己的实践范围，发现了新的经验事实。然而，迄今为止，那些宣称自己“发现了新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是当代科学所解释不了”的人，他们所说的事实不是魔术，就是骗局，没有一件经得起现代科学的严格检验。

撇开他们的虚妄事实，仅就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而言，也没有一件是当代科学所解释不了的。所谓的外气问题，当代科学之所以不用这样的概念，是由于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今天的科学已能准确地判明哪些是电磁现象，哪些是声音的共振等。至于人，他是一个热物体，能够放出红外线；他能发声，可以产生声波；他是一个生物，可以产生生物电，他的呼吸在吸进新鲜空气的同时，也要排出废气等等。这些就是人能够放出的外气。我们并不是不能解释人的所谓外气，而是可以更加准确地指出，这些所谓的外气是什么内容，并且指出这些外气的能量都极其有限，决没有某些人所说的那种巨大的能量效应。

在这里必须指出，所谓意念场之类的概念，完全是臆造的、反科学的概念。世界上决没有这类场的存在。汉代思想家王充说，气是力。而力，在现代科学中更准确的表达就是能量。场，是能量的连续分布区。人在思维的时候要消耗能量，因而会伴随着能量的释放。但是思维所产生的意念本身不是能量，也不会释放能量，因而没有什么意念场等。这就好比工厂里生产产品，要消耗能量，因而会伴随声光电磁等能量场的产生，但是产品本身没有场，比如没有桌子场、玩具场、电冰箱场等。不同的是，工厂的产品是物质产品，这些产品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各种场。但是，意念等不是物质产品，它们在任何条件下也不会释放能量，不会有什么意念场之类的东西产生。

任何经由长期实践和严格科学实验所产生的科学定律，都是客观的真理。任何客观的真理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绝对真理并不是存在于相对真理之外某个遥远的地方，而是存在于

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在自己适用的范围之内，是绝对的，不可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碰钉子。

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

当前国际上重大的事变提醒我们，不仅落后要挨打，愚昧也要挨打；在愚昧的基础上，也无法摆脱贫困和落后。因此，我们在努力脱贫的同时，必须进行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那就是努力“脱愚”。只有整个民族摆脱愚昧，才能真正地脱贫。摆脱愚昧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

(1) 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是必要的，在当前的建设年代同样是必要的。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五四运动提倡科学精神，主张用科学的世界观代替落后和愚昧。当时科学口号的直接对象之一，是所谓“新灵学运动”，这是中国传统迷信和国外洋迷信的杂烩。他们用现代的技术去“证明”鬼神的存在，宣称只有发扬鬼神之说，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五四运动的先进分子，坚决反对旧的和新的迷信，从而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对于此后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向着新的社会制度前进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最忠实、最彻底地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科学精神，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都十分注意在领导群众参加革命工作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方式多样地用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科学无神论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曾一度几乎使巫婆绝迹，迷信潜踪。这对于激发广大群众建设新社会的热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 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这些年来新的鬼神迷信之所以能够抬头，除了社会的、历史的原因外，与一段时间以来忽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有关。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之一，就是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19世纪末叶，鉴于当时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形势，恩格斯曾经建议当时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翻译和大量传播18世纪法国的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列宁继承恩格斯的思想，更加明确地指出，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落后和愚昧，单是进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不够的，还应该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提供给群众，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告诉群众，用各种办法来影响群众，帮助群众从愚昧迷信中解脱出来，建设自己的新生活。

一般地说，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的关系，类似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只有具备初等数学的扎实功底，才能学好高等数学；只有具备坚定的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无神论的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的关系。不懂初等数学，或者初等数学的基础不好，就不可能谈论高等数学；但是有些不具备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人，却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从这种自认出发，他们往往做出一些害人害己、甚至危害社会的蠢事，还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要掌握一门科学，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知识。

(3) 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应注意处理好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与维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的关系。

我们长期进行的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是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以前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和教育的时候，确实有过这样那样的偏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盛行用“左”的一套对待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宗教。有些人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消亡学说，以为讲宗教消亡，就是现在去消灭宗教。他们组织群众和宗教信仰者进行有神

无神的大辩论，甚至强迫宗教信仰者放弃信仰。这些做法不仅伤害了宗教信仰者的感情，而且违背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说。正本清源，我们一面要大力宣传科学无神论的世界观，一面要依法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两个方面，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是错误的。在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破除新的有神论，破除这些年来滋生的各种迷信，反对打着宗教旗号进行的各种非法、违法活动。因为这种新的有神论和种种貌似宗教、实为迷信的活动，不仅侵蚀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影响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而且也损害了正常的宗教信仰。从这个意义上说，宣传科学无神论，也是为了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我们坚持正面宣传，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关心下一代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一步一步地提高我国人民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就一定能促进我们的民族精神健康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psi 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

于光远

psi 是什么

对中国读者来说，psi 是一个很陌生的外国字。在我国一千个懂外国语言的人当中，未必有一个人认识它。和 psi 有关的一些术语，人们熟悉的也不多。因此讨论到正题之前，只好用一些篇幅，根据英国、美国、苏联等的百科全书有关条目和其他一些著作，对文中要提到的几个术语做一些解说。

(1) psi 不是一个缩写，而是一个新字。它的出现不会早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一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英文字典中我们查到了它。在该字典上除了讲 psi 是一个希腊字母 ψ 的读音外，还讲了 psi 的另一个含义就是 psi phenomena，即 psi 现象。而对 psi phenomena 这一词的解释则是“心的超心理学的（parapsychological）功能的总称，包括超感官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 ESP）、预知（precognition）和心灵运动（psychokinesis）^①”。从“超心理学”专家的角度来说，把 ESP 与预知并列未必妥当。这一点读者看到下面就会明了。按照这部字典的解释，我们应该把 psi 译成“超心理功能”，但我认为还是译作“心灵现象”较好。为了简便起见，在这篇文章里不用这个译名，而直接用 psi 这个外国字。当然，说到这里读者仍旧不能了解 psi 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要讲清楚 psi 的含义就要先解释 ESP、PK 和超心理学这几个字。

(2) ESP 是 psi 的两大主要分支之一。这一类 psi 的含义是：不通过感觉的媒介而获得信息^②。在 ESP 中外界事物并不向被试者呈现，因此 ESP 的对象就不能叫做“刺激”，在“超心理学”中

用“靶子”这个名词来代替。按照“靶子”的不同，ESP 又分为三大类：传心术、天眼通和预知。“如果靶子是某个人的思想，这种 ESP 就叫做‘传心术’(telepathy)。如果靶子是某个客观事物，这种 ESP 就叫‘天眼通’(clairvoyance)。如果在被试呼叫时靶子还不存在，这种 ESP 就叫做‘预知’(precognition)^③”。传心术的另外译名是“心灵感应”、“思维通讯”等。天眼通包括“非眼视觉”、“遥视”、“透视”等。

(3) PK 是 psi 的另一个主要分支。这一类 psi 的含义是：精神直接作用于某个外界物体或某个客观过程，使之发生运动。PK 的另一个译名就是“意念致动”，直接作用于某一个人的 PK 叫做“心灵强制”(psychic coercion)。

(4) parapsychology 就是主要研究 ESP 和 PK 这两种 psi 现象的一门伪科学。parapsychology 的另一个译名是“心灵学”。

除了 ESP 和 PK 外，“超心理学”还研究 survival afterdeath (死后生存)(许多人就是因为关心自己的死后生存问题而热心去研究超心理学的)、appearances of ghost (鬼出现)、reincarnation (再赋肉身,也就是说鬼魂可以附在某个活人或活的动物身上说什么话,做什么事)、physical manifestation (灵的物化)、poltergeist (闹鬼,比方说可以在一所“凶宅”里经常出现奇怪的音响、玻璃被打碎等没有原因而发生的物理现象)等。

parapsychology 这个名称连同 ESP 和 PK 这两个术语都是这个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美国这个领域著名的“专家”莱茵(J. B. Rhine)首先使用的。

对有关 psi 的一些名词术语做了这样一番解释^④以后,我们就进入正题。

psi 研究侵入了我国科学工作的领域

psi 现象的研究或者超心理学这门“学问”,在这次大规模的

“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之前，在我国从来没有人认真对待过。当然也不能说它对我国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因为超心理学的名称虽然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它早就以“现代唯灵论”（modern spiritualism）或“心灵研究”（psychical research）的名称存在了，而超心理学是它的近代产物^⑤。“心灵研究”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获得“灵学”这个译名。我认为这个译名很好，因为它表明这种研究不是科学^⑥。汤姆逊^⑦所著的《科学大纲》很早就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最后一部分就是“灵学”。在中国当然也有对那种伪科学感兴趣的人，早在20世纪初他们就开始活动；20年代就有余萍客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心灵研究会”，出版灵学书籍^⑧。灵学传入中国之后，同中国原有的封建迷信以及当时的反动政治结合在一起，反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而当时革命的知识界也就对灵学家们的活动给以尖锐的批评^⑨。尽管如此，灵学方面的活动直至30年代一直有人在搞，而且搞得很起劲。^⑩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12年中，战争的环境使在外国新兴的“超心理学”没有能够在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建国以后，大家忙于建设，同时大家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伪科学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人对它做什么介绍。因此四十多年来这门“学问”的确几乎没有人知道^⑪。虽然在1965年到1966年和1976年到1977年出现过钉螺姑娘和董小四事件，但这些事件也没有同psi发生直接关系^⑫。

我国在很长时间内不关心、不传播心灵研究或超心理学这门学问，这对于中国人民革命、对于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⑬。我们知道，这门学问，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⑭。在这100多年中，它对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没有起到丝毫的积极作用。任何科学，对于革命，特别对于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事业，或者直接、或者间接，或大、或小，总可以起某种积极作用。而心灵研究或超心理学，由于它根本不是科学，而是伪

科学，因而不能起到科学的作用，而只能起到伪科学的作用，也就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⑤。从革命和建设的利益来考虑问题，我们完全用不着为我国在这方面的“落后”而遗憾。

可是，在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上登载的一则小小的消息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本来完全可以无须理睬的这门伪科学给予一定的注意。那一则新闻报道了四川省大足县一个12岁的男孩能用“耳朵认字”，引起了四川省科研部门的重视。接着不少报刊转载了这条“科研珍闻”，并且有好几处地方报纸和科技报报道当地也发现一些少年儿童具有类似“人体特异功能”的情况。这种荒谬的宣传，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日报》的批评。在1979年5月5日到18日间发表了两篇短文，对这种反科学的宣传进行了批评。6月2日《人民日报》刊出四川省医学院揭露大足县那个小孩弄弊的信息。就在这时候，香港有一位博学的先生于1979年6月18日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发表意见，对于我们党报的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他认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领导人对ESP（即“超感官知觉”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的缩写）这门学问或许“所知甚少”；说我国“某些领导人的科学知识还不够现代化，态度似乎也不大科学化”；并借别人的话说，“如不改变这种情况，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ESP是psi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超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应该承认这位先生是把“超心理学”和我国四个现代化联系起来的第一个人^⑥。我国“耳朵认字”宣传者非常重视这位先生的言论。他们当时受到党报批评，有的正在检讨，有的正在观望，有的还在抵制。现在海外有人支持，他们的腰板就硬起来了。原先处于动摇状态的，现在“坚定”了。原先并没有积极进行这种宣传的一些人，现在得到这种消息，预见到它的发展前景，也投身到这个行列中来了。属于最后这一种情况的，我认为不应该忘记上海《自然杂志》的作用。这本杂志从1979年第9期开始，连续登载“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它在重振“耳朵认字”宣传的事业上和把“超心理学”这门很少为我国人所知的学问引进

我国来方面的功劳，是应该得到肯定和重视的。这个刊物编辑部后来成为鼓吹这门伪科学的中心，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在《人民日报》批评“耳朵认字”宣传的文章中，讲了两句这样的话：“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的脸……听说香港的报纸和‘美国之音’都做了报道，一定会引起外国有识之士的讪笑。”为了证明“外国人并没有讪笑”，有一位“耳朵认字”的宣传者著文说：“有许多国家的新闻出版机构也如我国那些被指控为‘缺乏常识’的新闻单位一样，在热心传播着这一消息。有些著名的专家教授还来函来电，索取有关方面的资料。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并没有表现出忍俊不禁的神情。这是不奇怪的，实际上，在国外也有类似的人体特异功能被观察到，并在进行研究之中。”这位作者还引用上述香港的那位先生的话说：“对超感官知觉（就是不通过眼耳等感官，而得到视觉、听觉，还包括预见能力等）的研究，西方早就着手了^⑦。”《自然杂志》编辑部也发表专文介绍法国罗曼（M. J. Romain）《非眼视觉》一书^⑧。许多报刊纷纷发表了所谓讨论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大量宣传“超心理学”的种种“事实”和“理论”。有的地方还出版了专门宣传超感官知觉的书^⑨。有的大学和外国大学中的“超心理学”家建立起联系，协议合作研究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现象^⑩。中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和外国的“超心理学”家相互引为同道。在短短的两年多中间，我国“超心理学”的“水平”的确大大提高了，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到1981年5月中旬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时，据说“在新功能的诱发训练工作上，一年多来进展神速，人体特异功能已远远超过‘耳朵认字’这一概念，不仅身体各部位都有认字辨色的功能，而且有可以不接触试样进行离体辨字的遥视和透视的功能，有对被感知的信息进行展开、拼合、放大、缩小和分层辨认等处理和加工的功能，有对残余信息感知的功能，以及拨表、开花、折枝、移物等致动或做功的功能等。这一连串新功能的发现，具有重大的

科学意义^③”。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就有 106 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所，提交会议的论文和报告 147 篇。真是人才辈出，成果累累。到 1981 年，我们就再也用不着谦虚地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内行了。香港的那位先生也就可以不必再责备我们对 ESP “所知甚少”了。

在重庆召开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的时候，“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达到了最高潮，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从 1979 年起对《人民日报》进行反攻的两年中间，所有不同意这种反科学宣传的文章和观测报告根本发表不出来。在某些学校和其他机构内部占用工作时间和仪器设备做这种“超心理学”的试验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在个别省市，这种宣传得到了某些负责人包括科委和科协的某些负责人的支持或默认。他们把这种研究称之为人体科学，而真正研究人体科学——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特别是脑生理学）、心理学的学者，则认为这种研究“是一场闹剧”。他们还在要求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鉴定他们的“研究成果”，要求科学界承认它们是科学而不是伪科学，要求全国科协接受他们的研究会为团体会员……现在，问题摆在中国科学界的面前，究竟应该怎样来对待 psi 研究。我想，为了对它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还是让我们再来看看 psi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看看我国的人体特异功能又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吧。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的同与异

psi 所包括的天眼通、传心术、心灵运动同两年多来宣传的“人体特异功能”，可以说完全是一回事。

据说，我国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人能够用耳朵、腋下、手等非视觉器官的人体许多部位辨认图像，而且可以辨认处于隐蔽状态的图像（如折叠起来的、揉成一团的、密封在纸袋里的、装在塑料盒子里和玻璃安瓿里的，甚至装在 10 毫米厚的铅罐里的纸条上的图像），可以把撕成碎末的纸拼在一起辨认出来，可以用正常

的眼隔墙看物，看到地下水、金属矿、巷道，甚至可以看到几千里以外的情景……。这些功能就属于 psi 中的天眼通。

我国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人，能够不经过任何物质手段了解别人脑子里所想的東西。比如父亲心里计算算术题，有“人体特异功能”的小孩子就会知道并把它写出来。两个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小孩，一个坐在房间里，另一个被叫出房间，让她看一个字，一幅图画，甚至一个完整的小故事，然后回房间；过了一段时间，原先等在房间里的那个小孩就可以“看出”这个字，这幅图画，甚至这个故事。……这些在两年多来“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中被称之为“心灵传递”或“思维通讯”的功能，就属于 psi 中的传心术。

我国具有“人体特异功能”的人，不用自己的肢体和体力，仅仅用自己的意念，就能够把装在一个盒子里的锁打开，把一物从甲处移往乙处，让表走快或走慢很长一段时间；能够把植物的枝茎、花朵从植株上摘下来，并使它穿墙越户地自己飞到盖着的玻璃杯里去；还能够把金属刀叉等看弯看断，又可以把断了的刀叉焊接起来而不留一点痕迹。……这些东西，在两年多来“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中被称之为“意念致动”，它就属于 psi 中的心灵运动。

我国两年多“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中报道的种种特异现象^②，大都是国外关于 psi 现象中早就报道过的，都可以看做属于 psi 的功能。

总而言之，我国的“人体特异功能”同外国所说的 psi 在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差别的。这是因为：

第一，它们都根本不是事实，都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中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我们生活在其间的这个世界。可是特异功能的宣传者们却认为在我们这个常态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异态”的世界。这个异态的世界，除了“特异人”之外，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普通人感觉不到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仪器测

试不到的^{②③}。他们认为在我们这个有形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无形世界；除了有形人之外，还有无形人；有有形眼、有形耳、有形手，还有无形眼、无形耳、无形手。“真谓：人外有人，世外有世；有形无形，奥妙无穷^{②④}。”他们认为在我们三维空间之内做不到的事情，在四维或多维的空间都可以做到^{②⑤}。他们实际上都是反物理学的（从而也是反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他们不是反对某个物理学规律的普遍性，而是反对作为唯物主义基础的物理学本身^{②⑥}。

至于 psi 或人体特异功能得以存在的“理论”（如果说他们还有什么理论的话），那是极其荒谬的，以致《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讲到“超心理学的理论”时写道：“对超心理学的发现作出解释的最简单的理论是 Price 等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充分控制条件下所得到的超过机遇的结果都是欺诈^{②⑦}。”英国大百科全书则写道：“许多科学家对这一领域的重要异议是：超心理学几乎完全缺乏对基础的过程（underlying process）进行勉强说得过去的理论上的论证（plausible theoretical account）^{②⑧}。”

第二，它们都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进行反科学的宣传的。他们声称这类特异现象有“事实”的根据，可是，没有一个“事实”是经得起严格的检验的^{②⑨}。他们的试验不具备可重复性。

美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专门有“ESP 实验的可重复性”这一节，说：“很少 ESP 试验曾被多次重复并得到类似结果。对这一事实的看法，不外有三种解释：①任何重要发现都不过是观察不良的偶然结果或是碰巧了；②确定 ESP 能力发生的精确的变量没有交待得十分清楚，因之关键的心理条件无从控制，所以实验结果不可能一样；③主试是 ESP 情境的一个内在部分。自然的、生动的兴趣有助于 ESP 的成功。但没有一个主试能无限地保持自然兴味，因之同一主试重复实验也会遭到失败。”《大英百科全书》上也说，“得高分的被试（highscoring subject）只能勉强地感知偶然机会看到的现象”，“欺诈问题侵袭着这一领域”，“大多

数专业的科学家对超心理学很少兴趣,或很不熟悉这方面的研究。美国大多数成熟的心理学家并不认为 psi 现象是真实的。就是在超心理学运动 (parapsychological movement) 内部,对加强超常现象 (paranormal phenomena) 可靠性的反批评也有争论”。对于超心理学的统计方法论,许多科学家保持沉默,甚至讥讽。世界上没有一门学问,它的“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像 ESP、PK 那些“实验结果”的真实性那样受到普遍的不信任。这不但因为这些实验结果如此荒唐,以至于同经过大量实践所得到的科学原理不能相容;还因为这些试验是无法重复的。

《在科学名义下的时髦货和谬论》一书的作者写道:“反对莱茵使其最受责备的事实是,除了极少数例外,做实验工作的人,肯定他的发现的都是和他一样的强烈相信心灵现象的人。而对心灵现象怀疑的心理学家们做了成百次测试,所得的都是相反的结果。莱茵把它归因于做实验的人的态度会对被试者发生显著的影响。如果科学家是一个不相信的人,那么就会破坏被试者 psi 能力的脆弱的作为。”

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从外国超心理学家那里搬来了这种理论。北京大学的一位同志讲:“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王氏姐妹和姜某的这种特殊感应功能并不像视觉功能、听觉功能那样随时都可以接受刺激产生感觉。受试者的精神状态与测试结果有密切关系。当受试者心情愉快、精神兴奋时效果就好;而受试时,人生地疏,观察者众多或受试者饥饿疲乏等情况下效果就差。”^④在做实验工作的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并且采取严格的措施来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时,就很难保证被试者心情愉快和精神兴奋,也做不到不人地两疏。按以上这种说法,即使失败了也不能否定这些相信者所做的实验的结果。这种“诚则灵”的科学实验理论,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所不能接受的。

有好几位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的同志抱着弄清事实、研究科学的目的,找具有这种“特异功能”的人进行测试(有一位

还愿意出比某大学多一倍的“营养费”)，被坚决拒绝的理由就是这个。

有一段“妙文”，我想不妨在这儿摘引一下：“现在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儿童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新奇了，所以想看特异功能表演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过去多次表演的效果是不好的，所谓效果不好，是目的和效果不一致，很多观看表演的人都是带着怀疑的观点和相反的感情，表演的人又经常因为主观上的紧张情绪和客观上的各种干扰而往往表演失败。失败并不算什么，因为失败也是真实的，可以取得观众的谅解，科学实验不可能都是成功的。但这一点我们却有说不出来的苦衷，表演特异功能的儿童有时因情绪紧张会影响功能，但也有的是客观原因，如：气功师的干扰。似乎也可以说是观众的意志和表演者的意志互相干扰的关系。如果表演人的意志很强，功能也很强，那就还可以表演出来；如果功能较弱，再加上情绪不好，就表演不出来了。实际上做出来是客观存在，做不出来也是客观存在^⑧。”一个“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积极分子在重庆会议上所作的重要报告中的这一番话是特别值得人们重视的。在这一段话中包括这样几点意思：

(1) 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的表演，效果往往是不好的，同他们的目的不一致。

(2) 失败的原因很多，如观看者带着怀疑的观点和相反的感情。在表演时，存在观众的意志和表演者的意志互相干扰等。

(3) 表演失败是无所谓的，因为失败也是真实的，做得出来是客观存在，做不出来也是客观存在。

上面介绍的国外“超心理学”家讲的 psi 与我们国内讲的“人体特异功能”，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它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在这里有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既然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都是捏造、虚构的东西，那么要寻求它们的差别，就只能从

如何捏造和虚构的角度来看，只能从它们都被捏造和虚构成一个怎样的东西来看，只能从他们如何去说明所捏造和虚构的东西来看。这样比较的结果是：在外国超心理学家那里，psi 被率直地认为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非物理的东西。莱茵在为《美国百科全书》所写的“心灵研究或超心理学”这一个条目里写道：

“ESP 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们与全部时空定律无关。……ESP 试验已经证明距离对成功没有影响。……其他的指标支持距离试验的结果和反对物理的解释。……最难用物理来说明的是预知的证据。……ESP 是非物理的。……ESP-PK 或 psi 过程是正常人的一种自然功能，与感觉运动过程截然不同，主要是后者与物理世界有密切的相互关系而且反映它们的原理。前者（psi）没有显示出物理的性质，与更高级的思想过程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更像是人的灵敏的、富有创造力的‘灵魂’的功能。”

“psi 能力的这种非物理特征的确立，打开了心理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多少是无益的、一直在探求的精神实体的独特世界的、一种评价的道路。但是人的这种非物理的部分必然不被认为是完全清楚的；它与肉体的有机体和它们的世界在相互作用着。……超心理学已经给予科学的最黑暗的角落——科学家自己的心的本质投入新的光明。”

莱茵对自己工作的历史背景，讲得也是很清楚的。他说：“精神感应术（传心术）受到较大的兴趣和大量的研究，特别是在英国心灵研究学会的创建到 1930 年这一期间。原因是相信精神感应术对唯物主义提出特殊的挑战，而唯物主义已开始统治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在科学的名义下的时髦货和谬论》的作者根据莱茵的话，说他“至少把心的一部分从物理世界中分辨出去，这是对灵魂、自由意志和死后生存给予了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外国“超心理学”家对 psi 的态度是公开站在非物理学的立场上，有的更为彻底的超心理学家认为，在这个领

域中把物理学和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上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痕迹消除得越干净越好。从这个观点出发，这些人甚至对已经很普及的 ESP 一词都提出了异议，因为其中有 sense (感官)、sensory (感官的)、perception (知觉、理解) 这样正统的心理学上的术语缀合在里面。因此，他们认为这个术语抱有心理过程是感知过程的偏见，主张用 “psi — gamma” 代替 “ESP”，主张用 “psi — kappa” 来代替 PK。

欧洲和美国的这些心灵研究或超心理学的研究者们，由于他们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毫无顾忌地说出他们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但是我国的“特异功能”的积极鼓吹者，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公开站在反对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是很不方便的，何况在这些鼓吹者中间有的还是共产党员。因此，虽然他们的思想和许多实验方法都来自西方超心理学家，但是他们在虚构“人体特异功能”时就不能像 psi 那样自由。他们申明自己“坚信人体特异功能现象有关过程，必定是一个物质运动的过程。通过研究工作揭示出这一过程的科学机制，必将扩大辩证唯物主义的阵地”。他们说：“人体特异功能现象至今尚不能被已有的科学理论所充分解释（请注意：这就是说在他们那里已经有了解释这种‘现象’的科学理论，只是不够充分！），这正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进行这项研究工作在科学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这一现象，并努力对它做出科学的解释，正是为了反对封建迷信，而且我们深信这才是彻底破除迷信的根本办法。”^⑫

这样，如果说在外国“超心理学”家那里，psi 是一个性格多少还比较明朗一些的概念，那么“人体特异功能”就成为一个矛盾百出、多种性格的畸形儿。说这些“特异功能”同外国“超心理学”家所说的 psi 一样是一个“非物理的东西”，人们还比较好懂；可是我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的专家们则特别喜欢用物理学的名词来装扮这种特异功能。他们大量使用物理学方面的名词：透视呀，遥视呀，电磁波呀，力呀，能呀，场呀，录像呀……说这

些“特异功能”和外国“超心理学”家所说的 psi 一样是非人体的灵魂的现象，人们也还比较好懂；可是他们又硬说它是“人体科学”中的重要部分。因此“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就更加不能自圆其说。

从这些地方来看，我国“人体特异功能”还不完全等同于外国“超心理学”家所说的 psi。它是 psi 的一个变种。

怎样对待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都是伪科学。它们的研究者和宣传者都称之为科学，但这是我们科学界所不能承认的。在外国，这门伪科学也拼命地向科学工作体系中钻，并为此做过长期的“奋斗”，但始终得不到科学界的公认。当然，相信这种伪科学的个别科学工作者是有的。在 19 世纪有华莱士、克鲁克斯、劳奇、汤姆逊，在 20 世纪有詹姆斯、弗洛伊德等。正是由于一些科学家，甚至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支持，这门伪科学才有现在这样的局面。但是绝大多数科学家是不承认它是科学的。在宗教信仰传统较深远、影响较大的国家中，存在一种调和科学和宗教的思想倾向，这可以从一些科学家的著作中看到^③。这种思想使一些科学工作者不能对 psi 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即使如此，绝大多数科学家不能承认它们是科学。在有的国家中，如美国，据说有将近 200 来个“超心理学”家挤进了某些高等学校^④；但在有的国家，“超心理学”家则在高等学校没有地位，只是在商业电视台里作为逗趣的东西表演给观众取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这类现象没有什么奇怪。而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是有领导的进行的，而建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就有一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如何对待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问题。现在我国搞这方面活动的一些人把他们的活动叫做“科学工作”，把他们的宣传叫做“科

学宣传”或“科学普及”工作，把他们写的东西有的叫做“科学论文”、有的叫做“科学实验报告”、有的叫做“科学资料”，在“科学杂志”、“科技报”上发表。他们进行“科学演讲”，他们的表演被拍摄成“科学珍闻”的电影，他们开了两次规模不小的“科学讨论会”，还正筹备着一个没有人体科学专家参加的“人体科学研究会”，使用着某些地区、某些单位的科学研究费用，他们的“发现”要求作为科学成果来进行鉴定……总之一句话，要求在我国科学工作体系中有他们的地位，有他们的研究机构，有他们的专家头衔，有他们的出国名额，等等。

我们现在写的是一篇学术性的论文，不想对具体工作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如果要我们就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在我国科学工作中应该不应该有它的地位的问题表一个态的话，那么，从前面几节的简要叙述中，我认为可以做出完全否定的回答。如果在我们的科学工作体系中也包括伪科学，那么它还能成其为科学工作体系吗？

既然不属科学工作的体系，那么我们就不要用对待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它。它就不应享受科学工作的权利。

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科学事业的一个根本方针。关于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适用于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这样的伪科学的问题，需要根据它们的性质进行讨论研究。我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学术争论是属于百家争鸣这个范围之内的。这是因为尽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但是两者之间的争论还是属于是非之争，彼此之间在必须遵守逻辑这一点上，还是有争论的基础的。对于 psi 与“人体特异功能”我看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一直主张允许唯心主义者参加争鸣，而且允许公开的唯心主义者参加争鸣。对于挂着唯物主义招牌的唯心主义者来说，当我们用有力的论据，说明其思想实质是唯心主义的，我们就可以在争论中得到了胜利；可是对公开的唯心主义者来说，他们可以不理睬这一点，说：“我们

本来就是唯心主义者，你们证明了的正是我们自己承认了的，但是我们究竟错在哪里，你们并没有论证。”因此，我们就要在今天这样具体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公开唯心主义的言论，进行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哲学根本问题的公开的争论。这种争论有助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真正获得锻炼。如果不允许他们争鸣，用压服的办法对待他们，不许他们说话，结果就降低了我们自己的水平。

我认为可以允许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鼓吹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论证。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不等于在科学上承认它们的地位。对于这种伪科学，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对他们进行批评。但是既然是争论，也就应该允许他们反批评。在争论中首先我们要维护辩证唯物主义本身，不容许对它进行曲解。比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就被他们曲解为经验主义的原理。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不能跟着他们瞎说一通。在我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的鼓吹者中间，绝大多数人是不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允许他们讲清楚自己何以不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我们不想把唯心主义的帽子强加到他们头上，只要他们讲清楚了，即证明自己所坚持的不是唯心主义，我们就要承认错误。“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中间不是有人已经讲我们是不承认事实的主观主义者或者是不懂辩证法的机械唯物论者了吗？对此我们并不介意。让争论的结果来说话吧！

psi 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还以科学实验的名义出现。因此在争论时就要讲清楚什么叫做科学实验，如何去做科学实验。我们本来认为如此宣传的人体特异功能是根本不可能的，是用不着进行实验就可以做出判断的事。但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认清事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使更多的人了解这是弄虚作假），我们主张不妨再进行一番测试，但这必须是真正的科学实验，必须是在严格条件下进行的实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评两年多来“耳朵认

字”的宣传》一文中用专门的一部分进行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打算写了。

注 释

- ① 见《韦伯斯特国际字典》第三版。在 1959 年订正的这一版中，收有 psi 和 psi phenomena 这两个词。
- ② 莱茵在为《美国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心灵研究或超心理学》中说，psi “有两大主要分支，多少是像在普通心理学中感觉和运动那样相平行地划分的。”他对 ESP 的解释是“信息的获得与其说是靠感觉的媒介，不如说是靠超感觉：在没有感觉器官的帮助下了解外界事件的行为”（见《美国百科全书》1963 年版，第 732 页）。
- ③ 《美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一卷，1968 年版，第 381 页。在超心理学的实践中，把实验材料称作“靶子”，把被试者的反应就叫做“呼叫”（call）。
- ④ 我在《百科知识》1982 年第 1 期上发表的那篇《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对有关名词讲得更详细些，读者可以参阅。
- ⑤ “现代唯灵论”与古老唯灵论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它用近代科学的语言甚至用近代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古老唯灵论者所主张的迷信和宗教观点。“现代唯灵论”者刚开始沿用“唯灵论者”的名义，他们的出版物就定名为《唯灵论者》和《唯灵论者新闻报》。后来为了表明他们的研究是科学的，1882 年在伦敦成立组织的时候，就改用“心灵研究”这个术语，而超心理学则在 1930 年以后才开始使用。唯灵论、心灵研究和超心理学一脉相承，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 ⑥ parapsychology 译作“心灵学”，也是一个很好的意译。现在唯灵论、心灵研究和超心理学各有相对应的欧洲文字的词汇，而灵学则没有，但是我倾向于保留“灵学”这个汉文词汇，作为“唯灵论”，“心灵研究”和“超心理学”的总称，表现其共同的东西。
- ⑦ 汤姆逊（J. J. Thomson）也是一个心灵研究专家。他同克鲁克斯（W. Crooks）、劳奇（Oliver Lodge）等都是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是 1882 年在伦敦成立的“心灵研究学会”的主要成员。
- ⑧ 早在 1916 年，在日本神户市留学的中国人就成立了“中国精神学会”。这是中国心灵学组织的先驱。后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心灵学会”，会长是余萍客。这个学会办了个“心灵科学书局”。这个书局出版的书有《心灵学讲义》、《千里眼》、《灵力发显术》、《心灵光》、《人电术》、《桌子浮扬现象》、《神通入门》、《新灵子术》、《太灵道》、《显明法》等。当时其他出版社也先后出过《唯心奇术》、《神秘灵子术传授

录》等书。从这些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到，那时也热闹过一阵子。

- ⑨ 鲁迅是对灵学的一个尖锐的批评者。1918年鲁迅曾对当时一些书刊所宣扬的灵学鬼怪之类的东西进行过抨击。他写道，当时一位神童做了一本《三千大千世界图说》，“他拿了儒、道士、和尚、耶教的糟粕，乱作一团，又密密地插入鬼话。他说能看见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见的‘地球星’，虽与我们所晓得的无甚出入，一到别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门了。因为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领在科学家之上。他先说道：‘今科学之发明，欲观天文则用天文镜……然犹不能持此以观天堂地狱也。究之学问之道如大海然，万不可入海饮一滴水，即自足也。’……”《灵学杂志》上有一位名叫俞复的人写道：“鬼神之说张，国家之命遂促。”针对这种情况，鲁迅写了《热风·随感三十三》进行批评。
- ⑩ 见鲁迅的《花边文学·偶感》。在这篇杂文中，鲁迅批判当时留德学生白同发明的“科学灵乩”——碟仙。那是用一只扣在画有凶吉的纸上的碟子来代替乩笔的把戏。
- ⑪ 我在1949年建国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个由国外回来的同志那里看到一本超心理学的“实验报告”。这个报告报道被测试者猜测psi纸牌（它是Rhine设计的一种特殊的纸牌，分星、圆、方、十字形和三条波纹构成的波形五种，每种各五张，共25张）时，被测者的心理状态（发愁、高兴、兴奋等等）和猜中率之间的“函数关系”。这篇论文有大量的图表和大量的关于概率论的数学计算。因未保存下来，现在我不能说出作者的名字和实验报告的题目和出版社了。
- ⑫ 关于这两次事件，请参阅《评两年多“耳朵认字”的宣传》第二部分。
- ⑬ 这种伪科学是会对革命事业产生不利影响的。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就看到当时的降神术和现代唯灵论对革命运动的危害。恩格斯1878年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就是从革命利益出发而写的。早在1872年5月恩格斯就写信给李卜克内西，谈到他对在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相信降神术的资产阶级分子划不清界线这一点不满意。1886年11月，他又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美国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习惯（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荒唐东西。如果那里存在着清醒的理论头脑的人能先预告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么，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缩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7页）。不能让群众被降神术、超心理学之类的东西所愚化，对于革命和建设都是很重要的。任何时候，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都应该有清醒的理论头脑。
- ⑭ 灵学究竟何时开始，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人们常把麦斯默尔术看做是现代唯灵论

的先驱者，然而麦斯默尔（他是奥地利医生）本人只是根据“动物磁性说”的不科学的东西在巴黎行医，还没有涉及今天我们所说的 psi 现象。但是在麦斯默尔术的传播过程中，就开始报道远远超出医学范围的特别现象。19 世纪 20 年代，麦斯默尔术从法国扩展到了德国、英国和美国。麦斯默尔的追随者除了行医外还报道说，他们发现了这样的现象，如“不说一句话就能在两个心灵之间传递思想，读平常无法阅读的密封的信，感觉的互换——用指尖代替视觉等”。当时已经涉及了“传心术”、“天眼通”和“感觉的换位”的奇迹，使一个科学调查委员会相信了这些东西，并写进了他们的调查报告（见墨非·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文版，第 231 页）。可见至迟在 160 年前，psi 已经侵入科学的领域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得更早一点。18 世纪 50 年代德国哲学家康德从他的一个学生那里听说关于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的一个瑞典哲学家和数学家斯维登伯格的传说：这个科学家晚年能看见神灵，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同死者交往。他曾受荷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遗孀的委托和她死去的丈夫交谈，了解到她丈夫所藏文书的一个秘密地方。他能在距离斯德哥尔摩 50 英里之外看到斯德哥尔摩发生的火灾。最初一段时间，康德对这些传说的可靠性并不怀疑。后来他读了斯维登伯格写的长达 8 卷的《天堂的秘密》之后，确信此人搞的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于是在他所写的《以形而上学的幻想解释视灵者的幻想》中，对斯维登伯格的著作作了辛辣的嘲讽，说此书卷卷“充满了胡言乱语”。二元论的哲学家康德相信灵魂存在，这一点毫不奇怪。即令如此，他还是从相信视灵者到识破其骗局。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可思议？》的作者则叙述康德如何重视斯维登伯格的特异功能并为之著书立说，力图在读者中造成康德肯定特异功能的印象。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为了证实人体特异功能而不惜歪曲事实和借重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名气，这真是无聊。

- ⑮ 马丁·伽特耐尔（Martin Gardner）著有《在科学的名义下的时髦货和谬论》（Fads and Fallacies in the Name of Science）一书。在这本书中有专门一章讲 ESP 和 PK，它把 ESP 和 PK 与飞碟等一起看做“近代伪科学者的稀奇古怪的理论和围绕这些理论的奇妙的、逗趣的和吓人的迷信”。该书作者说他的著作是“对人的易受欺骗性的一个研究”。这样一个研究题目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 ⑯ 李学联：《以耳认字，未必荒谬》，1979 年 6 月 18 日香港《明报》。
- ⑰ 《耳朵引起的风波——非视觉器官识别图像的事实与争论》，此文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待揭之谜》一书中的一篇。
- ⑱ 罗曼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超网膜视觉和超光学的感觉》（A Study of Extra-Retinal Vision and the Paroptic Sense），1921 年巴黎出版，1924 年伦敦和纽约出版。
- ⑲ 吉林人民出版社在 1981 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不可思议？——人体超级能力现象》的书，就是根据日本三本宣传 ESP 的书编成的。

- ⑳ 美国爱丁堡大学李绍昆教授在给《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寄来的书面发言中透露：“去年（一九八〇）夏天，我应教育部之邀回国一行……在武汉大学访问时，该校领导的支持和几位教授的努力，我们达成了一项原则性的协议，即今后几年武汉大学将和我们爱丁堡大学合作研究儿童特异现象，并且将举行校际科学讨论会。”这个书面发言还透露，1983年8月美国“超心理学会”决定“邀请中国专家学者来美访问”。“全美三大电视台之一的ABC公司……委托本人（即李绍昆）向中国方面取得有关研究的记录片。《询问周报》的记者杜肯要与本人（也即李绍昆）合作，在最近的将来以英文共同撰写一部《超心理现象在中国》。”这位李绍昆教授很欣赏我国“耳朵认字”宣传者的一段话：“如果我们现在把一切不能解释的现象都斥为‘迷信’，这绝不是科学的态度。这说法本身倒是一种‘迷信’。”
- ㉑ 见《人体特异功能一年来研究进展和展望》（《自然杂志》1981年第7期）。
- ㉒ 我写的《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从1981年第10期开始在《知识就是力量》上连载。全文共七个部分：（一）两年多来“耳朵认字”宣传的经过；（二）这种宣传不是新现象，也不只是我们一国的现象；（三）如此宣传的“人体特异功能”根本不是事实，只不过是利用魔术手法的弄虚作假；（四）对“耳朵认字”宣传的揭露和批评的文章，都未能获得发表的机会；（五）为了在更多人面前揭穿这种弄虚作假，不妨再作一番测试，但必须是真正的科学实验；（六）要从哲学上根本解决问题——反对经验论；（七）是停止这一宣传的时候了——但这一类宣传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会绝迹的。现在只发表了前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介绍了宣传中的我国“发现”的“人体特异功能”都有哪些。因为人体特异功能五花八门，报道的“材料”极多，在那篇文章中只是简单地分了一下类。
- ㉓ 见《人体特异功能移物的若干实验》（《自然杂志》1981年第9期）。
- ㉔ 见中国科技大学五位同志为重庆会议提交的论文《意念论》。
- ㉕ 注㉓的那篇实验报告就写道：“物体在转运过程中能够突破空间物理障碍，表明这种‘转运’似乎不是三维空间里的简单的机械搬运过程。”在国外灵学文章中讲四维和多维空间的很多。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中就曾专门批驳这种谬论。
- ㉖ 可参阅《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第三部分。
- ㉗ 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Social Science）1968年版。
- ㉘ 见《大英百科全书》1973年版。
- ㉙ 在灵学研究的历史中，20世纪30年代发现，美国Rhine的工作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运动等现象。在他之前，甚至在古代，对这早就有了记载，民间也有大量传说。他的贡献甚至也不在于把“近代科学方法”应用到这个领域。这个功绩应该记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伦敦“心灵研究学会”的学者们的头上。那个学会的宗旨就是“以科学的精神，不抱成见地检查人类

实际上或被认为是有那种不能以一般假说予以解释的能力。”Rhine 的贡献就在于他设计了一套测试 ESP 和 PK 的实验方法，发展了分析实验结果而得到的理论，为 ESP 和 PK 的“真实性”提供了所谓“系统性的证据”，使得在他以前的心灵研究者们提供的证据成为这种系统性证据的补充，并获得非系统性证据的名称。这种非系统性的证据或者是收集到的自然的案例，这里出现了一件特异的现象，得到了这种报道，把它们作为存在这种特异现象的论据；或者是对敏感人（即具有特异功能的人）的研究，即对这类人的观察和测试。在 Rhine 以前的心灵研究的著作中大量的有这样的材料。后一种证据只要我们看一看《“凯蒂·金”的最后出现》（克鲁克斯的作品，1974 年）、《关于派珀夫人的霍奇逊控制的报告》（詹姆斯的作品，1909 年）等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一类非系统性的证据的不可靠性是很明显的，Rhine 企图用他的系统性的证据去加强它们，即去证明它们是可能的。可惜 Rhine 的系统性的证据本身也是站不住的，因为他的结果对不相信的实验者就重复不出来。有的学者，如 John Coover 以一本六百页篇幅的著作，用大量测试数据证明 ESP 不存在。可是 Rhine 又用种种办法，制造像“移位”（Displacement）（即可以把出现较早一些靶子或出现迟一点靶子呼叫出来的这种功能）、“躲开靶子”（专门叫不出来的一种功能）等等说法，按照这些说法，像 Coover 这样六百页的书也就证明不了不存在 ESP 了，Rhine 和他的追随者的实验方法在心灵研究中可以说是最“严格”的，尚且极不可靠，其他的“证据”就更不用说了。中国这两年多来的“耳朵认字”等“人体特异功能”提供的证据，绝大多数还属于非系统性证据的性质。它在心灵研究方面的水平大体上相当于 19 世纪中叶和下叶那个非系统性证据的性质。关于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真实性的实验报告，在《自然杂志》和其他一些出版物上登出过。对这些“报告”不妨重复一下，以揭穿它们的弄虚作假。在上引《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的第三部分，我指出他们所有实验都是不可靠的。

③⑩ 这种言论是很流行的。这段话引自《某些人具有一种特殊的感应功能》一文，它是一家报纸对北京一个大学好几位教师对王氏姐妹、姜某测试情况的报道。

③⑪ 见《推动人体科学研究》（《自然杂志》1981 年第 7 期）。

③⑫ 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纪要》中，他们又一次由自己来宣布“人体特异功能”的真实性。说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实验结果表明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他们在这个纪要中不得不承认“有的实验设计尚不够严谨”，承认“在实验中也确曾发生某些特异功能儿童作假的现象”，承认他们的宣传中有“夸大甚至失实之处”。但直到现在，我们从他们的刊物上，从他们的文章中还没有看到具体指出过哪一次实验设计不严谨、哪次实验弄虚作假的说明，也无从知道究竟哪一点宣传是“夸大”了、“失实”了。他们不讲自己有没有弄虚作假，而把弄虚作假的责任向小孩身上推。他们把小孩作为实验材料公布，又

不许别人引证他们的实验，不许别人评论他们的实验，这样做是很不老实的。在纪要中他们承认在他们当中有人“招摇撞骗进行封建迷信活动”。但又说，“这是我们历来所坚决反对的”，但是谁也没有看见他们自己揭露过这种招摇撞骗，反对过封建迷信，而只看到他们大量宣传封建迷信，如在他们的科学讨论会上的文章中肯定“请青蛙神”、“请竹笠神”、“算命”等等是有道理的。在这个纪要中，他们表示：“把人体特异功能跟封建迷信，唯心主义的‘唯灵论’等混为一谈的看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用大量材料证明人体特异功能就是 psi 的变种，这不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而是因为人体特异功能与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本来就是一路货色。所不同的就是我们这里分析的那几条。而且在这个纪要中，他们说自己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唯灵论，但是他们对外国现代的“超心理学”的态度怎样，却一个字也没有说。这大概是因为前不久在《人体特异功能通讯》上才发表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爱丁堡大学教授李绍昆博士的给“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书面发言的缘故，这个书面发言透露我国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同外国“超心理学”家有过不少交往，不好一下子否认。另外一个原因，恐怕就是舍不得丢掉这方面的“国际友人”。

- ③③ 丹皮尔的《科学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的历史》是一部科学史料相当丰富的著作，但他无疑是站在调和科学和宗教的立场上的。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不能对灵学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著者认为，对“所谓灵魂的研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种研究是否能产生有科学价值的结果。在‘唯灵论’的现象中，有许多是出于自欺或有意的诈骗。但在合格的观察者的眼里，即使把一切欺骗成分除去，仍有一些现象不能解释，值得加以科学的研究。要考察这些现象，研究者必须有特殊才能，对歇斯底里和邪术家的法术都要有一些经验。灵魂研究学会的刊物中载有许多精细的研究，但唯灵论的解释是否合理，有资格的人士尚无一致的意见。在获得更多用严格的方法检验过的知识以前，我们最好不下判断”（该书 1958 年剑桥版，第 357 页）。这是貌似客观的观点。他主张“真正的宗教是一种更深奥的东西——建立在直接经验这一块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同上，第 495 页）。其实作者的态度是有倾向性的。在结束这本书时他写道：“如果从精神的观点看人，则人仍然是一个理性的心灵，与一个活着的灵魂。科学已经认清其真正的意义，不再想用定律的羁绊，来束缚人的精神，而听任他用他的灵魂所需要的任何方式自由接近神灵”（同上，第 497 页）。他主张去“寻求灵魂对于真正的宗教的探索”（同上，第 499 页）。

- ③④ 南山宏：《世界怪奇情报大事典》，1978 年讲谈社版，第 229 页。

对“特异功能”、伪气功、邪教论战 20 年纪事^①

申振钰

1979 年 3 月 11 日,《四川日报》编发了一篇报道“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副标题是“省有关科研部门已采取措施,对这一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从此揭开了“人体特异功能”大论战的序幕。3 月 16 日《上海科技报》率先转载了这篇报道,随后,全国数十家“科技报”及地方报纸转载这个消息。^①

1979 年 3 月 13 日至 20 日,根据四川省科委的决定,儿童唐雨不再接待测试,专门由四川医学院派专家来考察。四川医学院派了科研处副处长吴家骏,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刘协和,眼科医生刘安负,科研处工作人员陈开俊等四位同志,对唐雨进行了为期 8 天的 25 次调查测试。这 25 次测试除 6 次偷看未成,拒绝测试外,其余 19 次都是偷看认出的。其结果证明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

1979 年 3 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批准成立了“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由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任第一届理事长。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全国性的气功群团组织。

1979 年 4 月 3 日,四川医学院调查组联名写了调查报告,指出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

1979 年 4 月 4 日,北京石景山区模式口小学二年级学生姜某,由学校老师和区教育局同志陪同,到中国科学院(简称“中

^① 本文是 1979~1999 年的 20 年纪事。

科院”)信访处上访,称姜某也有“耳朵认字”功能。

1979年4月13日,《北京科技报》记者甄庆如以“本市一名8岁女孩可用耳朵识字”为题,对姜某“以耳认字”做了报道。4月中旬,北京北礼士路二小王氏两姐妹也有“耳朵认字”功能的宣传不胫而走。两姐妹一出场,就被对“特异功能”感兴趣的研究者盯上了。空军第四研究所罗冬苏、北京师范学院林书煌、北京大学陈守良、上海《自然杂志》贺崇寅,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干部申漳等,一直视她们为观察实验的对象。她俩从此成为著名“特异人”,从“地方队”到“国家队”和特异功能研究者合作16年之久,直至姐妹俩全出了国为止。

1979年4月上旬,在四川、北京发现“特异人”前后,安徽、湖北、河北、黑龙江、江苏等地,也发现“功能强”的特异人,但与四川、北京的情况一样,他们一出现,有宣传者,就有揭露者。安徽省繁昌县科委主任鲁世荣于1979年4月16日,就对《安徽科技报》刊登的《宣城县12岁女孩胡联能用耳朵认字辨色》的新闻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皖南医学院张甫同于1979年4月对宣城县“特异人”胡某、何某进行测试,并写了观察报告,否定二人的特异功能。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所一位科研人员,从1979年5月就对湖北省有名的“特异人”谢朝晖进行测试,以后又看过多次表演,均不成功。她说:“叫我难过的是通过这种办法来教育孩子弄虚作假,作为一个母亲,我呼吁为了保护儿童的健康,不要再给这些儿童套上‘耳朵认字’的精神枷锁了……”北京空军第四研究所的李良明同志,从1979年4月开始对北京“特异人”王氏姐妹和姜某多次进行测试,均不成功。李良明批评说:“特异功能的宣传,造成迷信活动猖獗,现在需要宣传理论思维,批判神秘主义。恩格斯曾生动有力地批判和嘲笑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对照第七感受器与古老的磁力骨相学中的‘敬神器’又何其相似也!”

1979年4月6日和4月19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某的“耳朵认字”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证明完全是弄虚作假。

1979 年 4 月 12 日和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宣传动态》第 8 期、第 10 期，分别就四川医学院对唐雨测试、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姜某测试的结果，发出了“未经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宣传”的通报。通报中说：“这种宣传，徒然增加了人们的迷信传说和助长了各种离奇的谣言呓语的流传，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有些同志爱好猎奇，哪怕是荒诞不经的事也信以为真，而且通过他们的口、手使之互为流传。这种作风很不好。让我们共同总结教训，杜绝这类无稽的宣传。”

1979 年 4 月 23 日，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以信访简报的方式（第 92 期，第 93 期），以“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和“四川唐雨‘用耳认字’也是假的”为题，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四川医学院测试实验结果。

1979 年 4 月 24 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第 92 期信访简报上写了如下的批语：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类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媲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1979 年 5 月，《科学画报》第 5 期刊登了肖静的一篇文章“用耳朵能看东西吗？”指出“耳朵认字”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和中国都有这方面的报道，其结果证明都是偷看和骗局。这是在期刊上登载反对“以耳认字”的第一篇文章。之后，张鲁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 1979 年第 1 期发表了“只不过是魔术”及在《新闻战线》1979 年第 3 期发表了“不科学的科学报道”，查良明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耳目不能易用”等文章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露了“耳朵认字”之类特异功能的

骗局，并指出了新闻单位宣传这类事情的危害。

1979年5月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祖甲的“从‘以鼻嗅文’到‘用耳认字’”的文章。这是当时国内，发表在“大报”上反对“耳朵认字”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中指出，“以耳认字”的魔术都是大人吹出来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猎奇！接着，施锦昌5月6日在《新华日报》发文认为“耳朵认字”纯属魔术手法。5月8日，方成颜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了“唐雨耳朵认字是假的”的报道。

1979年5月16日，中国科协所属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集在京有关科研单位的同志，对这一奇闻进行学术讨论。出席会议的有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北京科技报》。会上专家发言的主要观点是：“耳朵认字”是违反科学的。讨论“耳朵认字”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①“耳朵认字”是否是事实，对眼睛看到的事实要去伪存真，这才是研究科学的真正态度。从实验看，“耳朵认字”并非真相。②从生理学角度看，耳、眼等感官各有特殊的结构和功能，有本质区别，不能互相代替。③从生物学进化，胚胎发生和个体发育角度看，“耳朵认字”是违反进化论的。④判断事物，除了靠自己的感官之外，理论思维很重要。一个人不能事事都亲自实验。原有的经过无数次实验验证的正确理论是判断事物的指导思想。与会代表认为，“耳朵认字”没有科学价值，不值得花大力量。

197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篇反对“耳朵认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教育家叶圣陶写的。题目是“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他在文章中指出：“耳朵能认字，稍有科学常识和唯物观点的人决不会相信，这种荒诞的新闻本来不值得驳斥。可是这条新闻引起了极坏的影响，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在文章的最后呼吁：“能从这件事取得教训，确信这样胡

搞是不行的，至少要学一点科学知识，学一点唯物主义，才能切切实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对四化有所贡献。”

1979 年 5 月 18 日，《上海科技报》发表了“‘耳朵认字’是一种魔术”的文章。文章中指出：“最近一些地方传出消息，说‘发现’几个能用耳朵认字的儿童。我们认为这是毫无科学道理的。”

1979 年 5 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祖甲和叶圣陶的文章后，只几天的功夫，就收到全国各地 200 多封来信。从来信和电话中，可以看出“耳朵认字”在当时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人民日报》科教部和群工部，把这些反映进行整理，以《情况简报》和《群众来信摘编》的方式进行交流。其中的内容摘录如下：

“自从《四川日报》发表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的消息之后，全国陆续‘发现’一批能用耳、鼻、手指、脚趾、胳肢窝、胃、前额认字的奇异人物。据国家科委统计，从 3 月 14 日至 5 月 5 日全国 12 个省报来 20 名。其中省级科委报来 2 名，地市级科委上报的 4 名，县级科委上报 3 名，基层单位推荐 3 名，个人反映 8 名（据我们了解还不止 20 名，比如北京已‘发现’四五名，尚未统计在内——编者注）。这 20 名中，9~15 岁的 14 名都是在校学生，20 岁至 30 岁的 5 名，40 岁的 1 名。其中最新奇的是有人可以把写字的纸团吞进胃里，然后再抓另一个纸团放在耳朵上听，同时把两个纸团上的字都认出来。”

“所谓用耳认字完全是违反科学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四川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新华社、《光明日报》、《天津日报》、《河北日报》的同志，分别对一些儿童进行测试，证明完全是弄虚作假。天津和石家庄有 2 名被测试的人，本人也承认这不过是魔术。”

“认为文章中批评某些领导同志很有必要，意见很中肯，希望报道耳朵认字消息的报纸，能接受教训，引以为戒。”

“《人民日报》的文章尖锐地批驳了耳朵认字的奇谈怪论，澄

清了问题，看了非常痛快。”

还有的来信和电话，揭露“耳朵认字”的表演，不过是我国濒于失传的一种魔术小艺。

这类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人，在当时是少数。而大部分的来信和电话是指责甚至谩骂《人民日报》的。这些来信与电话，绝大部分是用他们观察“特异人”表演的“眼见”，驳斥《人民日报》的报道“不符合事实”，“用官方发言的方式堵人家的嘴”，“欺骗舆论，窒息科学”，“以权威人士压人”，“用假科学代替科学，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铸成一桩新‘冤案’”，“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还有的甚至谩骂《人民日报》“是国民党报纸”，“与林彪、‘四人帮’的做法毫无二致”。

1979年5月25日和5月31日，《四川日报》编辑部向四川省委宣传部做了两次检讨。

1979年6月2日，《人民日报》以“四川医学院的调查证明，四川一个小学生‘用耳认字’是假的”为题，发表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

1979年6月5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就“耳朵认字”的宣传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打了报告。至此，荒谬宣传本来可以停止下来，但后来又被海外的人给鼓动起来，事情并未就此完结。

1979年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香港人士李学联写给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的一封信，题目是“以耳认字，未必荒谬”，直接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祖甲的文章，指责祖甲和某些部门领导人对西方的超感官知觉（ESP）和特异致动（PK）研究所知甚少，这是由海外来的第一个介绍西方“特异功能”研究的材料。并煞有介事地告诫：“国人之领导，如此缺乏科学常识，怎能带领群众为四化奋斗呢？”在信的最后还希望：“在对科学问题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态度更科学一点，对于不明白的事物，不妨持怀疑态度，不要过于武断。”

李学联的信很快被大陆“特异功能”研究者广为传播，于是“耳朵认字”的风波又掀高潮。6月18日前，在舆论的批评和行政的干预后，唐雨得了一场病，“耳朵认字”的功能也有所消退。但就在这时，种种批评“耳朵认字”的宣传，也在不断冲破种种阻力，发表出来：

“当心以‘科学’的名义”，《人民日报》1979年7月7日；“不科学的科学报道”，《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只不过是‘魔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2期；“耳目不能易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耳朵能认字吗？”《广州日报》1979年10月29日。

1979年7月，上海《自然杂志》派人到北京测试特异儿童王氏姐妹，在罗冬苏等人的陪同下，对她俩做了3次测试，每人辨认12个试样。一个完全成功3次，部分成功7次，未成功2次；另一个完全成功5次，部分成功6次，未成功1次。根据这个成功率很低的测试实验，该杂志于1979年9月发表了第一篇由记者采写的《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观测报告。

1979年8月11日，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经过测试，证明姜某“耳朵认字”是假的之后，姜某的“耳朵认字”功能一度消失。此时，时任北京大学科研处处长的陈守良教授，又亲自到姜某家中测试她的“耳朵认字”功能。

1979年8月19日，《首钢报》几位编辑陪同陈守良教授在北京九中组织对王氏姐妹进行测试，把姜某也邀请去了。此时，陈守良让姜某坐在王氏姐妹中间，以接受王氏姐妹的影响，在这种诱导下，姜某的“耳朵认字”的功能又恢复了。此后，陈守良将这些测试结果写成《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功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第2卷第11、第12期上。

1979年9月，在唐雨的家乡——四川又掀起了对唐雨“耳朵认字”真实性的考察。

1979年9月3日、4日，四川江津地区科委副主任高万秀和

大足县宣传部、科委、文教局的同志一起在团结公社对唐雨进行重新测试，效果不好。

1979年9月5日，大足县团结公社党委书记李均荣，副书记曾泽，宣传委员谭天成，公安员黎功德等又亲自测试。3个字团，10个字，被认对了9个字。

1979年9月6日至13日，由大足县宣传部、科委、文教局、公安局、进修学校、县医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又对唐雨进行11次测试。9月19日由何大华、丁先发、申政伦、钱邦伦、朱永弟、胡正书等人联合签署了“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识字的考察报告”，认为唐雨“耳朵认字”是客观存在，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79年10月5日至13日由江津地区宣传部，科委、地区人民医院组成的“唐雨耳朵辨色认字考察小组”共进行了9天的测试。江津地区科委于10月16日以肯定“耳朵认字”的“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近期情况报告”的江地科[79]87号文件上报行署并报省科委。

1979年10月24日至26日成都《红领巾》杂志社又组织了7次测试，并于10月27日由《红领巾》杂志的赵明、郑家声、何五全、贺启富，《四川日报》的张乃明，江津行署科委的黄侃如，大足县科委的王大用、何大华联名写出《关于儿童唐雨耳朵认字辨色的考察报告》，声称唐雨的“耳朵认字”并非是“大人吹出来的”，是“真实存在的”，再一次肯定了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真实性。

1979年11月1日《红领巾》杂志社编发的《情况摘编》“红领巾杂志社调查组”写的关于唐雨耳朵认字前后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在该杂志第11期发表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耳朵认字’”的文章。

1979年11月12日唐雨的哥哥写信给中科院，称唐雨“耳朵认字”受到批评是“不白之冤”，并希望中科院的人再来考一考唐雨。唐雨也写信给《红领巾》杂志的叔叔阿姨们，称“我的耳朵

认字是真实的”，并由《红领巾》杂志 1979 年第 11 期发表了唐雨的信。《人民日报》继续收到批评他们的文章，一时平息下来的“特异功能”宣传，又大张旗鼓地开始了。在对唐雨“耳朵认字辨色”功能真实性测试报道的同时，北京对王氏姐妹的测试以及全国各地“特异人”报道纷至沓来。

1979 年 11 月 8 日，针对国内掀起的又一次“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热，当时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道上做出了第二次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1979 年 12 月，北京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79 年 10 月、11 月、12 月，胡耀邦的第一次、第二次批示，并没有制止住“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相反，其宣传势头越加猛烈。下面将 1979 年 10 月至 1980 年 2 月 4 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之前，全国几十家报纸、杂志对“特异人”、“特异功能”的报道概列如下。其中《自然杂志》是他们中的领头羊。

《自然杂志》连续发表了数篇肯定“人体特异功能”的观察报告。报纸也在连篇累牍地刊登“特异人”的表演。这些观察报告的题目是：“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与人体电磁感受机制探讨”；“人体能感知地磁”；“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功能的调查报告（一）”；“关于人耳认字辨色功能的考察报告”；“观察谢朝晖用耳朵认字辨图辨色的小结”；“关于唐雨耳朵认字辨色的考察报告”；“人体感知地磁的测试”；“用手可以看见东西”——译自苏联《科学与技术》。

以下是报纸、杂志的文章：

1979 年 10 月 11 日，《四川科技报》“王斌、王强具有‘非视

觉器官识别图像’功能”。

1979年10月16日,《黑龙江科技报》“记能用耳朵认字的牟凤琴”。

1979年10月19日,《首钢报》“关于‘以耳认字’及其他”。

1979年10月23日,香港《文汇报》“‘以耳认字’传有其事”。

1979年11月,《红领巾》第11期“在事实面前”。

1979年12月5日,天津《科学园地》“唐雨是在骗人吗?”;“探索新的课题——访宣城有特殊感官功能的‘两姐妹’”;“人体确有特殊感应功能”;“要有科学精神”。

1979年12月8日,香港《大公报》“耳朵、腋下认图识字奇闻”。

1979年12月9日,《天津日报》“关于唐雨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

1979年12月9日,《甘肃日报》“对未知的科学领域不要想当然”。

1979年12月18日,湖南《衡阳日报》“不要给科学设置禁区”。

1980年1月11日,《长江日报》“常识未必常有理”。

1980年1月18日,《解放日报》“从耳朵认字说开去”。

1980年1月29日,《文汇报》“不做请求鸭嘴兽原谅的事”。

1980年1月7日,《文汇报》,“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邓伟志。这是揭露“耳朵认字”表演作假,以“目击记”形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80年1月被誉为“中国超人”的特异功能人张宝胜在辽宁本溪被“发现”。6月由本溪市科协组织的测试,肯定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张宝胜正式“出山”。张宝胜的出山意义非同寻常,他不仅一直高举着“特异功能”的大旗,而且成为最有应用价值(特别是军事应用价值)的“中国超人”。1982年初,他被召进北

京，3月，由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副主任亲自主持张宝胜“耳朵认字”的表演。1983年6月2日，张宝胜穿上了军装，被正式调入国防科委所属507研究所。

1980年2月4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简称“上海会”），四川1人（唐雨）、北京3人（王氏姐妹、姜某）、安徽4人、湖北3人、江苏1人、河北1人、黑龙江1人共14名“特异人”参加了表演，来自全国8省（四川、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甘肃、河北、黑龙江）3市（北京、天津、上海）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出版、文化教育以及科委的干部70多人参加会议。会后，有《解放日报》、《北京日报》、《湖北日报》、《辽宁日报》、《吉林日报》、《黑龙江日报》、《河南日报》、《福建日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湖南日报》、《陕西日报》、《内蒙古日报》、《浙江日报》、《云南日报》、《新疆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南方日报》、《人民铁道报》、香港《快报》、香港《明报》、香港《百姓》、香港《争鸣》、《春城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科学周报》、《文化与生活》、《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长江日报》、《健康报》、《中国新闻》等数十家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新华社还发了“新闻稿”。这些报道称“上海会”14名“特异人”做了10场表演每人平均做了100次测试，成功率在80%左右，观看者达2000多人，功能更涉及很广泛的领域。报道中说：“与眼睛相比，这种特异功能具有一系列奇妙特征。它能渗透视觉所无法渗透的种种蔽障，辨认出放在胶水密封的牛皮纸袋、火漆和蜡封口的塑料盒、瓶口用火烧结的玻璃安瓿瓶中的试样；把试样放在壁厚40毫米，储藏同位素的10公斤、20公斤铅罐中，受试者用手抚摸铅罐外壁，也能辨认；甚至把试样剪成小块，混乱放入纸袋中，受试者脑中同样会呈现出完整的字形来。”这些报道和介绍，不但肯定了“耳朵认字、辨色”的真实性，而且还说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广泛前景的开创性的研

究领域，将会给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生物物理学等许多领域提出全新的课题”。

而就在这舆论一致的形势下，《文汇报》派到会上的三位记者和《人民日报》群工部的记者本着弄清真相的态度，在测试时，一直盯住被测试的“特异儿童”，其结果却一个也没有成功。会后《文汇报》记者洪东流把这一情况写了一个近1万字的“观察记”。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得到公开发表，但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00期中，以“上海会议的真相”的标题，做了专门的披露。

1980年2月，“上海会”后，邓伟志写了《对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揭露“上海会”“特异表演”的弄虚作假。送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在《宣传情况汇报》第14期上登了出来。1980年3月5日，邓伟志又给国家科委写信《吁请国家科委鉴定耳朵认字》，并附上了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两点意见》一文。邓在这封信中，不仅表达了对“耳朵认字”泛滥的忧虑，敦促国家科委组织鉴定，而且还提出了设立“科学法庭”，就制定科学法的必要性提出建议。

1980年4月14日，在全国“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浪潮愈演愈烈，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人民日报》科教部以“关于‘耳朵认字’的争论”的题目把这一时期的情况编辑成《情况汇编》第200期。《汇编》一共分4个部分：①一年争论简况；②上海会议的真相；③“耳朵认字”的真伪问题；④报刊、电台要不要再宣传“耳朵认字”。这个《汇编》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时“争论”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对批评“耳朵认字”的舆论，给予了公平的、真实的反映和评价。

1980年3月以后，全国各省市都在组织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研讨会、报告会，筹备成立组织，而且得到政府各级领导的支持。据《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1980年11月5日第3期报道说：“据各地报道，四川、云南、湖南、湖北、甘肃、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省委书记或副书记、省长等党政领导同志都

曾观看测试或亲自测试。”“上海会”后到 1981 年 5 月 11 日召开“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前各省、市进行了一系列有关“特异功能”的活动。

1980 年 6 月 15 日，上海《自然杂志》总编贺崇寅以编辑部名义写信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对邓伟志《有关耳朵认字宣传的两点意见》一文进行答复，对于邓揭露“上海会”弄虚作假的事实全盘否定。

1980 年 6 月 30 日，贺崇寅又给《人民日报》写信，对于《人民日报》科教部所编辑的《情况汇编》第 200 期所披露“上海会”的情况提出批评，并要求《人民日报》用内部情况或在公开报道中做出符合实际的反映。

1980 年 10 月 6 日至 1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辩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于光远在会上进行了一次讲演。他敏锐地指出，在对待“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我们有的哲学工作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在“耳朵认字”宣传后，于光远第一次公开表态。

1980 年 10 月 15 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小报在上海创刊，由《自然杂志》编辑部编辑。

1980 年 10 月 20 至 11 月 4 日，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草稿修改会在昆明举行。会议安排了“特异功能”表演，使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相信了“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于光远同志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十分震惊。更使他惊奇的是“人体特异功能”竟在即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出现了。于光远认为，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个在 100 多年前就有的灵学唯心主义的东西，竟然被看成是“新发现”，并且被写进普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去。于光远说：“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我们事业理论基础的国家，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竟如此肆无忌惮地得到宣传，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从这时开始，于光远

才把反对“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当成了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给以重视。从1981年开始，积极投入到这场破除伪科学宣传的战斗中。

1980年10月，由周文斌、周国兴主编的《待揭之谜》，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论及人体特异功能的书。

1980年10月31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报道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位副所长谈人体特异功能。他说：“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未知领域，生物界、生物个体以至在人体中存在着特异功能，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不能轻易否认。”

1980年11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记录片《你信不信》，除了人们熟悉的“特异人”表演，“耳朵认字”，“意念移物”之类的“特异功能”外，还有一个在当时全国传得很响的董氏父子的思维传感表演。董父是贵州省惠水县科技局的一个干部，作为一名科技干部，搞这种活动，更引起科技界的关注。贵州省科委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都组织过考察、测试。其结果不过是父子之间经过训练的协同作弊。

1980年，《气功》杂志在杭州创刊。

1981年5月11日至18日，在重庆召开了“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简称“重庆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06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300多名代表。收到论文147篇。

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有两个“成果”。一是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会上交流的论文，不仅有基础研究成果、应用研究成果，还有开发研究成果。基础研究的成果，诸如，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用他们自己设计的生物探头捕捉到了常人、气功师、特异功能者三种不同的信息。常人在意念集中时发出的信息仅在毫伏级，气功师可以达到零点几伏，特异功能者可以达到几伏，是常人的几千倍，肯定了特异功能信息的存在。云南大学物理系的科研人员，用IL-700型辐射

仪测试时,发现常人发出的信息能量只在十万分之几的量级上,而特异功能儿童信息能量则在千分之几的量级上,两者相差上千倍。这样的所谓实验报告,在重庆会上有一二十篇。所谓的应用研究,更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在公开的报道中,却很肯定地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属初级阶段,但它已在应用科学领域展示了诱人的前景。”诸如,利用透视的功能在医疗诊断中正取得了一定效果,在地质、城建、文物、考古、公安、仿生等领域,也都取得了颇有意义的进展。在开发研究中,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可谓之创造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奇迹”。会上,居然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蔡庆生、孙其梅、杨洪根、阮迪云、张安祺写的《意念论》这样的论文,被捧为是最有创建的论文。这篇论文说:“一个人体,除了有形人外,还存在无形人;一个世界,除了有形世界外,还存在着无形世界,这个无形人生活的无形世界,必将被开发出来。所谓:人外有人,世外有世;有形无形,奥妙无穷。”这个宣传“灵魂不灭”,并被称为世界首创的论文,被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严济慈和第一副校长李昌称之为给中国科技大学丢脸的事,是“胡来”、“损害校誉”、“令人不堪”的事。此后,严济慈和李昌又联名写信给中国科技大学领导,批评科大有些人搞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信中说:“过去,我们在合肥和北京都曾多次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完全是违反科学的,我们科技大学不要有人去搞。然而,现在不仅有人在搞,听说学校有关部门还拨款支持,并作为科技大学的代表到处写文章、做演讲。为端正学风,维护校誉,我们现在郑重地向你们表示,希望科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不要以科大的名义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希望你们几位捍卫科大的优良学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导全校开展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工作。”

另外的开发研究,也令人瞠目结舌,诸如“碟仙姑姑”这种流传在民间的占卦小戏法,也被称为“有着特殊意义和价值的科研课题”,要开发它,解开这“生命科学深奥之谜”。还有诸如

“‘鬼神附体’的科学”、“古墓怪影”、“鬼魂形成的机构”之类的内容，也都打上了科学包装，被当成“人体特异功能”来研究。

作为这方面的“成果”，在会上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建议”：①关于特异功能的发展和培训；②关于基础研究；③开展应用研究；④关于儿童的教育和保健问题；⑤关于目前科研人员问题；⑥关于情报资料的搜集研究。

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的第二个“成果”就是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这个“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织，虽然一直未被中国科协批准，但它却是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尔后领导“人体科学”，“气功科学”研究与发展的重要组织机构。

1981年5月13日，《中国新闻》率先向国内外，发布了“重庆会”的消息。接着10多家新闻单位，对“重庆会”的“成果”也进行了报道。

1981年5月27日，《工人日报》用了很长的篇幅，选用了醒目的标题，如“层出不穷的新功能”、“实验科学的新成果”、“应用科学的新领域”对“重庆会”上所反映出来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成果进行了较全面的报道。

1981年7月，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暑期讲习班，于光远做了《用科学态度对待哲学教学——兼论“耳朵认字”这种戏法何以使一些哲学工作者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演讲。他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是西方灵学的变种，它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批判过。

1981年8月，于光远开始写作，系统地揭露从“耳朵认字”开始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他的第一篇文章长达近10万字，题目是《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全文共分七个部分。①两年多来“耳朵认字”宣传的经过；②这种宣传不是新现象，也不只是我们一国的现象；③如此宣传的“人体特异功能”根本不

是事实，只不过利用魔术手法的弄虚作假；④对“耳朵认字”宣传的揭露和批评文章，都未能获得发表的机会；⑤为了在更多人面前揭穿这种弄虚作假，不妨再做一番测试，但必须是真正的科学的实验；⑥要从哲学上根本解决问题——反对经验论；⑦是停止这一反科学宣传的时候了，但这一类宣传有其根源，一下子是不会绝迹的。这一篇长文的前四部分，当时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的 1981 年第 12 期到 1982 年第 7 期上。其余的三部分，就被当时舆论一边倒的氛围压制，未能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而发表在《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的内部刊物上。这一篇长文——实际上是一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揭露“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论文。当时，在宣传“人体特异功能”浪潮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这篇论文实际成为了向伪科学宣战的号角。这篇论文在研究和讨论现代中国灵学运动发展的历史和理论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有对中外灵学历史的考察，也有精辟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分析，又有高瞻远瞩的预见，体现了于光远同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学问家的真知灼见。

1981 年 8 月 10 日，于光远在“全国科普报刊、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做了《应该停止这种反科学的宣传》的讲话。其摘要发表在 1981 年 9 月 10 日的《科学报》和《科学大观园》1981 年第 3 期上。

1981 年 8 月以后，为了反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热潮，除了《人民日报》旗帜鲜明地发表一篇篇署名文章和用“内部简报”的交流方式，批评“耳朵认字”之类的“人体特异功能”外，上海的《文汇报》和北京的《中国青年报》，成为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佼佼者。《文汇报》开辟了《向科学进军》副刊，《中国青年报》开辟了《科普小议》和《长知识专栏》，刊登了大量的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此处列举从 1981 年 8 月至 1982 年初，两报所刊登的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若干篇

文章。

1981年8月29日，“特异功能和特殊技巧”，《中国青年报》——薛延。

1981年9月21日，“不准给鬼魂穿上科学的外衣”，《文汇报》——钱维华。

1981年10月31日，“‘人体’特异功能纵横谈”，《中国青年报》——袁一志。

1981年11月10日，“这是在宣传什么？”《文汇报》——孙文质。

1981年11月24日，“破除迷信，警惕伪科学”，《中国青年报》——赵之。

1981年11月30日，“从占卦棒到‘人体感应探泉’”，《文汇报》——程伟礼。

1981年12月5日，“汉武帝与特异功能”，《中国青年报》——明道。

1981年12月5日，“宗教宣传怎么到科普杂志上来了？”，《中国青年报》。

1981年12月7日，“尤里·盖勒出了风头之后”，《文汇报》——张利华。

1981年12月19日，“在玻璃瓶子面前——‘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目击记”，《中国青年报》——邓伟志。

1981年12月19日，“要唯物地研究人体科学”，《文汇报》——邓伟志。

1982年1月30日，“鬼魂附体的‘科学’”，《中国青年报》——滨生。

1981年9月9日至21日，“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暨首届学术交流会”在河北保定召开。这个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就是1979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更名后的气功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气功师、气功科研工作者和有关单

位代表 120 余人参加会议。吕炳奎出任理事长，冯理达、陆祖荫、林中鹏、高鹤亭、欧德士任常务理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气功研究会章程》，大会宣读 44 篇论文。

1981 年 9 月 15 日，当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给中国科协领导写了一封信，敦促中国科协应该严肃地研究一下“耳朵认字”问题，并提出为了彻底揭露“耳朵认字”只不过是魔术，不妨由中国科协出面，邀请有关专家参加，拟定一个严格的科学实验方案，保证实验的科学性。

1981 年 9 月，在长沙召开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大会。于光远在会上做了《对待人工智能和人体特异功能用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的讲演。他指出：“‘人工智能是一门新兴的科学’，我们应该积极支持，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是一门伪科学，不但不应该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

1981 年 10 月 4 日、10 月 28 日，于光远针对云南省科协领导下的《奥秘》画报 1981 年第 4 期上对迷信的公开宣传，两次写信给中国科协领导，指出“鬼魂”宣传不是孤立的，它是两年多“耳朵认字”这类“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产物。

1981 年 10 月 5 日，针对于光远连续发表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写信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任重，批评于光远，“把‘人体特异功能’扣上迷信、骗术、反科学的帽子是主观的、不科学的，是机械唯物论的表现”。在信的最后还指出：“现在苏美正在制造假象，尽量使人不相信，目的是保密。而国内主观唯心论者，正在反对。于光远这样武断，要闹笑话了，要上当了。”

1981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出面，召开了“尊重科学，弄清真相”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座谈会。会上，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发起建立了“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这个联络组，由于光远倡导，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中

科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罗伟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长钟林三位同志负责。开始只有邓伟志等一两个同志在于光远办公室负责搜集情况，编辑资料。后来把办公机构设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其任务就是调查研究、组织测试、出版刊物。办公室的工作就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部申振钰负责。“联络组”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四川医学院对于“特异功能”儿童测试所做的10多个小时跟踪录像带，编辑了50分钟的简略版送中央领导了解“耳朵认字”真相。

1981年10月23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写信给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澄清社会上对该研究所所长潘菽教授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看法的歪曲报道，指出潘菽不相信“耳朵认字”。1982年3月14日，潘菽写信给于光远同志，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大肆宣传已产生很不好的影响，搞得到处都是乌烟瘴气。你出来加以批判抵制，我完全拥护。”

1981年10月，由美籍华人马淑英牵线，美国超心理学家克里普纳·吐兹、普索夫和塞斯布鲁克学院学生组团来中国考察“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西安观看了十几名特异功能儿童表演。其结果是相当令人失望的。除发现一些孩子作假，他们得到的印象：就是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粗糙的。对这一次外国人的考察，国内新闻媒体没进行什么报道。

1981年10月至12月，兰州大学单嘉量、韩波等人完成了对兰州市5所小学，2832名少年儿童的32840个样本数的测试，否定了北京大学陈守良等提出的“特殊感应功能”普遍性的结论。

1981年11月4日，于光远给冯德培、过兴先、潘菽同志写信，希望中科院有更多的同志参加揭露“耳朵认字”的工作。

1981年11月4日，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暨首届学术年会》上，做了《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辩证法》的演讲。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就是灵学的一个变种，灵学是一门伪科学，是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严肃

批评过的，它同自然辩证法是不能并存的。”

1981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二次全体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章程（草案）》，正式报中国科协。会议还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委会”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建议由国家科委组织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实验验证的报告”。这个报告未得到回音。

1981 年 11 月 23 日，于光远写信给河南省委刘杰、李葆光，对河南已出现“人体特异功能门诊部”，感到忧虑。他指出：“人体特异功能宣传开始影响实际工作与人民生活。”

1981 年 11 月 30 日，由“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编辑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创刊，该资料以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揭露“人体特异功能”表演的弄虚作假为宗旨。该资料到 1982 年 10 月共出刊 10 期。1982 年 10 月以后，又编辑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参考资料》，主要介绍国内外超心理学研究状况。

1981 年 11 月 30 日，据《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报道，著名科学家茅以升 1981 年 8 月 19 日，给《人民日报》科教部写了一封辟谣信，指出《福建青年》杂志 1981 年第 7 期，登载的茅老“于今年 3 月在北京观看了昆明 4 名小孩移动物体穿墙过户的特异功能表演”完全是捏造，让《人民日报》去函查问一下，以免以讹传讹。

茅老在信中说：“今年 6 月，我观看了一次所谓特异功能‘录像’，很模糊，也无穿墙过户的镜头，同时观看的也无周培源、钱伟长同志。可见《福建青年》的这段报道，完全是捏造的。”

1981 年 12 月 9 日，于光远给中国科协负责人写信，询问中国科协是否有承认“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的情况。中国科协答复：“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已经建立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云云，完全不是事实。”

1981年12月,《哲学研究》杂志12期发表了于光远《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的论文,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一定要从哲学上反对经验论。

1981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四次会议上,由解放军代表高占杰和新疆代表杨永青分别提出了“重视和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提案,提案号分别为第622号、第973号。提案指出,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实验,在科学上、实际应用方面都有重大意义,要求从精神上、经济上、人力上、组织上、物质上给予支持,以期使特异功能得到科学的指导,为四化建设发挥不平常的作用。

1981年12月,中华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清华园举行科学与气功研讨会,有20余名科技工作者参加。

1982年1月,于光远在《百科知识》第1期上,发表了《唯灵论·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文章。于光远建议,把这些条目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关卷中。

1982年初,于光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了“psi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指出:“psi(超心理现象)根本不是事实。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是一门伪科学。我国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就是psi的变种。超心理学不是科学,在我国科学工作中不应有其地位。”

1982年初,于光远的“消除哲学教学中的不良影响”,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第2期上,就发生在1980年和1981年“人体特异功能”进入辩证唯物主义阵地的情况,进行批评。这一批评,作为“1981年我国哲学战线上的一件重要事情”,被收入《1982年中国哲学年鉴》。

1982年1月5日至11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物理专业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昆明、哈尔滨、西安、合肥、南宁、长春、太原、南京、贵阳、泉州、重庆、通辽和长沙等地的26所大专院校、16个研究所和单位的科研人员共80余人出席了讨论会。会议共收到论文30余篇,在大会

上交流了 17 篇。

1982 年 2 月 6 日、2 月 15 日，张震寰写信给李昌、于光远，对他们发表不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和讲话，提出批评。

1982 年 2 月 10 日，《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报道，著名科学家周培源 1981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一次座谈会上谈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他说：“我看过一次特异功能表演，有的地方就把我看表演的事加以宣传，说我信。《人民日报》打电话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没有，我是不相信的。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我要解释一下。那次是云南来的 4 个孩子表演。其中一个口中念念有词，杯子中有了一朵花。这朵花不是北京的，而且修得很整齐。一朵花怎么可能到水杯中来呢？同我一起看的还有裴老（裴丽生同志）、述周（刘述周同志），他们也同我一样，都不相信。还有什么意念作功，我也怀疑。有人说那些东西可治癌，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念是主观的，规律是客观的。如果说我想要什么东西，就会到我口袋里来，公安人员还怎么工作？有人提出要成立全国性的特异功能学会。这个问题，我看要慎重。科协不能接收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入会。科协要对维护科学的尊严负责。”

1982 年 2 月 19 日至 20 日，据安阳市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报告，安阳 5 名特异儿童进京表演“特异功能催化植物生长”，均获成功。报告称，催化果实，青果变熟果、枯黄果返青、熟果转枯黄、嫩绿转干红；催化树叶，由枯黄转绿、由嫩绿转黄。报告的最后称：根、茎、枝、叶、花、果等生物组织的颜色、形态、性能等生长情况，都能随特异人“意念功能”进行催化和逆转。

1982 年 2 月 23 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洪潮生教授写信给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对于要召开“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我认为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是科学与迷信的区分问题，用不着什么调查研究。如果对‘耳朵认字’、‘人眼透视内脏’、‘意念移物’等荒诞迷信的东西还要组织测试，是太可笑了……严重的是，本该是宣

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的一些中央宣传机构、报刊竟也对于迷信毫无抵抗力……我希望中央能严肃看待这种情况。”

1982年2月24日，中科院举办科学报告会。中科院党组书记、主席团执行主席李昌主持会议并讲了话。随后由于光远做了《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

1982年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科院的报告，发表了《两年来“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简况》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

1982年3月3日，张震寰亲自主持对张宝胜“耳朵认字”特异功能的测试。

1982年3月，由于《人民日报》于2月25日报道了中科院2月24日的报告会，并加了编者按。张震寰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指责国家科委对特异功能口诛笔伐，要求国家科委公开做自我批评。3月5日，张震寰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提出“你们已写了‘赵王鼓瑟’，我们要求也登‘秦王击缶’，这我们已屈‘尊’了”。

1982年3月13日至15日，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科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安徽、河北、甘肃、黑龙江、福建、山东等10个省、市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60余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到会讲了话。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徐联仓、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洪潮生、北京医学院生化教研室教授王志钧、首都医院眼科主任胡铮、首都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邹鲁得、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佩珊、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感官生理专家江振裕、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上海科技出版社副社长姚允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叶至善、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章道义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提出严肃批评，而且对

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项任务：①加强组织工作；②进行调查；③组织测试工作；④加强宣传工作；⑤开展灵学史的研究。会后，组成了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国家科委、中科院研究生院、兰州大学生物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组成的两个测试组分赴南、北方，对著名“特异人”进行测试。

1982 年 3 月 25 日，《科学报》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进行了报道，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是违背科学的”。

1982 年 3 月 25 日，《科学报》报道了著名科学家张香桐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批评。他以“闹剧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为题，发表了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批评。他说，“从我国‘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目的等几个方面来看，很像国外一些人所提倡的‘超感觉论’、‘旁门心理学’和‘灵学’。不要听他们说得那样神乎其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那些东西，在国外是吃不开的。科学家们认为，那不是科学是灵学。”

1982 年 4 月 5 日，张震寰写信给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潘菽，对于潘菽于 1982 年 3 月 14 日给于光远的信中所指出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大肆宣传已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搞得到处都是乌烟瘴气”的说法，提出批评。

1982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张震寰 3 月份给胡耀邦的来信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 1979 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198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和批评人体特异功能通知》的文件。《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

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行“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现通知你们，请各地区、各部门注意掌握。

中央宣传部

1982年4月20日

1982年4月28日，中国科协转发了中宣部的《通知》。

1982年4月至6月，根据3月份召开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会”的决定，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派出虞积生带队的调查组赴河北、黑龙江、安徽对特异人员于某、牟某、黄某进行考察测试。考察结果表明，牟的“耳朵认字”和于的“透视”功能是没有的。黄拒绝测试，没有结果。

1982年4月至7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北京师范学院组织了几个省的联合测试。这次测试，虽然仍然是在信仰者中间进行的，但仍然发现“3名受试对象作假”，甚至“某些在严格情况下确证有特异功能的受试者，也发现有作假行为”。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在测试报告中，仍然得出结论：“联合测试提供的例证表明：‘耳朵认字’，这种人体特异视觉功能，‘特异转运’、‘特异书写’、‘突破空间障碍’等人体特异致动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极不严肃的科学报告。

1982年5月，《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资料》报道，中科院数理学部副主任马大猷批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一段文字。马教授说：“耳朵认字这类东西，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搞了。外国的恩

格斯，中国的鲁迅都批评过。我看科学界和科学家都不要介入这个事情。一些领导科学方向的同志起作用，甚至大力宣传，也有些半信半疑的，因而助长了这股风。我想现在应该更关心一些对我国四化建设有直接影响的事业，把大家的精力引导到这上面来，是更为重要的。”

1982 年 5 月 13 日，胡耀邦同志在看到了钱学森给郁文的信之后，又做了一次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条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和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去阅读和继续探讨。

1982 年 5 月 14 日、5 月 18 日，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分别写信给胡乔木和胡耀邦，对于中宣部文件所述“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不批评的提法，持不同意见。

1982 年 6 月 8 日，由申振钰带队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家科委、中科院研究生院、兰州大学生物系组成的调查组赴云南对“特异人”进行测试。云南大学以物理系综合实验室主任罗新为首的人体特异功能组，从 1980 年 4 月就开始诱发“特异致动”的人体特异功能，并声称于 7 月初获成功，于是就在媒体上频频报道。其实验报告“人体特异功能力学效应的初步测定”，发表于 1981 年 5 月的《自然杂志》上。称已在“特异人”孙某、李某、陈某、杨某等人身上诱发出“凌空飞物”、“拨动钟表”、“折断树枝”，使花蕾快速开放，并又能还原成花蕾等特异功能。这些“奇迹”不仅通过媒体传播，而且到处表演。到北京给中国科协的领导表演后，就到处宣传周培源主席相信特异功能。调查组去云南，就是想调查云南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组“意念致动”的“成果”。但因受到种种阻力，经过近一个月（6 月 8 日至 7 月 1 日）的

交涉，终因未果返京。

198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第二次通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总政宣传部、中央宣传系统各单位党委、党组。重申了今后在报刊上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的“三不方针”。

1982年6月26日，中国科协转发了中宣部的《通知》。

1982年7月，人体科学科研人员在京召开座谈会。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的部分常委参加了座谈会。

1982年8月16日至21日，受国际超心理学学会（Par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邀请，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陈信、梅磊两位教授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召开的国际超心理学第25届年会暨国际心灵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成立100周年紀念大会。并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中国》，报告了中国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情况，指出把气功、中医理论和特异功能研究结合起来，使之逐步纳入现代科学研究的轨道，是中国特异功能研究的特点，并表示对其前景充满信心。

1982年10月16日至20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四川、云南、内蒙古、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筹委会常委、委员（或代表）共28人，列席代表7人参加了会议。

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要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和“特异功能”的进一步开发。事实上，中宣部发文“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后来被概括为不宣传、不批评也不争论的三不方针）之后的近20年，“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势头，并没有丝毫的减弱。“特异功能”的研究，以一种新的形式——“气功外气”，仍然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里进行着，所谓的实验报告不断地

发表出来，甚至是以整本整本的著作出版发行。那些以“气功大师”的名义冒出来的“特异功能人”层出不穷。这类宣传神秘现象、特异功能、神魔鬼怪、看相算命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1999 年，就有上千种。其中仅看相、算命、看风水的就有 225 种。相反，“不批评，也不争论”这两条，真的实施得很好，截至 1994 年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前，几乎没有敢直接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问世，就是批评“伪气功”的声音也是很微弱的。

1982 年 10 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通灵人”尤里·盖勒的真相》一书。第一次向全国报道了震惊欧美的“科学界水门事件”，揭露了以色列魔术师打着“特异功能”招牌行骗于欧美大陆的事实真相。

1982 年，《气功与科学》在广州创刊。

1983 年 3 月 11 日，在北京、四川、上海、新疆、福建、浙江、陕西、广东、山西、安徽等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以“耳朵认字”发源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 5 周年。

1983 年 3 月 30 日，《文汇报》发表了中科院学部委员张香桐的文章“对大脑研究的哲学思考”，批评“特异功能”宣传的所谓第六感官、第七感官的谬论，指出“耳朵认字”不仅仅否认了感觉器官所具有的专门功能，否认大脑思维的一般规律，这是个自然科学的问题。张教授进一步指出，要科学地回答“耳朵认字”的挑战，不仅需要脑科学知识，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1983 年 4 月，在昆明召开了“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来自 20 余个省、市、自治区的 100 多名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这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和宣传的又一次大型活动。

1983 年 5 月，按着 1982 年 10 月 16 日召开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的决定，继续“认真办一个严肃的科学刊物，以发表实验报告、科学论文为

主”。由上海《自然杂志》负责筹办，经过他们的努力，经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在上海创刊。

1983年6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了“量子物理与人体科学讨论会”。来自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科研工作者参加。

1983年9月，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四次委员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会议增补了陈信、陈守良和朱润龙为筹委会常委。

1983年，《中华气功》在北京创刊。中科院院士钱伟长在同杂志编辑部人员谈话时指出：“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也没有包治百病的东西，也没有万能的东西。科学是各种事物在发展与进步中互相促进的。科学是没有顶峰的。宣传气功也一样，应该留有余地，不要有迷信。”

1983年，由马济人编著的《中国气功学》出版。这是第一部集气功概念到理论、气功发展史以及各种功法门派的一部较全面的具有工具性质的著作。该书从出版到1988年，共印行5次，总册数达30余万册。之后，作为工具性图书出版的气功书不下十部。这里列举部分书目：《中华气功学》、《中国气功辞典》、《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中国气功养生学》、《气功学》、《中国气功心理学》、《中国当代气功全书》等。

1984年3月，在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太原、芜湖举行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5周年纪念大会。

1984年6月15日，陕西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筹）向省科协申请创办《气功天地》，作为陕西省气功研究会会刊。后来，这个会刊由郭周礼负责，并在1985年将其改名《气功与体育》。这个杂志虽然在陕西创办，实际上是个地方杂志，但在郭周礼的运作下，很快成为一个在全国气功界颇有影响的杂志。

1984年7月，《重庆工人报》发表了敖大伦写的《神医·神话·现实》的长篇报道，把在四川绵阳中医学校任教，因搞封建迷信活动被取消处方权，沦为江湖郎中的严新，用当时享誉中外的海灯法师弟子的包装装扮起来，于是一个神医、神话的现实被

呈现出来。他的遥控治病被吹捧成诊断正确率达 95%，治疗显著率达 65.8%，即刻见效率达 42%。这篇文章可以被称为“严新大师”的出山代表作。之后，严新的名字“享誉”海内外，严新的“奇迹”更是中外罕见。严新是中国神怪气功的第一个“出山”者。严新一人的“神迹”宣传，从他出山的 1984 年到 1990 年，仅六七年的时间，关于他的专著就有十几种之多。

“严新现象”树立了中国“神怪气功”的模式，奠定了中国“神怪气功”的基础。

1984 年 10 月，受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的委托，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学术讨论会”。来自各地的 80 余位从事人体科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参加会议。

1984 年 10 月 23 日，陕西省气功研究会成立。这个研究会虽然是个地方的气功组织，但他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小视。第一，在全国气功研究会还未成立之时，陕西率先成立了“气功组织”，这对于推动全国性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第二，1982 年出山、从事“气功产业”活动的郭周礼当上了这个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他的策划下，国际气功联合会在西安建立，使西安成为全国“伪气功”的一个活动中心。

1984 年 11 月，上海《大众医学》发表了李胜先的文章“对巫医之我见”。这是李胜先以巫医及传播封建迷信坑人骗钱为研究方向的起点。此后他用了十五六年的时间在民间暗访巫医以及伪气功以治病为名的害人夺命的案例。1988 年 5 月，《人民日报》的《群众来信摘编》刊发了他的“关于巫医及其迷信活动的调查和建议”。2000 年 1 月，李胜先将他十几年的工作和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暗访巫医》的著作，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1984 年，中华气功进修学院在北京建立。据三年后学院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介绍，三年来，该院聘请气功界 80 余位著名人士为兼职教授，编写出 1800 余万字的气功系列教材，培训学员 5000 余名。

1985年7月,《读书》杂志发表于光远的文章:《为〈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出版讲几句话》。他说:“《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过去不被自然辩证法研究者所重视,而今天成为一个反对伪科学宣传的重要武器,恩格斯写它的时候,决不会想到他写这篇论文,是对8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出现的遍及全国许多地方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有力驳斥。”

1985年7月,《新体育》载贾金鼎文章:“‘外气’可以影响脑电图——赵学忠气功师‘外气’实验。”这篇文章介绍了气功师赵学忠的特异功能,这是继1978年顾涵森发表“外气”实验报告后,第二个在刊物上以“实验报告”形式发表的宣扬存在“气功外气”的文章。

1985年10月,在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召开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常委会议。这个从1982年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三年多来,一直未得到中国科协的批准。这次常委会议。决定寻找新的审批单位。会议提出研究会必须加强领导;改变原来的挂靠关系;搜集和畅通信息;加强国际交流;解决经费问题。根据这些精神,会议决定增补张震寰为会员,并代替贺崇寅出任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主任;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替代《自然杂志》社,作为研究会的挂靠单位;在1986年适当的时间,召开全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人体科学研究会。

1985年12月25日,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

1985年,《气功与体育》杂志在西安创刊。

1985年,由时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的郭正谊主持,与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巫师的骗术》的科教电影,发行2000余套拷贝。这个片子揭露了打着“特异功能”的各种江湖骗术。这对于人们认识“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1986 年 3 月,《气功与科学》发表了“现实和我们身边的神话”的文章,吹捧严新的带功报告。此时的严新不仅有治病的“奇招”,什么“气功通信诊断治病”、“用通电话诊断治病”、“与患者谈话诊治疾病”、“喝自来水治疗疾病”等等,更“奇”的是严新“发明”的带功报告治病,已是声名显赫。据当时报刊报道,严新的带功报告,少则几百上千,多则几万人听。一个靠骗术发迹的“神医”、“神话”、“现代济公”就这样一步步地被编造出来。

1986 年 4 月 30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

1986 年 5 月 26 日至 31 日,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代表大会(第一届全国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人体科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张震寰任理事长,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陈信任常务副理事长,贺崇寅、徐兰许任副理事长,朱润龙任秘书长。创办《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公开发行。这个人体科学研究会和 1981 年 5 月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成立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是一脉相承的。这个筹委会几经报中国科协均未得到批准,于是改变为报国家科委。1987 年 5 月 3 日,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

张震寰理事长代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在开幕词中总结 7 年来(1979 年“耳朵认字”到会议召开的 1986 年)工作时,肯定了六个方面的特异功能:①关于人体特殊感应功能的真实性问题,对诸如“耳朵认字”、“人体透视”等等,经过在严格条件下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它是人体存在的一种潜能。②关于人体特殊感应功能的普遍性问题,经过从北京到西藏一些地区调查,也已经判明人体的这种潜在能在儿童中间是相当普遍存在的。③关于人体潜在功能的诱发问题,在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一系列的实验已经看出,在青少年中间运用一定的方法,人体的一些潜能是可以诱发或培训出来的。④关于人体特异致动问题,经过严格条

件的联合测试，也已经证明它的客观性。其中“穿壁现象”（抖药片）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采用高速连续摄影记录已经观察了它的全过程，真实性已得到肯定。⑤特异焊接或破损物体复原的研究，目前虽然工作不多，但经过一定的重复实验，对现象的肯定，还是可以做出判断的。⑥感知遗留信息问题，经过几次重复实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以验证。

这些语破惊天的结论，着实让人感到“鼓舞”，似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科学”革命和东方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已经到来。关于这些结论的“科学性”，国际化学界知名人士、香港中文大学化学博士甘钜廷曾风趣地对一记者说，如果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把这些成果公布于世，我国的千万个物理学科学工作者都要跳入黄河浸洗 50 年，才能去此耻辱。

1986 年 6 月，严新“大师”被请到北京，为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病。据新华社记者明真著《当代科学新天地》一书中描述：6 月 27 日，严新到了邓稼先的病房，严新仅仅站了 3 分钟，没用任何药物，没有接触病人，病人的剧痛霎时止住。10 分钟后，病人要求站起来。两天后，这位科学家能下床走路。这位科学家经严新力挽垂危，生命延长一个多月。

事实上，邓稼先于 1986 年 7 月 29 日去世，从严新进医院的 6 月 27 日到 7 月 29 日，也只有一个月零二天的时间。但是在追逐“猎奇”的记者笔下，什么样的“奇迹”都能编造出来，邓稼先如果病好了，自然是严新的“神功”所致；没治好，严新的“神功”也丝毫不损一根毫毛，严新为邓稼先“延长一个月生命”也能在记者的笔下生花，这就是一个个“奇迹”闯入世间的重要原因。

1986 年 7 月至 12 月，严新走进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气功科研协作组合作，在清华大学作气功报告，并搞了一系列的“气功外气”的实验，发表了一系列实验报告。这些实验报告有：①《外气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载《中华气功》，1987 年第 3 期。②《气功外气对某些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影响的观测》，载《生物物理

学报》，1987 年第 3 卷第 1 期。③《气功外气对激光偏振面的影响》，载《东方气功》，1987 年第 2 期。④《气功外气能影响核酸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载《光明日报》，1987 年 9 月 4 日。⑤《2000 千米超距作用下对具有生理效应溶液影响的激光拉曼观测》，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 年 9 月。⑥《激光拉曼仪对“气水”结构的测试》，载《气功》，1987 年第 6 期。

1986 年 9 月 18 日，“超人”张宝胜由张震寰陪同在广州市委礼堂表演特异功能。在千万人的注视下，张宝胜从密封好的瓶子中抖出了 6 片药。张宝胜的“超人”奇迹，由此传遍大江南北。

1986 年 9 月 19 日至 21 日，上海市气功研究所在上海召开首届中外气功研讨会。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巴西、联邦德国以及港澳地区的 8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把中国气功推向国外。

1986 年 10 月，《北国风》杂志刊载了徐恒进写的宣传气功大师赵学忠的报告文学——《他神奇得令人难以置信》。

1986 年 11 月 17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率团去日本访问。

1986 年 11 月 18 日，《光明日报》记者庞佑中、陈光曼以“怀揣求医者的电报、信函，从重庆出发北上，中医师千里迢迢找病人，他集中医、气功、武术和特异功能于一身，沿途为不少人治好病”的报道又一次向全国传播严新“奇迹”。

1986 年 11 月 26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河北保定召开华北、东北、西北“三北”地区气功学术交流会。

1986 年 11 月，于光远于 1985 年 8 月完成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几经周折，终于 11 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这是自 1979 年“耳朵认字”到 1982 年上半年暂时停止的这场争论中，以批评的观点反映当时历史真实的一部著作。书中不仅反映了这一段历史的事实，而且也系统地介绍了国外超心理学研究的

历史现状以及与中国特异功能的比较研究，并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人体特异功能”进行了较深入的哲学理论批判。

1986年底到1987年初，在北京钢铁学院，还没毕业的张宏堡，借助给同学和老师表演小戏法和治病在学校就已经有了点名气，他已经用他精心琢磨编出的一套“中华养生益智功”一步功法，在学校正式开班传授功法。他开始表演的是轻功和缩骨法，让人把自己用绳子捆住，然后用“功”将绳子解脱（其实这不过是江湖把戏），看者目瞪口呆，于是就有人向他拜师学艺，开始时，只有七八十人，拜的人多了，他就向校方提出要求，成立气功研究会。而此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气功大师“出山”了。

1987年1月，《气功与科学》第1期，发表了暨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梁荣麟的文章《对气功及气的不恰当描述》。梁荣麟从医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的角度否定了五种对“外气”的描述：①气功是人体的一种潜能。②气具有物质性。③气是电磁波。④气是低频调制红外线。⑤人体是有生命的磁体。

1987年，1月24日至26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分别报道了严新在清华大学所做的“外气”使物质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的实验。这一在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反复检验证明的所谓成果，居然被以“科学报道”的方式向国内外发布出去。

198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李升平宣布，严新远距离发功，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

1987年2月，《气功与科学》载凌云文章“‘龙子’论和它的创立者”。文章介绍了“龙子”的发明者气功师屈成春的高论：认为人体科学是研究比微观粒子还小，有质量（比光子小得多）、能量（比光子大得多）、正负，其运动速度最低也超过光速的“龙子”。“气”就是由龙子的集合与聚合物组成的。钱学森曾批评说：“一些人创造虚无飘渺的所谓理论，什么气场啦，还有同志说的‘龙子’啦，其实，这些东西没有科学实验的验证事实，是凭空想

的；有的同志是提出了这个‘场’，那个‘子’，无非是一个说不清楚代替另一个说不清楚。这个不能叫做科学。”

1987 年 3 月，《生物物理学报》发表了清华大学陆祖荫、赵南明等人一篇共 52 页的实验报告《气功外气对某些物质的结构和性质影响的观测》。

1987 年 3 月底至 4 月中旬，严新在辽宁省电子研究所、省委礼堂、省体育馆、辽宁中医学院做带功报告，听众数千人，在省体育馆那次达上万人。听众除了公众、科研人员，还有军界、政界的领导。

1987 年 4 月，“气功研究开发公司”在珠海经济特区成立。这是由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珠海市科委合作经营。致力于气功科学的研究开发和气功在治疗保健方面的普及和应用，促进中国气功事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给以后的“气功大师”从事“气功产业”树立了楷模。

1987 年 5 月 3 日，国家科委批准成立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其实在未批准前，已于 1986 年 5 月 26 日至 31 日，在北京已经召开了成立大会。

1987 年 5 月 6 日，在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了“生命科学研讨会”。

1987 年 5 月 15 日，严新在辽宁向外界透露，辽宁方面邀请他作气功扑灭大兴安岭火的试验。他说：“过去气功有呼风唤雨的说法，人们把这看成迷信。现在应重新看看这个说法究竟是封建迷信，还是科学的。因为我在清华大学做的实验证明，气功能使温度升高，使气压升高。如果气功师发功，使气压升高，就能把地下水压上来；地面温度升高，水蒸气就会上升，水蒸气多了，就会降雨。”这个 2000 公里之外灭大兴安岭火灾的神话，完全是编造出来的，也是“严新大师”的一段丑闻。“严新大师”还有一个最让他尴尬的故事。严新为了捞稻草出名，向清华大学要名誉教授的头衔。一位教授向校长张效文再三推荐。张校长很不同意，但

又不好驳教授的面子，于是他急中生智，对严新说：“我发给你一张聘书，填好后，你如果能用‘意念’把图章从我的保险柜调出来，我就把聘书发给你。”在这种“较真”的人面前，严新就什么本事也没了，只好悻悻而去。

1987年5月24日至28日，由西安的郭周礼一手策划的，由陕西省气功研究会、《中国体育报社》、《气功与体育》杂志社、深圳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国际气功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会上除了空谈一些论文，还组织了气功师的“口功书法”、“钢针穿腿”、“掌裂碎石”、“五指冒烟”的表演。

1987年5月，《气功与体育》杂志发表芳踪人文章“此功原来人间有”，介绍道家龙门派第18代传人王力平神功。鼓吹其发功停雨，震响全国。王力平练功坐像印在该杂志的封面上。

1987年5月，《五角丛书》第5辑，由朱润龙、朱怡怡撰写的介绍中国特异功能的《中国超人》出版。

1987年6月7日至9日，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987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在《人民子弟兵》节目中，以《妙手回春见奇功》为题，首次报道了解放军气功师万苏建用独创的“八卦循导功”为人治病的新闻。该气功师被称为“军人气功师”。在“气功大潮”的影响下，军人气功师也被神化。1988年6月军人气功师率八卦循导功弟子一行8人去日本讲学、表演，在日期间，先后在6个城市讲学21场，表演20场，“外气”治疗了600余人次，引起日本各界的关注。日中气功学会会长称赞万苏建是“鉴真第二”。

1987年7月13日到8月12日，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安徽师范大学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保健气功讲习班，目的是培养高校气功师，来自全国20多所高等师范院校体育系和普通学校公共体育教研室的教授、讲师及助教37人参加培训班。

1987年7月17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对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代

表张震寰等人提出了 201 号议案《关于在学校开展气功科学的教学和科研的建议》做出答复。其文件开宗明义称：“诸如建议中所谈从教育入手，开展气功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建议中提到的具体问题，答复的意见是：①关于做出规划、培养人才问题，“正在积极着手解决”。②关于在各级学校开设选修课、必修课问题，“我们正在积极进行试点”，“也希望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及其他各方面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经验、交流信息和研究成果，以便促进这项工作的开展”。

1987 年 8 月 8 日至 17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在辽宁省兴城市召开全国气功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会。会上交流论文 115 篇。这次会议除继续宣读气功基础研究的成果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宣传气功带来的经济效益，如气功外气促进平菇、猴头等食用菌的生长，可增产 33.9%；练功使学生脑电流和脑电状况改善，使学生睡眠更好、学习状况提高的报告；气功外气对肿瘤病人免疫功能提高，改变癌细胞染色体畸变的报告等。大会向外界透露，气功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方兴未艾、大有可为。严新在大会上也做了报告。

1987 年 9 月 4 日，《光明日报》报道：“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首次发现，气功外气能够影响核酸分子结构，证明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

1987 年 10 月 10 日至 13 日，第一届国际医学气功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有 20 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气功组织倡议书。

1987 年 10 月，正值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功理功法委员会在西安召开之际。郭周礼又到大会拉了几名出席大会的体育界人士及一部分气功师，宣告成立了“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在没有征得北京和各省市名人、要人意见的情况下，就给他们封上理事长、副理事长的头衔，自己封为秘书长。这完全是一个未经任何部门审查批准的非法组织，郭周礼把它挂在《气功与体育》杂志社。该

研究会 1992 年被国家体委认可，民政部 1992 年 9 月 28 日准予注册登记，一跃而成合法组织。

1987 年 10 月 12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功理功法委员会在西安召开成立大会，一批气功师出席会议。这时已经 20 岁的唐雨出席了会议，他说，他 8 岁时，因“耳朵认字”成了“实验人物”，先后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参加实验，幼小的心灵蒙受高负荷的压力，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只念到初中毕业，没能升上高中，由于经常埋怨自己的特异功能，根本没有想到保持这种功能，致使他的“耳朵认字”的功能已逐渐消退。他现在在四川省气功协会工作。

1987 年 12 月 9 日至 13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和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在广州举行了“中国气功观摩交流会”，10 位著名气功师共进行了 6 场表演。仅在广州三河体育中心的一场表演，8000 张门票被抢购一空。各电台、电视台、报刊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大会盛况。

1987 年，大约在下半年，张香玉被中国气功研究会借调去进行考察。在此之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张香玉，曾在北京一家工厂当过 5 年工人，1963 年自动退职，选择了演员职业，先后在山西大同市话剧团、河北张家口地区文工团当过演员，1972 年通过“关系”进入了青海话剧团。她喜欢练太极拳、练剑。1983 年 5 月，张香玉拜她爱人工厂的一位气功师贺占魁为师，从此就练上了道家内功。她师傅贺占魁说：“我教给张香玉许多基本功，教过她太极、两仪、四象、五行、八卦的架势。她学了一年，后来就不辞而别了。”离开师傅，张香玉就开始给话剧团和邻居的人发功治病，效果都不好。1986 年张香玉自费来北京，想施展一下自己的才能，她在朋友的介绍下，给一些人看病，也不见“经传”。后来她就在北京公园里的气功辅导站练功，人家不知她练的什么功，问她，她随口答，是“自然中心功”，从此就和北京气功界的人接上了头。后来她就给人表演看病，还自称有“特异功能”，能看天

上地下，透视人体，还给别人授功，接触的人多了，就有人把她介绍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就决定对她所声称的“神功”和“特异功能”进行考察。据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一位副秘书长称：张香玉在考察期间治疗的病人，1/3 有效，1/3 不明确，1/3 无效。考察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聘张香玉为特邀会员。有了合法的身份，张香玉从此“出山”。

1987 年，张志祥经过一段“缄口修炼，埋头医道，初悟元极”的功夫之后，于 1987 年 5 月 24 日，在湖北鄂州注册了一个“鄂州市元极功法研究会”，正式“出山”。张志祥的出山非同于喜欢张扬的严新、张宏堡、张香玉。他“默默地”耕耘出一个完整的、涂满了红色油彩的神秘团体，其隐秘性、欺骗性、迷惑性胜过其他的伪气功大师。他建立组织、发展实业、办班培训，动员舆论等来推行他的“功首”崇拜，从而聚敛巨额财产。他拥有于 1993 年落成的，堪称现代宗教圣地的豪华的莲花山基地；有经营多种农业产品的“元极实业集团”和从事经济活动的“鄂州市元极医院”、“中国中医药学会元极医院”以及鄂州市元极旅行社；有从事“元极功传播”、“元极学研究”的“鄂州市元极功法研究会”、“鄂州市人体科学研究所”、“鄂州市人体科学研究院”、“湖北省元极学研究院”、“中国中医药学会元极医学研究院”、“中国元极学研究会”等组织；有造舆论的《元极新录》、《元极之友》、《人天科学研究》等刊物。张于 1989 年就当上了鄂州市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92 年 5 月，又被选为鄂州市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1994 年 3 月，张志祥当选为鄂州市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

1988 年 1 月，新闻界掀起一股张宏堡热。1 月 2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神奇的故事——气功大师张宏堡小记”；8 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张宏堡掀起气功热”；22 日，《中国电子报》报道“张宏堡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气功班”；31 日，《天津日报》报道“中华养生益智功风靡京城知识界”。

1988年1月,《武魂》杂志第1期,发表了张洪林“气功外气发放之我见”的文章。这是张洪林针对当时“外气”浪潮,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批评“外气”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洪林首先批评了“内气外放”的观点,同时也指出所谓“外气”就是受暗示性的心理特征。

1988年1月,李洪志入门学气功,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大地兴起的气功大潮熏染下,李洪志开始入道学气功,师从李卫东和于光生学习“禅密功(佛家功法)”和“九宫八卦圈”(道家功法)。不甘寂寞、生财有道的李洪志,很快就摆摊传功,在家给人治病,招收弟子。1989年开始拼凑“法轮功”讲义。1990年李洪志去泰国探望其妹,学到一些佛教知识,接触了境外邪教组织“灵仙真佛字”和宣传“特异功能”的书和宣传品。回国之后继续拼凑他的“法轮功”,并声称他的“功夫”已经高得不得了,“阿弥陀佛就相当我一个小拇指头大小了”。这就是李洪志造神的第一步。

1988年2月6日,郭周礼成立的“中国气功体育服务队”得到国家体委的批准。使其得以利用奥运会集训期间、亚洲锦标赛期间以及亚运会期间,以“义务”服务为名,大捞政治资本和骗取大量钱财。

1988年2月,《气功与科学》增刊刊发了《严新报告》。严新在这次报告中宣布了气功阻挡原子弹和大兴安岭灭火实验的新闻。该刊还同时发表了陆祖荫、李升平等人与严新合作实验的一组论文:《气功治疗的生物物理学基础的研究》。

1988年2月,在龙年的春节晚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气功师张加陵表演的“气球站人”、“意念推板”、“纸吊灯管”、“拔钉子”等特异功能项目,在国内外反响很大。把本来是“魔术”的项目都当成“气功外气”或“特异功能”来宣传,并公开登台表演,这种做法,对伪气功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8年3月,《新体育》载文“青年气功师张宏堡的宏大抱

负”。张宏堡要办“中国气功大学”、“中国气功研究所”、“中国气功实业开发公司”。张宏堡声称，他的“气功”能改造社会，改变国家元首的决策思维，能提高体育成绩……总之，他的“气功”无所不能。

1988 年 3 月 15 日，国际气功联合会在新加坡成立。

1988 年 3 月 25 日，国家科委、中宣部、中国科协联合发出《关于气功的社会活动和宣传报道工作的通知》其内容如下：最近一个时期，气功引起相当普遍的兴趣。一些群众利用气功健身强体和治病。有关部门也在组织这项研究工作，一些科技人员和气功师积极投身于研究，这是有益的。

然而，社会上关于气功的某些活动和宣传报道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有的气功师在报告中不切实际地夸大自己的功力功效，个别人对目前还无法解释的某些气功现象的机制随意加以解释，一些报刊夸大渲染。某些气功报告会、表演会越搞越大，一次活动多则成千上万人参加。这种状况不利于气功的科学研究，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了科学地开展我国气功的研究和挖掘工作。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做好教育和疏导工作，注意划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把好宣传报道关，对于气功功法介绍、练功心得、养生治病效果等内容的报道要注意科学性、真实性，防止夸张渲染，严禁宣传封建迷信；各机关团体不要轻易搞大型报告会、表演会，更不能借机谋利。对于“特异功能”现象，大众传播媒介，包括广播、电视、电影、图书、报纸、期刊杂志（有关学术刊物除外）一般不要宣传报道，有关信息的发表，要报科委和宣传部门审批。

这个既有科学管理部门，又有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共同签发的文件，本可以管住“伪气功、封建迷信”的泛滥，然而并没有奏效。这种只有文件没有监督措施和惩治的相关规定，无法挡住洪水般的伪气功和封建迷信。

1988年3月27日，清华大学成立了气功研究会。中华养生益智功研究总会理事长张宏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张惠民任顾问，周毅任理事长。

1988年3月至4月，受《科技日报》社长兼总编林自新的邀请，“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CSICOP）来到中国考察特异功能现象。考察团由哲学家库尔茨（主席）、魔术师兰迪、心理学家阿尔考克等6人组成。这个国际性的科学与教育组织成立于1976年。其宗旨是，以负责的态度、科学的观点，批判地考察各种声称的异常现象，并通过会刊《怀疑的探索者》和讲演、电视节目等传播研究的结果，向公众进行“科学的目的与方法”的教育。自1964年起，兰迪就随身带着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声称：“任何人能在符合要求的条件下显示特异功能，我马上付给一万美元。”至今测试过700多名全世界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却没有一人能取走这张支票。这次来中国考察，他们先后在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做报告和测试，结果是所有“超人”都失灵。

这次考察是正值中国大兴“伪气功”和“特异功能”热的时期，在洋人面前，所有“超人”失灵，这让支持“伪气功”和“特异功能”的领导者很没面子。于是对洋人的考察也大造舆论，说外国人是来摸我们的底，探我们的秘密，是来窃取情报的，是借洋枪队剿灭中国人。而绝口不谈在北京、上海、西安所做试验全部失败的情况。这一次的考察可以说对“特异功能”的表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88年4月，《中华气功》发表了南开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康健和华夏人体科学学会钱信沙的文章“全关良先生‘拨云见月’目击记”和“全关良工程师‘聚云震映日食’实验场记”，吹捧气功师全关良“拨云见月”、“让太阳改变颜色、进出云层、出现彩虹及抖动”的特异功能。这种文章纯系蛊惑人心，一派胡言。

1988年5月13日，张宝胜进行汇报表演。起因是CSICOP代表团访华活动及其调查报告引起很多人的异议。“人体科学工作

组”决定邀请反对派参加，组织一次特异功能汇报表演。会议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所长陈信主持，反对派人士有林自新、何祚庥等人。表演从上午 10 时到下午 3 时，尽管张宝胜做了很大努力，却始终没有完成指定的表演项目。在做非指定项目时，又调包作弊，当场被揭穿。因此，双方都认为这次表演失败。这次张宝胜败走麦城的真相，直到 1995 年才得以曝光。

1988 年 5 月 26 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张震寰任中心主任。

1988 年 5 月，号称中国佛法芳香型智悟气功的“香功”问世。这个“功法”是以自称得佛家禅密宗上乘修身祛病法门 50 余年的田瑞生创立的，声称有八大特征，五字真谛，精要三十六秘义。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功法，习练者据称数以百万计，并传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欧洲、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国家与地区，成为推动气功大潮的佼佼者。

1988 年 6 月 12 日，中日气功研究会在日本名古屋成立。

1988 年 6 月 19 日，中华气功进修学院向首都 29 家新闻单位举行新闻发布会，其目的是“为气功正名”，并声称 3 年来该院聘请 80 余位著名人士为兼职教授，编写出 180 余万字的教材，培训学员 5000 余名。

1988 年 6 月 29 日的《科技日报》和 6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分别发表文章，《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表专题报告指出，人体特异功能迄今未获得科学证明》。

1988 年 6 月，李志庸编著的《中国气功史》出版，印行 8200 册。

1988 年 7 月 7 日，经北京市外经委审查批准，国家工商局颁照（营业执照——工商企合京字 0319 号），张宏堡在北京注册了“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并与美国、日本、苏联、中国香港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张宏堡自任总经理。在这个“公司”名下，不经登记、注册，还非法挂有“中华养生益智功研究

会”、“中华养生益智功国际交流中心”的招牌。张宏堡不满足于建立公司这样的实业组织，在这之后，又于1990年4月25日经四川省科委批准建立了国际生命科学院，下设青城山人體科学培训学校及特异人才培训学校（设小学部、中学部、中专部及研究生院）；1990年8月，又办起了国家生命科技大学，培养所谓高层次特异人才。为了给这些“组织”、“公司”创牌子、搞宣传、推行歪理邪说，张宏堡还出版刊物《麒麟文化》，创办《生命科学报》、《世界气功导报》。这些“公司”、“科学院”、“大学”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张宏堡就是利用这些机构非法行医、办培训班、招徒拜师、教化“神功”等手段搞教主崇拜、秘密结社、精神控制，从而聚敛巨额财产。1990年6月，张宏堡在北京六里桥所谓的国际气功大楼公开非法行医，被北京中医药管理局“依法取缔”，但这丝毫没有阻止住张宏堡的野心，相反更加变本加厉，疯狂地向具有邪教性质的黑社会势力发展。

1988年7月19日，《科技日报》发表由钱三妹翻译的“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在中国考察时库尔茨的演讲：《谈谈科学与异常现象》和肯特列·弗莱兹尔的《用科学知识帮助人们弄清真相》。

库尔茨在演讲中指出，异常现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心灵力”，即人体特异功能，包括超感官知觉（ESP）和意念致动（PK）；第二类是“空间时代的宗教”，如占星术；第三类是“不明飞行物”，即所谓UFO。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异常现象呢？他认为：“首先要有开放的思想，而不应仅仅由于那些稀奇古怪的现象或违反常规的理论对我们的观念构成的挑战，就反对它们。其次，只要任何声称的异常现象有真实依据，而且它们的效果在其他实验室也可观察到，或者受试者可以有其他独立的研究者加以考察和验证，我们也会重视的。第三，一旦这些数据被确认有无可辩驳的可靠性，下一个步骤就是要设法阐明或解释人们声称发生的事。”但是，异常现象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文章还指出：①传闻故

事是不可靠的，不能根据表面现象就相信。②迄今为止，“超常感官能力”还未在实验室得到证实。③在这个领域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弄虚作假和欺骗。④由于存在“超自然的诱惑”，卷入这个领域的多数人相信特异现象，不是靠事实，而是靠先入之见。⑤必须特别警惕那种为了支持异常现象而不加批判地认定“眼见为实”的态度。最后，库尔茨提出两点意见供科学界和教育界人士参考：第一，必须要让公众知道科学界对各种声称异常现象的批评；第二，我们需要在公众中培养对科学事业本身的重视态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向更多的公众，特别是大、中学生传播对科学方法本质的认识。

1988 年 7 月 23 日，《科技日报》再次发表心理学家阿尔考克的报告《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吴小平的文章《以科学的态度探索未知》，以及美国《时代》周刊 6 月 13 日第 24 期发表的介绍兰迪的文章。

吴小平的文章把 CSICOP 的一些观点做了归纳。主要内容包括：①科学并不像有些批评者想像的那样排斥任何可能性，但是科学可以估量可能性的大小。对那些异常现象，要极其审慎地对待。②轻信特异功能是当今一个世界性现象，甚至一些科学家也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③关键在于弄清客观的事实。④在对“异常现象”进行周密考察时，魔术师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⑤1987 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对“超心理学技术”的评估结论是，最佳的科学证据并不支持超感官知觉和心灵致动存在的结论。⑥对声称的异常现象进行科学考察很有必要。用科学观察的结果反对迷信，揭露骗局，迎接“异常现象”对科学的挑战。

1988 年 7 月，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理事共 50 余人，还有《新华社》、《科技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及北影摄制组的代表。张震寰理事长主持会议。他对人体科学学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他说，一年多来，已经成立了 20 多个科研课题组，发展会员 84 人，对上

半年《科技日报》邀请美国 CSICOP 组织来华访问也发表了一些看法。在会议纪要中反映了这些问题。纪要中写道：“反对者不甘失败，竟然利用洋人来否定我们。他们先邀请一个‘美国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的代表来中国做报告，看表演，目的是否定我们的特异功能的真实性，把它归咎于魔术。然后又借《科技日报》这块宣传园地公开刊登出来，先后两版半，这就挑动了人体科学真伪争论的第二次高潮。我们的态度是既不怕，又重视，不沉默，不回避，积极迎接挑战。”

1988 年 8 月 20 日，《北京晚报》发表署名文章《是气功还是“气功教”？》。文章认为气功是一种功夫，需要长期的锻炼才能受益，想靠听几场“大师”的报告就能获得神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防止把气功锻炼变成气功教。

1988 年 8 月至 10 月，《自然杂志》第 8、9、10 期发表严新在清华大学做的外气系列实验，该组实验报告总共 7 篇。这些实验报告不仅肯定了“气功外气”的存在，而且声称找到了开发“人体潜能”的钥匙。从此，“气功外气”的实验报告接踵而来，许多大学和研究所都设立课题组做这方面的实验。1989 年 2 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将 1987 年辽宁兴城“全国气功科学学术交流会”及后来所做的“气功外气”的“实验报告”和“观察报告”，编辑成两大本著作《气功科学文集》I、II。

另据《中华气功》消息，北京大学 1987~1988 学年，开设了全校性的“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选修课。每周授课 2 学时，记 2 个学分，有 100 多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从北京大学生物系等不时也传播出有关“气功外气”的实验报告。

1988 年 8 月，《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气功学》卷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印行 40 000 册。

1988 年 9 月，《中国气功辞典》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1988 年 10 月 8 日，《健康报》在气功与医学专栏里，发表了张洪林“外气效应与暗示催眠疗法”的文章。明确提出“外气就

是暗示与催眠的作用”。在此前，张洪林在他所在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院报的“学术与争鸣”专栏上，发表了“气功‘外气’浪潮中的反思”及“再论‘外气’”的文章，进一步阐明‘外气’疗效的 6 条特征：①只有对‘外气’敏感的受试者，并知道眼前治病的是气功师有效。②只有受试者知道气功师正在发气时有效，若不告诉受试者有气功师发气时无效。③信“外气”的有效，不信者无效。④从心理学角度看，易受暗示人显著，如年轻者、女性、艺术型气质等，反之不明显或无效。⑤所有“外气”师发气时，均需用语言、表情、眼神、手势、动作或其他信号，如果不用或阻断暗示则无效。⑥只有对受过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知道气功作用的人有效，对不知气功为何物的人无效。

1988 年 10 月，《医学与哲学》杂志第 5 期，发表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张洪林文章“气功学领域中科学与迷信的较量——外气实质初评”，较系统地总结了张洪林对“外气”思潮的认识与批评。

1988 年 11 月，在大陆“气功潮”的影响下，一些“气功师”打入香港的市场，骗人骗钱的“外气报告”、“外气治病”，高额的收费和“气功师”的不断“漏气”，也着实让香港的一些有识之士恼火。严新的“奇迹”、“神功”在香港传播之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1988 年秋，严新又一次来港，打算进一步扩大他的影响，没料到遭到从来没遇上的挑战。带头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化学博士甘钜廷，他口诛笔伐讨伐严新。1989 年，甘钜廷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姑妄评之姑妄听之——评严新报告的科学实验”。认为中国出了个严新，真是无法解释的悲哀。他总结评价了“严新报告”（带功报告和实验报告）：①严新是骗子；②严新在清华大学的实验是毫无意义的；③“气功外气”是傻气；④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受了名义污辱，要跳入黄河浸洗 50 年。在甘钜廷的带领下，卷入这场论战的各界人士达 700 余人，写文章 2000 余篇。香港的气功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来了个 180 度的大转弯，变成了讨伐气功和特异功能热。

1988年11月25日，张香玉等一行8人，受湖北省气功科学研究会和武汉大学邀请，历经10天，分别在武汉大学、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和同济医科大学做“实验”。这些“实验”在1989年8月长虹出版公司出版军人作家李培才著的《大自然的魂魄》一书中，也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科学实验。参与实验的同济医科大学的毕教授和武汉大学的李教授说：“张香玉的‘实验研究报告’没有真实反映事实，不能作为实验的结论……《大自然的魂魄》的作者，不顾事实，把一次实验的记录，当做‘实验研究报告’写在书里，不仅不加说明，还在实验报告中加进自己的东西，其目的，无外乎给张香玉及其‘自然中心功’罩上科学的外衣。”

1988年11月，《中华气功学》由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

1988年12月23日，由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批准张香玉在北京成立了“自然中心功研究所”。这虽然是一个既无人员，又无设备，只通过“咨询”和“授功”赚钱的皮包公司，但这个“研究所”却是张香玉坑人骗钱招摇过市的“护身符”。

1989年1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于光远的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这是于光远先生在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浪潮结束以后，看到“特异功能”以一种气功“外气”的新形式表现出来之后的又一次表态。他在谈话中说：“我想有朝一日再写一批文章，再来一次战斗。”

1989年1月23日，申振钰在《科技日报》撰文指出，当前的“气功外气”热，是“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继1979年“耳朵认字”风波后的第二次浪潮，今后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之后，她又在该报和《健康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等报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医学与哲学》等杂志多次撰文批评灵学与现代迷信的种种理论和实践。

1989年2月，聂春荣写了一篇针对于光远的文章“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可惜，这篇针锋相对的文章没有发

出来。聂春荣逝世后，1991 年发表在《中国人体科学》第 1 卷第 4 期上。

1989 年 1 月至 4 月，《健康报》带头讨论“气功外气”问题。严新在清华大学所做若干“外气”实验报告发表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宣传“气功外气”的热潮。同时，也引起科学界一些学者的质疑。为了弄清事实，《健康报》带头调查事实真相，1988 年 12 月 3 日，张洪林同《健康报》记者陈浩、王国辰一同赴清华大学科研处、生物系、化学系对严新同这两个系所做的实验进行调查采访。其结论是：“陆祖荫、李升平和严新所做的实验未经清华大学科研处和大学的审查批准，就以清华大学的名义发表文章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的行为不代表清华大学。”张洪林应《健康报》中医版刘燕玲副主任的要求将这次的调查写一篇文章，以期引起对“外气”问题的讨论。1989 年 1 月 28 日一篇题为“暗示疗法是气功外气治疗的实质”的文章在《健康报》“气功医疗探讨”的栏目发表，同时也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的文章。之后，《健康报》又连续发表了一些争论文章。1989 年 3 月 11 日，《健康报》又发了张洪林题为“这样的‘外气’实验报道科学吗”的文章，对清华大学某些教师与严新合作，以 2000 公里以外发气，改变多种物质分子结构的报道为例，结合《中华气功》、《东方气功》杂志发表的有关“气功外气”实验内容，一并做了批评性的评述。1989 年 4 月 13 日《健康报》记者刘燕玲、王国辰，又将去清华大学调查的内容整理成一篇题为“清华大学科研处负责人说某些气功研究与清华无关”的消息发表。该消息称：“以清华大学研究人员名义发表的‘气功外气对 2000 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的实验研究’等文章，在海内外造成很大反响，清华大学科研处最近郑重声明，这些研究与清华大学无关，也根本谈不上是一项成果”，“国家科委明确规定，科研成果必须经过成果鉴定及成果登记。而‘气功外气对 2000 公里超距物质分子作用实验研究’，既没有提出过鉴定申请，也没有组织专家评审、测试测定，更未经过成果登记。”

1989年8月20日,《中国体育报》发表张洪林文章“清华大学科研处应进一步澄清事实”,敦促清华大学对严新实验进行审查鉴定。

1989年8月,敬永祥公开发表了《海灯现象——(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造神运动》的长篇报告文学。该报告文学搜集了大量海灯及其弟子范应莲为造神作假作伪的大量证据。敬永祥从1988年10月起,就向新华社写信揭露具有神功“魔力”的海灯法师及其义子范应莲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和《内参选编》编发了这些信件。敬永祥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正是伪气功风靡的年代,就站出来揭露这种作伪作假的行为,并指出:“海灯神”是风靡全国“气功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有了“海灯神”的经验和办法,才有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大师”、“超人”、“奇人”。为此,敬永祥遭遇了10余年的法律官司,但他自始至终坚持正义。他的行为值得赞赏,他的精神值得学习。2000年12月2日,他与申振钰、孟东明、张洪林、张彤玲、李胜先、李力研、张玲、潘国彦、李波、刘华杰、杜萌萌等12位反伪人士,获得了由《广西科技报》、《小博士报》、《生活科学大观》杂志出资,由中国自然科学辩证法研究会颁发的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1989年8月23日,中国科普研究所召开会议,主题是以下几个问题:①展示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看相、算命等宣扬愚昧迷信的图书和印刷品。②由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政策和情况。③请有关专家对此类图书进行分析批判。④交流情况讨论对策。会议还安排了五个重点发言:①“近年来流传的看相算命印刷物述评”——郭正谊。②“手相、面相、血型——科学还是伪科学”——郎景和。③“占星术的批判”——李元。④“宗教、巫术与科学”——申振钰。⑤“如何看待文化遗产——兼评风水术”——陶世龙。这次会议除了一些专家、学者参与外,还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局、中宣部出版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

京电视台社教部、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北京日报》、《北京科技报》、《工人日报》、《中国教育报》、《农民日报》有关人员。这是中国科普研究所公开向“伪科学”挑战的信号，是自 1982 年中宣部下达“三不”文件后，反对“特异功能”、反对“伪科学”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揭露与批判活动。在这之后，中国科普研究所又组织了多次这样的活动。

1989 年 9 月 10 日至 15 日，第二届国际气功会议在西安召开。这个会议是以“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的名义召开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未经任何审批手续的“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正式挂牌子了。实际上是郭周礼盗用了 1988 年 3 月 12 日至 17 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参加的“太极气功与武当气功学术交流会”，会上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名称为“国际气功联合会”的组织名义，既未经新加坡注册，也未经中国有关方面审批。1989 年 3 月 1 日，郭周礼就敢在《气功与体育》杂志社的办公室挂上“第二届国际气功会议筹备处”的牌子，自封秘书长，私刻各式各样“国气联”的印章。一个非法组织诞生了。在“国气联”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名下，召开的会议当然也是非法的。但是胆大妄为自封“国气联”秘书长的郭周礼，不仅是毫无惧色而且狂妄声称，他还要办第三届、第四届国际气功会议，因为没有人对郭周礼操办的这次会议的合法性提出疑问。会上不仅招来了七八十个外国人参加，而且不断地报告中国的“外气”奇迹。诸如气功师宋纪平用气功意念力改变全世界蚊子的遗传密码，使蚊子只叮树叶，草叶、蚜虫，不叮人……

就在郭周礼自鸣得意之时，陕西出了一个倔强的老头，人称“陕西司马南”，离休干部，原《体育世界》杂志社老记者李国华，他就盯住了郭周礼。从 1985 年开始，就对郭周礼篡夺《气功与体育》杂志领导权，自封社长、主编及其相继成立的“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东方气功研究所”、“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中国

体育气功服务队”以及“大兴善寺气功门诊部”、“终南山医院”等非法气功组织进行调查、取证、揭露、举报。坚持十五六年与“郭记”气功诈骗腐败团伙进行斗争，为国分忧，为民除害，无愧于一个老战士、老记者的良知、责任和义务。

1989年9月，由中国科普研究组织翻译的《科学与怪异》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汇集了美国著名科学家和科普作家阿贝尔、阿西莫夫、萨根、加德纳等编写的对超自然现象进行分析和评论的文章，是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重点推荐书。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舆论一边倒的形势下，无疑是一股冲击波。

1989年10月，柯云路的第一本“气功文学”《大气功师》出版。接着，《新世纪》、《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三卷本、《人体宇宙学》、《面对气功》等五本著作一二年内相继问世。

1989年11月，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第二届全国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应邀的日本、美国代表共233人出席会议。

会议期间，还邀请了“特异人”王友成、张宝胜做了“移动钱币”、“思维传感”、“燃烧衣服”、“突破空间障碍”、“认字”等特异功能表演，令很多人“瞠目结舌”。

1989年12月19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气功要整顿”的强烈呼吁声中颁布了《关于加强气功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指出：“一切非医疗卫生单位(含部队)，不得擅自开展气功医疗活动；对气功医疗的宣传报道，必须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正确引导，不得夸大猎奇，更不能带有迷信色彩。”但实际上这个“规定”根本就没有管住伪气功的泛滥。无监督检查机制，此“规定”形同虚设。

1989年，《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创建人体科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为《创建人体科学》一书在成都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这两本书从理论和实践上，

对 10 年来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1990 年 2 月,1987 年取得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特邀会员资格的张香玉便开始在全国“授功”,她的足迹遍及河南、河北、内蒙古、广东、海南、江苏等地。1990 年初,张香玉返回她的工作单位所在地青海省西宁市。连续做了 21 场带功报告,获利 9.7 万元。张香玉在青海搞大型“授功”得手后,于 3 月初返回北京。

1990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张香玉打着“为亚运会集资”的招牌骗取巨额财产。1990 年 3 月 16 日,张香玉亲自跑到亚运会集资部,提出她要“授功集资”,将部分所得捐给亚运会的要求。亚运会集资部负责同志明确答复:授功必须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和支持后方可举办。然而张香玉不顾这些忠告,仍然打着为亚运会集资的旗号,从 3 月 18 日起至 31 日,授功 27 场次,授功人数 11 693 人,赚取人民币 409 255 元。然而这个所谓要捐资亚运会的万人授功,却没有向亚运会捐助一分钱。

1990 年 4 月,张香玉在首都搞“万人授功”,引起各方面人士关注,许多北京市民认为,这是公开搞封建迷信,纷纷写信、打电话向北京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政府立即制止。中国集邮总公司的一位干部连续给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三封信。指出:“张香玉宣传鬼神迷信,如此大范围行骗、蛊惑人心,政府怎能熟视无睹?长此下去,我们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封建主义?”

1990 年 4 月 14 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发表了“醒民”的文章“警惕迷信附体”严厉谴责张香玉借气功宣传迷信。当天下午 4 时许,海淀公安分局的警车突然驶进万寿宾馆,将张香玉抓获收容审查,并于当年的 12 月 6 日正式逮捕,并被判了 6 年徒刑。

1990 年 4 月,系统吹捧张宏堡“神功异能”的由纪一著的《大气功师出山》一书出版,1992 年 10 月,还是这个纪一又写了一本书——《新编大气功师出山》,进一步吹捧张宏堡。这两本书的出版,不仅在于神化已出山的“大气功师”张宏堡,而且也为再造出像张宏堡这样的“大气功师”做准备。事实上在纪一羽翼

丰满之后，便脱离了张宏堡另立门户，又造出打着“生命文学”招牌的“大佛功”、“一通法”，造出一个新“气功大师”、“新气功文学作家”纪一。“法轮功”事件后，“大气功师们”都龟缩起来了，张宏堡也逃往了美国。只有纪一仍顶风，不断变换手法，继续神化自己，以《人活精神》一书及发售能治百病的“一通茶”诱骗、招揽信众，聚敛财产。2000年5月28日，他因涉嫌出版发行非法出版物被抓起来了。

1990年5月17日，由中国科普研究所出面召开座谈会。内容有三项：①推荐该所组译的《科学与怪异》一书。②展示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的西方伪科学图书。③座谈如何抵制和批判形形色色西方伪科学。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来自科技界、医学界、科普界、新闻界的专家学者30多人。会议由中国科普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郭正谊主持。他说，自人体特异功能争论以来，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虽然有中宣部文件，但并没有管住宣传者的声音，相反，变换形式愈演愈烈。出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召开这次会议。大家一起谈谈当前的情况和看法。会上一些学者就有关“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练功出偏”、“外气揭秘”、“看相算命”等主题做了发言。参加这次会议的学者，一部分是反对特异功能的，一部分是批评“外气”气功和看相算命的，这两部分人过去没有机会面对面交流。通过这次交流，大家认识到“外气”气功，实际上就是人体特异功能的变种。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反对“特异功能”、反对“外气”气功两股力量汇合的会议。

1990年5月，《中国人体科学》杂志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创刊，由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此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停刊。

1990年6月，“五角丛书”中的第10辑，由厦门大学乐爱国翻译的美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著的《伪科学的时髦与荒谬》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于当时流行的飞碟热、大金字塔之谜、相面与测字、魔法探矿、大西岛的秘密、心

灵学等伪科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批判。

1990 年 6 月，由谢龙主编的《现代哲学观念》一书出版。该书第 12 章题为“主体思维与人体特异功能”，提出“人体特异功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古典形态推向了‘现代’形态”。这是公开篡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1990 年 7 月 28 日，台湾的一家报纸以“大陆奇人张宝胜玩的是何种神功”为题，再一次揭露张宝胜。美籍华人袁志道，也算是台美商界知名人士，来大陆观光，想与早就享誉海外的“特异人”张宝胜谋面，并想观看张的“特异”表演。袁氏商人听说张宝胜能够“意念移物”、“触摸燃物”、“空瓶变水”、“吸脓”、“药丸离瓶”，最精彩的是把烟灰缸变到人的肚子里去。袁氏商人对这些“特功”表示惊异，于是特邀台湾商界名人尹书田先生同去赴邀观看，袁氏并立下“自愿书”，愿意“以身试法”，接受张宝胜把烟灰缸变到袁氏肚子去的表演，并答应成功后，袁氏除自己去医院取出烟灰缸外，还自愿捐出 10 万美金给张宝胜。7 月 28 日，双方约定在钓鱼台国宾馆午宴时进行。在这位不信邪的袁氏面前，张宝胜为了摆脱自己的窘境，只好表演几手他已经很熟练的“空手烧衣”、“抖药片”、“吸脓”、“意念拨表”的伎俩之后，说另有约会后仓皇逃出会场。事后袁氏把此事公诸于众，张宝胜的这些伎俩不过是“掉包”、“作假作伪”、“人为破坏”的老套子：吸出的“脓”，原来就是卫生间的白色肥皂；损坏袁氏的手表，原来也是人工的破坏行为。为此袁氏大怒，要起诉张宝胜，并给国防科委写信揭发张宝胜的妖言惑众，招摇撞骗。

1990 年 8 月 10 日，在中国科普研究所组织过多次座谈会，讨论会的基础上，在反对“伪科学”一些学者参与策划下，于 8 月 10 日在北京科学会堂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弘扬科学气功，破除封建迷信》报告会。主要内容有：①什么是科学气功。②伪气功种种。③张香玉其人其事。④谈谈走火入魔。⑤近年来借“气功”骗钱害命案例。⑥“气功”及魔术表演。

参加会的有来自科技界、医务界、教育界、新闻界、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 130 余人。报告会后，司马南和魔术师表演了社会上流行的所谓“神功异能”的项目。诸如，“意念认字”、“抖药片”、“白水变味”、“一指弹停电扇”、“意念提物”、“口拉摩托”、“倒拖汽车”、“意念拨表”、“意念移物”，还有两位气功师表演了“轻气功”、“电气功”，司马南都一一做了披露。

这次会议影响很大。它的作用和影响有三：①揭露了打着“特异功能”招牌的骗术，其实不过是“魔术”、“戏法”。②给当时风行社会上的“气功大师”以重创，揭老底辨真相，擦亮了人们的眼睛。③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气功，什么是伪气功，并懂得了“眼见未必为实”的科学道理，对人们进行了一次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教育。会后新华社、中新社及 20 几家新闻单位做了报道。香港甘钜廷博士看到了报道后，欣慰地说：“北京来的否定‘外气’和‘神怪气功’的报道也许能叫大人君子们和有识之士反思吧？”

1990 年 9 月，由申振钰编著的《特异功能与超心理学》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舆论”一边倒的形势下，以《三原色丛书》的名义出版的。该书探讨了中外超心理学研究兴衰历史及理论与方法，使人们对“特异功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是以国外灵学为借鉴，系统批判人体特异功能的一本著作。

1990 年 10 月 13 日，天津《今晚报》报道，天津首次“评气功师职称”。报道称气功师职称分为两种，即气功教师和气功医师，并有高、中、低之分。

1990 年 11 月 3 日，张宏堡以国际生命科学院和国际生命科技大学院院长和校长的身份在北京科技会堂做了《生命科学观与方法论》、《特异功能理论》等专题报告，来自科技界、学术界、医学界、新闻界以及政府部门的 300 多人参加了会议。

1990 年 11 月 16 日，司马南揭露伪气功表演的录像片《神功内幕》，举行首映式。此录像片对于揭露伪气功作假作伪有着长久

的魅力。

1990 年 11 月 18 日,“国际气功科学联合会”秘书长郭周礼与日本三大气功组织签署了在日本召开第三届国际气功会议的协议。就是这样一个从未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非法组织,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组织国内外的气功活动。

1990 年 12 月,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 6 期上发表文章“论科学与伪科学”。这篇论文对科学与伪科学做了界定,并指出,同伪科学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有必要对伪科学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

1991 年 5 月,郭周礼组织考察团赴日本考察第三届国际气功会议筹备情况,中国驻日大使会见了考察团。

1991 年 5 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甄玉撰写的“超心理学与伪科学”的文章,从灵学史出发,从理论上分析了超心理学和伪科学的特征。

1991 年 6 月,由郭正谊、申振钰主编的《气功与伪气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主要是 1990 年 8 月 10 日报告会的文集。这个文集记录了伪气功大师张香玉的覆灭,宣传了科学气功,鞭挞了伪气功和特异功能。

1991 年 7 月,张彤玲著《气功的误区》由科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也是在 1990 年 8 月 10 日报告会上张彤玲所作的“谈谈走火入魔”报告的基础上整理的 45 个释疑,20 个实例。这本书引导练功者走出“接受封建迷信观点,追求‘特异功能’出现”的气功误区,把气功当成一种正常的健身方法。

1991 年 7 月,沈昌在他的家乡,开始以“中华养生益智功辅导站”的名义办班授功,沈昌正式出山。沈昌是一个农家子弟,江苏农学院南通专科班毕业。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农场时,就自吹有“特异功能”,逢人便宣传自己可以“气功治病”,无奈同事了解他的底细,无人相信。于是沈昌就到农场周围的村庄为人看病收钱。一来二去,知道沈昌的人多了,沈昌便开始施展“才能”。无奈他

的“中华养生益智功南通辅导班”，由于没有合法手续，被南通市民政局查处并解散。沈昌转而离开南通到苏州发展，另起炉灶。在苏州某些“领导”的支持下，沈昌开始在苏州工人文化宫内租场地办班、收徒。苏州电子局一些领导，就是沈昌最早的一批“弟子”，并为宣传沈昌“特功”大卖力气。之后，又在他们的支持下成立了“沈昌特功求是者协会”，并请了苏州电台一位资深记者当秘书长。沈昌从此以“协会”的名义四处活动，“沈昌大师”气功事业三部曲，办班敛财，制造理论，发展气功产业，没几年功夫沈昌通过办班、搞带功报告、卖“信息茶”获利几千万元。然后把编造的“沈昌科技”推向全国。从此，又一个“神功大师”在中国大地上出现。

1991年，“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司马南，也像其他“大师”一样名噪海内外，但他不是敛钱骗人，而是弘扬气功文化，去伪存真者。司马南仅在1991年这一年就连续出版了三本书，《气功与骗术》（与人合作）、《伪气功揭秘》海南出版社出版，《神功辨伪——一个气功大师的自白》一书，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他由虔诚的气功修炼者变成了一个反伪斗士的故事。这些书为弘扬气功文化破除封建迷信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之后，司马南用他谙熟伪气功的“秘密”、“门子”以及与伪气功大师斗法的事实继续写书、讲演、表演，揭露伪气功。司马南成为伪气功大师的冤家对头。由于司马南反对伪气功工作的贡献，1999年8月6日，他与于光远、何祚庥、龚育之、郭正谊一起获得第一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1991年，李洪志从本单位正式“停薪留职”，专心发展他的“法轮功”。从1989年李洪志和他的弟子李晶超及合作者刘凤才共同设计、修改以及表演实践（传功初期是由李晶超在台上表演，李洪志讲解），于1992年5月，正式出台了“法轮功”。

1992年2月，于光远在《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期发表文章“坚持科学态度”。

1992 年 4 月 21 日至 24 日，第三次国际气功会议在日本京都市举行。郭周礼率 25 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会议。郭周礼为大会秘书长，利用他的职权，他把已被揭露的严新“2000 公里改变物质分子性状”的所谓实验报告拿到会上继续散播。

1992 年 4 月，由郭正谊、申振钰、卞德培、卞毓麟、张洪林、胡卫国、李吉光、姚允祥等编著的《剖析洋迷信》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在国外流行的“招魂术”、“灵媒子”、“天眼通”、“传心术”、“预知”、“意念致动”等灵学项目，“催眠术”、“地外文明”、“大金字塔之谜”、“异星飞船”、“1999 年大劫难”等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1992 年 5 月 15 日，经过精心准备策划拼凑的“法轮功”正式登上培训班的讲台。从这时起李洪志告别了摆地摊、街头卖艺的历史，开始登堂入室，正式办起了“法轮功”培训班，向社会推出他所创立的“中国法轮功”。所以，有人把这个日子作为李洪志的“出山日”。

1992 年 6 月，刚出山的李洪志，就瞄准了北京，6 月底他与弟子李晶超进京寻求发展。他们找到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想加入该会，并将“法轮功”列入到中国的“气功门派”，李洪志为达此目的，当然使出了他全身解数，大肆吹嘘他的“法轮功”。如何治病、健身，如何讲究功德——真、善、忍，如何受人欢迎。在接受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两个月的考察后，1992 年 8 月，被注册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一个气功研究组织（三级组织），并给了李洪志一个“气功师”的身份。有了这个合法身份，李洪志便在北京大规模办班，开始他大行欺骗、作伪的生涯。他首先给自己升级为“高级气功师”，他先后在北京办了 13 期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像王治文、纪烈武、姚洁这样的“老弟子”，他们成为“法轮功”走向邪教的骨干。

1992 年 8 月 14 日，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发射澳星 B1 取得圆满成功。1992 年 12 月 30 日，香港发景国际集团和世界华人协会向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捐赠 40 万元人民币，以奖励直接参与发射任务的航天专家和有功人员。出人意料的是，在捐赠仪式上，发景集团总裁沈泰东提出，将所捐款 40 万元的半数 20 万元作为特别奖赠予“大师”陈林峰，褒奖他对发射澳星做出的重大预测。实际上这一出奖励“预测大师”的戏，完全是陈林峰自编自导自演的丑剧。陈林峰是世界华人协会的副会长，也是这次捐赠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和主要联系人。这样一来，他本人顺理成章地由“捐赠者”变成了“受奖人”，变成了对火箭发射的“有功人员”。关于陈林峰的所谓“预测”，1995 年，参加火箭发射工作的航天专家庄逢甘院士做了详细的披露，戳穿了陈林峰的谎言。

1992 年 10 月，郭正谊、林自新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 CSICOP）第 16 届国际年会。这是中国怀疑论学者第一次跨出国门参加怀疑论组织的国际会议。CSICOP 组织是 1976 年由美国著名哲学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保罗·库尔兹（Paul Kurtz）建立的。它的宗旨是不带偏见地对于声称的异常现象进行科学调查；致力于推进公众对于各种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评价和判断，以及从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教育方面促进大众和大、中学生对于伪科学和反科学的思潮应具有的怀疑态度、批评态度、探索态度。此后 CSICOP 组织创立了公开发行的会刊《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这个杂志向全世界发行 5000 多份。目前，在全世界 30 多个国家建立近 80 个类似 CSICOP 组织这样的机构和发行近 50 个类似《Skeptical Inquirer》这样的杂志。

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受到了东道主美国 CSICOP 组织的热情接待。CSICOP 组织主席保罗·库尔兹多次接见中国代表团，并就两国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交换了意见，达成了由 CSICOP 组织普罗米修斯出版社（Prometheus Books）出版中国学者林自新、郭正谊、宋天彬、申振钰、张洪林、张彤玲、于力（司

马南)的著作《Qigong Chinese Medicine or Pseudoscience?》(已于 1999 年出版)和在中国翻译出版普罗米修斯出版社图书及双方学者互访进行交流的协议。在会议的学术交流中,CSICOP 组织为中国学者安排了单独的会场,并由库尔兹亲自主持这个会场。会上五位学者分别就中国江湖门派、特异功能、易经、伪气功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学术报告。参加这个会场的 100 多外国朋友,共同讨论了有关问题。

1992 年 10 月下旬,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在京举行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了第三次学术交流大会。来自全国 20 余省、市、自治区的会员代表及日本、美国的来宾参加了会议。26 日下午,会员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的方法,选出了 63 名理事。

1992 年,国家民政部给予中国人体科学学会正式登记。

1993 年 1 月 30 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 107 期发表了张洪林“这类表演不是气功”的文章。指出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所表演的“眼皮提水桶”、“生吞鸡蛋”、“缩身穿童衣”、“玻璃碴上跳舞”等所谓的气功表演节目,与气功风马牛不相及。他说,气功是一种自我身心锻炼的方法,不是用来表演、愉悦观众的。那些诸如踩气球、踩鸡蛋、钉板开石、油锤贯顶、银枪刺喉、手指钻砖等表演项目均属江湖艺人表演技巧、窍门、胆量、道具的配合。这些江湖把戏也被拿来作为“气功”、“特异功能”加以神化,这种宣传无疑是推动了伪气功的泛滥。

1993 年 2 月 2 日,《科技日报》发表了最早揭露“耳朵认字”的陈祖甲的文章“何必求助于神魔”。文章中指出:“1900 年前东汉的王充尚且知道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而当今见诸报端的,常有什么“魔水”、“魔粉”、“魔针”、“神功”、“神带”、“神枕”、“神茶”等“神魔”。面对科学昌明的今天,唯物论者应该相信依靠科学技术,而不是去求助神魔。

1993年4月，李洪志的第一本书《中国法轮功》出版。随后，李洪志早期“教功”的录像带，也出版了。同年12月，《中国法轮功》的修订本连续再版，发行数十万册。这本书奠定了“法轮功”歪理邪说的基础，为李洪志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1993年4月16日，沈昌在上海徐汇区法院打官司，被驳回。这是沈昌在法律上的第一次败北。沈昌1992年到上海，在上海徐汇区宣传他的“沈昌科技”、沈昌“特功”，被徐汇区民政局以“宣传唯心主义、宣传迷信”，与“当前国策相抵触”而驱逐，体现了上海人的现代意识、政治敏感和科学素养。沈昌于是状告徐汇区民政局。

1993年4月，李洪志在北京取得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气功研究组的招牌后，并在北京办了几期培训班。回到老家长春，再一次申请“注册”（在此之前的申请未被接纳），有了北京的牌子。长春市气功科学研究会将“法轮功”注册为下属专业委员会。

1993年5月，于光远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毛泽东与科学规划”。文中涉及《人民日报》曾发表有人根据阳光辐射的数量来计算粮食产量的文章，来证明“亩产10万斤粮食”是可能的，并把这事与此人支持特异功能联系起来，认为同样是违背科学的。

1993年6月，《中国当代气功全书》出版。该书总策划为纪一，主编组由19人组成，其中12人在该书人物卷中可查到，纪一、陈林峰、郭周礼等均在19人之列。

在该书出版说明中写道：“《中国当代气功全书》历经三年，终于出版了，带着我们的欣喜与歉意，了却了一片苦心与虔诚。”

“全书经过征稿、筛选、整理和编辑以‘功法卷’、‘著作卷’、‘人物卷’、‘组织卷’四卷合集而成。共收入气功组织182家，当代功法161种，公开出版的气功著作389部，有一定影响的气功人物556位，但由于渠道不畅未能入选名家名法的仍不少，留待

全书续集再做补充。”

这本声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更多的献身于气功事业的气功师和气功爱好者正名”的全书，其实根本就不具这种特征。观览“全书”可以看出，该书既不是气功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也未经历史的考察与鉴别。这种征集的由“大师”自编自导的“作品”和“小传”何以能戴上“精华”、“正名”的美誉，倒让人感觉有许多虚伪、不实、伪造之处。以《人物卷》为例，对那些在气功大潮中出现的伪气功大师，如李洪志、张宏堡、严新、陈林峰等极力吹捧。像李洪志编造的“神秘身世”，也大段地收录到“全书”中。

1993 年 7 月 23 日，故意杀人的罪犯胡万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哈木呼提监狱服刑期间，被批准从监狱提出，在农二师挂出了“新疆兵团农二师第三劳改支队中医门诊部”的招牌，开始了胡万林“神医”、“神骗”的生涯。

1993 年 7 月 30 日，中央电视台记者对李洪志进行了专访，使李洪志捞到了重要的政治资本。

1993 年 8 月，“法轮功”又升级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直属分会。李洪志嫌这还不够，于是又伙同李昌、王治文、于长新等人在北京非法设立“法轮功研究会”（1996 年后改为“法轮大法研究会”），自任会长。

1993 年，12 月，李洪志掏钱参与“东方健康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在博览会上，他除了做所谓“气功学术报告”外，还自己参与评审，给自己颁发“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奖。

1993 年以后，刚出山一年多的李洪志，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了组织，有了政治资本，也有了经济基础，李洪志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上下，国内、国外，五六年功夫，发展信众 200 万（自我吹嘘达 1 亿），一步步向邪教迈进。

1993 年年底，由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校长朱国伟教授在该校召

开了一次真伪科学研讨会。该会虽然批评的是“水变油”、“超浅水船”、“无隙过盈技术”等伪技术，但确是在伪科学、伪气功风靡大江南北的形势下，朱国伟教授号召和团结了一批科学工作者，在南方燃起了一股反伪科学之火。

1994年1月1日，由国家气功科学联合会和中华体育气功研究会主办的《国际气功报》在西安正式创刊，社长兼总编辑为郭周礼，自称该报是我国惟一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一份气功专业大报。每周一期，至1996年底共发行157期（缺第5期）。1997年改为每周二期，截止到1997年被查封，共出版178期。

199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记者贾西平发表文章“气功师的‘预测’及其他”，揭露陈林峰所谓“预测澳星发射成功”。

1994年4月23日，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理事长，著名的“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者、组织者、领导者张震寰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1994年7月，李力研著《柯云路的新神话》，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1994年8月至9月，李洪志先后去美国、法国进行所谓的“访问”、“讲学”，使李洪志身价倍增。1994年8月，由张兆志编写的《中国气功大论战》一书，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在当时伪气功鼎盛时期，能够有这样的一本书出版，真是难能可贵。正像书前“编者的话”中所说的：“作者的这种揭露和批判，常可使那些被揭露、被批判者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从当前我国气功的现状来看，这种揭露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1994年9月，由傅起凤编著的《惊世奇功揭秘》一书，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由出身于魔术世家谙熟魔术的傅起凤研究员编写的。她的家族几代人都有著名魔术师，她本人也从事魔术史研究，所以在她笔下的“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种种项目，不过就是魔术的“门子”。这是国内第一本从魔术发展史以及魔术和巫术、道术、佛法、气功之间的关系，揭开“特异功

能”、伪气功奥秘之书，令人耳目一新。

1994 年 9 月，由辽宁气功人体康复科学研究中心出版了《中华奇女张颖》。张颖的“奇异功能”就是“空中抓药”行医。张颖到美国、日本、香港、台湾，四处招摇撞骗，最后在台湾，被魔术师当场揭穿。为此，张颖被台湾地方检查署以非法行医起诉，被判一年三个月刑期。

1994 年 10 月，《气功与体育》、《国际气功报》主编，“国际气功联合会”秘书长郭周礼，同涉嫌诈骗，在西安被捕，当场搜出巨额来历不明的人民币和外币，以及大量私刻的公章。10 月 11 日，民政部发出解散“国际气功联合会”的命令。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和 10 月 12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都播发了这一消息。

1994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在北京召开了“庆祝中国人体科学诞生 15 周年”（1979～1994，作者注）大会，来自 20 余省、市的 400 余位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中还有来自日本、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 30 余位外宾。由于张震寰的去世，在会议的前一天，理事会改选陈信为学会的理事长，林书煌为常务副理事长（就是这位常务副理事长携几千万元资产逃亡国外，现仍在逃）。会上，新任理事长陈信做了长达一个半小时题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 15 年来的回顾与展望》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目前已有会员 500 余人，团体会员 14 个。1990 年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创建了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与教委批准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中心为一体），内蒙古医学院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特异功能班。

会议期间的 26 日晚和 27 日上午，“特异功能人”王友成、冯银栓、张宝胜表演了“额前贴硬币”、“空中抓药”、“抖药片”、“烧衣服”等“特异功能”。

1994 年 12 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洪志的《转法轮》，并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李洪志参加了首发式，并在

会上“讲法”。这本书是违犯国家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迷信出版物，全书充满了谎言、骗术和歪理邪说，是李洪志毒害信众的精神毒品，是李洪志邪教教义的代表作。

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的文件。文件中指出：“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对利用封建迷信搞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打击，对反动会道门组织要坚持依法取缔。”这个文件的颁布，吹响了向伪科学、伪气功开战的号角。此后，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斗争有了长足的进展。

1995年2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11号文件的号召下，科技界首先起来反对伪科学。中国科学院近百名院士联名倡议“高举科学旗帜，做好科普工作”。倡议书指出：“努力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方法，学会科学思维，战胜迷信、愚昧和贫穷，为我国现代化事业奠定坚实基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

1995年3月3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抢救正义——揭露‘佛子’真相搏斗纪实”。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所谓“万法归一功”57代传人张小平的种种恶行和中央电视台驻武警记者站记者张玲揭露张小平生活流氓、政治流氓、文化流氓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内幕新闻。

1995年3月5日，《中国科协报》发表两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在中国科协四届五次会上的发言“大力开展科普工作，坚决反击伪科学”。

潘院士在讲话中颇有感慨地指出，当今中国的迷信活动和伪科学的传播像汪洋大海般拥有广阔的市场，甚至一些名流和科学家也卷进去。这中间不仅有烧香拜佛、看相算命，更有那些未卜先知的大预言家，神奇莫测的特异功能者，还有什么穿墙术、辟

谷术，甚至还有不仅看到飞碟和外星人，而且还和外星人发生性关系的人物。如此荒诞的宣传，体现了中国的“民智水平”之低下，恐怕只能引入世界落后国家之列了！

1995 年 4 月 25 日，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龚育之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工作会议上做了“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的演讲。指出，面对社会上频繁发生的反科学、伪科学和迷信愚昧活动，应当有一个战斗的姿态。保护科学精神，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迷信和伪科学，应该作为既是科学的研究会，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会的一个应尽的责任。

1995 年 4 月 7 日至 10 日，《第四届国际气功大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郭周礼率 21 人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郭仍为大会秘书长，这个会议仍然是郭周礼以“国气联”的名义策划的，“国气联”本来就是一个非法组织，而且在 1994 年已被民政部明令解散。郭被拘捕放出来之后，仍然猖獗地活动。郭周礼狂妄地说：“老郭永远倒不了。”西安民政局社团处负责人通知郭周礼谈话，郭态度蛮横地说：“我不和你谈，要谈让国家民政部来找我。”

1995 年 4 月 17 日，被称为“法力无边”的“佛子”张小平在河北石家庄落入法网。这是继自称“玉皇大帝”女儿的张香玉之后，又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伪气功大师。张香玉、张小平的落网说明，伪气功大师骗人敛财，除“包装”、“打扮”成“超人”、“神人”、“传人”、“佛子”……还要打着领导、科学家、名人的招牌。张小平所以能行骗于海内外，除了自吹他的“法力无边”外，还仰仗两个“尚方宝剑”。一说自己是邓小平的保健医生；二是伪造邓小平同志题词“步步上进”，居然明目张胆地在深圳挂了许多年。要不是中央电视台驻武警记者站的记者张玲冒着被张小平追杀的危险（经常接到张小平弟子打来的威胁、恐吓电话，逼得张玲全家不得不经常转移，东躲西藏），跟踪张小平多年调查他的行骗和作伪，并把他的丑行写成《女记者江湖追踪“佛子”张小平》一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他可能还在民间肆虐百姓。张香

玉、张小平的落网，也说明打着气功招牌，以行聚敛财产之实的伪气功和伪气功大师，都要受到人民的声讨，法律的制裁。

1995年5月26日，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11号文件的发布和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何祚庥、庆承瑞等人写的“迟到的报道——‘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的文章，揭露张宝胜在1988年5月13日那次由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组织的，有信仰者和怀疑者共同参加的，所谓向国家有关部门领导汇报会兼表演会的一次正式测试表演的失败和作弊过程。同样在1988年3月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期间，张宝胜给来京的香港代表和委员会表演很成功。香港代表为了弄清真假，于是他们在和平门烤鸭店摆下两桌酒席，邀请于光远和张宝胜当面较量，张宝胜答应赴宴，可是到时间等了很久，张宝胜没有去，让香港的代表、委员大为扫兴，也为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大打了一个问号。这件事，也是事隔7年后的1995年，于光远先生写了一篇“佛眼通”的文章在《随军》杂志1995年第5期发表，揭露张宝胜虚伪、作假的本质后，才被公之于众。

这是在中宣部1982年发布“三不方针”的文件以后，“特异功能”、伪气功不断地、大面积地、持久地宣传的情况下，持批评态度的反对者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著名“特异人”作假、作伪的欺诈行为，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美国、欧洲、香港、台湾大大小小的报纸都全文或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就此，国内一批反对者及海外的一些学者针对“特异功能”与气功“外气”及其他伪科学现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驳。这是“人体特异功能”风靡20年来，又未能拿出过硬的、可以经受严格检验的项目，而导致怀疑论者针对打着“特异功能”招牌所兴起的伪气功和各种形式的伪科学进行的有一定力度、深度、广度的批驳，最终导致国内的人体特异功能、伪气功的宣传与传播热首次出现明显降温。

1995年5月2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中国科

学院院长周光召做了《迈向科技大发展的新世纪》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现在社会上有人鼓吹可能存在新的相互作用力，以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辩护，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讲话指出：“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一道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维护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迷信活动，反对伪科学。”

1995 年 6 月 2 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何祚庥、郭正谊、胡亚东、邱仁宗、张洪林、张彤玲 6 位同志的文章“该揭露伪气功和‘特异功能’了”。这篇文章不仅批评了伪气功和“特异功能”推行的超自然崇拜，是完全违反科学的，而且以日本奥姆真理教为例，指出：“趁伪气功和所谓‘特异功能’还未演变成真理教那样的邪教，还未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事实上，十余年来死于伪气功、因练气功而精神失常者已经不计其数了），我们已到了清算伪气功和所谓‘特异功能’的时候了。”

1995 年 6 月 14 日至 24 日，美国 CSICOP 组织派出三位理事，第二次来中国访问。这三位成员是加拿大籍西蒙大学生物学家巴里·拜尔斯坦（Barry Beyerstein）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桑普森（Wallace Sampson）、美国《医学协会杂志》记者安德鲁·斯科林奇（Andrew Skolnick）。在中国期间访问了北京、上海两座城市，在北京期间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中国方面参加讨论会的有原《科技日报》社长兼总编林自新，国家科委调研室副主任张琚，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郭正谊，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申振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邱仁宗，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政，机电部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开逊，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编审袁钟博士等学者及新闻单位 20 余人参加交流和讨论。美国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北美大陆，利用宗教信仰方式，使病人通过“神职人员”与上帝直接对话，从而消灭去病的伪科学事件十分普遍，特别是在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癌症、白血病等顽症领域。此外还有维生素 C 疗法、古老的顺势疗

法等伪‘疗法’屡禁不绝。这其中，既与西方人的“反权威”传统有关，也和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即认为证实和未被证实可行的文化同样优越）不无关系。长期受这种思潮熏陶的年轻人，很容易走上“文化相对主义”的道路。斯科林奇在发言中，讲述他多年来，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手段，联合各界朋友（包括魔术师），进行科学打假，揭穿魔杖探矿，“特异功能”治病、看风水、占星术等伪科学骗局。他认为，新闻出版界在反伪科学问题上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中国学者在发言中指出：当代中国伪科学的骗子歪曲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与国际上反科学的“新时代运动”思潮产生共鸣。他们大打东方神秘主义旗帜，创办带有帮会性质及浓重邪教色彩的严密组织。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大地涌现出数量惊人的“气功大师”，利用声称的所谓“特异功能”，大搞坑人、骗钱，制造社会动乱。所以，反对伪科学不仅仅是科学界的任务，即科学家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发表意见时，要格外慎重，特别是对奇异现象的探索必须是严格的、科学的。另一方面要面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树立一种全民族都应具有的科学精神，让大众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和反科学，提高鉴别能力，自觉抵制伪科学。代表团在北京期间还访问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和那里的专家学者座谈讨论。6月20日至24日，代表团在上海访问了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脑生理研究所。

1995年6月20日至24日，柯云路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组织了“柯云路健康万里行报告团”，在全国多个城市举行报告会。经查，这个“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学院”是一个未登记注册的非法组织。8月5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做出“停止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筹建工作”的决定。12月5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今后如有人以‘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名义从事违法活动，有关部门将依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1995年初，中国科协以党组的名义给国家科委打报告，按着

中共中央、国务院 11 号文件精神，提出开展反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意见。6 月份，中国科协成立了“保卫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迷信”组织委员会，把各方面有关人士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愚昧迷信和伪科学。后来这个组委会发展成“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以下简称论坛）。与此同时，将“论坛”内容汇编成《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的资料。2000 年以后，改名为《捍卫科学尊严文萃》，每年 4 期，下发到全国各级科协，在社会上树立起一面弘扬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的旗帜。之后，这个“论坛”就由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主任龚育之教授主持。龚育之同志一开始就敏锐地指出，“这是一场捍卫科学精神、捍卫科学尊严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同迷信和神秘主义，你进我退，此长彼消”。此“论坛”自 1995 年至 2003 年，已召开了 8 次，汇编资料 22 册。

· 1995 年 6 月，《中国青年》杂志第 6 期，发出了反伪科学专题：《科学与伪科学——世纪末的较量》。

1995 年 7 月，司马南著《神功内幕》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是继 1991 年出版的《神功辨伪》后，第二部揭露伪气功、特异功能的近 50 万字的著作。据称这本书截至 1997 年 4 月，已发行 50 万册，而且不断有盗版书问世。根据市场需求，经司马南修订，1998 年 1 月，又出了该书的第 2 版。可见人们是多么的渴望了解一下这些“神功”，这些“大师”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司马南在再版这本书时，有一段警句，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个人可以被骗一生，一些人可以被骗一时，但没有人能让所有人被骗永远，一个民族不可能被长久地欺骗，更何况是中华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

1995 年 7 月 12 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王小波文章《迷信与邪门书》，批评个别出版部门大肆出版柯云路的所谓“特异功能”、

“生命科学”之类的邪门书。

1995年7月26日,《工人日报》发起了对伪科学、伪气功的声讨。7月中旬《工人日报》召开了一个严新“气功科学实验”座谈会,邀请了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高能物理所研究员王蕴玉,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宋心琦,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霍宏暹,北京大学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高崇寿,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郭海,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郭正谊,就严新在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科院高能所做的一些实验的真伪进行评论。7月26日《工人日报》在一版头条以“科学殿堂不容玷污”的消息和评论员的文章“坚决反对伪科学”,举起了反对伪科学的大旗。这一期的《工人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6位科学家评论气功师严新和科学工作者合作所发表的一些所谓科学实验和表演。指出,这些所谓的实验,是极不真实、极不严肃的,完全不具科学性,违背科研规律和起码的科学实验原则,以伪科学欺世盗名,图利骗钱,把科学殿堂搞得乌烟瘴气,甚至使我国一些著名高等学府、研究院、所的声誉在海内外受到影响。因此对这些现象,不能再听之任之,必须动员社会各界奋起揭露和批评这些丑恶现象。接着《工人日报》又连续刊发了坚决反对伪科学的文章。1995年8月3日,“赛先生,不能沉默——二论坚决反对伪科学”。指出,发扬“五四”精神,请出“赛先生”与社会各界共同呐喊,不要再让伪科学信口开河。1995年8月9日,“摘掉金字招牌——三论坚决反对伪科学”指出,伪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以著名高等学府、科研院所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文章呼吁,我们的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再不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新闻媒体应该深刻反思,多给一些让科学家说话的机会。1995年8月11日,“让科学说话——四论坚决反对伪科学。指出,伪科学用“科学”的字眼,“现代科学”的招牌作掩护,贩卖“天方夜谭”的神话,要撕下伪科学的画皮,还是要让科学说话。1995年8月16日,“戮力同心

清除污染——五论坚决反对伪科学”。号召全社会戮力同心，清除伪科学的污染，这个任务任重道远。长期以来，伪科学所以狼奔豕突，与一些地方、一些部门领导重视不够、听之任之、态度暧昧，甚至为虎作伥有关，进而发展为社会“公害”，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1995 年 8 月 3、4、5 日，香港《中国时报》发表大陆反思特异功能报道：“媒体‘发功’，特异功能首当其冲”、“‘超人’特异功能，多属子虚乌有”、“伪科学蒙蔽人心，十二亿之耻”。

1995 年 8 月 8 日，《工人日报》，以“伪科学为什么在当前的我国泛滥？”为主题，召开了有 10 位社会科学家参加的座谈会。他们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北京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彭瑞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宗教所杜继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吴延濬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袁钟博士，北京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胡佩诚教授，中国科普研究所郭正谊研究员以及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张彤玲，中国中医研究院气功研究室主任张洪林，《杂技与魔术》杂志副主编傅起凤。会议由《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孟东明主持。龚育之在会上做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赞扬《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等许多报纸在捍卫科学精神方面所做的工作，并向科学家及科技界同志们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表示敬意。他特别指出《工人日报》最近所发的一批文章，用摆事实讲道理，用具体的实例，告诉人们什么叫科学实验、什么叫非科学、假科学或不够科学水准的实验。这是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重要方面，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会议上几位学者的发言刊登在《工人日报》1995 年 8 月 16 日第五版上。

1995 年 8 月 9 日，《工人日报》记者走访了早在 1989 年就代表清华大学发表郑重声明的清华大学科研处原处长张宏涛同志。提起当年的声明，张宏涛仍记忆犹新。就此，张宏涛说，当时有

很多打着清华大学名义的气功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还有很多人到我校或来函找严新求医、求教，搅得是非不清。我在校长授权下声明：严新不是清华大学教职工，学校也未聘请过包括严新在内的任何气功师担任教师或兼职研究人员。他说，即使清华大学有科研人员与严新一起做实验，也仅是以他个人名义参加的，并不代表清华大学。他认为，是到了正直科学家站出来批评严新“气功科学实验”不科学的时候了，重新强调清华大学当时的声明，是完全必要的。

1995年8月21日，《工人日报》报道：8月5日至9日，在广东汕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学大会”上，与会华裔科学家纷纷向中国科技界表示祝贺。华裔诺贝尔获奖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等人表示支持中国科学界、新闻界，支持何祚庥反对伪科学、伪气功。

1995年8月26日至29日，在呼和浩特召开了1995年人体科学学术会议暨特异功能测试会议，约百余人参加会议。经内蒙古自考委员会批准，国家教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同意，从这年起，在内蒙古医学院开设中医专业人体特异功能自学考试大专班，面向全国招生。

1995年9月20日，《工人日报》再一次报道“超人”张宝胜“漏气”的特异功能表演。该报道以“敢冒风险，却难掩破绽”为题报道了1995年8月11日张宝胜在称之为招待新闻单位的一次内部聚会的表演。这消息一传出，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传遍了首都各大新闻单位。当天下午5点30分，各报记者陆续集中到北京某新闻单位的大楼前。6点钟左右，一辆挂着国徽及“警车”字样的黑色丰田轿车停在了大门口。记者们蜂拥而至，想一睹“超人”张宝胜的风采。不料，除了几家新闻单位的老总被一位中年妇女领进了大楼，其余绝大多数记者被挡在了门外，几经交涉未获准进入现场。据进入现场的读者透露，张宝胜玩的还是老“套数”——弯刀叉，意念认字，抖药片，烧衣服，但仍然是老手法，

弯刀叉，还是用物理的机械力完成或者事先在刀叉上做手脚，一位坐在张宝胜旁边的目击者说，他看到张宝胜的屁股底下露出了叉子，这与当年风靡欧美大陆的“特异人”尤里·盖勒一样，当他用身体的部分帮助他弯刀叉时，在场的魔术师詹姆斯·兰迪，当场抓住了他的手腕子。至于“认字”、“抖药片”、“烧衣服”，更是用“偷看”、“掉包”在衣服上涂抹燃点很低的白磷等小戏法蒙人、唬人的。

1995 年 9 月 20 日至 21 日，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研讨会。这是国内自 199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的文件之后，反对伪科学、伪气功规格最高、规格最大的一次盛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玉台，书记常志海，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邢贲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刘吉，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还有中科院院士王大珩、马大猷、何祚庥、王夔、潘家铮、庄逢甘以及专家、教授和反伪人士 150 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协两科联盟委员会主任龚育之主持并致开幕词。他以“捍卫科学尊严”为题的演讲中指出，如果说这个会有什么“来头”，有什么“尚方宝剑”，“来头”就是当前揭露伪气功、伪科学的大好形势；“尚方宝剑”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对于中央所说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不能再等闲视之。这场斗争既是捍卫科学精神的斗争，也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这个命题的另一个侧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与迷信思想是相对立的。迷信泛滥，损害科学精神，也损害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得到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力和吸引力就增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朱光亚院士在会议闭会时做了“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是很重要、很紧迫的任务”的讲话。会上，庄逢甘院士就

“慧学大师”陈林峰和“雪域奇人”玉骑的所谓对火箭、卫星发射进行预测为名，大肆兜售封建迷信货色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批判（这方面的详细内容刊登在1995年9月25日《中国科学报》上）。会上还有25位专家、学者发言，揭露伪气功、伪科学，《工人日报》副总编孟东明以“担负起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为题，系统地介绍了《工人日报》组织反对伪科学报道的体会。他说，《工人日报》所以有勇气挑起反伪气功这面大旗，是因为看到名声显赫的气功大师的欺骗嘴脸，认识到伪气功不仅在社会上影响恶劣，而且已经玷污了科学的殿堂，影响了我国科学的声誉。作为新闻媒体，有责任、义务披露事实真相，还科学本来目的。司马南和中国铁路文工团魔术演员徐秋还表演了被声称为“特异功能”的伪气功项目。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倡议书。倡议书中，呼吁科技工作者、领导与管理干部、新闻媒体、执法机构对于“捍卫科学尊严”方面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

这次会议，也被称之为中国科协两科联盟委员会“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第一次论坛，之后，延续这个名称，不定期召开各种不同主题的论坛。从此这个“论坛”成为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一面旗帜。

1995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官杉的文章：“灵魂的新装——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揭露柯云路以“新思想”的幌子，贩卖“唯灵论”旧货的真实面目。文章指出，《破译》作者所破译的“人类神秘现象，实际上就是潜心破译神灵的奥秘”。正像柯云路自己所写的：“我们破译神灵，其实就是神灵之物。我此刻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感觉到神灵在照耀，神灵在启示，神灵在暗中相助。”

1995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记者孔晓宁的文章：《向伪科学宣战》。把国内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声音传播到海外。

1996 年 1 月 26 日,《工人日报》发表秋云飞文章“听沈昌吹牛,心想事成太荒唐”。从 1991 年从苏州正式出山的沈昌,这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名气。他的“带功”报告已做到了北京大学这样著名的高等学府,他声称在常州做的一次带功报告 5000 多人参加。沈昌骗人的手段有三:一是做“带功”报告;二是兜售“信息茶”;三是推销“心想事成”的所谓“沈昌人体科技”的异端邪说。沈昌用这样的手段,没几年功夫就聚敛巨额财产,在苏州盖起了“人体科技应用中心”大楼。并迅速向邪教方向发展,他发展信徒(号称几百万信徒),建立组织网络,沈昌自称全国有 500 多个活动站,搞教主崇拜,破坏社会秩序,对抗法律。1996 年 4 月 21 日,沈昌搞“人体科技应用中心”大楼奠基仪式,3 万多人聚集现场,造成 312 国道堵塞,当警方赶到现场疏导时,很多信徒高喊:“我们只听沈昌老师的!”沈昌一到现场,由信徒借来的警车开道,红地毯铺路,一路信徒高举双手大呼口号。秋云飞在《工人日报》上,批评这样的教主,沈昌自然是不能相容的。4 月 8 日,沈昌以侵害“名誉权”,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告《工人日报》和秋云飞。《工人日报》8 月 30 日又刊登一组北京大学黄楠森、赵光武、刘华杰等学者批评沈昌“人体科技”的文章。9 月 4 日,《工人日报》门前聚集一百多信徒,要为沈昌老师讨个“公道”。之后,报社门前每天都有几十人来闹事。10 月 10 日,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为了给沈昌老师“助威”,上千名信徒半夜从郊区赶来,在法院门外排队等候。当时,一辆囚车开过来,所有信徒以为沈昌来了,竞相鼓掌、欢呼、气氛空前高涨,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正因如此,这一天的审判没有进行下去。但法律的威力是无穷的。在推后十几天的审判中,沈昌还是败诉了。这是沈昌第二次输了官司。

1996 年 2 月 7 日,宋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而奋斗”的讲话,提出:“科技界要同社会各界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1996年2月7日，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在科普大会上做了“加强科学普及，弘扬科学精神”的报告。这个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科学实践活动的重要性；第二部分讲科学精神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讲科学普及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报告的第二部分周光召指出，弘扬科学精神不仅是科学界的事情，对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普及基本科学知识的同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此举的关键则在科学界、领导干部以及舆论界。他引据400年前，英国哲学家培根（1561～1626）在他著的《新工具》一书中分析迷信和认识错误发生的根据，他称之为四种“假相”。第一种“种族假相”，是人类普遍易犯的错误，原因是人们都错认了感觉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第二种“洞穴假相”，是个人爱好和天性引起的错误。天性好古，就会崇古，反之，则会轻视古代，偏爱当今。第三种“市场假相”，是交往和言语中产生的错误。如不诚实，弄虚作假，相信谣言等。第四种“剧场假相”，是主观虚构的错误，就像舞台上的表演，与真实世界相去甚远。这些分析，对照在中国大地上伪科学、伪气功的泛滥，是有很大启发性的。周光召的这个报告引起与会代表广泛的注意。

1996年3月1日，《求是》杂志第5期发表了郭正谊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这是《求是》杂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1994年颁发11号文件后，刊发的一篇比较系统地批评愚昧迷信和伪科学的理论文章。文章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大地风靡的迷信与伪科学活动现状特点以及泛滥原因及危害。文章最后的附录：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让人们思考》一书中提出的“三不信”原则很有启发。即①当专家意见一致时，切勿相信反对的意见。②当专家意见不一致时，切勿相信任何一方的意见。③当专家一致认为某种看法缺乏充分根据时，切勿相信任何人的武断主张。

1996年4月，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在北京

召开。人体科学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张耀廷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张宝胜到场表演了几项特异功能。陈信理事长在会议最后总结说：“对于形势的发展，不论目前也好，今后也好，出现的任何风波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掌握了真理，掌握了事实，就无所畏惧。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坚持用事实来说服人”。

1996 年 5 月 17 日至 19 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理事长龚育之做了“论发扬和保卫科学精神”的报告。龚育之在报告中，就伪科学、伪气功所提出的种种理论和案例，从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认识论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指出，要把愚昧迷信和伪科学当做一种认识现象来研究。这里面涉及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诸如科学检验标准问题；表演、科学演示和科学实验的关系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方式问题；神秘现象和“突破现有科学”的认识问题；新旧理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问题；真理的实用范围问题等都需要认真研究。他赞成“不要随便把一门科学叫做伪科学”的提法。但是如果是宣传迷信，即宣传神鬼、命运、灵魂以及各种超自然物质的神秘力量，那么，不管这种宣传把自己称为什么门类的科学，物理科学也罢，生命科学也罢，人体科学也罢，对这种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迷信和种种神秘事物的宣传只能称之为伪科学。

1996 年 5 月，杜继文（钟科文）著《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一书，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针对社会上掀起的“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和种种社会问题，引起了作者和社会上各方面有良知的人的关注。作者指出，这个时候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神化和巫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社会问题，它所引发的社会效果和社会震动，几乎令所有人注目；它所涉及的范围，从宗教、哲学到医学、科学，从传统文化到现代化方向，从个人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到国家

的文明建设，都提出了许多有待澄清的问题和需要切实解决的实际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促进医学和科学的正常发展，有利于民主与法制建设，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正是这一认识，促成作者和他的课题组，进行了若干调查、分析，研究了大量资料，经过了认真、严肃的理性思考，写成这本书。这是当时国内一本以中国的“大气功师”、“特异神人”为对象进行历史、哲学、宗教、社会学、科学哲学的分析的理论著作。该书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图书三等奖。1999年7月该书的修订本《法轮功何以成势——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由当代中国出版社重新出版。

1996年6月，张洪林著《还气功本来面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自1988年以来张洪林发表的揭露和批判伪气功集大成的著作。他说，我一定要“还气功本来面目”，为气功“正本清源”。

1996年6月12日，中宣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发出《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在对待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这类重大问题上，新闻宣传要勇于捍卫科学与真理，不能模棱两可，对违反科学的事实、科学原则和科学精神的荒诞学说，对反科学、伪科学的‘奇闻怪事’，对求神弄鬼的封建迷信活动，对违反科学规律和弄虚作假行为，一定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揭露、批评和反对。”这个《通知》是直接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科委、科协和中央有关新闻单位的。《通知》的10条意见中，中心是把住宣传口子，特别是媒体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播媒介，应加大科普宣传的声势和力度。《通知》最后说，各地宣传部门、科委、科协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会同教育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和社会各界，真正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1996年6月20日至23日，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城的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召开了由美国CSICOP组织第20届年会暨第

一届世界怀疑论大会，来自亚洲、东、西欧洲、南、北美洲及澳洲的 30 多个国家的 1000 余名代表参加。

林自新、申振铨参加了大会，并以“异常现象在中国”（The Paranormal in China）为题，做了专题交流。来自美国、荷兰、印度、英国、俄国、日本、加拿大的 40 多位学者参加了专题交流。

1996 年 6 月 24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监狱管理局发出了“立即停止罪犯胡万林非法行医的通知”。胡万林自 1993 年在农二师 223 团挂牌行医，到发出该“通知”时止，已治死和经其他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人数达数十人。在兵团行医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股“神秘氛围”、“恶势力”：①伪造年龄，胡万林说自己已经 81 岁（实际只有 46 岁），吹嘘自己有神功异能，并已修改《本草纲目》若干错误。②制造神秘，在门诊部周围到处张贴吹捧胡万林“玄极大师”、“大仙”等标语。③利用一部分信徒求医心切的心理，培育了一股恶势力，吹捧胡万林的“神奇”，说“胡大仙”头上有发光的光环，请“胡大仙”看病，必须“心诚则灵”，否则就要遭报应。胡万林于 1997 年被释放，成了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

1996 年 6 月 17 日，当时任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副司长的潘国彦写了题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是全国首篇在大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法轮功”邪说和揭露李洪志无耻的自我造神行径的文章，致使“法轮功”信徒围攻《光明日报》。这是“法轮功”最早的一次围攻事件。早在 1990 年开始，潘国彦以比较敏锐的眼光看出社会上一批打着科学招牌的伪科学著作，宣传神功绝技传播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能论。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对一批宣传迷信与伪科学的书进行审读，并由新闻出版署查禁了这批书。

1996 年 7 月 2 日，《中国科协简报》第 9 期刊登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中止支持“人体特异功能”或“超感官知觉的研究”。这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从 1970 年起先后支持

的依靠“特异人”搜集情报的所谓星门（星球大门）计划，到1995年底，中央情报局宣布取消了这项耗资2000万美元的“星门计划”。其结论是：利用“特异人”从事谍报工作既不可靠、又无价值，而且实验研究并未验证特异功能的存在。《中国气功科学》杂志1996年第2期以“美国正在大力研究和开发应用人体特异功能”做了歪曲的报道，称：“这些特异人的确提供过一些有趣，甚至令人心痒难搔的情报。”

1996年7月24日，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立即收缴封存〈中国法轮功〉等五种书的通知》。这五种书是：《中国法轮功》、《转法轮》、《转法轮（卷二）》、《法轮大法义解》、《神通大法——李洪志和中国法轮功》。

1996年8月，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三本揭露伪科学的丛书。这三本书是郭正谊主编的《揭穿涉资亿元的“水变油”大骗局》、何祚庥主编的《警惕祸国殃民的伪气功》、郭正谊、祝永华主编的《扫除用科学语言包装的封建迷信沉渣》。

1996年8月，由何祚庥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这本还各种“大师”本来面目的反伪科学的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独具慧眼，鼎力相助，将拟10月出版的该书，提前两个月昭示大众。海内外数家报纸以“捍卫科学尊严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学者呼吁摒弃愚昧迷信，向伪科学展开新攻势”、“还‘大师’们以真面目”、“内地召科学家聚会，吁联手打击伪科学”等标题，报道该书出版的意义。

1996年8月，中宣部、国家体委、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局等部门发出《加强社会气功管理的通知》。指出要“依法坚决制止非法行医和封建迷信宣传，严厉打击利用气功进行诈骗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然而，伪气功的诈骗活动和非法行医仍在泛滥。此时不仅那些早出山的伪气功大师继续疯狂肆虐百姓，晚出山的像李洪志、胡万林这样的骗子巫医，依然十分猖獗。

1996 年 9 月 1 日，在北京长安街上的社会科学书店，召开了由何祚庥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的首发式，10 多位著名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领导出席首发式。中科院院士王大珩、潘家铮、邹承鲁、庄逢甘、何祚庥、王夔，社会科学家龚育之、任继愈、刘吉、杜继文还为读者签名售书。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在首发式的座谈会上，呼吁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应组成联盟，使科学真理真正得到捍卫。中国工程院院长、两院院士、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在为该书的题词中，特别强调“倡导科学思想，捍卫科学尊严，摈除愚昧迷信，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台在该书的首发式上指出，《伪科学曝光》的出版继续证明，伪科学终究是没有市场的，但同时要树立长期作战的观念，充分认识到反对伪科学工作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正是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使《伪科学曝光》这样的书，还能在 1999 年 9 月得到第二次印刷，并同时出版了《伪科学再曝光》。

1996 年 9 月 30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何祚庥院士“表演不是科学实验”的文章。文章针对“耳朵认字”、“抖药片”之类的“特异功能”和伪气功表演，指出：“科学实验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探索事物和现象间的真实的因果联系。而表演则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这就完全有可能在表演时使用魔术手法，也就是将虚假的因果联系冒充真实的因果联系。这是表演和科学实验的最重要区别。”文章最后说：“本来，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实验是不需要采取特种防伪措施（即防止别人‘调包’的）。但由于现在表演代替科学实验的做法十分盛行，而且被称为已是‘客观事实’，这就不得不郑重说明一句，表演不是科学实验。”

1996 年 10 月 12 日，台北检察署依据受害人及知情人的举报，查抄了台湾邪教头目“神棍”宋七力 7 个窝点，从查抄宋七力的窝点中发现，1996 年 6 月 6 日，由郭周礼一手操办，为宋七力在大陆注册了“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宋七力天人合一学会”，并

在《国际气功报》上做广告宣称将在北京举办“中国莲花圣光功”高级功法培训班。所谓“莲花圣光功”就是以宋七力天人合一思想为功法理论基础的。这个“莲花圣光功”已成为郭周礼控制下的“国气联”和“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的团体会员，并由“中国体育气功研究会”批准成立了“中体会宋七力学会”，在大陆积极活动，其理事长是哈尔滨圣光健身艺术学校校长孙厚民。学会拿出10万元，为宋七力大做“神化”广告和写宣传宋七力的文章。这些活动说明台湾邪教已渗透到大陆。何祚庥、郭正谊、龚育之撰文“封建迷信必在严打之列”，指出了台湾邪教组织“宋七力天人合一学会”，正在我们这里向纵深渗透，并必将成为社会的极不稳定因素。

1996年10月16日，由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举办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专题研讨会。可以说这次会是继1995年9月20日至21日“捍卫科学精神”研讨会的第二次大型专题研讨会，也可被称之为中国科协两科联盟委员会“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第二次论坛，出席这个会议的有中宣部、广电部、国家科委、社科院；有关领导：中国科协及其各个学会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湖北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新闻单位共200多人。会议由“两科联盟”主任龚育之同志主持。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潘家铮、刘吉、杜继文、申振铎、李力研、孟东明、胡懋仁、李申、李胜先、曾性初、毕东海等20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发言。专家、学者们针对违反科学的迷信现象，伪科学、伪气功从科学哲学、社会学、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分析。于光远在发言中指出，在20世纪科学技术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愚昧迷信盛行；伪生命科学、伪人体科学、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于光远称之为“三伪一所谓”）泛滥成灾，这是可悲、可耻的事情。要坚决反对彻底揭露，必须提倡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会议认为，宣传科学思想，讲究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培养

公众用科学的思想观察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培养公众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依靠科学、崇尚科学的意识，树立与科学发展相适应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是社会各界的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今后科普工作的重点。

1996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由湖北省科协、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湖北省高校马列主义教育研究会、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科协共同主办的第二次真伪科学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中科院、中国科协、中国科普研究所以及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共 23 个单位和《人民日报》、《中国科协报》、《新华社》等 18 个新闻单位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此次会议以“高举科学旗帜，弘扬科学精神”为宗旨，被列为湖北省、武汉市“96 科技周”的重点活动。代表们除了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的主会场进行研讨和交流外，何祚庥、郭正谊、樊洪业、李力研、司马南等还应邀在科技周上向湖北省 10 余所高等院校做了反伪科学的科普报告，听众 1.5 万余人，受到武汉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干部、教师和学生的欢迎。

1996 年 10 月，李洪志办了一个旅游签证，又一次去美国传法，得到在美信众的支持，回国后于 1997 年李洪志数次申请赴美，但都遭拒签。还是在他的美国信众的帮助下于 1998 年 2 月，李洪志举家赴美定居，并很快拿到了绿卡，从此李洪志以美国为基地向海外发展，在北美、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都建立了“法轮功”的据点。在美国李洪志更把他的触角伸向美国的大小城市，在 38 个州设立辅导站。

1996 年 12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信息茶探秘”的题目，揭露了“沈昌信息茶”的骗局。原来使沈昌暴富来源之一的“信息茶”，既没有什么“信息”，也没有使人品尝到好茶叶的芳香、美味。不过是沈昌从茶场买来的每公斤几元的劣质茶叶，雇几个老太太在一个 40 平方米的作坊里分装一下，然后打上“沈昌牌信息茶”的标签，就成了能治百病的“沈昌牌信

息茶”，一小包卖 10 元钱，每 500 克茶就获上百元的利润。沈昌就是靠这样的方法，骗人敛财。

1996 年 12 月 17 日至 18 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河北省科协共同主办的“弘扬科学精神，反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河北省政府领导、省科协领导、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领导和来自全国 1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河北省副省长刘作田到会做重要讲话。平措旺杰、朱伯昆、鼓瑞骢、丘亮辉、李惠国、董光璧、孟东明、申振钰、张彤玲、张洪林、蒋志、赵纪琛、解成、李恩、张卓、周秀生、李振伦等 30 多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的发言涉及如下内容：对科学技术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进行历史和现实和论证；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现象进行有关科学哲学、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分析；对迷信愚昧和伪科学给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造成的危害进行研究，并从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中分析其根源；对中外历史和现实的案例进行剖析；对科学与伪科学，宗教与邪恶，健康民俗与封建迷信的界定等问题。

1996 年 12 月 20 日，《中国科学报》发表了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科技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致科技界的倡议书。这个倡议书，是在 199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一系列重要文件，江泽民总书记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及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其宗旨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特别强调了“坚持捍卫科学尊严，旗帜鲜明地反对迷信愚昧活动，反对伪科学，高举科学的旗帜，反对各种宣传神鬼、命运、灵魂和超自然、超物质、神秘力量的迷信愚昧活动”。倡议书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

学方法，使科学逐步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处，使人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自觉破除迷信，从根本上铲除迷信和伪科学赖以生存的土壤。

1996 年 12 月，由于李洪志将他的“法轮功”神秘化、邪教化，违背气功宗旨，又非法设立“法轮功研究会”，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取消了“法轮功”直属分会的资格，并予以注销。

1996 年 12 月，《各界》杂志刊登了原《西安公安报》记者杜亚民，《体育世界》离休记者李国华，以利剑、金盾署名撰写的揭发气功骗子郭周礼恶行的文章“国际气功大骗局”，为此引起了一场官司，郭周礼于 1998 年 6 月 8 日起诉《各界》杂志和文章作者“名誉侵权”，1999 年 8 月 31 日，西安市中级法院做出判决：原告诉求理由不成立，驳回起诉。这次反伪气功事件法律的胜诉，其意义非同一般，是对伪气功泛滥的一次重创。“大骗局”文章发表后，由郭周礼控制的为伪气功摇旗呐喊的《国际气功报》1997 年被取缔。

1997 年 2 月 20 日，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第三次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倡导科学文明，打击巫医巫术”。会议由中国科协“两科联盟”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主持，有关的医学、心理学、宗教学、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有关部委领导及新闻单位 100 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反映了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求净化社会精神生活环境的共同呼声。

1997 年 2 月 26 日，人体科学 9 人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李杰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秘书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关于特异功能、气功外气存在性检验，目前还缺乏铁证，不能被科学界公认。针对作假问题，他说一百次失败都允许，但是一次作弊、变魔术也不行。

1997 年 3 月 26 日，香港《信报》发表署名张立的文章“正邪之分”。指出，“法轮功”是邪教，李洪志是邪教教主。“法轮功”

借用虚无缥缈的词，实际上是谤佛谤法谤僧，传播魔说：李洪志自称如来现世，传人类有史以来未见的“宇宙大法”。这些“无限夸大”的功能与效力，无限夸大教主的潜力和权威，正是邪教的特点。可见，这时“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已经暴露。

1997年3月，由张彤玲、徐鸿涛等著《走火入魔面面观——气功出偏》一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是北京第六医院主任医师张彤玲教授从事精神医学实践20多年，治疗因练气功出偏造成精神障碍100多例病案总结出来的，由实践到理论分析的一本反对伪气功的著作。这是继她1991年7月出版的《气功的误区》后的第二本著作。这本书不仅增加了很多案例和释疑，而且还有理论分析及“练功出偏的防治与预后分析”。

1997年4月30日，一贯以宣传伪气功为宗旨的《国际气功报》，被国家新闻出版署[1997]163号文件撤销登记，取缔了该报。

1997年5月19日，在被媒体吹出来的“神医”成名后，为“神医”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省有关部门反映要求重审胡万林案件的呼声甚嚣尘上，于是一个“证据不足”宣告胡万林无罪的声音，从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出，并很快不胫而走。然而事实上，直到胡万林再次入狱，很多记者和公安机关对胡事件的调查中，没有任何部门能够出示胡万林无罪释放的手续。

1997年6月3日，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第四次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这次会的主题是“周易与算命占卜”。

1997年7月23日，又由郭周礼策划由陕西大秦房地产开发公司出资，在陕西省长安县滦镇，为刚从新疆释放的胡万林创办了一所非法医院——“终南山医院”，为请到“胡大师”喝彩，还专门出了一张小报《终南山医院通讯》。并由“中国气功出版贸易有限公司”为胡万林出版了“世界气功大全丛书”《胡万林和他的〈自然大法〉》。

1997年7月，李力研著《超级谎言》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这是李力研针对柯云路的《新疾病学》、《中国气功九大技术》所写的评论作品。

1997 年 8 月 7 日至 10 日，在英国举行了国际超心理学联合会第 40 届年会。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何宏博士应邀参加了大会，何宏博士用了 30 分钟做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报告。何宏认为，对比西方超心理学研究（ESP 和 PK 被中国人称之为“特异功能”的研究）中国人体科学的研究还缺乏严肃、客观的科学态度。

1997 年 8 月至 11 月，在山西省太原晋祠第二工人疗养院为胡万林成立了“万林医院”。

1997 年 10 月，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纪末逆流丛书”。此丛书共 8 本，即《世纪末逆流》、《两大迷梦》、《科学怪影》、《超常之谜》、《玄机揭秘》、《道破天机》、《算命透视》、《魔术与神功》。此书系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1999 年获第九届上海中小学优秀课外读物二等奖，并于 199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1997 年 10 月，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第五次研讨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气功与健康养生”。

1997 年 11 月 27 日，胡万林又返回陕西长安县“终南山医院”。这时“终南山医院”已由长安县的滦镇迁到长安县的太乙宫镇，继续干他图财害命的勾当。

1997 年 11 月 18 日至 19 日，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第四次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图书馆会议大厅召开，有来自台湾、日本、韩国等不同身份背景的人士约 200 人出席会议。在大会主席台就坐的除了各界的领导和兄弟学会的代表，还有两位不断被揭露作假作伪备受争议的“超级气功大师”、“中国超人”严新和张宝胜也坐在主席台的显要位置上。这意味着随着 1995 年以后气功的降温，“神化气功”的宣传有所收敛，但是作为伪人体科学（于光远语）核心内容的伪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这两根立柱是不能垮的。严

新和张宝胜是这两根立柱的代表人物。学会理事长陈信在做总结报告时说，要“坚持实践检验标准”、“严格按着科学准则进行科学实验”、“坚持不懈地进行人体科学研究，提高水平，跟上时代步伐”、“团结广大人体科学工作者、功能人和支持人体科学的人们”。照惯例，张宝胜于19日上午给与会代表作“弯刀叉”、“抖药片”之类的老套表演。代表宣读论文后，另一个“特异人”冯银栓又做了“空中抓药”的表演。经过20多年“人体科学”的发展，一个学术的交流会，仍然把这些“表演”当成“科学事实”来宣传，那么以这些“表演”为“事实”和“科学实验”又会是一些什么“内容”和“水平”就可想而知。难怪一位谙熟内幕的科研人员深有感触地说：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的人体科学研究在组织上有很大的发展，很多研究者的大量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这都为今后的核实检验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但是在这个领域中也明显地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组织管理上缺少力度，由于领导、协调方面的问题，科研人员之间缺乏相互联系，缺少学术权威；缺少研究“成果”的审定机构，无从界定谁的工作较为可信，谁的工作是粗制滥造。虽然少数一些工作也获得了省级、部委的科技进步奖，但这种只看论文报告和介绍的“成果”鉴定是否可靠，本身就很成问题。

可以说前面的这些问题正是造成气功界、人体科学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等混乱局面的根源。或许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的出现，及其逐步由虚转实的发展，还有当时所提出的“加强管理、加强科研”的指示精神，最终可能会实质性地改善这种局面。总之，语言争论本身是软弱无力的，20年来的风风雨雨和种种争论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人体科学今后前途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能否对人体特异现象是真实还是虚幻得出一个阶段性的结论，这将是未来几年时间里备受各界人士关注的焦点问题。1988年及1995年，美国曾经分别进行了两次较为权威的评审鉴定，可惜均未能获得肯定性的结论。

这次会议同时进行了换届选举，从当选的 108 名理事中，产生了 38 名常务理事。新的理事会选举了原黑龙江大学校长徐兰许为理事长，常务副理事长为孙金鏢、朱润龙、林书煌，另有八位副理事长，秘书长为宋孔智。

1997 年 12 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沈昌一案，维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7 年 1 月 27 日对沈昌做出的判决，实行苏州市技术监督局、税务局、工商局对沈昌偷税、漏税行为处罚决定，对沈昌罚款 650 万元。沈昌对于这样的处罚，不仅毫无愧色和收敛，相反变本加厉地扩张他的野心，扩大他的“气功产业”，疯狂推销他的歪理邪说——“沈昌科技”。他的弟子为他编写的《人体、宇宙、沈昌现象》、《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沈昌人体科技》、《沈昌人体科技的理论与实践》，大肆宣传封建迷信，疯狂“造神”，狂热包装沈昌的“气功产业”。这样的恶势力不除，人们无法安宁，社会无法安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01 年 9 月 18 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以偷税漏税，非法经营一审判决沈昌有期徒刑 12 年，罚款 894.6 万元。

1997 年 12 月，柯云路《发现黄帝内经》（上部为《发现当代华佗》）出版。

1998 年 1 月 23 日，《南方周末》发表了反伪斗士、“西安司马南”李国华（化名姜古迪）题为“胡万林是神不是人？”的文章，接着陕西的反伪斗士们向“胡大师”射出了支支“利箭”。1998 年 2 月 10 日至 16 日，陕西《三秦都市报》，以“是旷世神医还是当代华佗——胡万林大追踪”为题，连续报道了“神骗”胡万林的治病手段。1998 年 2 月 11 日至 17 日，陕西《华商报》，以“太乙宫神治百病‘大师’之谜”为题，对胡万林非法行医及其骗术进行连续揭露。1998 年 2 月 27 日，陕西《各界导报》刊登长篇报道“胡万林是华佗再世吗”，系统揭发了胡万林治病骗术。

1998 年 2 月 24 日，司马南奔赴胡万林所在地终南山医院，想见见这位“当代华佗”。司马南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相

约西安见。不料，司马南竟然遭到胡万林指使手下暴徒的一顿毒打。在中国大地发生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最后两年的“西安事件”。2 月 27 日凌晨，在西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亲自布置指挥下，西安警方联合行动，出动 600 余警力，100 多警车直捣终南山，但未抓到胡万林，胡在公安局行动前畏罪潜逃了。《北京青年报》在 2 月 28 日对“西安事件”做了整版的报道。

1998 年 3 月 6 日，西安作者姜古仁、江平所写的“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又在《南方周末》发表，这是“胡万林是神不是人？”文章的姊妹篇。

1998 年 3 月 13 日，《南方周末》发表“揭开民间邪教‘法轮功’的真面目”。文章指出，“法轮功”既非气功，也非佛法，而是“一种颇具宗教性的新型的民间邪教”。

1998 年 3 月 27 日，由中国科协“两盟委员会”召开第六次论坛，讨论柯云路的《发现黄帝内经》的反科学本质。中西医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1998 年 3 月，由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获得者司马南、李力研合著的《太乙宫黑幕》，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以“西安事件”为契机，系统揭露“胡万林妖风”兴风作浪的起因背景，影响、危害的力作。

1998 年 3 至 4 月，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杂志第 3、4 两期以大篇幅发表了该杂志编辑部主任陈星桥居士的文章“法轮功——一种具有民间宗教特点的附佛外道”，指出“法轮功”是一种新型的现代迷信和附佛外道，从佛教的角度来看，“法轮功”就是邪教。

1998 年 4 月 1 日、4 月 7 日、4 月 8 日，山东《齐鲁晚报》刊出三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要旗帜鲜明地宣传科学”，“‘法轮大师’聚财有道”。这是《齐鲁晚报》根据读者和“法轮功”家属投诉、揭露“法轮功”罪行的事实材料而写成的。这种揭伪打假的正义行为，遭到了被李洪志组

织起来的信众的围攻。

1998 年 4 月 8 日，中国科协“两科联盟”和中国法学会共同主办以“科学与法律”为主题的第七次论坛。由“两盟委员会”主任龚育之和中国法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孙琬钟共同主持。来自科技界、法律界、新闻界专家、学者及科技案件部分当事人 100 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士认为，科学与法律作为维系现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本质是相通的；科学追求真理，法律维护正义，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近年来，涉及科技的案件上升，而不分科学真伪令人称憾的案件频频出现，甚至出现批伪打假、揭露骗局、捍卫科学尊严掌握科学真理一方败诉的反常现象。与会的科技和法律专家认为，这主要是作伪者滥用诉讼权，钻法律的空子；个别执法者不重视科学家的意见，执法时出现偏颇；科技队伍中的少数人，受利益驱动，自觉不自觉地支持了伪科学；一些新闻媒体推波助澜。与会法律专家认为，近年来国家的立法和司法部门在保护科技进步、维护科学尊严、打击伪科学犯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立法和司法上都取得了进展，但在某些方面还显得较为滞后，现行法律还不够完善，给伪科学滋生蔓延留下了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会议一致认为，不断完善立法，用法律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设立科技法庭，建立科技陪审团制度；加强新闻媒体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克服有偿新闻和“猎奇”心理因素造成的虚假宣传，扭转揭伪打假文章不能被传播的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执法的公正，科学真理的弘扬。

1998 年 5 月 4 日，《健康文摘报》根据《齐鲁晚报》“请看‘法轮功’是咋回事”的文章，编发了“违法坑人‘法轮功’”，6 月 10 日，开始遭 400 余名“法轮功”习练者连续三天的围攻。报社态度强硬，拒不道歉，“法轮功”信徒也就偃旗息鼓了。

1998 年 5 月 11 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的关于《发现黄帝内经》的专家座谈会上，司马南当众宣布出资 100 万元人民币悬赏

特异功能。5月18日《中国科学报》、《新民晚报》等报纸做了报道。

1998年5月25日，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播出“上岗证能否扫净假气功”的节目。何祚庥院士讲了他的一个博士生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病的事实，惹恼了李洪志。他指使“法轮大法研究会”副会长李昌到北京电视台讨说法，并在李洪志的亲自授意下，从5月27日至6月4日，围攻北京电视台达8天之久。台里为了息事，妥协为他们播了一条“正面”消息，然后将做此节目的电视台记者李波除名。围攻北京电视台的得逞，被李洪志看成是护法成功的范例，并照此在以后的围攻中愈演愈烈，发展到1999年“4·25事件”。

1998年6月1日、6月3日，由于《齐鲁晚报》于4月份发表了批判“法轮功”的文章，经过4、5两个月“法轮功”骨干分子对报社屡次威胁、恐吓、施加压力，要求公开道歉，发表吹捧李洪志的文章的要求，未被报社接受。6月1日，约1000名“法轮功”习练者围攻《齐鲁晚报》，要求报纸登报更正、公开向李大师道歉。报社基于稳定广大练功者的考虑，答应登一则“说明”。但他们要求登一份由他们起草的向李洪志道歉的文章，并扬言一个字不能改。经省委宣传部、《大众日报》与《齐鲁晚报》领导的研究认为，不能登他们起草的所谓“更正”。6月2日，按原定意见在《齐鲁晚报》上登出了“说明”。“法轮功”骨干一看没有刊登他们的“更正”，6月3日一大早又聚集了近2000人来围攻《齐鲁晚报》。一批公安干警被调来维护秩序。最后，由公安局出面向法轮功习练者阐明，这种围攻和冲击新闻单位，又未经办理任何手续的行为，是违法行为，“是一次带有政治性质有组织，有预谋的非法集会”。信徒们一看目的达不到，便悻悻离去。

1998年6月5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广东新闻出版署对李洪志的《法轮佛法》进行查禁处理。

1998年6月15日，在“西安事件”后逃逸的胡万林活动于西

安、深圳、北京。胡万林于 1998 年 6 月 15 日，又到了河南商丘，6 月 20 号在商丘的卫达医院开始正式坐诊行医。

1998 年 6 月，《真理的追求》杂志第 6 期，发表了何祚庥院士的理论文章“经验不等于实践”，批评了“特异功能”、“伪气功”的庸俗的《经验论》哲学。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①实践高于理论，但是理论高于经验。②经验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③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不会被新的实践所推翻。④信仰特异功能的“眼见为实”只是经验不是实践。

1998 年 7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世界怀疑论大会，中国学者林自新、申振钰、孙倩参加了这次大会。美国 CSICOP（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组织主席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做了一个“新怀疑论运动”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怀疑论组织任务，就是要面对各种超自然主张：无论是来自于宗教的还是非宗教，无论是“通灵人”（特异功能者），还是“未来的预言家”，都对将要到来的 21 世纪充满着神秘和恐怖，甚至预言 2000 至 2001 年人类面临的大规模迁徙。一些人对于自杀的憧憬，对 UFO（地外文明）的追逐，对天堂之门的向往，对新宗教的崇拜……总之，人们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一些问题的恐惧，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我们要去解决它，就必须用理性的力量、自由探索的精神，并面对这些现象做调查研究，并给予揭露和批判。他说怀疑论的关键不仅在于怀疑，更重要的是探索，怀疑只是探索中的一个元素，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超自然的神秘现象，不在于相信不相信它的结果，而在于它的事实、理论和方法。但他也指出，不管超自然信仰遭到怎样的揭露和批评，它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就是所谓的“沉不下去的橡皮鸭”现象。所以只要人类的轻信存在，怀疑论的质疑就会存在下去，这就是新怀疑论运动在广大社会中所肩负的积极的富有前瞻性的重要历史使命。

库尔茨的观点，对中国怀疑论者的工作是有很大学识的。

1998年8月16日，新闻出版署决定，对繁体竖排16开精装本李洪志《转法轮》予以收缴查处。

1998年9月，署名王昌盛（刘华杰）著《虚妄的智慧》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刘华杰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把自己的批判锋芒直指伪科学，他批判“宇宙论”，批判“沈昌的意念调控论”，揭露“国气联大骗局”，《虚妄的智慧》就是这些工作的集中反映。在何祚庥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和《伪科学再曝光》两部书中，刘华杰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在反伪科学方面所做的工作和贡献，他于2000年获得了第二届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

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报道，曾对“特异功能”悬赏1万美元的美国魔术师詹姆斯·兰迪再次挑战“通灵人”，并将赏金提高到100万美元。

1998年9月下旬，司马南应邀在湖南卫视、湖南经济电视台做揭露“特异功能”的节目，向湖南人民揭示所谓“特异功能”的秘密。

1998年9月26日，胡万林在商丘卫达医院试营业了三个月后，于这一天正式开业，为了蛊惑人心，开业的消息于6月23日就通过媒体传播出去了。开业的那一天，来自上海、大连、天津等地的求医者纷纷前往卫达医院。而令人痛心的是河南省漯河市市长刘法民，劳累过度，患病高烧17天不退，8月份，在省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催促下进京检查，当时被确诊为患有肝硬化，怀疑肝癌（未扩散）。但刘法民考虑到繁重的工作，拒绝了在北京住院的要求，返回漯河。恰在这时，有人向刘市长介绍商丘有位“神医”专治疑难杂症，一心只想着工作的刘市长想这样省时而快捷的医疗办法可以一试，在家人的陪同下，刘市长于9月20日以私人身份到卫达医院看病，住商丘市某宾馆一号楼的三层。从9月20日至9月27日刘市长去世，只7天的时间。据商丘市中心医院诊断，刘市长由于服了胡万林用芒硝配制的“神药”，上吐下泻，

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引起病人的肝昏迷、肝衰竭、肝脑中毒。一位被漯河人民称赞的好市长，55 岁的刘法民，就这样死在了胡万林魔医手中。而这个日子，正是胡万林大张旗鼓庆贺他在卫达医院正式开张的第二天。漯河市人民在纪念他们的好市长刘法民的活动中，深深地怨恨着这个“魔鬼”胡万林。之后，10 月初又治死了商丘优秀高级教师何素云（到此时，在陕西终南山医院，山西万林医院和卫达医院由胡万林“治病”致死的人数已达 204 人）。在卫达医院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就使两位“名人”死去，这个震惊河南，震动全国的事情，引起了死难家属，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极大愤怒。人们在卫达医院门前挂上“草包医院庸医无能 草菅人命天理难容”的大标语，为死者开追悼会。全国声讨胡万林罪行的活动，由媒体纷纷传出。“商丘事件”宣告了胡万林“神迹”的末日。

1998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科协“两科联盟”牵头，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了“声讨非法行医的胡万林”新闻发布会。来自河南商丘死者何素云家属、睢阳区崔桂云家属、新闻界、科技界等几十家单位共同声讨了胡万林非法行医致死人命的罪行。会上受害者家属和知情人揭发控诉胡万林罪行、罪证，令人震惊和触目惊心。会后 30 多家新闻单位派出记者前往商丘进行暗访和追踪“商丘事件”。50 多家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报道和转载。

1998 年 11 月 15 日，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在北京会见了何祚庥和司马南，又一次明确地表示不相信特异功能。他说：“科学不特异，特异非科学。”

1998 年 10 月 17 日，胡万林在商丘“漏气”之后，知道形势不好。就在何素云死亡的 10 月 1 日晚上即在医院失踪，据胡万林的朋友和学生阿迪在互联网上披露：胡万林 10 月 2 日晚 10 时许乘车撤离商丘，后辗转来到北京。后得知商丘方面还无动静，10 月 9 日返回商丘。这期间商丘市公安局曾拘传过胡万林，并对胡万林已采取了监控措施，但胡万林还是于 10 月 17 日又一次神秘

地失踪了。

1998年12月8日，在北京避风的胡万林被邀请到上海参加一个全国性气功会议。为了保证胡万林在上海期间的安全，他派了几个弟子先期到上海进行准备。虽经过周密的安排，但有警觉性的上海人，得知了12月7日《文汇报》一篇大字报道的消息“胡万林又逃走了”。文中明确指出：“被人称为神医的胡万林因治死了8人，被河南警方宣布‘监视居住’，却不料一个星期之后，胡万林便又一次的神秘失踪，“河南商丘警方正在加紧缉捕”云云。知道这一消息的人，自然对一些形迹诡秘的人会给予注意。恰巧胡万林弟子为他选的这家招待所里，就有这样一些敏锐的上海人，胡万林中午在上海下飞机，在他的弟子陪同下，吃过午饭，下午两点钟住进了这家招待所四楼包下来的三个房间中的426号。就在这时，招待所的所长已将胡万林的情况报告了徐汇区公安局湖南路警署，下午4点钟已完成对胡万林住处的监控。到了晚上8点许，徐汇区公安局已完成了向商丘市公安局索取胡万林“监视居住”和请上海警方配合拘捕胡万林的有关文件。胡万林就是在这样迅速而准确工作的湖南路警署公安干警面前束手就擒。1998年12月9日商丘公安局办案人员赶到，当天将胡万林带回商丘关押。2000年9月30日，河南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胡万林以非法行医致多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99年1月，《三思评论》第一卷发表了“特异功能”和“超自然现象”5人谈。这5个人，是由信仰者、怀疑论者组成的，他们的看法有许多方面是大相径庭，也有些方面是可以取得共识的。这是国内第一次在期刊上，将持两种不同意见学者的观点发表在同一篇文章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对“特异功能”的观点是：第一，它违反现在一般的科学常识；第二，它违反经过多少年建立起来的科学规律。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认为，“特异功能”和宗教不

是一类东西，“特异功能”与邪教和反动会道门一脉相承，科学家不应被那些在其研究范围之外的东西所迷惑；非科学的东西有它自己的目的，“我有责任反对它”。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申振钰认为：科学最重要的两个标准和原则是可重复性和可检验性。科学是客观的，无论是信仰者还是不信仰者，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易成说：“我是在看了王氏姐妹表演后‘上钩’的……在看了一个甘肃孩子的表演后，就几乎深信不疑了。”他说，他做了很多“意念致动”、“穿壁”的实验，并认为这些实验不是不能重复，只是因为“功能人”年纪大了或做“疲”了，因此很难重复。在做不出来时，他们就会作弊。

航天工程医学研究所何宏博士的谈话最令人深思。他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作物理学博士后。他是一直坚持练气功的，对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有独到见解的。他回国初衷是想找到确凿的特异功能现象，以使用前沿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但几年的工夫过去了，他所经历的“特异功能”实践令他很失望。他撰文认为：“迄今为止，气功、特异功能研究总是在个别人所在的研究组获得惊人的成果，外人重复不出来。”“他们既不屑于做给别人看，却又连续不断地报道新项目、新发现，满足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发现。”^①

1999 年 3 月 8 日，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何祚庥、王夔、冼鼎昌及 30 位科技界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三个有关胡万林的提案，即“关于依法严惩非法行医谋财害命的逃犯胡万林提案”、“关于严惩胡万林‘医托’的提案”、“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新疆和静县 223 团劳改队违法活动”的提案，均被立案。

1999 年 4 月 11 日，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

^① 引自《气功与科学》1999 年第 1 期。

上发表了何祚庥院士署名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文章中两处批评了“法轮功”，一处提到了李洪志的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篇揭露伪科学对青少年毒害的科普文章，竟然招来一场轩然大波。4月15日，“法轮功”天津总站决定，就此事向天津师范大学进行交涉。这个想法得到了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主要负责人王治文的支持，并指示，采取组织“法轮功”习练者聚集施压的手段迫使该校屈服。他们无理要求该杂志编辑部收回已发出的所有刊物，销毁还没有发出的刊物；在该刊上公开发表向李洪志和“法轮功”赔礼道歉的声明，并从4月19日开始至24日连续5天围攻天津师范大学。王治文乘机鼓动，组织六七个省市的“法轮功”习练者一起围攻，并指示，对于情绪激昂的“法轮功”习练者别拦着，谁愿意去谁就去。围攻的“法轮功”习练者，从开始的两三千人到4月23日已达6300多人。当天津市公安部门采取措施制止了这次非法聚集活动后，王治文不甘心，进一步为天津总站负责人打气说：“怕什么，这不正是考验吗？”还派人去天津当场策划指挥。于是天津总站随即又组织了两三千人围攻天津市委、市政府。

1999年4月20日，中国科协宣传部、《科技日报》科技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研讨会”。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张玉台，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常志海，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维、邹承鲁、杨乐、何祚庥、郝柏林，著名学者于光远、邢贲思、汝信、任继愈、吴明瑜、单天伦以及科技界、社科界有关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会议。研讨会由中国科协“两科联盟”主任龚育之和《科技日报》社社长焦洪波共同主持。与会者回顾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今天，中国正面临着迈向新世纪的挑战，纪念五四运动，应

该特别注重弘扬科学精神的当代意义。周光召在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旗帜，唤醒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也唤醒了民众。今天，发扬五四传统，倡导科学精神，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会代表结合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伪科学、伪气功现象，特别强调了在当今坚持科学精神，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意义，它甚至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于光远在会上以题为“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责任”为题，做了一个极为中肯的发言。他说，20 多年来在我们中国有一股反科学反社会的势力，他们的势头颇盛，他们的活动在全国泛滥成灾，十分猖獗。这是一个十分可悲、可忧，极为严重的现象。这股势力已经发展到街头显示力量，他们的反动政治色彩、反社会的色彩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国家机器对这种邪恶势力一定要严肃对待，对那些为首作恶的分子决不应软弱无力，不能姑息养奸……与会的许多专家、学者的发言都表达了这种忧虑，何祚庥、郭正谊、杜继文等在发言中举出大量事实说明伪科学、伪气功对社会的危害。段启明同志就“法轮功”问题做了一个简短发言。研讨会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发扬五四传统，一定要弘扬科学精神、坚持科学精神、捍卫科学精神。

1999 年 4 月 22 日，李洪志秘密从美国潜回来策划更大的阴谋。李洪志以为，一个个围攻政府机关，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得逞后，实施他向党中央国务院施压达到他政治野心的时机已经到了。所以从 4 月 22 日潜回到 4 月 24 日匆匆离开大陆去香港坐镇。仅 44 个小时，就把一个一万多人围攻中南海的“4·25”事件搞定。

1999 年 4 月 25 日，经李洪志精心策划的“4.25”事件终于发生了。李洪志 4 月 22 日回到北京和“法轮大法研究会”的骨干李昌、纪烈武、姚洁、叶浩、刘志春等共召开四次密谋会议。4 月 25 日凌晨 3 点多钟，来自河北、山东、辽宁、天津、内蒙古等地的

“法轮功”习练者开始向北京聚集。早晨7点多钟，中南海西门府右街一带已形成了静坐的场面，上午在中南海西门、北门及北海公园府右街已布满了“法轮功”习练者一万多人。

当日早上，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现场的“法轮功”习练者的代表，明确指出：“法轮功”习练者围聚中南海是错误的、非法的，应立即撤离。当信访人员问及“法轮功”代表，为什么要搞这次活动时，进去的两拨人都说不清楚。于是信访局的同志要求法轮大法研究会和北京总站派能说清楚的人进去谈，经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商量，并请示了在香港坐镇指挥的李洪志，决定由原来不准备露面的李昌、王治文、郝嘉凤、周德承、刘树人等5人作为代表进中南海“对话”。这5个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纠缠长达八九个小时。在“对话”中，他们向中央提出三个无理要求：①释放在天津被捕的“法轮功”闹事者。②《青少年科技博览》和何祚庥公开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攻击”“法轮功”。③宣布“法轮功”合法。实际上还有一个第四条，在当时没敢提出来（怕暴露李洪志的野心），直到5月份，“法轮功”信徒在北京香山为李洪志祝寿时，由李洪志信徒嘴里说出来：李洪志要进全国政协！

围攻中南海的“法轮功”习练者，从早晨3点多钟陆续聚集，到这时天色已晚，但在未得到李洪志的指示前，一直仍没有散去的迹象。当北京市政府发布通告要求聚集者离开时，纪烈武立即请示李洪志。李洪志问：去中南海谈判的代表出来没有，纪烈武说还没有。李洪志指示不能撤。直到傍晚9时许李昌、王治文等5人出来后，并向李洪志报告：第二天还要接着谈的信息，纪烈武才发出了“撤离”的命令。李洪志一手策划、指挥的“4·25”非法聚集围攻中南海的事件，就这样宣告收场。

在此之前4月14日，中国无神论学会也组织了一次纪念五四的专题讨论会。会上，段启明同志就法轮功问题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剖析了“法轮功”的主要邪说、组织体系和社会危害，提出

了对策建议。讨论中，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任继愈、副会长何祚庥提出“法轮功”的问题值得重视，是不是大家好好研究一下，把问题搞得清楚一点，写个材料给中央有关领导。于是任继愈先生推荐段启明同志先写个草稿。段启明同志是国家宗教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当他看到了法轮功到处围攻政府和新闻单位以及何祚庥院士在 1998 年 12 月 4 日，在全国宗教局长培训班上所做的“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专题报告中揭露的“法轮功”恶行及看了何院士送来的有关材料。有着政治敏感和共产党员责任感的段启明，于 4 月 5 日、4 月 11 日，两次给局领导打报告，希望局领导安排一次“论坛”，由他介绍“法轮功”的情况。段启明在报告中说：“……研究这个问题是要冒点风险的。但是当我一接触这个问题，我就难以放下，如果听任这种妖言邪说流传，就失去了一个党员应有的责任。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和精力看了李洪志八九本书，一些群众的来信，整理了《浅析李洪志的‘法轮佛法’》的材料……处理这一问题虽不属于我局职权范围，但中央要研究这一问题，必然要听取我局意见，及早有人研究有好处。”

段启明同志于 1999 年 4 月 18 日完成了初稿。后又经过任继愈、杜继文的建议经修改及经有关人员的讨论，于 1999 年 4 月 24 日定稿。4 月 25 日经任继愈、何祚庥、杜继文、李申、郭正谊、段启明签字后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李岚清、尉健行关于建议尽快查处李洪志“法轮佛法”组织的信（一式七份），于当天下午 4 时许由段启明同志送至中南海北门收发室。

信的全文只有 500 多字（附了一个 5000 字的李洪志“法轮佛法”组织的社会危害的附件），但内容相当精练。在扼要列举了李洪志的“法轮佛法”组织的行为和危害后，提出了结论性的意见：“法轮佛法”组织不是气功团体，不是宗教组织，它含有海外邪教组织主要特征，李洪志妄图做全世界至高无上的新的教主。故我们建议：尽快组织政府有关部门清查李洪志的犯罪事实，坚决予

以查禁并明令取缔其邪教组织。

1999年4月，文放著《黑幕中的胡万林》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一个记者调查记录”的写实手法，真实地记录了胡万林从山野之民——杀人罪犯——劳改行医——“引渡”出狱——媒体包装——“神医”、神骗——黑幕深深——再次犯罪的历史事实。“胡万林现象”给我们的启迪：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像胡万林这样治死一二百条人命的骗子，居然能得到层层的保护，舆论和媒体的频频宣传，无耻文人的疯狂吹捧，实乃文明国家的一大耻辱。难怪作者文放说：“胡万林背后有一张大网，胡万林也只是网上的一个棋子。”

199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任继愈先生的文章“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谈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任继愈先生对从改革开放20年来，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脚步声中所出现的不和谐音符——鬼神迷信沉渣泛起的现象，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新的鬼神信仰的主要表现”、“新有神论的理论武装”，提出了“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宣传和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和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任继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在科教兴国的大战略中，脱贫和脱愚具有同样的战略地位。任继愈先生的文章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

1999年6月，“4·25”事件后，李洪志丝毫没有收敛他的行为，继续在全国各地组织非法活动。出于主持正义、铲除邪恶的良知，武汉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开始调查“法轮功”的内幕，揭露李洪志欺世盗名、愚弄群众的丑恶嘴脸。他深入到武汉的“法轮功”组织内部进行调查，北上长春、山东等地对李洪志的部分亲属、邻居，原来与李洪志一起传播“法轮功”的合作者以及部分“法轮功”习练者进行了调查和探访。搜集了大量的有关李洪志的

言论、音像、图片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了一部完整、内容真实、证据确凿的电视片，交中央电视台，拟在《科技之光》栏目中播出。当李洪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指挥北京和武汉等地的“法轮功”组织负责人：“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电视片播出。”于是，“法轮功”骨干，再一次制定计划，围攻中央电视台，向媒体和政府施压，阻止揭露李洪志嘴脸的电视片播出。

1999 年 7 月的一天，“法轮功”骨干分子经过精心策划，并施展了威胁、恐吓之能事，称电视台如播出，将挑起和激化社会矛盾，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亿万‘法轮功’习练者绝不能答应和坐而视之的”。就在李洪志指使和骨干分子的策划下，1000 多名“法轮功”信徒开始集中在中央电视台所在大街两侧或站或坐。中央电视台的领导随即对聚集的信徒进行劝谕，但没有取得成效。一位“法轮功”负责人高喊：“我们要见江泽民！”有的信徒也跟着喊。然后就谩骂武汉电视台记者宋某，要求中央电视台不准播放他采访的纪录片。有几个信徒还企图乘混乱之机冲进中央电视台大门，被保卫人员及时制止住，围攻事件持续到下午。当日天气酷热，在阳光下一些老年信徒开始出现中暑反应。信徒们个个耷拉着眼皮，昏昏欲睡。直到傍晚时分，这场闹剧才算结束，围坐的信徒慢慢散去。

1999 年 7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公布，决定说：“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 年 7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李洪志发布了“通缉令”（公缉〔1999〕0102 号），内容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

李洪志组织和利用“法轮大法研究会”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宣传迷信邪说，蒙骗他人，致人死亡，并未经依法申请和许可，组织、策划集会、示威、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等活动，涉嫌犯扰乱公共秩序罪，经北京市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予以通缉。

1999年9月，《何祚庥与法轮功——1999年夏天的报告》一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作为战士的科学家和作为科学家的战士的何祚庥院士，在1999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和“法轮功”斗争的“英雄”（于光远语）事迹，称何祚庥院士为反“法轮功”的英雄是不为过的。自从何祚庥在《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了“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就惹上了麻烦。面临着李洪志的辱骂和恐吓，其骨干分子组织的“围攻”，痴迷者的叫喊与威胁。何祚庥院士从未惧怕过，他口诛笔伐，直揭得李洪志一伙及其骨干目瞪口呆、恼羞成怒。在那个酷势的夏天，何祚庥院士的名字热满京华、誉满京华，享誉海内外。他作为一位科学家，对国家、对民族、对下一代如此深重的忧患意识，做着一件件惠及当代，泽及后代的好事。我们应该记住这位战士——何祚庥院士。

1999年10月8日、10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九届第47次会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79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共是八条十三款。这是对于“邪教组织”有关法律条文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是对涉及“邪教组织”有关问题的法律解释，是办理此类案件的依据，也是重要的法律文件。

1999年10月22日，国家新闻出版署以新出报刊[1999]1233号文件注销了《气功与体育》杂志。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决定》的要点如下：

一、坚持依法取缔邪教组织、严厉惩治邪教组织的各种犯罪活动。

二、坚持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依法严惩极少数犯罪分子。

三、在全体公民中深入持久地开展宪法和法律宣传活动，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四、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

1999 年，“法轮功”被取缔之后，国家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伪气功组织都暂时隐匿起来了。那些“特异人”、“气功大师”也暂时停止了活动。一些人体科学 researchers 们从 1996 年至 1999 年上半年所做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特异功能实验报告”，都以“证据不足”自行封存了起来。这 20 年来由特异功能—伪气功—邪教引起的争论，就此也暂且告一段落。此大书记也暂此搁笔，但这是不是尾声的尾声。

从 1979 年发现唐雨“耳朵认字”起，一场从“特异功能”—神怪气功—邪教的“新时代运动”在中国大地风行了 20 年之久。在这 20 年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神功大师”大红大紫，太多的愚昧信徒上当受骗，甚至牺牲生命。

所幸的是，事物总有另一方面，总还有那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反伪斗士不惧不畏，顶着巨大的压力，吃了不少的苦头，与这些“神功大师”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使如此，事态仍然戏剧性地发展到了今天。这场论战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如此发生，如此发展，如此泛滥、如此结束，可能又会如此地再兴起……如此，如此，太多的如此，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比较清楚了的问题，展望未来，又觉得并不尽然。我们还会不会重演这一历史上演过多少次的场景呢？

现在，李洪志仍逍遥法外，也还有较少数的痴迷者仍沉浸在邪教的泥潭中。我们决不能说，一切都过去了。

面对未来，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土地上不会再出现“张洪志”、“王洪志”……我们的土壤中，生长

出这些畸形怪胎的温床并没有消除。于光远先生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之冰非一日能解”，“我们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战斗正未有穷期，和“法轮功”、“伪气功”、“伪科学”的斗争任重而道远。

酒不醉人人自醉，功不迷人人自迷

——神秘体验四人谈

何 宏（文中简称何）：人体“特异现象”研究者

孙 倩（文中简称孙）：科普出版社副编审

申荷亮（文中简称亮）：《火箭兵报》主任编辑

申振钰（文中简称申）：教授，《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副主编

申：今天请你们几位来，主要想探讨一下关于神秘体验的问题。何宏，你是学物理出身的洋博士，又在牛津大学做过博士后，最后放弃本专业回国研究人体“特异现象”，先由你谈谈好吗？你当初是怎么考虑的，在经历这些年研究之后，如今又有些什么认识。

何：那我就不客气先说，算是抛砖引玉吧，大家可以用做靶子展开话题。我放弃国外的工作，改行研究特异功能、气功外气等人体神秘现象，这令许多人，包括父母、同学感到十分费解，许多朋友为我感到惋惜。但我做这种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事出有因，如今也谈不上为之后悔。我愿意把自己的一些体验、经历、认识，拿出来与诸位讨论。当然，未必深刻，更不敢说正确，仅供大家参考讨论。

据我所知，国外有少数特异现象研究者并没有神秘体验，他们对这个领域发生兴趣，完全是因为受到大量文献资料以及一百多年相关争论的吸引。而相比之下，国内有关人士发生兴趣大多源于个人体验或者看到过神奇表演。我本人转而投身研究特异现象，也是与自己的神秘体验有关。

我对气功产生感性认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上初中

的时候。《工人日报》等一些报纸开设了气功栏目，介绍一些简单功法。完全出于好奇心，我跟着模仿，很快产生了气感。什么是“气感”，这好比梨子的滋味，没有体验的人很难理解。总之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感受，能真切地感受到某种气体、液体在肌肉里面、皮肤内外流淌、拌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意识状态、呼吸节奏和身体姿势都需做相应调整。练功结束后，往往头脑很清醒，身体也有一种欣快感。

上大学以后，我依然对气功保持着兴趣，从图书馆可以借到有关刊物，阅读的东西也更多一些，甚至到国外留学的时候，每个星期也会抽出几天入静个一二十分钟。只要一入静或者说进入所谓“气功态”，就能在脑海间隐然听到潮汐般的声音。这时，只闻内息而不知外物，对体内的各种变化变得敏感，对体外的各种刺激变得迟钝。身体处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之下，时而如沐春风，时而感到气机涌动。经过长期锻炼，大概是形成了条件反射，入静很容易。对各位练功者来说，尽管说气感不尽相同，但往往是十分真实而深切的。

亮：我觉得这些感受很难称得上神奇，基本上是由心理暗示所致，就像一些“大师”做“带功报告”时听众中常有的反应那样。而你这主要是一种自我暗示，同时引发了一些生理方面的变化或感受。

何：心理学的确用暗示解释这类现象，因为这是人的身心活动的结果。然而对于暗示的机制机制，包括专业心理学家在内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澄清，据我所知，国内外都有心理学家对人体神异现象感兴趣，所以心理学理论并不能消除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对气感、外气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除非找到公认的判定标准，采用共同的实践尤其是科学实验进行检验，否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很难说服对方。现在，学术界对气功现象不以为然，而气功爱好者却沉迷其中，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身陷其中的爱好者不认为自己的感触实属虚妄，也就很难醒悟过来。下面我介绍几件

自己经历的奇异幻象。

我当年在德国的时候，博士答辩前两个月，有两位年轻的美国摩门教徒敲开我的宿舍门，又是送材料，又是宣讲教义。一则因为他们纯正的美国英语，二则因为强烈的好奇心，我与他们聊了一两个小时。摩门教创立于1830年，目前有600万信徒，据说是美国最有势力的基督教派。此后没过十天，我体验到一次非常奇异的幻境。我睡在床上，大概到夜里两三点钟时，突然看到满室白光，在我脚部上方不到2米的高度有个奇亮无比的光团。我倒没有恐惧，因为直觉这是一种“神性”的存在，既有关爱又很严厉。不知为什么，右腿从床上抬起来，成30度~40度角，心中风驰电掣地涌出千头万绪，对其中一些想法好像感到电击式的震颤。前后不到一分钟，我恍惚一下就醒了，光团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无从断定刚刚经历的只是一场梦。我当时的感受是：生命是有安排的，有些事情是不允许做的。

申：这是人们常说的神秘体验或者宗教体验。

何：是的。我由此从对武功的好奇，转而对宗教发生兴趣。作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数千年来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以各种形式沉迷其中。除了把这指责为迷信、愚昧、寻找精神寄托之外，难道这后面没有更深刻的道理？

亮：道理自然是有的。若从文化意义上讲，任何宗教甚至包括巫术的存在，都会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都有其合理性，或者说必然性。但说起这些来就太复杂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文化上的合理性是一回事，科学上的真假正谬是另一回事。不过还是请你接着讲，这些体验倒是蛮有意思的。

何：在答辩结束几个月后，我获得了英国签证，转到牛津大学做博士后。在卢瑟福国家实验室做实验时，遇到一位沉默寡言小个子的香港年轻人。我感到他很孤单，就主动对他表示友好，与他搭话。他告诉我自己信佛，严格吃斋，每日打坐。我把心中的一些疑团，包括那些体验拿来向他请教。不料他听了之后相当兴

奋，他说，我在英国呆了几年，几次想回香港，却留下来，不知是在期待什么，原来就是为了接引你啊！他说我的这些感受说明我们之间颇有夙缘、有慧根。我在入静中听到的是虚空的“万籁之音”，而梦见的那团光亮，是自心佛性的显现。他说这些体验载于《楞严经》等佛家典籍之中，并屡屡为后来的修炼者验证。他劝我修炼他奉持的法门（名称我不说了），并称他师父是得道明师、在世活佛。见他说得这么真诚，我于是开始接触他的朋友，学练他们的功法。他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完全断绝一切荤腥，每日至少打坐两小时，有条件就应当“同修”（集体练功）。在经受四五个月的言行举止以及吃全素的考验后，我才在神秘的气氛下被授予“心法”。

此后，不到十天半月时间里，我经历了两次幻境。与前次看见光的体验相仿，也都发生在半梦半醒之中。一次是只尖嘴长尾的动物，像是一只“老鼠精”，眼睁睁地看到它从卧室左边墙上的窗户里跳进来，再一下就窜到我身上，其尖嘴抵在我的胸口吸气。我惊惶失措，使劲挣扎，手脚却无法动弹。我想起功友讲的，念佛号可以避邪，于是忙不迭地连声呼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喊了十几声之后，那东西才腾然跃起，从窗户跑掉。没几天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一次。在睡眠之中，我见到一个透明的裸体女性从左边飘然穿墙而过，脸朝上横切进入我的身体。这令我感到极其恐怖，慌忙把佛号念过来念过去，然后感到身体一震，那东西才不见了，我的身体才能动弹。坐起身来，全身大汗淋漓。

亮：我再插一句，我觉得你这像是走火入魔了，或是被那个什么门派的人作法催眠了吧。

何：这种身临其境，难以与现实区分的“幻境”，过去从未有过，这几次的体验都因为接触到了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至于究竟怎么解释才好，我想可以好好讨论。不过在有了这些体验之后，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看来很愚昧、甚至瞎编的宗派和气功组织竟能吸引到那么多信徒。人们在特殊场合所获得的独特体验要

远比一般的说教生动得多，有影响得多。

我接触到的这个修炼门派里的人，严格吃素、持戒、打坐、练功，此外尽自己所能布施、行善，为的是达到高境界以至最终“成佛”。当然无意的暗示是存在的，毕竟他们信鬼神，集体练功等活动笼罩着神秘气氛，使人相互感染并产生臆想。

在听说了我的两次经历之后，功友们说他们中许多人大都有过类似体验，他们解释说：你着魔了，你过去练过杂七杂八各种气功，身体、心地不够纯正，对修道有妨碍；另外，你的“我执”太强，不是全盘接受教义，而是自以为是胡思乱想，因此招来魔障。这么说不是毫无道理，宗教界讲皈依，讲“信、愿、行”，“信”是排在第一位的。无休无止地钻牛角尖追问下去，肯定找不出一个完美解答，反而会问出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出来。但我对功友们的警告不以为然，我用“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来安慰自己，觉得必须依靠自己的头脑进行判断，否则“信”上一位大魔头可怎么办？没上得了“天堂”，反倒先入“地狱”了。况且禅宗强调，“佛在灵山莫外求”，必须依靠自己的“心”。

当时我想了许多许多，这几次的幻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信仰者能够这么真实地感受到“神灵的世界”？或者说信仰团体的“集体无意识”能够创造一个被这个群体所感应的神灵世界？即使这是下意识制造的一个根本梦幻世界，科学地认识其规律也将具有极大的社会文化价值。我意识到自己触摸到宗教与气功的本质，这里面充斥着极难捉摸的复杂的心理、生理活动。那段时间我每天24小时大脑都在高速运转，试图凭借逻辑和体验解答气功、宗教之谜，是否可能存在鬼神的世界？一时间，上下五千年，古今中外数不清的事情全扯到了一起。那阵子感到自己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到别的任何事情上来，全副精力都被诱惑着用来思索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时而觉得自己正在彻悟宇宙人生，连走路都有飘起来的感觉；时而感到脑汁耗尽，身体虚脱，正在陷入精神

错乱、万劫不复的境地。

孙：听起来很可怕。似乎你已经到了临近崩溃的边缘。

何：是这样。四周的人也都注意到我的精神亢奋但脸色晦暗。不过有了这番经历之后，我才深刻地领教到什么叫作走火入魔。

孙：那你最后怎么跳出来的呢？

何：毕竟自己接受过全面的科学训练。如果我对科学的完备性产生了一点怀疑，那我对气功的低俗、宗教的不完备则看得极为清楚。我不可能像信徒那样去接受任何说教，原因很简单，如果真的拥有惟一的真理，宗教便不会在科学面前败落，或者至少应看到某个教派比其他团体高出一筹，并形成天下一统的局势。事实远非如此，每个信仰团体都自称掌握着绝对真理，单从逻辑来说，这表明谁也未必持有终极真理。经过几个月时间，我觉得不会有更多收获，于是就出来了。

当然这其中也有必然因素在内。我练功多年，并没有仰慕哪位气功师；我对宗教有兴趣，但并不相信它们掌握着绝对真理；我有神秘体验，但我对此类现象仍保持怀疑态度，认为证据不够客观与充分。相反，若是抛弃了怀疑的态度，放弃了思考，那可能就十分危险了。所谓“酒不醉人人自醉”，我添一句“功不迷人入自迷”，缺乏对科学的全面认识，缺乏对历史文化的起码了解，头脑简单、单向思维，这是许多练功者迷失自我，陷入神秘主义的根本原因。

亮：心理学有句术语，是“我们拥有”（we have）情结，还是情结“拥有我们”（have us），二者大不相同。看来你还是“拥有”了这些体验而没让它们来主导你。

申：这一点非常重要。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自我，说到底是不能失去理性。你可以研究神秘主义的东西，甚至去寻求某种体验，却不能让神秘主义的东西反客为主。

孙：你最后为什么回国研究特异现象呢？

何：其实我还有好些体验，应验的梦、一系列奇怪的巧合，无

法都展开来谈。我个人以为心灵感应未必一定不存在，作为实验工作者，我认为有必要通过科学实验进行严格的客观检验，用科学的、怀疑的态度探究神秘现象的真相。我觉得如果能够有所发现，或许可以糅合物理与心理、沟通科学与宗教，至少就体验背后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机制，也值得专门研究。在出国前我就听说过耳朵认字等现象，还有被宣传得沸沸扬扬的气功外气实验，然而似乎国内外没有定论，这令我感到极大的挑战性，说得夸张点，我感到强烈的“感召”，这使我下决心回国，找个专门研究单位亲自做一些深入研究。

申：可是你回国这么多年，没能找到任何人体“特异现象”存在的科学证据，你是否觉得很后悔，浪费了青春？

何：笼统地说，好像如此，但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实际情况远比一般人想的更复杂。

首先，不管特异功能与气功外气是否存在，我不觉得现象研究本身就是“伪科学”，正如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就专门研究宗教文化与相关社会现象，甚至其中某些研究者就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伪科学”应当专指不遵循科学规范，把虚假的现象、错误的结论当做科学成果宣传，而且有意躲避批评，并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因此，我觉得应该具体地就事论事，而不是泛泛而谈，尤其是应该侧重挖掘“伪科学”滋生的社会根源，以杜绝其继续泛滥的可能性。话说回来，我的确从实验本身发现这个领域被宣传得神乎其神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毫无可信之处。在这层意义上，我感觉非常失望，感觉自己与社会曾被严重误导。不过我认为这些年的研究也还是有意義的，否定也是成绩。

其次，在谈及证据的“科学性”的时候，我认为人们往往未能意识到其实存在两重标准：科学共同体的认定标准以及个人或实验室标准，相比之下，自然前者更可信赖。虽说在西方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科学界显然并不认为有足够证据确

认特异现象真实存在，这一点从 1995 年美国否决“星门计划”可见一斑。但我们应该同时承认，一直有些水平不错的科学工作者相信他们在严格的科学的实验条件观察到了异常的现象，在他们个人看来，这些实验操作是严格的，结果是可靠的，尽管只是一些孤立的“奇迹”。把这样一些实验因为其研究对象或结果就统统斥为不科学，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仍有个别现象是存疑而未被证伪。

申：何宏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我们没有理由批评和限制某些学者善意致力于对这类现象的科学研究。但我们却有理由，也有责任去批评和揭露科学研究中的，虚假、作伪，甚至是欺骗的宣传。

何：我再补充几句。这些年来，我接触过不少自称有特异功能的人，检验过许多此类现象，但迄今没有发现使我有十足信心的确凿证据，有一半是抓获表演者作假，还有一半无法证实。但因为我自己的亲身体会，知道有些神奇经历别人难于体会，却使当事人着魔般地相信或许并不存在的事物，所以我还是很理解对各种功法入迷上瘾并称自己有神秘体验的人。这类体验能够自然发生，跟是否有知识、是否懂科学并没有多少联系。我认为先入为主地一概斥为虚妄不经，不屑一顾，或者一上来就把人羞辱一通，说此人不是骗子就是神经有毛病，这么做与相信者不加怀疑全面接受神秘解释并无二致，也是不正确的态度。理性要求我们不可轻信感觉，要重事实证据，不论被吹得怎样神乎其神的“大师”、“高人”，如果经不起科学验证，神话自然也就破灭了。

亮：我基本赞同你的这种态度。不同的是，我觉得许多人声称的神秘体验，包括你说的这些情形，从心理学角度好像都能解释。按照精神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人是有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其人格也是由自我、本我组成的。所谓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社会化的结果，而人在被社会化的同时，总会有一些东西被深深地压抑下去，形成“无意识”，或叫做“阴影”。许多梦境都是

人的无意识在活动，这一点已被心理学界公认；许多心理疾病也来自人的无意识或阴影，也正在被更多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界所接受。

申：你是不是说，何宏的这种体验，也是他的无意识制造的一种幻觉呢？

亮：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由于读大学及公派出国非常顺利，他可能在内心深处自认为比一般人聪明，更有悟性，那位佛教信仰者一见面就称他有慧根，正好迎合了他的心理。但因为他确实悟性较高，稍练之后便感到该功法不过如此，于是不肯让自己受到可能还没自己道行高的所谓功法门派的羁绊。他的梦（对不起，我认为这毕竟是梦，尽管他们可能当做神秘体验）大约就是这种深层矛盾心态的折射。当然我这说法只是一种可能，也可以讨论。

何：没有亲身体验的人往往不假思索就接受心理学解释，因为这是最常规，也最符合经验逻辑的解释。但我想强调，心理学研究的并非是绝对客观的物质对象，而是人以及他们的行为规律，这就决定了心理学的研究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实验，其结果并非绝对必然，而是概率趋势。借用并非充分的共性解释千差万别的具体现象，我不认为这就算作科学解释，准确地说是一种相对更有把握、更合理的解释而已。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心理学解释与神秘解释并无质的差别，试问怎么确认是我的内心矛盾导致了这种梦，而其他人的内心矛盾却不导致这种梦？

亮：一般而言，越是聪明的人，悟性高的人，他对自身的内窥能力就越强，对自己的阴影越能感觉到。这会有两种情形及后果：一种是敢于正视这些灵魂中的阴暗部分，自觉分析它们，与之和平共处，这有助于人真正了解自己。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及的“我们拥有”情结。另一种是对这种潜意识中莫名其妙的“邪念”或冲动感到紧张，因为它与社会所要求的伦理标准和价值观念几乎完全不符，所以便试图回避或压抑之，这就会造成人的内心冲突，而当冲突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人格分裂，这也就是

我们被情结或心理问题所拥有了。这时，原先受压抑的阴影部分可能会膨胀起来，成为意识的主宰，人说话、办事、想问题基本不再用理性思考，不再顾忌他人评价，会把脑子里的幻象当成生活的实在。比如有人声称自己看见了某人某物，而别人都没看见，他不认为自己是患了幻视，反而认为别人没他有功力，或是别人没说真话。

申：老百姓有句话，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人生在社会中，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总会受到束缚，感到压抑，潜意识中总会有挣脱这种压抑的冲动。有时，给他一定的心理暗示，或到了某种可以“合情理地”释放这种冲动的场合，他可能就会一反常态。比如那些在“带功报告”会场手舞足蹈的人，痛哭流涕的人，还有的是随着“大师”的暗示语言，说自己闻到了某香味，看到了某场景，等等，实际上不过是幻象。

亮：还有的时候，人出于某种自恋心理，会倾向于臆想出或附会出所谓的神秘体验来，比如说，一般人感觉不到，而我感觉到了，你们没有气感，而我有，等等。在另一些场合，又会出于脆弱心理自己吓唬自己，比如媒体报道过在美国一所学校发生的集体癔症。起初是一位女教师自称闻到了某种怪味，头晕头痛，这招致环保研究人员前来调查，同时跟来一大帮记者。这时有更多的教师和学生也声称闻到了这种味道和感受到不适症状，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但后来并没有检测到环境方面的任何问题，只不过是一种群体心理现象。

孙：前不久我国四川某地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一个小学里先是个别人出现肚子痛、呕吐的症状，接着许多人也出现症状并住进了医院，还以为是食物中毒，后来证明也是一场集体癔症，是对食物中毒的恐慌所致。这说明心理暗示对人的生理感觉和机制能起到多么强大的作用。

何：我曾遇着好些人对我描述他们的神奇体验，而我听起来却感觉十分平淡，远不如亲身体验有那样强的震撼力。有体验与

没有体验的人接受异常事物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未曾身历其境的人听起来，往往觉得是瞎编，或者是把普通的梦境加以渲染以满足个人心理需要。但我想请诸位注意，既可以用心理学解释当事人的盲目相信，同样也可以用心理学解释其他人的绝不相信。说起幻境的真假，我们并没有客观和公认的尺度，只不过难于认定为真罢了。比如很特殊的情况，有人屡屡重复做同一个梦，这我们比较相信，然而据说还有数人同做一个梦的情况，心理学就没有办法接受并做完美解释。毕竟它只能依据当事人的描述，然而从描述来说，是否真是“同一个梦”，或者只是内容相似的梦，或者压根就是附会，却无从判断。所以此梦非彼梦，不同的人就有不同感受。

亮：心理学的释梦确实还很不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 and 荣格的学说至今也没被科学界承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成果，但是我觉得，它们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用理性来揭示神秘现象和体察内心世界的门，方向和方法大体上是正确的。我的看法是，迄今为止，绝大部分的所谓神秘体验可能并不是什么神秘，是可以用物理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知识加以解释的。当然，由于事涉身体与心理的范畴，情形太复杂，轻易下结论来否认一切神秘体验，恐怕也不是明智之举。据说有些动物对自然界的灾难会有预感，人有没有呢？有报道说在相同血缘的亲属间有时会做类似的梦，在直系亲属的意外死亡时会有某种心灵上或生理上的反应，这些也许都有待于生命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来进一步研究。

申：承认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有些东西尚属未知，尚待认识，还是以为自己的知识是无限的，什么都懂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这正是科学与有神论的分野。所以，可能有某些现象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我们权且把它叫做神秘现象或神秘体验，但是，最终我们仍要用科学方法和科学手段去接近它，认识它，绝不可因它们的存在而攻击科学、诋毁科学。

孙：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立足点”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即便一些科学尚不能解释的神秘体验是存在的，我们作为一个有理性思考的人，仍得把自己的行事原则和价值观念立足在科学常识和科学精神之上，而不能老是想着寻求那些神秘体验，依赖那些神秘体验。比如，天冷了得想着加衣服，出门时得遵守交通规则，想考上大学得好好念书，等等。总不能把健康和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做梦也可解出难题，或有了“功力”就百病不侵就能避祸消灾上头。

何：几位这样说我基本同意，正因为科学“承认自己是有限的”，所以我所理解的科学不仅提倡怀疑，还包括对自身的怀疑，科学本身就是在怀疑与批判中发展的，能否经受怀疑正是判断真“伪”科学的试金石。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原则区别，因为历史充分证明，神秘现象从来就没有影响到人类历史进程，且不说缺乏客观证据，即使神秘现象真实存在看来也没有多少应用价值，至多是像灵感一样瞬乎即逝，可遇不可求的体验。不过我还是坚持对神秘体验无需一概抹杀，把神秘体验一概视为妄语（尽管确有许多属于妄语），这种指责只会引发当事人的抵触情绪。毕竟人性是复杂的，是无法用科学手段测量和规定的，这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内心体验是千差万别的。只要不是用这东西冒充先知，有意蒙人骗人，扰乱社会，有人愿意相信，甚至于以假当真，哪怕愚昧，也是可以容忍的。既然宪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个人行为相信神秘事物也无可厚非。我想，多一点宽容或理解，再多介绍国内外的真实情况，更加有助于当事人纠正错误认识。

孙：说起来那些法轮功信徒可能也有点神秘体验，要不怎么有那么多高学历、高职称的人至今不能醒悟，不能划清界线？

何：法轮功现象提出了许多问题。应该说李洪志的真实面目已被揭穿，骗子加无赖，没有一点超出其小学水平的任何“功能”。但对那些执迷不悟的法轮功练功者，我觉得批驳他们愚昧、

无知、不懂科学，甚至精神不正常，并不解决问题。这些人之所以容易被人蛊惑站出来“护法”，是因为自以为道德高尚，认为是批判者无理，不懂他们的“超级科学”。因此，我认为单靠加强科学知识宣传、加大文字批判力度，未必就能收到多大效果，我觉得最好还是入情入理地教他们看清楚李洪志的真实面目，他根本就不是“真、善、忍”的精神偶像；如果这些人练功后身体变好，或者还有点神秘体验，这与法轮功甚至气功自身也无必然联系；另外像法轮功这样的社团，历史上有的是，国外现在也是数不胜数，虽然裹挟其间的人大多以为教主或大师有神异本领，然而无情的却是否定的事实，甚至于有些人沦落成为邪教谋财害命的帮凶，所以不可不慎、不可不清醒；最后还要清清楚楚地告诉这些练功者，集会、“护法”等活动属于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亮：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法轮功出现的原因应如何认识，解决法轮功问题应采取何种对策，我们似乎不应该像西医治病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采取中医的观点，把它看做是我们这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出了毛病。换句话说，法轮功只是一个症状，或一种表现形式。李洪志不过是个胆子大脸皮厚的骗子，他的所谓理论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不值一驳，但是群众练法轮功信法轮功的原因却相当复杂。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社会矛盾多，观念冲突大，利益分配失衡，腐败之风严重，这些都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出现混乱，产生信仰危机和诸多心理问题。再说得具体一点，有人是担心生病无钱治疗，有的是退休生活寂寞找不到归属感，有的是对社会有怨气而借着“组织”的力量去发泄，甚至夫妻关系紧张在家中缺少温暖，都是使得这一邪教组织趁虚而入占据人们心灵的原因。而这些社会问题若不能得到重视和有效解决，不仅法轮功风波难平，即便通过强制手段做到完全禁除了法轮功，也难保不会再冒出别的什么功法门派来兴

风作浪。古人说医政相通，有毒瘤自然要割除，但调养机体以祛除生瘤子的原因，才是更应下力气做的。

申：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神秘体验，其他的思考留待以后再说。今天的讨论大家的观点都很鲜明，各位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我相信这样的思考与交流是理性的、有益的，希望今后找一些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议题，继续切磋。

灵魂是否存在

——关于有神论与无神论对话

申振钰：《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常务副主编，研究员

李 申：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研究员

何 亮：《火箭兵报》副刊部主编

孙 倩：科普出版社副编审

李东松：北工大人文社科院副教授

郑 念：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1. 有根据才有价值

申：今天，我们以这种半旅游性的沙龙讨论形式，来一起聊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无非是想进行一下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往许多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种沙龙活动中跳跃出来的，历史上靠非逻辑的思维，讨论一些科学问题而产生科学思想火花的例子也不乏其数。我想不需要大家做什么准备，不要拘谨、刻板地长篇大论，只是就大家认识和理解的东西互相交流一下。

李：其实，我们主办的沙龙无非是给一派学者提供一个交流思想的场所，我们的主导思想还是宣传“四科”（即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但以什么形式进行宣传确实需要研究，决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成大批判性、大理论性文章，问题一定要贴近现实，贴近百姓，贴近生活，所以开办了一些“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对话沙龙”，力图从科学的源头上做一点思考，让科学走进我们这个沙龙，并能由此吸纳各种不同见解的学者的意见，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思考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孙：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宽容的、柔和的、中性的态度去

讨论，对待科学也应以科学的探索精神，对待要讨论的问题也应采取理性的质疑态度，以事实为根据，而非空凭个人的好恶。

申：我们还是反对那种把“有神论”批得体无完肤，而把科学宣传得神乎其神的绝对态度，因为科学本身也是有限的。只要讲出根据来，任何观点都是有价值的。

何：我赞同这样的讨论，既是学者交流，就不能一个调门，一个声音。否则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很难说了。

申：那好，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灵魂是否存在”。因为这个问题在当代迷信现象中出现频率较高，特别是神怪气功。所谓的气功大师追求超自然力的主张，如李洪志之流在宣传他们那一套歪理学说，把“灵魂不灭”、“轮回转世”等古代迷信思想糅杂于其中，主张灵魂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可以主宰现在的世界，蒙人唬人。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也很模糊，我们不妨讨论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但要注意，要依事实说话。

2. 灵魂是物质吗？

申：我在研究世界“唯灵论”问题时就发现，“灵魂不灭”是灵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追溯起来，从巫术开始直至盛行于19世纪招魂术的操作，达上千年的历史。把这类现象归为科学研究领域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882年，在英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的名义研究灵学的机构——英国灵学会。在早期的灵学著作里，“灵魂”被看成是一种物化形式，并有重量0.4~1.5盎司。后来“灵魂”的概念不断地被演绎、升华。现在的灵学观点是把精神也看成是一种物质形式，而且，这种物质形式是高于现实、高于人类、高于一切未开发的无形世界。

孙：不是以前有人做过试验吗，测量死者在死的前后几秒钟之内，体重有何变化。

申：有的说人死的一瞬间，灵魂化成一种雾气飞升出来。这还是把灵魂当成一种物质。我认为，这“一瞬间”从物理仪器上

根本无法操作，只是一种演绎，仪器的误差足以造成这样的结果。从实证科学考察，“灵魂存在”既没有得到证实也没有得到否定（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就像特异功能问题一样，现在的实验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例证实特异功能存在。

孙：我们可以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灵魂问题。我在《方舟在线》一书看到的“生命是什么”这篇文章，觉得挺受启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存在“万物有灵论”，即动植物都有灵魂一说，到了笛卡儿时代，才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一切运动都是机械运动，甚至把人也看成是一种机器，过去所谓灵魂作用的东西都可以用机械运动来解释、替代。在他们之后，又有人提出“活力”的概念，但后来物理的能量与转化思想的发展又替代了“活力”。从科学史发展的观点看：过去曾被认为是灵魂起作用的现象，现在都可以用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学的作用来解释。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过去很多为人不能接受而被认为是灵魂起作用的生命现象，也都可以用分子水平的物理化学反应来解释了。无神论者认为灵魂不存在的根据之一就是过去许多被认为灵魂存在的现象，现在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它不过是一种物理化学反应，而不是超自然力所为，任何一种反应都是有其动力根据的。方舟子最后的结论是：生命是自然选择下的物理和化学的反应。

郑：关于生命的起源仍然是个谜。到目前为止，无外乎四种观点：神创论、外界移入论、生命永恒论和化学进化论。你这可以称为“化学生命观”。

孙：我说不好是什么观，但是科学信奉的是一种还原主义，就是每一层面的现象都可以由下一层面的各个部分的组合及相互作用来得到解释。随着科学的发展，许多现在解释不了的现象而被冠以超自然的或灵魂的作用，有可能被未来的科学有所解释。而事实上，有许多从前解释为灵魂存在而起作用的，现在可以被科学解释了。相信灵魂存在本来是一种目的论的观点，比如相信人类存在是有目的的，宇宙社会存在的秩序是上帝安排好的。但是

科学不这样认为，科学研究的是客观实在，目的是发现这些客观实在的规律，但这些规律到底是什么，科学只是一步一步地向纵深发展，而始终没有找到终极规律，更没有找到上帝那里。而有神论一开始就找到上帝那里，认为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科学与有神论在观点上、立场上和出发点都不一样。

3. “灵魂不死”新解

李：“灵魂不死”问题是否这样看：人类基因组做了大量破译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人类有可能做到复制自己，这里有一个问题：人原来不能自己控制灵魂，那么复制出一个人来是不是就可以控制住一个灵魂。在科学家进行人体研究工作时，科学家是否在做“招魂术”？这些研究工作从神学的观点来看，科学家本身是否就是“上帝”，他可以造一个灵魂了？也就可以造神了？

另外，关于生命起源问题，有些科学家试图用自组织理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超循环理论来解释。各种高级的生命形式是由低层次的生命组织起来的。它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根据自组织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低级生命形式或是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通过自发的自组织和内部形式，在正反馈作用下过渡或突变到一个新的稳定状态。人是生命体，是非平衡状态体。在人类研究自身或受制自身时，甚至利用科技手段达到使产品也能够进行思维时，那么是否可以说人类创造的产品具有了灵魂，显然科学又可以造一个灵魂。那么将来灵魂越来越多。按照通常所说“灵魂不死，灵魂不灭”之意；可以理解为灵魂是永远存在而循环下去，也就不能再生。这与我们上述情况正好相悖。

何：我得插一句，我们是否先给灵魂下个清楚定义，我们选择哪一种理解。

申：还是超自然的，从科学的角度上看，李东松说的造神和造灵魂也都是物质的，而非超自然的。我们现在讨论的灵魂问题都是和鬼神相联系的。至于“飞升”的那块灵魂以什么形式存在？

如果是物质的，我们可以用实证科学去检验，但现在没人去做这些。而我们想讨论的与鬼神相联系的灵魂至今也没有什么新的内涵，宣扬神怪气功的一些人把灵魂是物质的东西与古老迷信的东西合二为一了。

4. “灵魂存在”在非科学层面上的诠释

何：顺着刚才的话题，针对灵魂是否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座的恐怕都不相信灵魂，有许多知识分子也不相信灵魂存在。但这是在科学范畴里争论不清楚的问题。“灵魂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在文化上和心理层次上的问题，在科学、哲学上不太好说。这个问题在过去有的发展成宗教信仰，有的停留在巫术阶段。若是与信灵魂存在的人讲道理，就好像“白天不知夜的黑”，无法沟通。关于信仰问题，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根本无法辩论。讲道理呢，当然可以举很多例子去反驳了，中国的范缜的灭神论、王充的无神论观点都可谓是无神论先驱者言论，甚至像孔子也不大相信神灵存在，有人问他神有没有，他说：“祭如在”，即祭神如神在，就当它在好了。应该讲这个问题从更多情况看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孙：你说到社会文化层次上，我倒觉得中国历史上关于鬼魂的故事特别多，如人死后有几个“七天”，小孩子被吓住了，几天昏迷不醒，大人们就要去叫魂。

何：是的，在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回煞”，是说人在死后的第二个七天时，灵魂又回到死者身上一次，此后再走掉。人们能看到一些物理现象，如灯火暗一下或变蓝了一下，有一阵风，普通人能感受到。有的化成一只鸟，当然这是一种传说。在山东流行着的鬼神故事，说什么光屁股小孩、黑脸大汉都是阎王爷派来的等等。西安半坡遗址有一块墓地，发掘出的小瓮是盛装尸体用的，它上面有一个小眼儿，人们一直说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郭沫若的解释说这是灵魂出入的地方。人被埋进陶瓮之后，留一个

眼儿，让灵魂自由地出入。我估计古人会这么考虑，他自己尸首埋下来，那么他的魂儿从哪里走呢？还是留个眼儿吧！人在生死的问题上，特别容易牵涉什么“命中注定”、“灵魂不灭”问题。在西方，一些自称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说能看到上帝，看到天使，其实都是一种幻觉。最近关于濒死体验做了一个实验，找到了十几个志愿者，给了他们一些药物，然后使之处于昏迷状态。真正的濒死体验是这样吗？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意思。

李：从文化上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过教育，一般地会本能地相信灵魂存在，并强烈希望灵魂存在。因为一般人认为死后成为一种虚无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而心理上强烈要求有一个东西保留下来，延续下来，这就找到灵魂上来。当然受到无神论教育的人不遇事还好，但尤其遇到生老病死这些事时，他仍然有强烈的灵魂不死的需求。

何：至于说“积德行善之人上天堂”、“为恶不仁之人下地狱”等说法，也反映出人们的普遍心理。一个受教育者可能在理性上更发展些，认为即使精神上有这种需要，但它都是不确实的，理性上也无法相信他。

郑：关于灵魂的问题，我认为它属于宗教领域的一个问题。宗教是绝对相信灵魂存在，可以轮回转世的。这是宗教的基础。灵魂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包括李洪志搞的“信则灵、诚则灵”，都是利用人们的心理反应不好验证或证实的东西搞名堂。我称之为“无约束的心理需求”。因为任何人想的什么别人无法证实。所谓“信则灵、诚则灵”是提供人们相信李洪志谬论的心理基础。我认为把灵魂划到宗教领域更合适。

科学提倡真的，宗教提倡善的，艺术是提倡美的，真善美三者是结合统一构成一个社会的层层面面。几千年来宗教不衰，也肯定有它存在的道理，灵魂问题存在也会有它存在的道理。

何：插一句，包括很多文学作品也大量使用灵魂的语言，说什么“某某的灵魂是多么地高尚了”等等，聊斋、金庸小说、武

打片等等，大部分讲的是鬼怪神灵之类，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些思想。

5. 什么时候需要灵魂存在

郑：其实宗教和科学是相互对立，并行发展的两个领域，往往在科学发展不到位时，宗教可以在科学解释不了的领域里大做文章。但一旦科学达到一定水平，解释了神秘现象时，许多东西就不攻自破了。

例如，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之前，宗教说把宇宙分为八层天，每一层有一个神仙驻守，各个神仙把持天庭各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在中国把统治者叫做“天子”，以利于“教化”百姓。在“日心说”提出和“哈勃望远镜”发明之后，科学已证明天上什么神仙也没有。现在大众恐怕都因科学而相信了这一点。

灵魂这种东西是什么呢？最早的时候，人类同大自然搏斗时，许多现象无法解释，人们一是把它归结为神仙所为，二是归结为人天有感应，人可以在阴阳之间轮回，灵魂是不灭的，等等。现在争论灵魂存在与否还是争论不清楚，因为既不能证明它存在，也不能否证。那么到什么时候才能争论清楚呢？也许就像现在所说：宇宙存在物质与反物质，那么反物质现在又抓住了多少呢？至少科学上存在这样一种推测，肯定存在这种反物质，否则质量问题无法解释。科学发展到证实了反物质存在，那么推测就成立了。回到灵魂问题上，等到科学上发展到那一步，确实证明没有灵魂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何：这一点我不完全同意，等到那一步还是不行。现在西方科技发展比我们快，但他们对灵魂的追求更迫切。许多西方人认为，科学越发展，越需要精神的支持。

郑：我理解，科学家若失去精神家园，就会无所适从，无所寄托，也许会变成疯子。这就会很难办。我认为作为一个有情感、有思想、有灵感的人肯定需要有一个精神家园，离开这个家园，他

就无所寄托了。当一个人干什么事都失败时，要么会破罐破摔了，觉得生活无趣；要么就要寻求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有一个目标就有一个希望。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要。

何：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人们都有这种需要。

6. 现代迷信借用科学名词

孙：刚才咱们讨论这么多，我觉得不同年代对灵魂的认识不一样。

何：不仅是由于年代不同，而且由于人员的不同，因而产生对灵魂的认识也是千差万别，很难用一个概念去讨论，包括科学家、文学家、宗教家形容灵魂这个词，也有不同的界定，虽然它们之间有些共性，但差异还是挺大的。

申：正如大家所言，灵魂的意义和内涵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那么你们认为现代倡导的灵魂到底是什么，社会上风行的特异功能啦、气功啦、宗教啦都打着这一招牌。

何：您是说与信仰有关的气功是否有灵魂的问题。

申：有的。说实话，不管什么气功流派，他们的功法操作本身是属于身心锻炼层次的，大家练一练，无害有益，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带有特异功能性质的较为神化了的的气功，把迷信和灵魂的东西塞进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了。一般讲，人们都有依赖需要、恐惧需要和目的需要。古时候，一个山洪来了，一个部落很可能就被吞没了。于是人类产生对天神的崇拜；超自然的信仰也就产生了，于是有了巫术求天求雨。而后从文化上加以提炼，于是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进而产生了宗教，同时也有了科学。而今天，由于种种社会问题和科学上的未知之谜，人们并未摆脱依赖需要、恐惧需要、目的需要，因此，对超自然力的笃信并未减少。

郑：而且随着人类思想能力的增强，原来一些不敏感的东西反而敏感起来。

孙：有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往往还论证得很逻辑。

申：当然这些都是文化层次上的。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一些古老迷信的东西，虽然在形式上不断变化，但是它超自然的属性是没有改变的，包括现代的扶乩，在一个黑暗房间进行的一种神秘操作，不过是古老招魂术的再现。

何：刚才讲，原来的迷信，如天下雨打雷是由天公所致等等，大家也都不信了。但是恰恰在生命健康、生老病死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因为科学对它还未研究透，特别是生命起源问题，仍属模糊地带。现在有人用气功、特异功能等散布歪理邪说也好，灵魂不灭也好，对此都无法用科学的手段来证实，也无法证伪。

申：我认为它们没有什么新内容，也不是什么高层次。古老迷信，要从心理和文化角度去讨论，我认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因为从信仰的层次考虑，它与科学没有什么关系。造诣很高的科学家，尽管他有很丰富的经验和严格的科学研究，但是他在信仰方面，在文化和心理的领域，他们还是相信灵魂存在，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李洪志这样的人把精神看成是物质的，打着科学的招牌进行招摇撞骗。一些北京中科院的博士们写什么东西，为李洪志说话，说它不是一个什么迷信领域，而是一种新科学的体系。我是想针对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郑：李洪志和兜售“信息茶”的沈昌是一样的问题，吹嘘自己的理论是什么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有这么一句话：无知者无畏。正是因为他不懂科学是什么，所以他们才敢说自己是是什么最伟大的科学。

李：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现代科学是什么，所以才特别敢大胆地设想。王洪成的“水变油”也是无知者无畏的范例。

7. 谨防上了伪科学的当

何：我不完全这样认为，像李洪志这样的还不是什么“无知

者无畏”，他就是一个骗子，他什么都知道。像其他人才属“无知者无畏”，如说“你们都不懂，李洪志才是新科学的代表”，诸如此类。

李：我理解的无知者无畏是，有些人听到了科学上的一些名词，自认为对他的体系有用，就把它借用自己的“理论”中，但实际上他们自己对所借用的科学概念的理解就是错的。

申：那么，为什么李洪志的学说那么有诱惑力？许多群众不懂现代科学，这对他们来讲太难理解了，而李洪志的那一套可以被他们直观地感受到。而在现代科学襁褓中成长起来的硕士博士们，为什么也那么容易相信李洪志邪说，就是因为李洪志敢于把不能实证的神学推到无限的领地，而这恰恰是和实证科学完全不相容的。

李：这不仅仅是科学的问题，也是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很大关系的。从20世纪70年代末转型期的20多年来，伪科学和迷信就不断地增长，最火暴的场面就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带功报告会，会场人员爆满，门口道路两旁到处是没有买到门票的观众。以至前两年法轮功信徒静坐聚集中南海事件，居然有那么多信众。

申：我认为现代自称具有神奇功能的“气功大师”的主导思想就是骗，所谓“一招鲜吃遍天”，不是有养生功能骗知识分子吗？那么就有大自然中心功能骗老百姓，说什么从大自然来的功什么病都能治。李洪志用“转法轮”就更有欺骗性了。

李：这些神怪气功先把他们要欺骗的人定位，琢磨人们的心理，再编造一套虚假学说来骗人。

申：人们有三个基本需求：依赖需求、恐惧需求、目的需求。骗术从哪里下手呢？就从人们普遍需求的生命健康上下手，吹嘘人体特异功能能够治病。能够治病就能有市场，走向市场就能够骗钱。像张宏堡、张香玉、张宝胜、沈昌都会一些小智术，他们发财起家就是靠骗术。

何：关于生命健康问题，人们是太容易上当受骗了。非常有

理智的一个人在碰上不治之症时，也会不自觉地倾向于什么神功、秘方，更何况老百姓本身不具有什么科学知识，更不具有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完全靠自身的体验。所以有那么多人信法轮功。

郑：我认为科普宣传立法很重要，我们这些科普工作者做了十多年的科普宣传，往往被伪科学或宣扬超自然现象报道毁于一旦，应当加强科学家在舆论方面的监督，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何：宣传媒体对算命、看相等问题的报道好控制，但涉及文学作品宣传鬼神问题时，就不太好处理，我觉得民间文化传统对文艺创作影响是很大的，什么天仙啦、嫦娥啦、玉兔啦等。老百姓对小说影视作品中的神灵鬼怪很容易接受。我们倒是应该像打预防针那样，从小孩、青少年起就要宣传无神论思想，因为环境气氛很重要。

申：好，我们讨论了不少关于灵魂的问题，收获还是很多的，大家发表不同意见，阐述不同观点，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讨论，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这种讨论。

追根溯源话神功

——关于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文化分析

申荷亮：《火箭兵报》文化处主编，主任编辑

秋 实：某协会副编审

（一）

秋：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怀疑论者大会上，你提交的那篇关于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文化分析的论文颇有新意，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起源和主要特点，受到与会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看来你对这方面问题思考很久了，很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好吗？

申：好的。要了解和分析中国特异功能迷信，先是对这一概念做些必要的界定。迷信是一个外延甚广的范畴。它包括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等一切缺乏理性实质的信仰或习俗，也包括对其他一切事物的非理性解释及崇拜。而所谓特异功能，则主要指某些人声称所具有的超常能力，包括能见一般人所未见的超常视觉，即所谓的“千里眼”、“开天目”、人在屋里坐着就能看见地球另一面的事情；听一般人所不能听的超常听觉，比如能听得见弄得懂“宇宙语”的本事，以及曾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耳朵认字”等；还有意念移物，用奇功异术求长生、疗疾病，甚至还有人声称有“刀枪不入”的本事。凡是对这类违背科学常识也从无事实根据的事情和说法的轻信、迷恋和倾倒，都是我们所说的特异功能迷信。

秋：这样，也就把它和传统的妖怪传说和鬼神迷信区分开了，

仅是指对于人体具有异功神能的一种迷信。

申：是这样。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对玉皇大帝、阎罗真君、山精树怪这类鬼神妖怪的迷信是越来越少了，关于天宫、地狱这些说法也没多少人会相信了，毕竟人类已经成功地登上了月球，没看到那里有什么玉兔嫦娥，石油和地质勘探已把钻头打到几千米深的地下，也没碰到过阎王殿的一砖一瓦。但是相对于探索外在世界的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成果来说，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还显得远远不够，未解之谜还有不少，这就给特异功能迷信留下了相当的生存空间。

秋：科学的阳光一时照不到的地方，迷信的阴影就会留在那里。

申：所以，我之所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理清一下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起源，就是想让用这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和教训作一面镜子，找出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提醒人们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已经有人上过当了，不可再轻信了。但这毕竟仍属于经验范畴，迷信特异功能的人仍然可以说，即便你列举的事实都是对的，那些所谓的特异功能都是假的，但却不能证明特异功能的不存在。事实上这种说法还是很有市场也貌似有理的，即所谓你们验证的特异功能人即便有一百个都是假的，却不能以此断定第一百零一个也是假的。而且，有些基本属于主观感受的东西一时是无法用科学技术手段来检验考证的。所以说，最终消除特异功能迷信，还得靠科学技术和科学手段的进步，尤其是真正的人体科学研究不断深化。

（二）

秋：做了上述这些必要的界定和说明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谈谈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历史根源和文化特点了？

申：对特异功能的迷信，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应该说，它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一样久远。和世界各民族的早期历史一样，中

华民族的先民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蒙昧时期。对于在他们看来毫无规律可言,而且总是肆虐加害于他们的大自然有着本能的恐怖,同时又幻想着有某种特殊力量能帮助他们征服自然,率领他们趋利避害。神话传说中的羿射九日、女娲补天,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根据中国民间传说,上古之时,天有十日,过多的热量导致禾苗枯焦,人民无法生活,当时部落首领尧便派一个善射的勇士后羿,用箭射落了九个太阳而使热量得到平衡,百姓由此尊尧为帝。后来又有淫雨不已洪水泛滥,又有一个叫女娲的妇女炼五色石补天,这才避免了人民被水淹没的命运。过多的太阳和过量的雨水,这正是当时人民深受其害而人类至今也未能完全解决的旱涝灾害的表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农耕文明的民族而言,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秋:由于这一原因,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某些同类具有这样的超自然能力上,是很自然的。

申:当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后羿、女娲,乃至被传为曾化作巨熊治水的大禹,都是生活中的人,一开始并不是以神的身份出现的。由于他们身上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特异功能,并且做出了有益于众生的事情,便有了神的性质。

秋:关于中国文化中由人而神的例子,还有许多。像《封神演义》里的那些神,实际也都是商朝末年和周朝建立初期的叱咤一时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将领,不少也都有着“特异功能”。

申:这些当然只是传说,是人们出于善良愿望而将这些“特异”本领“强加”给他们的。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加深,这类以向自然挑战为代表的特异功能迷信逐渐弱化,而代之以致长生、医病痛、以及在战争克敌取胜的超自然能力的迷信。因为对于人的生老病死、战争的伤害,人们既不明白原因也无法控制其结果,某些超常能力的存在,对一般人民是一种安慰。许多王公贵族也对这种能力孜孜追求,对声称有此能力的术士深信不疑。秦始皇就曾数

次听信方士的吹嘘，派徐福去寻长生不老药。汉武帝终其一生，被自称能通神仙致长生的方士骗得团团转。唐太宗李世民为求长生，曾从印度请来一个巫师，此人自称已活了200岁，但他献上的药不仅没让李世民生，很快就死掉了。

秋：你列举的这几位皇帝，都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了，他们对方士的神功异能迷信如此，其他皇帝和普通百姓便可想而知。

申：的确如此。实际上，直至今日，因为经济水平发展尚不均衡，教育不能普及，尤其因为迷信文化的巨大惯性作用，中国民众对特异功能仍有相当迷信，或者说特异功能迷信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仍有相当的市场。

(三)

秋：上次谈到了中国特异功能的起源，我觉得很有道理。那么，在你看来，中国的特异功能迷信都有哪些文化特点呢？

申：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特点，择要而言，我以为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与政治关系密切；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三是有正统的反对力量。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下面我就具体解释一下。

关于与政治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历朝历代的大多数统治者笃信有特异功能存在的，并且希望通过有特异功能的术士求长生，知未来，巩固其统治，如前所述中国几个被公认为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是相信特异功能的，他们的政治取向不同程度地受过方士的影响。其次是历史上许多重大的起义，发起者往往要借助于民间的特异功能迷信，有的是声称有包治百病的能力。如秦末的从根本上动摇了秦始皇的统治基础的陈胜吴广起义，最初便是以“篝火狐鸣”（用点燃诡异的篝火和学狐狸叫出“陈胜王”的声音）来显示陈胜的特异，聚集人心的；又如汉朝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其首领张角便是一个据称有特异功能的术士，其跟随者也都

相信他有超常能力，负有天命（“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因而敢于跟他造反。至晚近的清朝，无论是反抗政府的太平天国起义还是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都把对特异功能的迷信推向极致，他们相信练了某种功法或喝了符水之后就能“刀枪不入”，甚至可以“撒豆成兵”。第三，由于许多官员也普遍相信特异功能，他们常常会利用某些巫术，延请方士，以从精神上控制或从肉体上损害政治对手。唐朝著名的女皇武则天最初作为嫔妃受到宠爱时，原皇后对自身地位不稳深感不安，就请术士用在纸或布做成的武氏模拟像上扎针，深信这样就可损害情敌也是政治对手的身心。后来事泄被囚，原皇后咒武氏将变成鼠而她自己将变为猫，必掐其喉则报仇，而从此武则天不准宫中养猫。

秋：这就是民间巫术中所谓的“厌胜”，现在受过教育的人都不会再信这个了，不过在一些农村，仍还有人为泄私愤这么做，媒体上曾有过这方面报道。

申：是啊，我这就要谈到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民间基础，应该说它是相当厚实的，也是相当顽固的，实际上，高官要人和起义造反者当中那些直接影响到政坛的特异功能迷信，其根子也就是来自民间的这种基础。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中国文化中缺少重科学、求实证的精神，而偏重于主观的感悟，按哲学家李泽厚先生的观点，是属于“审美的文化”，因此理性和怀疑态度虽然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受到尊崇，多数人却不愿意在理性和分析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和太累，而宁可满足于事物的表面效果给人带来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由于一神论的宗教始终没有在中国占据过主导地位，这就使得包括特异功能迷信在内的各种迷信在民众中广有市场，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对他们的生老病死起到直接影响的，只要通过个人修炼就能祛病去灾、长生不死，甚至具有超常能力的特异功能迷信，就更容易使他们接受。

(四)

秋：上次说到中国特异功能的文化特点的前两个问题，比较容易明白，与政治关系密切是因为王公贵族大都相信这个，试图造反的人也要利用这个，而民间基础深厚既是一大特点，也是左右政坛的要人们笃信特异功能的原因。可是要说到第三个特点，有正统的反对力量，这是不是和前面两个特点有点矛盾？

申：你是说，既然有正统的反对力量，为什么特异功能迷信还这么盛行？看上去这似乎有些矛盾。但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形。虽然笃信特异功能者在皇室和民众都不乏其人，对于中国政治有着某种奇特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中国历史上对特异功能迷信持反对态度和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也是不少的。从中国儒家的宗师孔丘开始，他对于特异功能和鬼神迷信就持一种不可知的怀疑观点，儒家经典《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有学生问如何敬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再问死是怎么一回事，孔子便说：“未知生，焉知死！”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其基本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提倡仁政，虽然也信“天命”，但那是对于自然界和社会政治中存在某种规律并要求人遵循这种规律的表述。荀子写过《天论》，其中明确表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孔子和正统的儒者都是不轻信神力怪异的。

秋：这倒使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即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便是把一个声称能与水龙王通话，要用活人向龙王献祭的女巫丢进了河里，同时带领人们用兴修水利的办法来改变处境。还有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为了劝说皇帝不要在迎佛骨这类迷信事情上花太多功夫，还专门写了流传后世的《谏迎佛骨表》，不惜犯颜遭贬。

申：最近还有一本由美国学者写的书，讲了清朝年间的一件

有趣的事情，从中也可以看出受正统儒家教育的官员们跟神神道道的皇帝及其愚昧的追随者之间是怎样“斗法”的。1768年间，曾发生过惊动全国的“叫魂”事件，民间盛传有人在用剪人发辫并施以巫术的方法，控制人的灵魂。乾隆皇帝亲自督促查办，因为他担心的是，这种邪术（也可叫“特异功能”？）用来做什么不好，却偏偏要用于剪人的辫子？这可是好不容易得来的让汉人向清朝表示臣服的象征啊。所以他怕背后有什么造反作乱的阴谋。可是他又不好把这层担心说破，只下令把会使这种法术的人抓住再说。但是除了少数比较愚昧轻信有异术这回事的官员比较认真，或是个别官员宁可滥抓人屈打成招也要向皇帝表忠心以外，这件事情遭到了各地许多官员的抵制，他们根本就不信会有在肩膀上拍一下辫子就给弄走，而且拿了辫子就能让你干啥就干啥这种无稽传闻。上面压力实在太小时，官员们才不得不应付一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是一场迷信闹剧。

秋：的确，信奉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不信鬼神，也不信特异功能的，他们的身体力行，用事实说话，确实能起到不使特异功能迷信过于泛滥的“防波堤”作用。

（五）

秋：除了上述历史根源和文化特点外，在你看来，中国现代特异功能迷信又都有哪些原因和特点呢？

申：20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曾广泛开展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运动，一度收到过十分明显的效果。从贫穷和无权的状态下获得解放的广大民众，看到了靠良好的社会制度和人们团结一致的努力便可创造幸福生活的可能，感受到了现代科学和医疗手段是人的生命与健康的真正有效的靠山，加上政府有意识地进行宣传、教育，包括特异功能迷信在内的各种迷信势力明显衰落。但是在我看来，这成绩的取得也不是没有代价。其教训便是当时过于强调思想一律，强调阶级斗争，容不得与正统思潮

相悖的任何理论学说,将一些只不过是民俗的行为也视为迷信,将一些坚持迷信想法的人当做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和打击。

秋:你是不是说,这样虽在一定时间内和表面上有所收效,却没能从文化深处寻找原因,没能从土壤中除去迷信的种子?

申:是的。这种被称为“极左”的思潮对社会的控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从那个年代经历过的人都还记得,当时的人们的确很少有对于神、鬼和特异功能的迷信,却对领袖人物及其话语产生巨大的迷信,几乎尊之为神,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科学态度和怀疑精神,这一本来对于克制迷信、驱除蒙昧最有效力的武器,在政治的高压下无人敢于提起。

秋:的确是这样,像遇罗克、张志新等就是因为表现出了怀疑精神,坚持自己的见解,竟被当时的专政工具判以极刑,教训不可谓不深。

申:随着比较僵化和专制的体制终遭摒弃,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这激发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创造精神和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多元化思考,但与此同时,原先被压抑下去的对于神秘主义的向往和对于超常现象的好奇也重新浮起。经济转型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动荡和不安,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而对国家和民族竟如此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实的认知,也使许多人因急切而浮躁,因图超赶而欲寻捷径。这些因素,使得特异功能迷信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重新浮出水面,继而大行其道。先是有关于耳朵认字的报道,接着是出现能用气功“意念移物”、“遥感”和预测的“大师”,其中大多数都声称具有帮人诊病治病的特异功能。在“气功热”中混杂了相当数量靠所谓的特异功能蒙钱的骗子。

秋:我曾采访过出身于中国魔术世家的傅起凤女士,她介绍,曾向她和她的家人学习过魔术但并未能成为出色的魔术师的人中,就有人靠吹嘘自己具有特异功能并进行“意念移物”等表演而赢得信众,成为聚敛钱财的高手。魔术上没出息,却能成神功

大师，真不知这是他个人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六）

申：这种重新燃起的对于特异功能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过去一些年代里不适当地用政治手段排除异己压制思想的一种反弹，有其必然性。它很快寻回自己在广大民间短暂失落的文化基础，并且因相当一批官员的热心支持和重要媒体的参与炒作而变得势头甚猛。

秋：这件事其实早已被专家揭过底，庄逢甘院士就曾专门撰文指出过此事不实。但少数民众对此深信不疑，媒体的力量和官员的声音压过了科学家的声音。

申：至于在涉及人的生命健康这一目前科学之光尚无法普照的领域，就更是诸多自称具有神功异能的“大师”竞相显能的地方，我想这方面我们就不需举例了，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需要强调的是，受中国特异功能迷信与政治具有密切而复杂的关系这一文化特点决定，当代中国的特异功能迷信也未能脱出这一窠臼。虽然从特异功能迷信的重新泛滥之初便有一些知识分子持强烈反对立场，呼吁用科学和理性精神教育民众，他们四处奔走，直接揭穿过许多骗局，但因各级官员中不乏这一迷信的爱好者，他们或对这种呼吁置若罔闻，或疑为政治对手的某种挑战，于是直接利用权力向声称具有特异功能者提供支持，压制对特异功能迷信持不同意见的声音。

秋：确实是这样。所以才导致特异功能迷信愈演愈烈，直至出现一批以某个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士为首领，有组织、有所谓科学理论、有资金支持，并且向社会炫示力量、要求权力的政治实体。“法轮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了。

申：这些明显具有政治色彩的功法组织，其领袖人物多属借助媒体吹嘘以骗术起家，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对他们及其功法产生痴迷的信众，却大多属于本性善良、易受心理暗示和容易被人

从精神上控制的人。中国正处于剧烈改革中的社会转型期，由此产生了诸如失业、贫困、医疗保障等问题，一些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人缺少归属感和稳定感，加之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影响到执政党和政府形象，这些都是促使许多人转而到某些功法组织中去寻找替代、去相信特异功能的社会原因。

秋：因此，在当今中国，与特异功能迷信做斗争的情形十分复杂。这不仅仅是用科学和理性的武器去揭穿迷信识破骗术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原因又有着相当复杂的时代政治背景的社会政治问题。

申：当然，在看清与特异功能迷信做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前提下，作为信仰科学和理性精神的怀疑论者，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科普工作者，我们首先要做的仍是要坚持不懈地宣传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要不遗余力地去揭穿形形色色的骗子们的骗局，将科学与理性的火炬高高举起，驱散愚昧的阴影。

气功“外气”是人体特异功能的变种

申振钰

第一节 特异功能研究向气功研究转化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发表了“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一文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延续四年之久的“人体特异功能”的争论。这场争论波及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深、影响之大、时间之久，都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中国科学史工作者，准备把它作为科学史上伪科学泛滥的一个大事件，记载在科学史上。

这场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人体特异功能的争论，在经历了4年之久的唇枪舌剑之后，悄然消退了几年。但正像几经崛起、几经衰退，已经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的世界灵学研究一样，中国的灵学研究，在它第一次浪潮消退之后，绝不会就此绝迹的。经过几年的理论与实践的准备，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以一个新的形式重新登场，掀起了以“气功外气”为核心的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浪潮。这一浪潮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一些新的特色。从理论准备方面可以追溯至1980年六、七月，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拟成立以宣传和推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为目标的“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时，就提出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理论均属人体科学研究范畴的思想。1980年8月3日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医、气功与特异功能统一”的理论。这是自1979年3月开始掀起的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热。在“耳朵、鼻子、腋下、手脚”认字辨色，耳朵透视、折枝摧花、找财探宝、隔墙看物、穿墙过户、意念治病、意念手术、意念催熟等宣传报道，激起了持怀疑态度的

科学家、受害者和一般大众强烈不满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们采取的一个新的策略。在这个策略指导下，人体科学研究会（筹）于1981年5月宣布成立（但一直未被中国科协承认），从此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特异功能”表演开始收敛，进入所谓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在这期间，以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的名义召开多次学术讨论会，提出了特异功能的训练和发展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并把人体特异功能分为两类：其一为感知外界信息，如耳朵、腋下、手脚等人体多部位辨认字样和颜色，远距离遥感，思维传感，残留信息感知，遥听，肉眼直接看全息照片，物质屏蔽视物等；其二为影响改变外部世界——开花实验、特异功能写字、断裂或接合火柴盒内金属丝、意念移物等。在推动应用研究方面，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提出建立一支特异功能力量，培训一些“神童”、“超人”，开发人的潜能，这个潜能就是人体特异功能。他们认为，人体是一个巨系统，这个巨系统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态，特异功能也是其中之一，把特异功能状态和大脑的功能联系起来研究，找到不同意念影响下，特异功能者释放出来的微量的生物大分子，从而找到特异功能态的物质基础，这就是人体科学研究的目标。为了寻找这一机制，他们提出把人体特异功能和中医、气功结合起来研究，这一考虑，不仅是基于开发人体潜能的人体科学研究的需要，也还基于一些战略的考虑，在一篇题为“谈人体科学研究范围问题”的文章中，谈到为什么要有一个人体科学学会时有这么一段话：“为什么你不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的一部分，或者你不是什么生理学会的一部分，要讲清楚。另外，我也想了一下，过去可不是这样，过去所谓搞人体科学的那时候用了一个别名，什么叫搞人体科学的？搞人体科学的是搞人体特异功能的。因为特异功能，人家反对的很多，有的人要打棍子扣帽子，所以我就把它换了一个字，不叫特异功能，叫人体科学，委婉一点。”在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文章中，说得就更明白一些：“人体特异功能太不寻常了，恐怕能接受

的人是少数，更大范围的是气功，它能治病，人家容易接受。虽然人体特异功能一时还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气功可以。”“当然，更广泛的还有中医。我们所以研究一下，搞一个协会性质的组织，可以把气功与中医联合起来……有一个群众组织，它可以打前锋，侦察并发现新的人体特异功能。”更明确的说法是：“人体特异功能，国际上早就开始了广泛的研究，我们起步晚，试验设备也较落后，但是，我们又有巨大的优势。一个，我们有许多具有显著特异功能的气功师，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第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天才论述，这也是我们独有的。”这些论述，清楚而又明白地道出了特异功能向气功过渡的必然性。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神怪气功即所谓“外气”热，是继 70 年代末掀起的第二次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浪潮。虽然人体科学研究者打着研究气功与中医的幌子，实际上只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老酒，仍然继续在宣传人体特异功能的神奇与怪异。人体科学研究者认为，气功师发“外气”，就是练出来的特异功能。练气功功夫深的人，高级气功师，能透视人体，透视地下构筑，“发气”拒敌灭火、改变生物习性、遥视千里之外，意念移物、焊接、折断、接枝等等。这些项目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的 ESP 和 PK 毫无二致。为此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将特异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发特异功能，这主要是青少年；另一类就是气功师，是通过气功练就的特异功能，气功师不仅可以使自己发“外气”，进入一种气功功能态也就是特异功能态，而且可以诱发别人进入气功功能状态。于是，自 80 年代末开始的气功外气宣传热，就以涌现大量气功师及以气功作为特异功能的载体为特征。一个气功师教功，就可以诱导出成百上千地进入气功功能态（特异功能态）的人，许多练功的人，出现幻觉、幻听、幻视，都被视为处于“高功态”、“特异功能态”。这种人不仅具有前述的功能，而且还可以为人治病，可以遨游灵间世界，成为能与灵间对话的现代灵媒。在论证气功“外气”物质基础及与特异功能关系

时，有这样论述：“气功进入高级阶段，‘气’就不限于人体内部了，能从由意识指定的部位和穴位发功，发出一股‘外气’，这‘外气’是物质的，它还载有信息。这到了气功的高级阶段就非常发达，可以运用自如。不同气功师发出的‘气’，其量（即强度）和质（即性质）也会有所不同。这‘外气’可以用科学仪器去测量，随测量仪器性能之不同，而有不同效应，有的是紫外线，有的是微波，有的是一定能量的电子。因此我认为，测到的是‘气’的派生物，不是‘气’这个载体的本身。这个‘外气’还能作用于物体，物体可以是无生命的，也可以是活的。如另一个人，物体接受‘气’之后，也可以发回信息，这信息也有物质的载体。高级气功师在自己身体的部位或穴位能接受回授的信息，信息又传到大脑，大脑加以处理，最后形成感受。有人体特异功能的青少年在运用功能时也是这个过程。最后的感受大都在脑的视觉部位，有形象的感受。‘耳朵认字’、皮肤认字认图、透视，以及遥‘视’都可能是这个过程。高级气功师也同样能‘看’到另一位气功师发出的‘气’，即在脑中感受‘气’的形象和性质（颜色）。至于遥感，那也是相似的过程，只不过信息载体可能不同。”这一段话，给予我们一个清楚的概念，即自发的人体特异功能（特异功能态）与气功师激发的特异功能（气功功能态）的物质基础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练出来的。这就是说，那种起强身健体作用的气功，根本就不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之列，因此也就不在人体科学研究的范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明确地提出：“至于气功对锻炼身体，起保健和增强体力的作用，就不包括在人体特异功能里了。”由此可见，人体科学研究的气功，只是“外气”气功，即能激发特异功能的这一部分气功。所以气功、中医和特异功能的统一，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寻求特异功能机制的统一。

第二节 气功—人体潜能—第四医学

气功——开发人体潜能的钥匙

在实现了特异功能向气功的转化之后，人体科学研究者便在气功上大做文章。他们把气功升华为中医、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统一体的核心，认为气功是人体科学的一块“敲门砖”。气功既可以练出特异功能，又与中医理论相通，是中医中药理论的源泉。抓住气功，就抓住了人体科学研究的实践和理论。开发人体潜能，就是气功的实践应用。他们认为，人体有很多好的功能——人体潜能（人体科学研究者称之为第四医学的研究任务），还没有开发出来，就像是一把关闭的锁，气功就是打开这智慧潜能的钥匙，并以此推测，古代的高级气功师都具有特异功能，古代的医药名家很可能就是有成就的气功师。顺着这样的思路，气功研究者们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神怪气功，似乎气功可以上通神仙，下通人体，他们说，神仙是什么？神仙就是高级气功师；人体是什么？人体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可以有许多相对稳定的态，如醒觉功能态、睡眠功能态、危机功能态、警觉功能态、催眠功能态等等，还有特殊功能态，这就是气功功能态、特异功能态。而无论是神仙，还是人体的特殊功能态，都可以通过气功练就出来，气功可以提高人的智慧，可以调动人的先天潜能。人体科学研究者认为，人体潜力的开发，将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带来巨大的改革，中国将可以培养出22岁的博士和18岁的硕士，并且提出，中国要立国，就要在智力开发上领先，这就联系到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气功。而且还认为，特异功能人及气功师做的事情，一般人并不是不可以做，可以通过练气功诱发。所以，从前人们都说什么“神仙”，也不过是人们想像出来的。如果把人体科学的成果运用到培养人的方面，就能从人体特异功能中找出规律，把人的

潜力发掘出来，那就又高出一层，不仅是人皆可为圣贤，而是人人皆为“神仙”了。有的气功工作者声称，通过对中小学生对教授气功，可以提高课程的成绩，可以挖掘开发人的智力，甚至可以培育出“特异功能的超人”，并为此提出建立“气功科学技术”的设想。认为气功科学技术是最高的科学技术，对气功科学技术研究的突破就会带来一次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一位为大气功师严新作传的作家，把气功和特异功能简直吹上了天。他从自然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思维科学、艺术、宇宙学等多角度，论述了气功、特异功能给人类带来的美好前途。他写道：“气功、人体特异功能引起的及所蕴含的社会学问题太丰富了。如果人的潜能都被开发出来，人人具有思维传感能力，人人都有特异致动（搬运）能力，那么，人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思想秘密可言了，相互都能感知对方的心理。而且，现有的财产关系、法律，都失去了神圣的意义，因为人们都可以超越空间把东西搬运来搬运去，将是一个怎样的‘混乱’——相对旧秩序，又将引出怎样的新道德、新秩序、新法规呢？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存的一切，本质上都是抵制人体特异功能的；反之，人体特异功能本质上也将是破坏现存的一切的。”作者进一步论述了，用练气功开发气功态、特异功能态和特殊思维态的意义，“有了这些功能态，可以要什么就有什么，可以用思想来把握宇宙，如果思维想到了银河系，就可到达银河系，对银河系有了影响。”他甚至把中国神话故事的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穿墙过户、明察过去与未来；透视人体、未卜先知、遥测预知、搬运折断的所谓“视听八达之外”、“尽见五脏症结”、“视听不用耳目”及解锁法、缩身法等等一套东西，都看成是真实的。他说：“现在不能只是一般地承认过去那些神话有依据，而是需要整个重新认识那些神话。现在，我们人体科学研究者认为，把气功和特异功能训练用于教育和培养人才，将为21世纪培养出大量具有高度智慧和知识的人才，到那时，中国将立于世界智慧之林的巅峰，这是何等美好的前景！”

第三节 气功奇迹与特异功能

气功——这个架在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之间的桥梁，自 80 年代以来，以它独特的风采，风靡了中国大地。为了澄清中国文化瑰宝——气功的名誉，本节所说的气功是指人体科学宣传者所说的“外气”气功或者称之为伪气功（虚假气功）、神怪气功（带迷信色彩的骗人把戏）。这些被人体科学研究者和宣传者捧到人体科学宝座上的假气功、神怪气功，都以具有特异功能或者能完成特异功能者所能完成的一些项目为特征，所以本节在披露气功奇迹时，就不一一与特异功能相对照。下面就举若干实例来揭露假气功与神怪气功。

一、气功师发外气影响生物体与非生物体（特异功能中的PK）

据报道气功师发外气，可以使兔子的心跳越来越微弱，最后一阵紊乱，心脏停止跳动，兔子死了。气功师用手对准含苞待放的花蕾发放外气，花竟然一点点张开了，几秒钟就都怒放了。气功师放外气改变人的心跳速度、人的体温、人的血压，可以瞬时减肥，可以降低眼压，可以使手指变长变短。

以上几项，气功师意念发功致家兔死亡和使含苞怒放——虚假报道（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气功与骗术》）一书揭露。其余几项是暗示与小戏法（有三环出版社出版的《伪气功揭秘》揭露）。

二、遥控杀人（特异功能中的意念致伤、断物类）

气功师声称，利用讲演，可以发功，即气功师的演说词带有生物能的信息，这个信息可以诱导听众，使听众接功、接气、接信息，于是这些听众就表演出千姿百态的动作——哭的、笑的、舞的、闹的、癫狂的、打滚的、晕厥的，甚是热闹。一个所谓的气

功大师带功报告，就有成千上万的信仰者倾听。严新自称他讲演授功，一次就达3万人。后来这种带功报告又发展成不当场做，而是用遥控的方式，气功师声称能发射生物电（气功研究者声称这种生物电是频率为10~360MHz、功率为30~65dBm的高频率低强度的电磁波），以气功信息控制他人的言行。

遥控杀人，就是这类伎俩。在《当代巫师与魔女》的一本书中披露一位本来不信气功师这类把戏的女军人，曾当面指出某气功师的“远方断魂”（即遥控致命）为邪说。该气功师对女军人说，今晚9点，我对你遥控发功，你在家等着。到了晚上9点，女军人突然感到胸部闷胀，呼吸困难，顿时晕了过去，呼吸停止，心脏停跳，2分钟后才苏醒。事后女军人诚惶诚恐地连称“服了”。此后，这位气功师就更声名大振，他进而蛊惑说，这“断魂法”可治病救人，可以防护自己，也可以远方杀人。巫师的这一伎俩成功，就为他赢得千万观众，登上大师宝座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大气功师，就是这样“轰”起来的。其实这种遥控杀人的伎俩，实属雕虫小技。这女军人不过是极易受暗示，且心理承受外界压力较弱的女性罢了。如果这位气功师，真有所谓的“断魂术”，能发出如此强烈的电磁波，（何况气功师根本不可能发出如此强烈的电磁波，就是气功研究者自己提出的强度为30~65dBm的电磁波，也并未得到证实）远距离使人致伤致残，又何必相约时间呢！？女军人不信气功大师的妖术，大师尽可以发功报复，决不必用相约害人。

三、意念手术、意念拨表、意念弯钥匙、意念搬运、意念断接钢条

这种特异功能在国外的超心理学事例报道中屡见不鲜。无奈20世纪80年代末风靡中国大地的“外气”热，又搬出这些老套数，以气功师发“外气”开刀取出异物、拨表、弯钥匙的奇迹，蒙蔽成千上万的群众。

一位声称可以做意念手术的气功师，在病人患处蒙上一块白布，然后煞有介事的运气发功，操刀而下，只见刀过之后，鲜血直流，伤口历历在目，像是真正手术一样；然后气功师手入患体内，切下一块东西来，并指给在场的助手、参观者及病人看。然后告诉在场的人，这切下的一块东西就是病变组织，切掉之后，病就会好了，随后将这块切下的东西扔掉，并运气发功使伤口愈合，发功片刻，取下白布，病人开刀之处完好如初，一点痕迹都没有，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毫无痛苦。这一幕幕一景景，使在场者无不惊异，赞不绝口。其实这不过是一场江湖骗术（本来就是一个魔术表演，但气功师偏要声称为病人施以气功手术，已经术到病除了，其实病灶安然无恙，这不是骗人吗！）。原来，气功师的白布就是一个道具，气功师拿来白布时，已将一块猪的膀胱，内储有血液和一小块动物内脏，藏在白布里面，当把白布蒙在病人身上的时候，这些道具就全部到位，当气功师煞有介事的运完气向患者开刀时，割开的是猪的膀胱，流出来的是膀胱里储备的血，取出的是膀胱里藏的动物的一小块内脏。如此气功和特异功能，完全是江湖骗子的伎俩。揭露此骗术的北京中医学院气功教研室主任宋天彬教授，谈起这件事，气得手都颤抖，他说，这不仅败坏了气功的名声，这些气功师也丧尽天良，不但坑了人家的钱，还耽误了人家的病。至于气功师声言意念拨表、意念弯钥匙，更是骗人的戏法。意念弯钥匙、弯勺子，已经是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揭露的以色列特异人尤里·盖勒干的魔术勾当，声称是高级特异功能的功夫，表演的足迹踏遍欧美，但终于被魔术师兰迪揭露，原来不过是魔术表演，曾几何时这种已经过时的东西，又被中国的气功大师捡来贴上气功的标签又在表演了。意念拨表、意念“搬运”、意念断接钢条等也是这类把戏之一，归根结底，都是魔术——技巧加调包。

四、窥破人心术（特异功能中的思维传感——传心术）

气功师声称能窥测别人的内心世界，三环出版社出版的《伪气功揭秘》一书中披露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北京的气功师，邀几位朋友在家里，气功师表演思维传感和窥测人心。气功师在墙上挂上四幅画分别是黑猫、小白兔、黄狗、红狐狸，气功师手里拿着若干个装有上述四种图画之一的封闭的牛皮纸信封。气功师可以做到，你想的哪种图案，他就可以给你拿出装有那种图案的信封或者气功师让你想哪种图案，你一定就在想那种图案，气功师拆开封闭的信封，出示里面装的图案，与你想的图案相对照。在气功师家做客的几位客人，都做了试验，结果气功师都猜对了，这个结果，使参与者目瞪口呆，瞠目结舌，连连赞赏气功师好功夫，有特异功能，其实气功师既没有什么功夫，也没有特异功能，不过是江湖上技艺不高的魔术。气功师在玩弄这个把戏时，有两条程序是绝不能含糊的，一是先要问想画的人想的是哪一个图案，二是要由气功师自己拆信封。有了这两条，气功师的骗术，就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原来气功师拿来封闭的牛皮纸信封是有四个夹层，每一层放一个上述的很薄的画片，因为牛皮纸较厚，不仔细比较，是不会发现信封是异常的。当试验者告诉气功师想的是那种图案时，气功师马上用魔术的手法拆开试验者报的那种图案的这一层信封，自然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传心术跟气功与特异功能毫无关系，不过是借助于有四个夹层的牛皮纸信封的道具的小戏法而已。

五、练气功开“眼功”（特异功能中的天眼通）

气功师声称练气功练到一定程度，可以开眼功，开天目，开耳功，开嘴功，这些功能都是特异功能，有了这些功能，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能与灵间的人对话。在中国名噪一时的“气功大师”张香玉最突出的特异功能，就是

用宇宙语同灵间对话，并看到灵间的一些景象，而且描绘得声形并茂，栩栩如生。在一本专为张香玉作传的书——《大自然的魂魄》中，对于张大师这种功能的描述比比皆是。由于文字很累赘，这里就不再列举。这一套招术，实际上就是风行 19 世纪欧美大陆的招魂术，所谓的开眼功、开耳功、开嘴功、开天目，无非是 19 世纪宣称的那种能与死者对话的敏感人灵媒。到了 20 世纪，中国的灵媒，已经不是自发的特异功能者，而是通过练气功练出来的灵媒。这样的灵媒同自发灵媒的区别就在于通过功法练习获得。遗憾的是那些号称的气功大师，把一些神狐鬼怪、江湖把戏的骗人勾当，都一股脑的加在了气功的头上，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事实上张香玉的开眼功、开耳功、开嘴功、开天目，除了由于练功不得当而造成的幻听、幻视、幻觉之外，剩下的就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了。这一点在张香玉因欺骗入狱后，已经自我披露了。

六、预测未来与洞察过去（特异功能的预知与先知）

气功师声言他们练功可以练出预知和先知的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鼓吹者称这种能力是超越时空的能力，高级气功师可以进入四维、五维空间，在这个四维、五维空间里，他们的视觉、行动都不受任何阻碍。一旦有了超越时空的感觉、思想和自信，那么时间、空间、间隔、障碍是无所谓的，是虚无的，此时，再去理解穿墙过户、遥测预知等特异功能，就是很自然的了，就可以达到真理的彼岸，大气功师就可以成仙、成佛。这种描绘的确令人神往。不过大气功师们的预言，究竟是一些什么超越时空，超越自我的真理彼岸，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预知了些什么！占梦术——梦中或其他状态中预感到的灾难、危险，从而免除；预测一副扑克牌将会洗成什么样的排列；一辆汽车行驶 20 分钟后将会在什么位置出现；一盘棋将怎样走法；一个人的命运如何等等。这些掺和着巧合和分析的事实和思维方式，都成了气功大师的预测

功能，实在也是降低了这些气功大师的声望。最可笑的是张宏堡大师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头上的胎记，说是欧洲地图；周围的点是苏联直接插手的邻国，色重的是正在打仗的国家和即将发生大动荡的国家，然后就开始预测欧洲的局势；说到罗马尼亚时，预言了齐奥塞斯库寿数已尽。这类预知真是叫人啼笑皆非。不知是后知，是附会，还是故弄玄虚。这类预知，并不需要什么先天的才能，后天的锻炼，只要朝着一个奇怪的形状和特殊的现象胡说八道一阵，其中再掺杂一些模糊的，怎么解释都可以的语言，这类预知就大半成功。至于那些预言谁可以当领袖，谁要下台，谁面临危难，如果不是正常人知识的一部分，那就是古老占星术。此种预知同气功和特异功能也毫无共同之处。

七、呼风唤雨（气功师称之为练就出来的特异功能）

这里最大言不惭的，要算是流传国内外的大兴安岭灭火的故事。说它是故事，确实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且看一看气功师的吹鼓手们是怎样描述这场神功降雨的故事吧！中国大兴安岭火灾，震动中外，规模之大、火势之猛，中外罕见，中国出动了军队、警察、消防队及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从空中到陆地，全力以赴地进行灭火战争。然而，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大火越烧越旺，眼看着成百万亩的森林化为灰烬。人类在围歼火灾；火灾在毁灭人类。人类动用了一切技术手段，包括飞机人工降雨。

这时，有关方面请著名气功大师严新，利用其神功，呼风唤雨，配合灭火。为了证实大气功师灭火的真实性，严新提出：①气功降雨的时间由组织单位确定。②试验要在火灾区天气晴朗、绝无云迹雨情的情况下进行。③试验降雨的空间要十分具体。④降雨与发功时间紧密相接。

于是，大气功师严新在北京发功，2000公里以外灭大兴安岭火灾。

大兴安岭火灾地区东线。这里大面积的山火虽经多方围歼、扑

打，仍然是此灭彼燃，随风蔓延。配合气功降雨试验的是沈阳部队某部。师长拿着一部军用电话，直接与北京通话。

你们那儿现在天气如何？北京方面问。

师长仰面瞭望，晴空万里，没有一丝云彩。

.....

严新正与众人围坐着谈话。他平静地说：告诉火灾现场，20分钟后下雨。

电话立刻告诉大兴安岭火灾现场：注意观察，20分钟以后将在你们那儿气功降雨。

.....

严新继续与满屋人轻松、随便、平常地聊着，讲着与气功有关或无关的话。人们都知道，他发功是用意念，无需摆什么姿势，就这样说着话，功就过去了。

.....

10分钟过去了，东北火灾现场激动地大声报告我方上空出现阴云，极为异常！北京的指挥部内一下都兴奋了。惟有严新还是镇定地、平平地和地聊着天。

.....

再有10分钟就要下雨了。请注意观察。北京方面指示。

时间到了，凉风来了，雨下开了。很快就成了哗哗的大雨。师长，火灾现场指挥部的其他成员，救火大军，成千上万面目黑灰、衣衫焦烂的军人、百姓，在大雨的浇泻下，浑身湿漉漉地高举双手欢呼！

雨整整下了48分钟。

雨停了。这一地区的火情基本控制住了。大部分林火已熄灭，部分地区还有残火、余烟，稍加扑打、处理也就根除了。

看了这个故事，真为之感动。但是在感动之余，不免总觉得，这近乎神话的故事，如果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话资料，也许还饶有兴趣，可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事实，确无法让人接受。且不说严新

大师如此悠然的谈笑，怎么发出那么大的能量？也不谈严新大师发出那么大能量，怎么调动 2000 公里以外晴空致雨的。就说这位作家，怎么就会如此轻信这美妙的传说是事实，而把它搬到文学作品里，栩栩如生地描写一番，这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就连严新大师自己都说，此次灭火不成功是有种种原因的。这里我们不想替严新大师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完成灭火的使命，但倒想说两句劝慰轻信者的话：绝不要被蛊惑人心的宣传所蒙蔽。

八、手上发烟术（特异功能的高功夫）

气功师说，气功修炼到一定程度，达到了高层次，能量达到一定数量级，发出的气就不同一般气功师了，不必开天目就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能看到，不仅看到气状，还可以看见火光。一位气功师在台上拉开发功的架势，然后让大家看他的手指。台下有人喊是红光！是黄光！还有说像水气一样，白蒙蒙一片！此戏法对一位从事气功科研教学多年的教授，一直是个谜，但他孜孜以求，非要弄懂这个秘密不可，经过他多次观察和研究，终于找到了这个“门子”，原来不过是手指指甲涂抹的白磷。白磷燃点很低，一经手掌摩擦，就可燃烧发烟，且不会烧伤手指。这就是气功大师发烟术的窍门。还有气功大师张宝胜发功能将衣服点燃，也是这类伎俩。

写到此，笔者不得不搁笔。这类奇迹，实在举不胜举。近年来，在中国书摊市场上，此类书比比皆是，什么《大气功师出山》、《大气功师》、《大自然的魂魄》、《中国超人》等等，每一部著作，都要介绍几十种奇迹，如此加起来，不是就有几百种奇迹吗！此处列举的七八样，不过是些典型。

第四节 中国当代气功四大天王

——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张宝胜

中国气功历史悠久，数千年，功法、流派甚多，但素来以开金裂玉、刺喉吞枪、擒拿格斗等“硬功”和强身健体、为人治病的“软功”为本。不料，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一种特异功能所取代，而且与特异功能结合起来，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展宏图。不但长期隐匿或自练自健的各家门派功法大张旗鼓地问世，什么“祖传”、“正宗”、“传人”、“掌门人”、“创始人”纷纷登场，而且一级气功师、高级气功师、气功大师、国家级气功师、超级气功师、也纷纷扬扬上阵，再加上千百万的痴迷者，一个“气功王国”的大潮在80年代后期，以极其凶猛之势涌来。据一位气功研究专家称，中国气功功法每年约以300种的速度增加着。人们估计，目前中国的功法大约有上万种。在这林林总总数以万计的异能气功中，名气最大的是号称四大天王的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和张宝胜。他们的气功生涯广为流传，蜚声中外；他们的气功足迹踏遍中国的南北东西，飞越国界；他们的异能气功堪称中国之“最”；他们可经常出入要员大门；他们有组织系统、医疗系统、出版宣传系统，为他们作传的书，每人一本，依本文列名之序，即《大气功师》、《大气功师出山》、《大自然的魂魄》、《超人张宝胜》（其余以宣传四大天王神功的报道、报告文学和专刊、专文还不算其内），一发行就是成百万册一版再版；对他们感兴趣的人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有人统计以“亿”计。这四大天王，既是大师，也是大亨，腰缠数百万贯，可谓文明古国气功文化中“轰动效应”之一大特色。下面就以本文列名之序一一简介四大天王之“神功”及其“漏气”小传。

严新，男，四川人，1977年成都中医学院毕业，职业：中医。严新一开始在四川绵阳的中医学校任教，就经常开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药方，如凉水治病，面条治病，香油治病，酒配菜籽油

治病等。1982年严新调入重庆中医研究所门诊部正式从医。从医没二年，便以搞封建迷信被取消处方权。严医生从此浪迹天涯，沦为江湖郎中。但奇怪的是，在严医生的江湖郎中的生涯中，他的名气却越来越大，舆论越来越响，没几年功夫，就由一个江湖郎中的地位升为大气功师，高级气功师，特异功能气功师。严新的拿手功夫是遥控治病。据《气功报》报道，严新遥控诊治病千余次，诊断正确率达95%，治疗显著者达65.8%，即刻见效的达42%。严新遥治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 (1) 气功、中医结合治疗法；
- (2) 用气功预先诊断疾病的发生，通过喝自来水治疗疾病；
- (3) 用气功、通信诊断治疗疾患；
- (4) 用通电话诊治疾病；
- (5) 用与患者谈话诊治疾病。

1984年7月，《重庆工人报》开始对严新的神奇功力进行宣传，写了《神医·神话·现实》的长篇报道，从此，严新的声望日趋升高。于是“肿瘤顷刻消失”、“粉碎性骨折瞬间除病根”、“国防科工委请严新大师给两弹元勋治癌症”、“严大师使高烧病人化险为夷”、“严大师呼风唤雨”、“严大师2000公里外改变水分子结构”、“严大师2000公里外灭大兴安岭火灾”等宣传和报道不脛而走。严大师为此声名大震，1986年严大师被招入北京，一展奇异功能和独特医术的风采，只短短几个月，从中央机关，部队营房到平民百姓，求医问病者络绎不绝。此时的严大师已声名显赫，全国慕名而来的患者，栖身于北京，等待着严大师的诊治。严大师也果真不负重望，把他在四川时就发明了的奇特医疗方法——带功报告搬进北京，一展严大师的遥控治病的奇功。这一招也果真吸引人，场场报告，座无虚席。为了给严新大师神奇气功的头上再加上几层光环，1986年11月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张震寰率气功科学研究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严新大师陪同，回来后“东京斗法记”的传闻飞满北京城。严新大师在日本斗败了日本老

资格的气功大师古岗顺，用气功使酒力升度，醉倒了大酒豪古岗顺，并使饮料、茶水，甚至白开水，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并且当场治好了日本大气功师古岗顺的陈旧性肘关节韧带损伤病。此系严新大师头上的第一个光环。第二个光环，就是严新奇异气功的科学桂冠。1986年12月至1987年1月，严新同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所作的严新气功改变自来水分子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以清华大学气功协作组的名义发表之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仅严新大师的声望不断升腾，什么特异大师，高级大师，一代宗师接踵而来，连参与这个实验的清华大学教师和科学院高能所的科研人员也都跟着大出其名。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实验报告发表不久，清华大学科研处及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纷纷指责这个实验的不科学性。严新大师头上的这个科学的光环，不但黯然失色，而且这种所谓的科学实验，也为科学界所不齿。这是严新大师在国内的第一次出了名的败北。

严新大师的第二次败北，是为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癌症。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奠基人，由于长期的劳碌，邓稼先身患直肠癌，至1985年才查出住院进行手术，到1986年又复发，并发展成直肠癌晚期，邓稼先的生命处在垂危中，在这危难之时。有人建议请曾给邓稼先退高烧的严新大师。此时的严新已非一般大师，已成神医，从宣传报道上，已有数百例治疗疑难杂症的赫赫医功，且治肿瘤，可做到功到瘤消的地步。严新大师接到此邀请后，于1986年6月27日进驻301医院，为邓稼先治病，至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一个多月的时间，严新大师使尽一切法术，终于没有救活一个杰出科学家的生命。一个号称能使癌症晚期病人起死回生的一代宗师，也终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奇能出来，事实是如此严酷地揭示了这虚伪的宣传，在生与死的边界上，气功大师无济于事。事后在严新大师的说明中，把没有治好邓稼先的责任归结为：①301医院没有给严新大师正式发邀请，这对大师的情绪有很大影响，干扰了功能的发挥；②在治疗过程中，

受到来自各方的有形无形的干扰，使大师功能减弱；③两个积极性没有很好的发挥，即特异功能人的积极性，病人的积极性。在给邓稼先治病过程中，严新大师曾让邓稼先吃一个猪胰子作药引，邓表示为难，严大师不满地说：不是我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是我的功发到这一步。我开方子是功能指挥着我，身不由己开出来的。

严新大师的第三次败北，就是 2000 公里之外灭大兴安岭火灾。这一情况在本章第三节已披露，在此不重述。

严新大师，在中国大地上，喧闹一时，他的“光辉业绩”也因不断败北和漏气而遭到指责。现在他到美国去了，善良的美国人民会怎样看待他呢？是继续与这位大师同乘“诺亚方舟”，让崇拜的欲望继续升华，去做甘愿上当的傻瓜，还是在“人”与“神”的交汇点上，停步伫立，想一想，看一看，是神迹所现，还是人力所及。希望美国人切莫轻信，切莫上当！

张宏堡，男，哈尔滨人，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职业：气功师。说也奇怪，这位被誉为高才生的张宏堡，经过四年跌跌撞撞的大学生活，在累计旷课 90 余天，连毕业证书也不领的“帅才”（张宏堡的老师这样称他），却一头扎进创建“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圈子里——天生气功大师的坯子。请看，在一本为张宏堡作传的《大气功师出山》中的一段神奇描述：“宇宙射出一道长虹，金麒麟光芒万丈，一代宗师呼风唤雨，带着三界人造福的使命从高天降于人世，无边旷野顿时升起一派辉煌。”

人们惊喜，神仙下凡了！

众生雀跃，大气功师出山了！

也许太突然了，突然得令人瞠目结舌，风云一年间，中华养生益智功以其磅礴之势，气盖京城，风靡华夏，波及四海，普渡众生。

中国和世界震惊中，响起了不可思议的东方汉字：张宏堡。

.....

这就是张宏堡。冥冥中，他坐地成神，把有历史文字和口碑相传以来的各类功能和神通神变，包括佛、道、儒、医、武、俗和印度的瑜伽，西方的基督教及民间的法术，全部汇集到自己手心，游刃有余地整理、编排、归纳出功能的十大神通和十大神变，吸收其他文化精华，采用集成电路块的方法，独创成为使众人也能进入这个领地的博大精深的中功体系。

这一段话说得多么明白：张宏堡是高天而降，旷野而升的具有十大神通和十大神变的坐地神。他集世界有文字以来和口碑相传的一切功能和通神集于一身。在四大天王中，严新走了，张香玉抓起来了，张宝胜保护起来了，只有这一尊神还在肆虐着千百万的群众。《大气功师出山》的作者称张宏堡有600万徒弟，他的信仰者以“亿”计，恐不为过。至于加在张宏堡头上的桂冠，就更令人目眩了。什么“天才”、“帅才”、“国际气功大师”、“奇异气功师”、“一代宗师”、“神仙”、“奇人”、“气功实业家”、“气功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天才的演说家”……这类吹捧，并不能为张宏堡赢得更高的荣誉。正相反，恰恰说明了张宏堡在制造“神化气功”，“宗教气功”，他利用“宣传效应”、“轰动效应”、“信仰效应”等心理因素，把自己推上邪教首领的宝座，巫婆、神汉的顶峰。

张宏堡出山，就有着明确的目的：造一个中国的“气功之神”、“气功党”的领袖，新时代的气功实业家。张宏堡这样想了，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

说张宏堡跌跌撞撞地念了四年大学，是因为张宏堡压根儿就没有把心思用在完成送他上大学的黑龙江省黑河金矿局要求他完成的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业上。“这个学生经常旷课，谁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待回校后系里查询时，他总有一个很说得过去的遁辞。上课时看上去挺老实，可是一提问，不是答不出、就是回答得风马牛不相及。教师们都反映他的注意力不在课本上，整天不知瞎

琢磨什么。”这一段话，是张宏堡的老师讲的。在大学期间，张宏堡就开始实施他的“中功”战略了。按张宏堡的追求和设想。他要独辟“气功”蹊径，就不能步先人、前人的足迹，必另有高招。张宏堡果真也不白读大学，在同知识分子的交道中，深知知识分子的苦衷，视时如金，无暇养生。他思忖：如果能够创建一套适合知识分子习练的气功，岂不可以独占“气功”鳌头！于是他试着先用他过去有的一点雕虫小技，给同学、给老师表演和治病。这一着倒也奏效，张宏堡从此开始大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整天琢磨，先编制出一套“中华养生益智功”，在学校正式办班传授功法。他开始表演的是轻功和缩骨法，让人把自己用绳子捆住，然后用“功”将绳子解脱（其实这不过是江湖把戏），看者目瞪口呆，于是就有人要拜师学艺。开始时有七八十人，拜的人多了，他就向校方要求成立气功研究会——就这样，一个新的气功大潮孕育成熟了。张宏堡从学校毕业之后，哪还有心思去搞什么管理。他的梦想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张宏堡成了北京钢铁学院气功研究会的理事长，从此开始了他气功师的职业。按照他的战略，他首先占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的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在一年多的功夫里就由北京钢铁学院推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17 所院校，中关村中国科学院 11 个研究所，然后又打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西北郊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顿时掀起了一股“中功热”。一时间张宏堡的“中功”沸沸扬扬，培训班一期接一期。张宏堡为了摆脱旧中国气功的山野之气和下九流的地位，他大面积地向知识分子普及功法，让气功堂堂皇皇地进入科学殿堂。他说：“为了让气功进入知识分子的生活，同时引渡知识分子进入气功天地，使知识分子能够接受，在功法的编排上要力求高速快速，符合现代生活节奏。知识分子惜时如金，不可能按古代气功锻炼的要求去‘百日筑基’、‘十月怀胎’、‘三年哺乳’的办法。”他只要求在 15~18 小时内，让学者学会采气、发气、自然换气、排病气；学会小周天速成法；学

会手感探病的特异功能和看光的特异功能；学会用气功和特异功能治病的配套手法——麒麟显圣六法；学会一步功的九妙法门；学会开周天的秘法等等（这就是张宏堡所谓的十大神通十大神变），张宏堡就是用这样的“风暴法”迅速地占领了知识分子阵地，《中国文化报》1987年11月18日报道：“较之前几年陆续出现的‘大雁功’、‘鹤翔庄’等气功热潮，今年下半年在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科研机关出现的‘中华养生益智功’学习热潮，以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争相参与而格外引人注目，”《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以“未名湖畔气功热，燕园师生受益多”的题目，对“中功”做了报道。某家刊物还以“气功搅动了科学城”为题，发表了长篇通讯。看来张宏堡的“中功”战略第一步是实现了。第二步就是打向新闻界。张宏堡认为上面所述的那点恭维的报道，还远不是他的目的。他要抓住整个新闻舆论界。他首先抓住了新闻界影响最大的《人民日报》，结果大获成功，接着他又举办了首都文化界“中功”速成班和广播电视部的“中功”速成班。这一下，可把首都的新闻界轰动了。《人民日报》在连续八年回避气功和特异功能这个敏感问题之后，率先于1988年1月8日发表了“首都新闻界、文化界举办‘中华养生益智功’速成班”的消息，接着几十家报刊、电台、电视台争先恐后对张宏堡和他的气功进行报道，国外和港台的记者也纷纷前来采访，邀请张宏堡开班讲课的单位纷至沓来。这个“轰动效应”完成了张宏堡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张宏堡的第三步战略部署是公、检、法。张宏堡说，公、检、法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打入到这里面，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事业，无疑是一个推动。他不仅为他们办培训班，还免费用气功为广大公安、司法、检察人员调整身体，检查病患，为张宏堡打入高层社会开辟了坦途。

张宏堡就这样一步步出名了，一步步神化了，不仅人神化了，他的功法也神化了。不仅他的“念力”治病的各种奇效有人信，据称可治109种病；他的呼风唤雨、气托飞机有人信；他的搬运、预知、判知、千里诊病有人信；他的为人减肥、使人退烧、让手指

变长变短有人信；他的手指冒烟、气功接电、手烤羊肉串有人信；他的“念力”致家禽死亡有人信；他可以只在几分钟的时间里诱发弟子多种特异功能有人信；他的汽车开到哪，哪里的红灯就变绿灯有人信……就连“隐身术”，“头上的光环”都被认为是大师修炼之果。一张头顶彩色光环端坐终成正果的照片，是张宏堡亲授弟子泡制出来，为他的神化气功张目的。张宏堡盘坐在一个水泥莲花上，身着黑色学生服，右手三指朝上，双目微闭，头上是白、红、黄、紫杂糅的颜色光环、此光环直径略宽于肩。这个运用基尔里安技术加工制作出来的照片，被选用来作为张宏堡大传《大气功师出山》的封面，不知多少人为之倾倒，为之迷惑，以致后来拜张宏堡为师的人，要交 200 元钱；买一张带有气功信息的张宏堡的照片，要 20 元钱。张宏堡就是用这样诈骗来的钱，办了国际气功服务有限公司、国际气功大学。他的确有名，蜚声中外，但中国不都是愚盲之众。就是在张宏堡不断升华的神化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正直的科学家，在不断揭露张宏堡的作假作伪，江湖把式、魔术表演、骗人骗钱、亵渎妇女、专横霸道，全然没有一点气功师“功德”。一位懂得气功“门子”的气功师写了一本《伪气功揭秘》，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张宏堡的骗术。一位科学家气愤地说：“我是解放前大学毕业的，今年已经 64 岁了，解放前夕‘一贯道’盛行。不过，就是那时候，‘一贯道’也是隐蔽的。可是现在，一些人借助气功、特异功能的形式公开宣传迷信，宣传愚昧，并把这些旧社会的渣子、破烂贴上新标签，已经搞得乌烟瘴气，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张香玉，女，北京人，初中文化程度，职业：话剧演员。自然中心功创始人。什么是自然中心功？自然中心功是张香玉借助神灵编造出来的。张香玉在练功中，听到从冥冥之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告诉张香玉，她练的功叫“自然中心功”，并说很早以前就失传了，张的使命就是大面积传授此功法，拯救人类。并且说：“此功将走向世界，只有此功才能拯救人类，没有此功者，

就免不了灾难重重。”“要尽快在中国传播此功，走向世界，绝不能保守。2000年就要到来……21世纪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怎么办？只有尽快地传播此功，很快走向高级功法……勇敢地带着人们走向大自然，这是最好的拯救方法。不然就面临自灭，面临死亡……此话不是开玩笑，以后的历史将会给你们作证的。”多么吓人的情景。张香玉的自然中心功一问世就带着浓重的神秘色彩。为了让人们相信自然中心功的神力，张香玉编造出了“宇宙语”，运用了“信息传导”、“残留信息”的现代语言。张香玉的自然中心功的特点，是让你练的开天目、开眼功、开耳功、开嘴功，诱发出具有多种功能和才华的特异功能的人才。开了天目和眼功，可以看见玉皇大帝、观世音、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佛祖、观音、仙女、释迦牟尼、老寿星、还可能看见什么鬼啦、神啦、骷髅啦、狐狸精、蛇精等等；开耳功能听见冥冥之中，长辈先师的指点，点化人生，点化治病，点化吉凶；开嘴功，就更不得了啦，你脑子想什么，就非要说出来不可。你说出来的话，自己不懂，但信息懂。这信息就能让人逢凶化吉，除病强身，惩治邪恶。在一本为巫师张香玉作传的《大自然的魂魄》（李培才著）一书中，作者把张香玉描写成可以与幽灵、先师、长老共饮共餐；能看见隐形人、隐形物；把人看成一个骷髅，把衣服看小看没；能看见地球那边，能听到冥冥之中传来的古代音乐，她一抬手，大铁门“吱悠”一声就打开了；她手一进洗手盆，手指周围就冒蓝光；她一看小人书、连环画里面的人物，尤其是神话故事里的人，就全变活了。她有透视眼——能看见堵在气管里的异物，能隔着墙看人看物……总之张香玉是至高无上的天神，是全智全能的神仙，是具有超人功能的大气功师。张香玉的所谓发功治病有四招：第一招：驱妖逐邪——这是中国巫婆、神汉玩弄了上千年的把戏；巫婆四肢、面部、形体做出各种令人作呕的动作——以表示除妖降魔。如果求治的患者果真好了，那自然是“神仙”显灵了，如果治不好，就是患者身上有附体的精灵，残留信息致使患者的病无

法治愈。第二招实施“咒语”——这是古老巫术沉渣。张香玉用这一招术可以对不信她功法的和不听他话的弟子施以惩罚。第三招是对病患者施以“自然物质”。张香玉说：“大自然是一个天然的物质宝库。有天然血质、天然细胞、天然骨质等等，人身体上存在的一切都是天然的，都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取。我们治病时，需要什么，大自然就给你什么。”张香玉用这样办法为患者补血、补肾、补自然神经、补天然脑细胞。第四招是意念手术，张香玉说，做手术需要手术刀，针灸需要银针，有特异功能的人，功带着你伸手就可以拿到这些，扔到患者病区，就可以做手术，针灸。在《大自然的魂魄》一书中，记录着这样一个实例：“有一次来了一个患者，是个小伙子，他被一辆卡车上拉的钢筋把肚子穿了一个洞，肾和肠子都穿了一个窟窿眼。因流血过多，张大师马上用气把血往身上集中。在补血的同时，用气针缝补伤口，肠子也是用气针一针一针地接起来，一边缝一边止血。止住血之后，又给他发气消炎补气。”在叙述一个用发气化胆囊结石的病例时写道：“我们需要的时候，把手朝空中伸出，摆出一种伸手要东西的姿势，需要气针，只见气针就银光闪闪，轻飘飘地来了。用完了，再向空中一抛，气针就轻飘飘地飞走了。”张香玉就是用这一套古老唯灵论的东西冒充气功，行骗在中国的大江南北，她的足迹遍及青海、广东、海南、江苏、河北、河南、内蒙古、黑龙江、北京等地。她的自然中心功的最拿手的好戏是授功。仅在二三年内，授功人数达10万人以上。张香玉的授功可谓名利双收。授功10万亲传弟子，自然是名扬四海了，再加上她的妖言胡说：呼风唤雨——她能把导弹顶回去，可以发气灭火，可以把美国绝密文件弄来，再神不知鬼不觉的退回去，可以退洪水，可以用“信息”催雪、催雨，可以阻止地震等等，使她获取了“神”的称号和四大天王之一的“荣誉”。她得的“利”更令同行刮目相看。1990年3月18日至31日，授功27场次，就赚取人民币41万元，1989年4月，在河北赵县授功三天，就收取6万元，1988年在西宁授功

一周,就得人民币8万元……如此大把大把攫取人民的血汗钱,终于激起广大正义人民的义愤。1990年4月张香玉终因骗钱和宣传封建迷信而被捕了。一个造神运动暂时消退了。

当人们从神龛摘掉这颗“明珠”时,一切神秘淡漠了。但有两桩血淋淋的事实,却依然在人们的脑际中回荡。那就是1989年10月,正当张香玉的气功热登峰造极的时候。一位部队的政工干部,在练张香玉自然中心功,练到第87天的时候,一个悲剧发生了。“自然中心功”,由于带有极其神秘的色彩,许多人练得癫狂、练得执著、练得如痴如醉,总觉“高功”还未到来,还不能见到玉皇大帝,还不能听到“信息”指导。为此一些人练得走火入魔,精神失常。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为了诊治此种精神疾病,专门开设了一个门诊部,二年多来,收治练自然中心功患精神病的病人100多例。这位部队的政工干部,正是走“火”走得太远了。在他练功练到81天时,就感觉到,有一种支配他的力量,驱使他写、动,“信息”告诉他,要回老家去过平静的生活。第85天,他突然说,单位里有一条反动标语案被侦破了,“信息”告诉他谁做的案,并从外面捡回一片生铁片,说这是根据“信息”找到的作案工具。后来他又去单位招待所给人治病,说“信息”让治的……人们以为他不舒服,可他一会儿又恢复正常了。第86天平静地过去了。但是就在第87天黎明前,他却走上了铁路,横躺在铁轨上,面对从锦州开往北京的列车,让列车轧过自己的身体,切成四段,鲜血淌洒了几十米……

另一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实例,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女干部,手臂、腿脚麻木已经10余年了,一些大医院都未能明确诊断她是什么病,一直按“周围神经炎”治。1988年4月,这位干部开始请张香玉治病,先后治疗7次。每次治病,张香玉都是用连唱带舞的方法,为她“发功”治病。治完病,病人还要坚持练张香玉的自然中心功。1988年6月12日上午,张香玉又如往常一样,为这位女干部“发功”治病,比划10分钟就算“治”完了。由于久治

无效，病人的丈夫就问张香玉，什么时候能治好？张说，我已经用了最大的功法，今明两天她会大发功的，发功时，不要管她。第二天（6月13日）晚上，这位干部依旧在练自然中心功，练着练着，突然倒下了，人躺在地上久久不动。丈夫按照“张大师”的指示，没有管她，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丈夫急了，立刻给张香玉拨通了电话。张香玉说：“我在电话里念咒语，15分钟后她就会醒”，丈夫按照张大师的吩咐，还是没有管她。15分钟又过去了，病人还是一动不动。此时，丈夫还是没有及时把病人送往医院，而是用车把“张大师”接来。张香玉到了现场，仍然用巫婆那一套手法，连唱带比划，结果无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病人还没有送医院，还继续让张香玉“发功”治疗，仍然无效。这时丈夫才将病人送往附近的海军总院急诊室。医生检查后说：“人已经死了那么久了，怎么才送来？”这位女干部的死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张宝胜，男，南京人，初中文化，职业：铅矿工人。这可是块“国宝”，可称四大天王之首。他的声望，他的待遇，他的“国粹”花样，也都居四大天王之冠。张宝胜被称之为是天生的特异功能人。1982年5月他由本溪借调到北京，被新闻媒介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大肆宣传，于是张宝胜的名字在京城飞扬了，找他透视的，看病的，找失窃之物的，疏通管道的，预测生男生女的，作晚会表演的，纷纷扬扬。这类的表演多了，人体特异功能宣传者认为他的特异功能最强。他的表演足迹从政府机关到高等院校，从知名演员到知名歌星；从海外侨胞到国外华裔。一个“超人”的传说，在北京不胫而走。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的“外气”热掀起了，张宝胜自然不会逊色，又迅速登上了新特异功能热的高峰。他因为已经有了一段“超人”的历史，自然在气功特异功能热中大显“身手”，他又一次出山了。他虽不像上述三位“大师”那么出风头，搞带功报告，办培训班，开门诊部，但他的声望和影响，可远非那三位“大师”能比。他不仅头上有“神

人”、“神仙”、“外星人”、“天外来客”、“转世活佛”、“中国圣人”、“国宝级气功师”、“活佛菩萨”之类的胜过一切气功大师的美誉，而且其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也非任何奇人所能比拟。

张宝胜特异功能的拿手好戏是“发气”治病，“意念”移物。他有极强的“透视”功能：在他眼里，人们都是“裸体人”。他第一眼可以看穿衣服，第二眼可以看穿皮肉，第三眼可以看穿五脏六腑。他被誉为“国宝级大师”，是因为他的表演花样翻新，手疾眼快，神秘莫测，令人眼花缭乱。他可以“发气”使人疼得喊叫起来，可以使肿瘤病人“气”到病除；他能“意念”取“脓”、接骨排病气；他可以透视人体七经八脉，区别出人体经络的变化与颜色；他能透视走私毒品，能知道沉落江底仪器的位置；他能从封闭的药瓶中抖出药片；他能意念弯刀叉、汤匙；他能使嚼烂的名片再行复原；他能穿墙破壁，隐身出入；他能使赌具按照他的意图出现；他能将别人的钱调入自己的腰包；他能用“意念”烧毁别人的衣服；他能“发气”修复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总之，他无所不能。然而，戏法，终于还有漏“馅”的时候，气功大师也经常会上当。张宝胜的名气大了，蜚声中外，不免经常要遇上不信邪，要看个究竟的人。张宝胜遇上了这种人，总是用两种方法：一是偷梁换柱。你如果要他表演某一种神功、神力，他就会用一套熟练的小戏法引开你的注意力，告诉你：我的功力如此之神，你要求表演的东西还在话下吗；二是采取恐吓，给你点颜色看看，并扬言，可以当众脱掉你的裤子或用小戏法把你的手表弄坏，弄丢，把你的衣服烧了。如此来吓唬你，使你不能再怀疑什么。久而久之，这一套伎俩，也被人看穿，揭露的报道传播海内外，“圣人”的画皮剥开了。

1991年10月12日台湾《联合晚报》，大世界专栏，以“国宝出洋相”的题名拆穿了特异功能奇人张宝胜的西洋镜。报道说：“最近，香港影视界人士到北京参加为华东赈灾的筹款活动，张宝胜应邀在饭店内表演特异功能，结果，其‘演出’引起香港影视

界人士广泛非议。”

由于张宝胜的表演从头到尾，都是在遮遮掩掩中进行，练气功的黎汉持说：“张宝胜的表演手脚笨拙。张坚庭则指出：“张宝胜的表演不是异能，而是魔术，而且是手法很拙劣的魔术。”许冠文更不客气地说：“张宝胜的表演，我不相信有异能，其实也是小魔术，这样一个九流魔术师在我们面前弄几下手脚，都被称为‘国宝’，竟然由国家保护、供养。”

美籍华人袁志道，是台、美商界知名人士。1990年其来大陆观光之际，要求与“久负盛名”的奇人张宝胜相见。袁氏与张宝胜两次会面。袁氏闻及张宝胜能“意念移物”、“触摸燃物”、“电人”、“空瓶变水”、“吸脓”、“药丸离瓶”，最精彩的是能把烟灰缸变到人的肚子里。袁氏商人对这些“异能”表示不信。特邀台湾商界名人尹书田先生，同去观看。袁并立下“自愿书”，表示愿意“以身试法”，只要张宝胜能将烟灰缸变入他体内，他除自行赴医院取出外，还愿捐出美金10万元。双方约定好，于1990年7月28日在钓鱼台宾馆，当众表演吃烟灰缸神功，结果“国宝”大出洋相。随即袁氏商人将此次神功表演披露外界。台湾《中国时报》以“大陆奇人张宝胜玩的是何种神功”揭露了这一次把戏。下面摘录几段以飨读者。

7月28日，袁一行人与张约于北京市钓鱼台宾馆午宴，席间，张宝胜不断地跑进跑出，先是拿出未开封的药瓶，单手在瓶底一晃，药粒掉入手中，药瓶却是封闭如初，当时，客人一阵哗然。张又用手指对每位客人施发“电功”，“电”得每个人对他崇拜，信服不已。之后，张将餐桌上的两把汤匙合并，双手一搓，两支汤匙卷成麻花状，立刻将汤匙丢在桌上，一旁认真观看的袁，此时立即拿起汤匙，却发现汤匙温度无异。于是，怀疑张乃利用“调包”的方式，并非施发神功。

待用完餐后，袁对张说：“好吧！现在开始吃烟灰缸吧！”并坐到张隔壁，然而，张却说要用袁手上的手表，代替烟灰缸变入

袁体内，袁立即答应。

此时，张再度跑进跑出，再回坐位时，手上拿着那个药瓶，叫袁单手拿住，袁仔细一看瓶内已装有水。之后，张拿来一杯水开始施功，施毕后说：“看，水在瓶子里！”众人以为空瓶中变出水来，又是一阵赞叹，但袁却就此确定张的把戏是唬人的。

借着人赞叹声，张问袁：“还要不要把表变到肚子里？”袁面不改色地说：要！吓得友人纷纷劝他算了。

这时，张的表情开始很“神经质”，先露了一手“空手烧衣”，再叫尹姓商人单手握住袁的手表，用力掐住尹的手背，瞬间，从手背上拔出时针与分针，当尹张开手掌时，表中指针确实不见，此举，使众人皆甚震惊，但袁仍要求张吃下烟灰缸。

混乱中，张的随行人员渐渐移出，张也在施完“隔岸看字”的神功后，以“另有约会、非走不可”为由，头也不回地坐车而去。

之后，张因答应替袁的友人看病，与袁在饭店再次见面。施功治病前，张先入浴室很久，然后在病人伤处“吸”出三把脓来，过程十分震撼，但待张离去，袁发现浴室中未使用的白肥皂，有两道抓痕，于是猜测所吸出的“脓”很可能是肥皂搅和而成的“伪物”。还有一个令袁怀疑张借“神功”招摇撞骗的依据，每次与张一同出现的人员，几乎是同样的组合。此外，张每次坚持由他选定约会地点，也有事先安排道具，便于里应外合的嫌疑。

袁表示，以张的手法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个“三流魔术师”。到此，事情并未完了。袁志道先生回台湾后，于1990年8月2日由台湾寄给张宝胜信一封，指控张宝胜未经他同意，乘众人不注意，将手表携出屋外，加以恶意毁坏，要求张宝胜赔偿他同厂牌、同形状的瑞士制劳力士（ROLEX）手表，并以书面形式正式向他道歉。否则除向国防科工委等单位揭发张宝胜的妖言惑众，招摇撞骗外，并委请律师依法追究张宝胜刑事责任。信中还告诫张宝胜立即停止以魔术手法夸称是“神功”替人治病及当众为患者“拔脓”等骗术，否则一并揭发。

这一段揭露，十分精彩。海外人士说张宝胜不过是三流魔术师、九流魔术师，确不算挖苦。事实上，他的“抖药片”、“弯钥匙”、“手掌冒烟”、“空手烧衣”、“名片复原”的把戏，国人早有揭露。三环出版社出版的《伪气功揭秘》中“超人篇”，揭露的就是张宝胜这类超人玩的“特异功能”杂耍。超人露“馅”又漏“气”，他将如何挽回这个面子，国人拭目以待……

台湾《联合晚报》以“拆穿特异功能奇人的西洋镜”为题，揭露了特异人神乎其神的表演，在行家眼里，不过是江湖戏法中的“障眼法”具体手法如下：

1. 表演的道具未经严密检查。
2. 大师级奇人，总有过多的随行人员保护。
3. 表演的项目及内容多不事先告知，使观看者事先无法准备妥善的道具，或表演者自行准备道具。
4. 经常在不适合的场所表演，使观众无法掌握较佳的观察角度。
5. 经常以牵强的理由和各种遁词，不让你立足于某种易于观察的角度，一般不允许录像与照相。
6. 表演过程极短或刻意加快，一般观察者只能得到结果，难以看清过程。
7. 表演者常坐不安席，每项表演之前、之中、之后，总是多次进出表演场所，名曰透气或调整身体、积蓄功力。
8. 表演者本人或随行人员总是先吹嘘功力超凡，但真正表演的项目都是较简单或者是不相干的。
9. 表演后道具不准看或迅速破坏。
10. 如遇不信邪的观众，提出质疑或要求表演高难度项目，多半给你来个“偷梁换柱”，或采取恐吓手法或干脆以身体不适，磁场不对等借口推托。
11. 表演者多以江湖场上的吹气、拍掌、跺脚等过门招式称“发气”。

12. 表演者多以人为道具，所谓的发热、发麻、气感等多为无法客观计量的主观体验。

这些概括，对照一下张宝胜，不是十分贴切吗！

总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兴起的“外气气功”，也称为“神怪气功”（带迷信色彩的骗人把戏）或伪气功（虚假气功），被伪气功大师拥抱着，在中国大地上风靡。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新品种，不过是在国外已经有百余年历史的灵学研究和在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兴起的“人体特异功能”的重演。

中国现代灵学运动的三次浪潮

——传奇、作伪、走邪

申振钰

第一次浪潮，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是1979年3月，以四川大足县发现了一个能用耳朵辨色认字的儿童唐雨，揭开了这场“特异功能”之争的序幕。之后的三四年的时间即1979年至1982年，特异功能的表演在全国此起彼伏。表演的项目，也从以“耳”认字扩展到腋下、手腕、脚底、皮肤、鼻子、头顶、膝弯、臀部，甚至把字吞到胃里，密封在牛皮纸袋里，用火漆和蜡封口的塑料盒里，瓶口用火烧结的玻璃管里及40毫米厚储藏放射元素的铅罐里的试样都可以辨认。除了这些被信仰者称之的非视觉认字的功能外，还有传感、遥感、显微放大100倍、特异功能透视、意念拨表、意念折枝等。全国上百家报纸争相报道，几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把“特异功能”当做研究课题，并且以在上海出版发行的《自然》杂志，作为这种宣传的载体，发表所谓的“实验报告”，召开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仅1980年和1981年就连续召开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在学术讨论会上，除了邀请来自全国著名“特异功能人”表演，以进一步肯定“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外，就是发表一些未经任何科学验证和检验的“科学论文”，其内容可以涉及原子能、高能物理、无线电、电子学、光学、声学、生物物理、生理学、心理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大脑科学、中医、经络、气功、自然辩证法、哲学、情报学等20多个学科。这样一些不实的非科学、伪科学的宣传，必然遭到怀疑论者的反对。自“耳朵认字”一出笼，就有四川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这些“特异人”进行测试，并给予揭露，提出

这些所谓各种非视觉功能，无非是作弊、偷看，超不出魔术师的那一套手法。他们总结出以下的 8 种情况：

1. 先观察周围形势，见有机可乘才答应“用耳认字”，如监视很严、难以作弊，就拒绝“认字”。
2. 常采用拖延或推诿的方式，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寻找可乘之机，有时拖上半小时至一小时才开始“认字”。
3. 用手摸字时，像变魔术似的做些动作，故弄玄虚，设法用手指搓开纸团，利用自然光透照或偷看。
4. 用耳听字时，先分散观众注意力，然后将纸团拿在隐蔽处偷看。
5. 如别人当面写字给他辨认，他则站在远处凝视别人笔动，或在别人背后通过腋下空隙窥视。
6. 如在夜间，则关掉灯，待眼睛对黑暗适应后，利用窗外微弱的光线辨认。
7. 用被子蒙着头认字，则躲在被子里，借缝隙透进的光偷看。
8. 所谓“过电认字”，即将纸团放在别人的耳朵旁，“特异人”用耳贴在该人的背上可听出纸团里的字。手法是，“特异人”手中先有一个假纸团，然后以假换真，把假纸团放在别人耳旁自己以耳贴此人背后，偷看真纸团里的字。

总的来说，“特异人”弄虚作假的手法是比较快的，基本上采取了魔术师的那一套，但并非十分难于识破，只要认真观察，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类以观察测试的方法揭露“特异功能”表演的虚假性、虚伪性，对人们认识“以耳认字”的特异功能的真伪，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兰州大学生物系生物物理组的工作，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从 1980 年 4 月至 1981 年 12 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甘肃省兰州市的 5 所小学，完成了 2832 个少年儿童的 32 840 个样本数的测试，否定了某些学者提出的“特殊感应功能”普遍性的结论。再加上于光远先生为代表的怀疑论学者的批评与揭露。从

1982年以后，这股浪潮就逐渐消退下去了。

第二次浪潮，是以“气功外气”的伪气功，宣传人体特异功能为特征的。它起始于“大气功师”严新的出山。1984年7月，《重庆工人报》发表了“神医、神话、现实”的长篇报道，推出了中国第一个以“遥控”治病的具有特异功能的“神功大师”。报道说“严新大师”遥控治病，诊断正确率达95%，治病显著率达65.8%，即刻见效率达40%。之后严新又创造了“带功报告”的神奇功能，被媒体称之为“我们身边的神话”。1986年，严新又走进了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与清华大学某些科研人员进行“气功外气”使物质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的一系列实验，并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和英文版的《中国日报》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些消息。从此，以“气功外气”为特征的特异功能宣传在中国大行其道。没几年功夫，各路神功大师从高天而降，旷野而生。他们的功夫不仅超群，他们的名声也吓人，什么特级气功师、奇异气功师、高级气功师、气功大师、国家级气功师、超级气功师、国际气功师、神仙奇才、帅才、天才、一代宗师等名义纷纷上阵。再加上千百万的痴迷者，一个“气功王国”的大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极其凶猛之势涌来。

据一位气功研究专家称，中国气功功法每年约以300种的速度增加着。人们估计，目前中国的功法大约有上万种。这种以“国粹”名义登场的特异功能，自然就“独具”中国特色。因此它能够像输入到中国来的ESP和PK那样输出到国外去。所以它就好比从美国和西方传来的那些ESP和PK的特异功能更具迷惑力，更有深度。至于广度更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人体特异功能热，不过是家喻户晓，不可能有千百万人的参与。而打着气功招牌的特异功能，却有千百万人追逐、参与。据严新自己说，他的带功报告就有几万人来听。张香玉的带功报告，也有几万群众等待甚至跪拜，要求进入现场。《麒麟文化》报道，张宏堡的中华养生益智功就有3000万弟子。现在席卷中华大地的

“法轮功”，自称在海内外有信徒上亿人。他们的功能，也不是一般特异功能人的所拥有的。可以说上至开天，下至辟地无所不能。从透视、遥视、遥感、预测、隐身、穿墙过户、呼风唤雨、搬运、招魂、飞升、治疗人间一切疑难杂症。气功师都是具有十八般武艺，会奇门遁甲之术的神人。

此时的气功，早已不是中国医学典籍中所称之为的强身健体的“国粹”，而完全异化为狂热推行“教主”崇拜，宣传神秘、宣扬超自然主张，肆虐信众的类邪教组织。信仰者们在解释“气功外气”与特异功能的关系以及“气功外气”和传统气功的关系时，也说得非常明白。他们说：“特异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发特异功能，这主要是青少年；另一类就是气功师，是通过气功练就的特异功能，气功师不仅可以使自己发‘外气’，进入一种气功功能态也就是特异功能态，而且可以诱发别人进入气功功能状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把在练功过程中出现的幻觉、幻听、幻视，都视为气功师处于“高功态”、“特异功能态”，并进一步论述说，“气功进入高级阶段，‘气’就不限于人体内部了，能由意识指定部位和穴位发功，发出一股‘外气’，这‘外气’是物质的，它还载有信息。这到了气功的高级阶段就非常发达，可以运用自如。不同气功师发出的‘气’，其量（即强度）和质（即性质）也有所不同。这‘外气’可以用科学仪器去测量，随测量仪器性能之不同，而有不同效应，有的是紫外线，有的是微波，有的是一定能量的电子。因此我认为测到的是‘气’的派生物，不是‘气’这个载体的本身。这个‘外气’还能作用于物体，物体可以是无生命的，也可以是活的，如另一个人。物体接受‘气’之后，也可以发回信息，这信息也有物质的载体。高级气功师在自己的身体的部位或穴位能接受回授的信息，信息又传到大脑，大脑加以处理，最后形成感受。有人体特异功能的青少年在运用功能时也是这个过程，最后的感受大都在脑的视觉部位，有形象的感受。‘耳朵认字’，皮肤认字认图，透视，以及遥‘视’都可能是这个过程。高

级气功师也同样能‘看’到另一位气功师发出的‘气’，即在脑中感受‘气’的形象和性质（颜色）。至于遥感，那也是相似的过程，只不过信息载体可能不同。”

这一段话，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概念，即自发的人体特异功能（特异功能态）与气功师激发的特异功能（气功功能态）的物质基础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练出来的。这就是说，那种起强身健体作用的气功，根本就不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之列。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者明确地指出：“至于气功对锻炼身体，起保健和增强体力的作用，就不包括在人体特异功能里了。”

中国的伪气功在中国肆虐 15 年之久（1984～1999 年），当然也同样遭到中国怀疑论者的反对、批评。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倡导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反对打着科学招牌和弘扬传统文化招牌的伪科学、假科学、反科学的推行，并提出在全国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号召，把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基本国策。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中国科学家奋起反对伪科学，新闻媒体高举反伪科学大旗，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工作取得显著成就。一个个的伪气功大师被陆续揭露，他们的伪善面目和邪恶本质也逐渐为广大公众所认识。“法轮功”邪教本质暴露后，伪气功的热潮也大大消退。这就是中国灵学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第三次浪潮，由伪气功转化为邪教阶段。中国现代灵学运动在经历了传“奇”——人体特异功能宣传浪潮，到作“伪”——伪气功在中国广泛传播，掀起了中国现代灵学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之后，进入走“邪”——掀起现代灵学运动的第三次浪潮。或者说，中国现代灵学的历史，就是从人体特异功能到伪气功到邪教，可以说走向邪教，就是中国现代灵学运动的归宿。伪气功的泛滥是邪教产生的温床。现代灵学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洪志。从李洪志走向邪教的历史和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李

洪志的看家本领，也是伪气功与特异功能。

1. 李洪志也是以“气功”起家的，这个受到中国“气功大潮”熏陶的李洪志，出道较晚。1988年开始学习气功，1992年才开始出道，推出了伪气功“法轮功”，开始办班授业，为人“治病”，打出“济世救民”的旗号。他同样也有搬运、定物、控制思维、隐身四大“特异功能”。所以，特异功能和伪气功是中国邪教产生的基础，可以这样说，没有特异功能的传播；就没有神功、伪气功的泛滥；没有伪气功的泛滥，就没有像法轮功这样规模大，信众多，影响广、危害深的邪教产生。

2. 李洪志也一定走神化自己的道路。伪气功大师，都要给自己套上一个个的光环。这不仅是伪气功的一个特征，也是邪教的魅力和关键所在。邪教总要制造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和无所不能的教主，而且教主和信徒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被推入极端，而正是这些差异，形成教主对信徒的控制，从而使邪教变得越来越残忍。

李洪志在编织自己“法轮功”的过程中，不断造化自己，往“神”方向一步步攀升，而他的“法轮功”，也就跟着一步步升级，开始由“法轮气功”——讲包治百病的气功功法（四大功能）；到1993年就提升为“法轮大法”——讲“法”，讲修炼；到1996年更升华为“宇宙大法”——讲“弘法”、“护法”，修炼“上层次”，“圆满”。李洪志就是这样把自己从具有搬运、定物、控制思维、隐身四大特异功能的“高级气功师”，升华为能看十维空间，知道人类过去和未来，功能比释迦牟尼高几万、几十万倍，其法身无处不在，能洞察宇宙根本属性，往高层次带人的“大佛”。

3. 发展组织，精神控制，涂炭生命。李洪志从1992年正式出山，到1999年被取缔，仅几年功夫就在国内外制造了庞大的组织网络，并通过他的歪理邪说，对信徒进行严密控制，制造了一个个人间惨剧。在全国自伤、自残、自杀杀人案件不断涌现，成千上万的家庭毁于一旦。

4. 邪教本质大暴露。李洪志在认为有了足够的资本之后，他的疯狂性、破坏性、极端性的邪恶本质开始大暴露。仅 1996 年到 1999 年“法轮功”被取缔，法轮功组织就策划 300 多起围攻活动，最严重的是于 1999 年 4 月 25 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规模的围攻中央政府的政治事件。至此，“法轮功”的邪教本质暴露无遗，它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99 年 7 月 22 日，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中国灵学运动的第三次浪潮暂时消退了。

按照世界灵学历史发展规律，在中国所发生的现代灵学运动的三次浪潮，能不能就永远消退下去了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树欲静而风不止。李洪志在国外还猖狂活动，其他气功大师也只是暂时隐藏起来。所以对灵学现象的批评和揭露，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未来 25 年会是怎样？我们能够回答的是怀疑论组织和怀疑论者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关于中国青少年对神秘现象 态度分析的对话

秋 实：某协会副编审

申 荷亮：《火箭兵报》文化处主编、主任编辑

（一）问题是什么

热中“神秘”的困惑

申：在 2002 年 6 月份于美国加州举行的第四次世界怀疑论者大会上，你提交的那篇《关于中国青少年对神秘现象的态度分析》的论文，也颇受与会外国学者专家的关注，因为在青少年中开展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的宣传教育，确是世界性的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未来。这次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好吗？

秋：好吧。这篇论文缘于 2001 年的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年会，许多学者提到，青少年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并热中追逐神秘现象，如对飞碟、外星人、特异功能特别感兴趣，相信星座和血型对命运和性格的影响等等，算命、求神拜佛等鬼神迷信观念和行在他们中间很有市场，并因此使他们正常的学习生活以及身心受到影响。

申：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例子？

秋：当然有了，我说三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一个是江苏无锡的 17 岁女孩，两年前到异国他乡攻读学位。可是，自从看了英文翻译词典“好易通”上的八字命评：“此人般般事不成，得来即是去之时”后，就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静下心来充满

爱心地学习了。她说：“它的消极程度和对我在遇到挫折时的负面影响和打击已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料和想像。它直接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学习，它不仅打击和混淆了我原本一颗谦虚的心，同时也伤害了我养成的坦然面对失败的一颗平常心，打击了我敢于闯，敢于奋斗的勇气和精神。”

申：看来算命这种荒唐事还挺影响孩子的情绪，误人子弟。那第二个例子呢？

秋：第二个，是重庆一位高中二年级的女生写给郭正谊先生的信，信中说：“我在小学时就读了有关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书，早就知道了尤里·盖勒。《上帝的指纹》、《人类神秘现象全记录》这类书我也看过。书中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使我着迷……但我看了《科学怪影》之后，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迷失感。因为书中几乎否定了我深信不疑的所有的东西。诺查丹玛斯就不必提了，然而尤里·盖勒竟然是个大骗子，《众神之车》是伪科学，特异功能根本不存在，这一切的事实实在使我受了打击。特别是特异功能，以前我一直深信人类都拥有这种能力，只是看是否发挥出来罢了。《科学怪影》刺破了我多年的梦，让我不知所措。”

申：孩子的成长时期碰上伪科学，会让他迷惑、失望而不知所为，在心理上蒙上阴影。遇到真正的科学，看到真理的阳光，反而觉得刺眼，觉得不可接受，觉得不知所措了。真令人感叹。

秋：第三个例子就显得更离奇了，2001年4月，深圳的一所寄宿学校里发生了一位14岁的女孩跳楼自杀的事件，她死前曾主动地与要好的同学讨论过怎样死得快、少痛苦，也讨论过命运及阴间、阳间和死后转世的问题。然而她的死引起全校的鬼神恐怖，许多学生和老师十分害怕，不同程度地失眠、噩梦、心慌，不敢单独回住宿舍。学生里有不少有关鬼魂的说法，比如这个楼的风水不好（14号楼，谐音念为“要死”）卖不出去才租给学生住；楼里闹鬼，走道里的灯该亮时不亮，不该亮时又亮了；有人说见到了女孩的影子、听到了她的声音，这是她在显魂；有人说她的魂

还在楼里，找到替死鬼才会离开，等等。

申：看来这些孩子还真困惑于神秘现象，受到鬼神迷信的干扰了。那他们这种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呢？未必都这么严重吧？

倾向“神秘”的种种表现

申：上面谈到的三个例子，说明了孩子受困于“神秘”的情况。虽然都很真实，但是否也只能视为个别情况？你能比较详细地谈谈中国青少年到底是如何看待所谓的神秘现象和现代的鬼神迷信的吗？

秋：从与会学者带来的调查报告和我这一两年来搜集的资料看，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热中“神秘”的倾向，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调查的数字来说明你提的这一问题。

一是有一些青少年相信命运和神秘数字，对星座普遍接触与接受。据湖南益阳师专教师涂建华的调查^①，大约有1/2的青年学生相信或有的信或不清楚“命运”，有1/3的人对神秘数字相信或不置可否；北京二中的薛丽霞老师调查发现^②，中学生中有38%的人，认为发生在自己身边各种事件的好坏与运气有关，40%的人不置可否；有70%左右的中学生接受星座观点。有些中学生弄不清人的生死、命运是不是受星座支配，因为有书刊说星座、风水、易经预测是科学。在大学生中也有不少人认为某些现象、数字、日期会带来某种运气、结果，如喜鹊叫带来喜讯，乌鸦叫带来厄运，“8”代表吉祥、发财，“168”表示“一路发”，“13”、“4”意味着不吉利等等，因而特别忌讳这个号码、活动时间中有“4”这个数

① 涂建华，“无神论教育要走进课堂”，《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北京，2002年第1期（总第15期），第32页。

② 薛丽霞，“关于中学生无神论观念的调查”，《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北京，2002年第2期（总第16期），第42页。

字，出门办事要选黄道吉日，恋爱择偶非生辰八字、星座星相匹配不可。

申：这倒是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可能是想寻求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心理暗示吧。

秋：二是一些青少年信神疑鬼。前面的自杀学生引起校园鬼神恐怖就是典型的例证。涂建华的调查还显示，有 1/4 的学生对鬼神迷信和巫术持认同态度和不置可否；在薛丽霞的调查中，学生对“转世轮回”的相信率达 28%，不清楚的达 26%。他们觉得真有“天堂”、“地狱”，认为菩萨可以显灵，讲求因果报应，相信有“神仙”和“鬼魂”，可以轮回转世，要“烧香拜佛”、“喊魂”、戴“护身符”。在中学生中，有的家长面对孩子的心理障碍不去求医咨询，却请“半仙”驱“魔”去“邪”。不少学生脖子上都戴着红绳子，下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护身符”，问起来时他们中多数会说此物将会保佑他如何如何。还有的学生和家长在考试之前去求神拜佛，求各路神仙保佑，考试后又去上香还愿。

申：看来这些现象是挺普遍的，也比较严重。说明青少年对这些问题缺乏认真的思考和必要的科学指导，家长和老师有责任引导他们正确认识。

秋：现在，在青少年中更时髦一点的就是特别迷信“特异功能”现象。少数大学生坚信“心灵遥感”、“未卜先知”，相信诸如“天外来客”、“超自然力”等一些“神秘现象”的存在；涂建华的调查表明对特异功能“相信”的占 12.2%、“有点信”的占 25.6%、“不清楚”的占 18.8%，说明对特异功能问题存在很大的模糊认识，容易产生神秘感。在《2000 年中学生科学素养调查报告》^①中显示，相信“意念改变人体能量”的占 35%，相信“人体穿壁”的占 19.9%，相信“心灵远距离致动”的占 35.8%，相信“耳朵认

^① “中学生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推进活动”项目组，《捍卫科学尊严文萃》文章汇编，2001 年第 3 辑第 81 页，中国科协宣传部编（内部资料）。

字”的占 37.55%。《牛顿-科学世界》杂志做过读者调查,发现 54% 的人相信“心灵感应”,40.1% 的人相信金字塔由外星人建造,63.7% 的人相信或不否认存在 UFO。

“算命”焉知祸福

申:接着上面谈的问题,青少年比较热中看、听和传播所谓的“神秘”,比如神秘数字、命运预测;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相信所谓的“洋迷信”,比如相信飞碟和外星人光临过地球、金字塔之谜和人类劫难的预测;对鬼神问题存在模糊的认识,并伴有一定的迷信行为。这对他们会有哪些负面影响呢?

秋:这些都已经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会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在我们已列举的这三个方面主要表现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青少年相信算命,包括用电脑算命。在《2000 年中学生科学素养调查报告》中关于中学生对占卜和算命的态度一项调查显示,认为占卜算命有科学道理或是超自然现象或不知道的,即对此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的占 25.9%,经常和偶尔参加算命的人数为 39.4%,非常相信或比较相信电脑算命的比例达 16.1%,算命后处处小心的占 51.4%。崔景贵^① 的调查显示,现代大学生中有 26.5% 的人看过有关宣扬“现代‘科学’算命、看相”之类的书籍,23.6% 的大学生承认自己有过现代迷信行为,例如“找算命先生”、“请人看手相、面相”、“电脑算命”、“去寺庙烧香拜佛求签”、“用扑克牌等算命工具互相算”等。

申:我前不久也曾在《大众科技报》看到报道:一个时期以来,网上的算命小程序在中学生中广泛流传,而这些学子竟然全盘接受,连穿什么衣服、怎样学习都要按照“网上神算子”的指示行事。

秋:一位小学生下载了一个估算未来学业的程序,欣欣然开

^① 崔景贵,《科学与无神论》杂志,2002 年第 3 期第 11 页。

始测试。“神算子”告诉他，今年他的学业将大踏步退步，无论如何努力都将失败告终。这个学生平时比较内向，看到这个答案就开始自暴自弃，把学业搁置一边，结果真的遭遇“滑铁卢”，从此一蹶不振。另一位中学生运用算命程序来测算自己和好朋友的缘分。这个学生属于射手座，而他最要好的朋友却属于天蝎座。这个程序“估算”出他的朋友心思深沉，而且容易背叛，于是他就开始疏远这位朋友并对朋友恶言相向，结束了本应珍惜的友谊。还有位小学生在出门前必做的一门功课就是看占卜穿衣服。今天“神算子”说红颜色好，她就穿红颜色的衣服，明天“神算子”表示绿色大吉大利，绿色就成为其惟一选择。

由此可见，当代青少年中有现代迷信观念和行为的人为数不多，已有了相当大的比例，并且已经影响了他们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引起了心理的不稳定和行为的偏差。

（二）问题的分析

透视“神秘”的媒体传播

申：看来，青少年世界观中有神秘倾向的比例还是不小的。我们应该好好找找原因了。这些年来社会上确实是对神秘主义过度宣扬，造成了很浓重的神秘主义气氛，无论是书籍报刊，还是电影电视的节目，神秘的气息无处不在，这对青少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秋：是的，报刊、音像制品发表的鬼神迷信的东西太多了，例如2001年5月许多报纸和网站都报道了泰山上有外星人来过的谎言；成都的一家报纸讲，斯里兰卡的总统是投胎转世来的。电视剧里，要么那些“神”人脚踏青烟、飞檐走壁、穿墙入户、意念搬物，个个都有超常功夫，要么鬼魂出没，鬼使神差。在书店里，随手可拿到有关神秘现象的书籍，如各种预测类的图书、神

秘揭秘的图书，都堂而皇之摆在“科普图书”的货架上。

郭正谊老师对这个问题有过专门的研究。他发现一批伪科学图书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未间断过出版。80年代翻译出版而风靡全国的《戴尼提》、《众神之车》、《1999 人类大劫难》是三本最为突出的伪科学代表作；而90年代出版的《人是太空人的实验品》、《人有两套生命系统》、《人类曾经被毁灭》、《超自然之谜》无非拾洋人之牙慧，还有《世界伟大考古纪实报告》共8种，成为个体书摊上的畅销书，其中以《水晶头骨之谜》、《上帝的指纹》影响最坏；直到2000年还有《月球：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和《地球：内部中空的外星基地》在出版。

申：你说的《戴尼提》是科学神教教主罗恩·哈伯德的著作，宣扬“通灵术”的，相当于李洪志的《转法轮》，他本想在中国发展“科学神教”；《众神之车》是瑞士的厄里希·冯·丹尼肯根据1947年美国军方造谣说有UFO来到罗斯威尔镇并得到外星人的尸体^①，在全世界掀起的UFO热后，所杜撰的一本论证外星人的书，后来他又陆续出版了《众神之金》、《神的奇迹》、《太空之神》，列举了世界各地大量耸人听闻的“事实”来论证所谓的神就是从外星飞来的宇航员，他们与地球人交配创造了新人种，是他们给地球带来了不可思议的高明文化。至于日本五岛勉根据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而写的《1999 年人类大劫难》尽管风靡一时，但依然随着新世纪钟声的响起被丢到历史的垃圾堆。

秋：你说的太对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现在许多影视剧、光碟、报刊、书籍以及因特网站投人们所好，充斥着光怪陆离的神秘现象的报道和内容，用星座、血型进行种种预测的宣传也比比皆是。深圳有一家以中学生为对象的刊物，设有专栏宣扬“星座”，并对某一星座进行幸运预测，如靠自己的异想天开，在金钱

^① 郭正谊，“飞碟谣言终于真相大白”，《科学怪影》，北京科普版，1999年8月第110页。

上将带来不错的进账，学习压力会渐渐转移，只要处理好与他人的互动关系，在人群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心中自然会有满足感；列出幸运日：3、6、21、24、25、27，幸运能量点：青绿色、兰花、手机、空旷的草原等。这些对青少年都产生了一定的心理影响。

“神秘”流行的社会原因

申：你上次只是从媒体宣传的角度，讲了青少年热中神秘现象的原因。其实这里面还有很深刻的文化历史与社会的原因。古今中外，多少年来，人类一直不懈地探索着“我们从哪里来，到何处去”这一永恒的话题答案，对出现的神秘现象和神秘预测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即使在科技很发达、国民科学素养很高的美国，也有55%的人相信占星术。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迷信土壤丰厚的国家，历史上各种神秘文化连绵不断。像教人长生不老的炼丹术，白日飞升的登仙符，预知未来的《推背图》，都是以无稽之说大行其道，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各种以科学名义出现的神怪巫术也是重新沉渣泛起，什么这功法那大师啦，意念移物耳朵认字啦，对一代青少年为害不小。

秋：是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用科学春天唤起的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一些边缘学科未知领域，各种神秘的东西开始猖獗泛滥：以特异功能的出现为标志，从“耳朵认字”到“意念移物”，从《发现黄帝内经》到“水变油”，从“飞碟幽浮”到“生命现象”，一时间黑云压城，打着“科学”幌子的现代迷信和旧社会流传下来的旧迷信泛滥成灾，在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十分猖獗的地步。巫婆神汉、“气功大师”纷纷出笼，书符念咒、“扶乩”、“圆光”，指点风水，千里传功，号称能驱邪治病、预测官运、“意念搬运”，甚至发功灭大兴安岭大火；求神保佑，长生不老，成仙成佛，对“大师”们奉若神灵，敬若上宾，为其招摇过市提供场地、进行媒体宣传。有专家作了调查，在广东的大、中、小城市约有一半左右的各类商店，其店堂中供着神像。在深圳的

一些居民区，几乎 24 小时都可以看到有人当街焚纸、烧香、祷告、跪拜。可见社会大环境急需净化。

迷信观念的潜移默化

申：不可否认，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对孩子而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家长和教师了。他们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秋：是的。在那次会上，我听到涂建华的调查分析，30%左右的学生家长存在鬼神迷信现象，父母亲人的迷信观念与行为，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青少年；深圳市近郊一位 15 岁初二女孩，因其奶奶天天讲鬼神，让她烧纸烧香跪拜敬神，她出现精神异常，不敢独自睡觉，自称看到无头鬼向她走来，青面獠牙的妖怪坐在她床前（她出现了幻觉），不敢上学，其父母不得不送她到精神病医院就诊，后来被诊断为“与迷信有关的精神障碍”。

北京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周放老师在 1999 年 11 月，完成了一项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科技素质的调查”^①。调查显示有一半左右的中小学教师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在回答“是否相信算命术”的问题时，有 15.7% 的教师认为算命术“有点科学”；有 8% 的教师认为要“因人而异”；认为算命术“非常科学”的占 1.8%。另外，郭正谊反映，个别老师（还是个重点中学的老师）向学生推荐科普图书，竟然是《水晶头骨之谜》。会上还有学者反映在 1998 年，有的小学教师带领几百名小学生在军事博物馆前练“法轮功”；一个学校的升学率下降，学校的校长便请来风水先生，专门派人到泰山去选良辰吉日来立升学符；学生在学校受到惊吓了，老师就请“大仙受魂”。有的大学开“风水课”，将风水说成是科学的。

申：当然，家长老师的态度行为会影响孩子。如果我们从教

^① 周放，“在青少年中弘扬科学精神迫在眉睫”，《科学与无神论》杂志，2002 年第 1 期，第 35 页。

育本身去观察思考，也会发现我们这些年来对无神论的教育也存在严重不足。

秋：是这样，至目前为止，中小学缺乏无神论教育的计划和内容，例如《中学生守则》没有反迷信的内容，《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长达40条）没有反迷信和无神论教育的条目，只是在“不打架、骂人，不说脏话，不赌博”之后并列“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只说“不参加”是远远不够的）；在《中学生德育提纲》中，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也没有反迷信和无神论教育的内容。这些代表国家意志的规定和规范，长期忽视以至忘记了对中小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的意义，学校、老师和家长最关心的是分数，是如何应试，更不去注意鬼神论对学生有何危害，还有部分家长向孩子灌输鬼神观念。学校，包括名校也不无例外地积淀了丰厚的鬼神论土壤与气候，遇意外出现鬼神恐怖也就不奇怪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探析倾向“神秘”的自身原因

申：上面讲的都是外部原因，但是对具有神秘主义倾向或是迷信鬼神的人来说，肯定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作为青少年，除了本身知识不够阅历太浅外，还有很多心理原因。

秋：是的。比如现代大学生对科学和迷信在理论上分不清，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是可以接受实践检验的，也只有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改善和发展；迷信宣扬的则是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实践检验的，杜撰出来的超物质力量的代表者只能是上帝（形形色色的神，现在又多了外星人）或被神化了的人。只相信物质的力量、人的力量，决不相信神的力量，是科学区别于迷信的实质所在。因此，中央民族大学于祺明教授就指出：“一个尊崇理性思考的大学生是不会轻易把纷乱的或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归因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对于这一点应该属于常识的东西，现在有很多学生却不怎么明白。

申：那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以及对社会不能深刻和客观地认识，也是青少年信鬼迷神、热中神秘现象的原因了。我看你的论文里专门谈到这一点。

秋：是的。由于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即好奇、冲动、轻信、偏执，对与鬼神迷信有关的东西既害怕又好奇，对充斥着鬼神恐怖的影视作品、“七月七鬼节”之类的东西觉得既好玩又恐惧，同时模仿成人的欲望或要求独立的欲望使得他们希望对鬼神问题做出自己的决定，但观察不会太深入，涉世尚浅，识别能力欠缺，情绪不太稳定，看事难免偏激、片面，易于被误导；再就是缺乏足够的分析审视能力，易于把见闻或想像当成事实。例如容易把文学作品（小说、影视），神话传说、迷信书刊或其他迷信编造当成事实，把那些经过包装的迷信玩意儿当成“科学”。歪理邪说中各种荒谬的理论与引入误入迷途的煽动性言辞往往导致青少年心理上无助感、侵犯性和退避倾向的产生，这样一些心理倾向构成了依赖型、敌对型和退缩型的性格特征。受鬼神迷信影响严重的青少年往往这三种性格会同时存在，从而使他们陷入心理冲突之中。

申：大学生的情况怎样？

秋：大学生由于他们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而有很多无法把握的因素，因而有强烈的寻求精神寄托与心理调适、企求精神愉快与生活充实、探求人际沟通与社会保护的心理需求，但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正在形成阶段，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又没有很好的引导，因而，对鬼神迷信和神秘现象的热中就有了可能。当然，也有大学生并不一定头脑中存有现代迷信的思想观念，但却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现代迷信行为，这多半是好奇、从众、模仿、崇拜或畏惧心态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大学生有可能因为自己这类行为的反复表现而变得真的相信现代迷信，这也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态度改变的“角色扮演法”产生的效果。

对“神秘”心醉神往的社会心理基础

申：当然，你说的是他们的心理特点和心理需求决定了他们的这些行为。但是，既然神功异能、电脑算命等现代迷信如此荒诞不经，它们为什么能流行，会有那么多人包括大学生对它心醉神往呢？我想这与他们利用了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手段和技术不无关系，特别是利用了一些社会心理效应，如权威效应（包括技术权威、政治权威、学术权威）、高价效应、镀金效应、从众效应，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等。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的。

秋：是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现代迷信之所以能迷惑一大批群众的原因，我认为有四点：一是利用从众心理。对于一般人而言，从众可能导致其行为指向有意无意地不同程度地回避或模糊真理判断，可能会产生“大家都那样做，就说明那样做是对的”的简单推理，产生“如果错了，大家都错了，不是我一个人错”的想法，逐渐失去理智的行为判断。二是利用心理暗示。现代科学研究证实，普通人群 1/3 的人接受暗示和自我暗示能力较强，而一个人心理暗示性的强弱，与其智力水平、文化程度并无决定性的因果关系，而主要取决于其个性心理倾向和人格特征，尤其是身心素质较差，不够自信的人受暗示性往往较强，因而容易接受周边暗示，沉湎于现代迷信不能自拔。三是利用心理治疗。临床研究和式样研究都已经证实，通过自我心理调整促进自身功能协调，可以起到健身防病和治疗部分身心疾病的作用，这是医学心理学领域的一种正常现象，但一些大学生误认为是现代迷信的神奇功效。四是利用心理改造。记忆改造是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在理解与自己有关的任何预言和结论时，人们都会进行心理改造，而且一般会向着自己容易接受或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造。

（三）如何看待和解决问题

神秘是兴奋剂还是迷魂药

申：咱们谈了那么多的内容，从现象到原因，负面的影响谈了很多。但是，一般人对此似乎并不太看重。因为思想解放后，多元文化和多维思考，带来更多的的是思想的活跃，文化的发展，有点神秘的东西，比如优美的童话和神话，可以发挥更多的想像力，可以增添生活中的乐趣，激发思想中的活力，不正是一些神秘现象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去探索 and 发现，才使科学不断进步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正在把曾只是人类传说和幻想的事物逐渐变成现实吗？如果没有古人“嫦娥奔月”的传说，没有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就没有今天的飞机和宇宙飞船，人类就不会遨游太空、登上月球。

秋：我同意你的观点。充满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之一。对大自然的奥秘充满了好奇，发现大自然的美，并由此爱自然，追求大自然给心灵带来的安慰，并在探索中得到快乐，这也是好奇的有益功能。只是我认为，如果“神秘”带给我们仅仅是探究的动力，而不是无力的“宿命”，看待“神秘”的态度是一种理性的存疑，而不是盲目的轻信，那么我们大可不必对“神秘”如临大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往往那些“神秘现象”鱼目混珠，让人迷惑或者上当，产生负面的影响。

申：这需要客观分析所谓的“神秘现象”到底什么，是兴奋剂还是迷魂药？它会给青少年的心灵种下什么？

秋：是的，我们理解的神秘现象一般是指高深莫测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现象，它的来源一般是口口相传。应该承认，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种自然发生的、客观存在的现象，如果现在的科学还没有认识与很好解释，这类的“神秘”感会产生科学

的探索动力。但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和思维的弱点，钻人类认识的局限之空而编造出来的假现象、假神秘，有些干脆是魔术戏法，却大有人在。由于这类故意制造的“神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就有不可测性和无法检验性，使人无法清晰认识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也就可以空而无物，千人千解，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动用人的主观感觉、经验和信仰，而不能动用大脑的理性思维。作伪的人特别需要宣传神秘，因为他不希望你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他的主张，只要求你对他感兴趣，并绝对地相信而无需求真的过程，实际上让你放弃你的理性思考，听任他摆布而不能自己掌握自己。

申：很明显，这后一种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不小，这是需要我们明辨是非，与之做坚决斗争的。

制造神秘是恶意的谎骗

秋：是的，故意制造的神秘，比如“野人之谜”、“麦田怪圈”、“UFO”的外星人、“金字塔之谜”、“1999 人类大劫难”和叫魂、算命、求神拜佛等等鬼神迷信，都是在利用了人们的无知、好奇、轻信。由于青少年心理的脆弱性和行为的不稳定性，在他们人生成长的重要时期，过多地接触和相信这些“神秘”现象而形成错误的概念，又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抵御这些负面影响，将会在他的人格塑造于发展和“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中出现障碍；首先在认识上他们会认为世界无从把握，许多是不可知的，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挫伤，自主意识缺乏，最后容易选择宿命论，产生依赖感；在归因上，容易把原因与责任都归于外界而无力自我改变，产生无助感；在性格上，容易恐惧胆小，自卑，极易受暗示，先要看别人怎样，随波逐流；在思维方式上，容易对别人的意见不经确证而轻易接受，没有主见地认识事物，人云亦云，无从把握自我，陷于一种永无结果的遐想和幻想，即过度地软性思维，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在行为上的：为人处世虚幻，不果断，

依据他人或外力（算命）来行事，缺乏自信与主动，不愿思考，不讲原因，做事仅凭直觉，极易受歪理邪说诱惑，对神秘中的美好过度奢望。这是不符合青少年自我同一性规律发展要求的，长此以往会形成他律性人格，为邪教的滋生发展提供天然的条件。

申：现在世界上许多邪教组织都在用美好的虚幻的谎言拉拢欺骗青年，特别是利用什么“外星人”、“UFO”、“通灵术”、“精神疗法”诱骗青年，比如“科学神教”、“上帝之子”、“天堂之门”等等邪教大量捕获青年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法轮功”痴迷者中的少年刘思影，就误认为通往天国的路是金子铺的，幻想着自己能当“法王”。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

秋：因此，我们主张青少年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增强是非、真假的辨别能力，应该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根据环境调整自己的认识与行为方式，使之更适应社会。并且主动考虑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考虑自己未来在社会中的位置，树立人生的理想目标，而不轻易受外界的影响，抵制各种诱惑。能够主动地有意识地行动，而不是被动地受人影响与支配，正是良好的自我同一性的启动，是自主性的体现，是自主意识的支配。

用科学和理性考察“永不下沉的橡皮鸭”

申：我们如何让青少年免受这些危害，提高免疫力呢？我们总不能让孩子生活在真空中，毕竟多元文化涌入了，那些“神秘”的东西存在了，孩子们有的信以为真，有的还亲身实践了。

秋：我认为首先应该用事实改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态度，所谓意识决定行为和方法。只有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不可信任的，那些欺骗才起不到作用。关于这一点。我在《科学于无神论》、《牛顿-科学世界》、《科学怪影》、《谁欺骗了全世界》中也看到了不少揭露伪科学、伪科普的文章，比如郭正谊写的《形形色色的算命迷信》、《飞碟谣言真相大白》，方舟子的《埃及金字塔的神话和鬼话》、《并不存在的“百慕大魔鬼三角”》、《复

活节岛的悲剧》、《揭开〈水晶头骨之谜〉的谜底》等等文章，就是用事实一一揭穿那些骗人的鬼话。

申：能用事实和一定的科学道理把问题讲明白，让人心服口服，是最有效改变态度的办法。郭正谊先生在《星座能支配命运吗？》一文中，提到美国天文家和其他科学家否定占星术的依据，就是在1975年对16 634名科学家和6 475名政治家的出生日期进行统计，发现处于12个不同星座的人数基本相同，说明一个人成为政治家或科学家的可能性对于出生的日宫（即星座）来说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统计数据要比神秘主义者用个别名人作证据更科学，更令人信服。

秋：是的。除了这种具体科学知识论证外，恐怕还要对青少年加强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方法的普及。因为神秘主义或是超自然的主张不会因几个科学家的揭穿工作而销声匿迹，即使在一定时期内科学家的批评声音使得这些神秘主张变得低调，但是过不了多久，那些“神秘”的超自然主张就像“永不下沉的橡皮鸭”又浮出水面。因为人们不可能穷尽证明所有的“眼见为实”事件，对于神秘制造者来说，在你证明了100个“神秘事件”是欺骗和作假的时候，神秘主义者会说还有第101个是真的。即便是像那种客观存在但目前还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也既要用科学的实证检验，也要用理性的逻辑推理。要让青少年懂得运用科学分析问题的道理，培养他们一种敢于怀疑和探索精神。

申：你说的对。李政道先生就说过：科学不神秘，神秘不科学嘛。因为科学的求真、求实的特性决定了这一点，才使理想和幻想变成现实。

秋：我想，梁启超先生对于科学的理解对于我们现在理解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有启发。他首先认为科学是求真的知识：“要钻到这件事物的里头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的周围研究；要跳到这件事物高头研究。”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然后归类。其次他认为科学是求有系统的知识：“知道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推彼。”“存

在一横一竖的系统”，一横的系统知道事物的普遍性；一竖的系统知道事物的因果律：“有此自然有彼；必须有此才有彼；此动才有彼动。”再次他认为，科学是可以教人的知识：凡学问有一个要点——可以“传予其人”。科学要说明理由，提供证据，使人明白。“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性，最为知识扩大之障碍。”正是科学的实在性、清晰性、可重复性，才使从事科学的人有了动力，有了信心，总是积极寻找办法，主动探索前进。而仅仅轻信“神秘”的人，没了思想，没了作为，没了主动，也成了行尸走肉。

申：因此应该鼓励青少年用科学的理性去考察所谓的“神秘”，不能轻信，更不能迷信。这也是你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吧！

秋：是的。这种想法和参加的第四次世界怀疑论者大会所宣传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怀疑论者共同讨论了在未来的25年里，如何加强青年对超自然现象主张的怀疑探索精神。我认为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容我们忽视这个问题。

无神论在美国

王珍^① 答问

问：王珍同志，听说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宗教信仰比较虔诚的国度，但又听说他们也有一个无神论协会。久闻您对美国无神论状况有所研究，能大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据我所知，美国大多数人过着一种“非教堂”（un-churched）的生活，有数千万的美国公民没有固定的教堂、清真寺或者寺院的活动，相当一部分人不信仰任何宗教。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过着有规律的教堂生活，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孩子。有超过97 000 000的人从未进过教堂。也有些人说他们“的确”去过教堂，一年大约去三到五次。去教堂经常是出于家庭、社会或者同辈压力，而不是出于对教堂学说、教条的信仰。据统计，有超过25 000 00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宗教怀疑论者、非信仰者等。他们怀疑祈祷和宗教仪式的作用，也特别反对把所纳的税款用于建立任何宗教性组织、宗教性的活动或宗教仪式。宗教信仰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小。

这是一份来自美国无神论协会的资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宗教怀疑论者、非宗教信仰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亲和的。事实上，按照我们的理解细究起来，无神论者与宗教怀疑论者、非宗教信仰者却有大大的不同，因为无神论者是不信仰任何神（的存在）；宗教怀疑论者只是怀疑而已，对神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而

① 王珍，博士，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教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要从事宗教有关问题的研究，发表《崇尚科学——美国无神论》、《宗教与人的解放》等多篇论文，《论现代无神论的知识来源》等译文。

是“不知道”；非宗教信仰者可以说和神根本就没有关系，比如康德，从他一生的行为来看，是一个非宗教信仰者，但却不好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在中国，人们常常把不相信神（的存在）称为无神论者，它明显地有别于自然神论者、泛神论者、宗教怀疑论者。而在西方很多时候是把自然神论者、泛神论者、宗教怀疑论者、无神论者作为一个系列的范畴去看待，虽然它们的含义不尽相同。这是由于西方长期的一神论宗教传统，他们常常把与正统一神论信仰相悖的自然神论者、泛神论者、宗教怀疑论者称为无神论者，如泛神论者斯宾诺莎、18世纪的自然神论者都（曾）被称为无神论者。这虽然说明了无神论本身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但它（曾）具有的这种含义却是我们要注意的。

无神论在美国的存在状况，我们可以通过美国无神论协会的一些情况进行了解。

一、美国无神论协会的基本情况

问：好。那就请您谈谈美国无神论协会的情况吧。

答：我可从该学会的建立，以及它的会徽、目的和活动状况几方面来叙述。首先说说它的建立。

美国无神论协会始创于1962年，是美国无神论者组成的一个团体。它的创建人是 Madalyn O'Hair's。Madalyn O'Hair's 出生于1919年4月；1959年，她向法院提出上诉。认为在学校，尤其是在小学把圣经及其赞美诗作为学生的必修课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不利于他们的发展，应该予以取缔。这一上诉需要的是勇气，更需要坚韧。因为这虽然是依据法律（下文还将谈到这一问题）提出的上诉，但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从无神论的角度对法律提出不同的理解，所以她面对的是强大的传统势力。在她刚一提出这一诉讼的时候，很多人感到愤懑，尤其是一些虔诚的教徒感到的是羞辱。很自然，她遭到了攻击，受到了敌

视，但是可贵的是她有自己的信念并且坚持。案件的审理经历了四年。经过艰难的四年，她胜诉了。很多学校不再把圣经及其赞美诗作为必修课灌输给学生。作为她胜诉的一个结果，美国无神论协会诞生了。

会徽 会徽通常以最简洁、最鲜明的形式体现着一个组织的形象。美国无神论协会认为，只有通过科学分析的作用，人类才有可能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认为，现在原子仍然是各种物质相互区别的基本单位，是一种元素得以存在并且保持其性质的最小微粒。虽然现在是一个新的原子时代，但也要重视过去时代发现的科学真理，所以他们选择旋转的原子作为标志。饶有意味的是，他们认为虽然无神论者相信科学，相信科学方法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但是也并不是有关人类所有的答案都在里面。所以，在这个会徽中，他们让其中一个原子的轨道断裂开来，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断开的原子轨道形成了一个字母“A”。另外在中心的地方也有一个比较小的字母“A”。前者表示“无神论”，即英文Atheism；后者是美国（形容词形式）英文American的第一个字母“A”。那么整个图案就代表美国无神论者（American Atheists）（协会）。

整个图案，以旋转的原子作为其组织的象征，明显地体现了他们以科学为其精神的支撑。

目的 他们认为无神论的目标是通过实际的斗争来维护社会应该提供给每个人的根本自由——精神自由（freedom of mind），无神论的目标就是促进这种根本自由的实现。

在社会生活中它致力于无神论者的公民权利、促进国家政权和宗教的完全彻底地分离、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在这里，所谓公民权利（civil rights），也是市民权利、市民社会中公民的世俗权利，它与由于信仰上帝、从而上帝赐予人的权利相对立。具体讲来，他们的目标与任务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1. 提供一种不同于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认为，美国只提供

信仰宗教的自由，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一种宗教去信仰，所以美国充满着过剩的宗教制度。而无神论协会认为，你完全有权利说：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你有自由地选择一种宗教去信仰的权利，更有自由地不选择任何宗教的权利；同时你也有权利不向教会捐款，从而摆脱这种来自宗教方面的经济负担。

2. 致力于政教分离。他们认为他们在严格地遵守着由美国法院所阐释的宪法条款，同意杰斐逊总统在他那封著名的给浸礼会（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这个宗教派别反对婴儿受洗，认为给婴儿受洗不符合基督教原始教义，主张成人受洗，因为受洗者成年时才可以理解受洗的意义）教友的信中的观点，即法律不应支持某一种宗教的建立。相反，它应该努力“在教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筑起一道高墙，使它们分离开来”。他们接受并且支持杰斐逊总统关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解释，要逐步地在政府与宗教运动之间筑起一道“高墙”，以使它们分离开来。

杰斐逊是维吉尼亚洲宗教信仰自由法令条例的制订者，这些法令条例表达了他的许多有关自由权利、个人内在道德的思想，表达了他的许多有关摆脱了强制性的、宗教团体限制的自由的自由的思想。另外，他是一个知识怀疑论者、自然神论者。他不相信有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同信仰的神，而相信“自然和自然神”的观念。他谴责已经确立的宗教习俗，认为国家政权支持教会就如同曾经存在于殖民地美洲和欧洲大部分地方的教会一样：强迫一个人为他所并不信仰的（宗教）观点的传播交纳金钱，这种行为有罪且专横。

在那封著名的 1802 年的给浸礼会教友的信中，他以一些极为强有力的措辞表达了政府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我以极大的诚意相信全美国人民的行动，即宣布他们的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法律不应该对宗教组织表示敬意，也不应该限制其自由的活动，以在教会和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堵分离之墙。”

在 1973 年 Allen 上诉 Morton 的案件中，就开始明确地认为

法律：第一，必须清楚地表示出来世俗的（即非宗教性的）、立法目的；第二，对于宗教，它既不起促进作用，也不起阻碍作用；第三，政府必须避免过多地干预宗教事务。

他们认为，政教分离是保证无神论者自由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种分离，国家就会运用政权的力量、甚至运用武力去强制一个无神论者去接受一种宗教性的信条或者限制他的自由。他们认为只有当国家政权与教会分开、从而教会独立地坚持自己的信条时，无神论才是可能的。当教会独立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时，它能够以一种平和的立场、逻辑地（intellectually）对抗自己信条的无效性；而当国家政权的力量与它相对抗时，它就不能以一种平和的立场、符合逻辑的方式被对待。

只有当一个国家不再用一种（宗教的）教条约束其公民的时候，无神论者才有自己的自由；否则他们只能被迫而非自由地去信仰。所以他们认为“政教分离是保证无神论者自由的重要前提条件”，没有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3. 保护无神论者的公民权利。如果一个人把无神论、不信仰任何宗教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基于此他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协会有义务保护他；例如，当前的法律制度因为一个人不信仰“最高存在”（一般指上帝）而不让他担任公共职务，这就侵犯了公民的权利，协会将为公民获得这种权利而努力。

活动及传播 自从协会产生以来，它做了许多工作，举行了很多活动，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例如在全国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会议与集合，其中包括“无神论者的骄傲”的游行；反对政府把资金用于支持宗教性的公众集会；代表无神论者的权利；主张政教分离等等。关于无神论、对宗教的批判、政教分离方面，出版了120多本书籍；出版了 Madalyn O'Hair's 写的《为什么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还出版时事通讯、期刊杂志等。另外，还出售一些有关的张贴画，等等。

你可以在《时代》杂志、《生活》杂志、《花花公子》杂志、

《周六晚递》、当地报纸等多种传播媒体上读到这一组织的有关情况。他们还经常在媒体中露面，因此你会极有可能通过国家的或者地方的很多电视节目目睹到美国无神论协会创办者 O'Hair 博士及其主席 Jon Murray 的风采；或者通过收音机听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还有各种途径让会员和公众了解到信息，例如通过现代电脑设备、互联网等。遍及全国并且在日益扩大的代表们的网络认真注视着十分重要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问题，他们在各自的地区代表组织中发挥着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自愿者的网络，他们在各自的社区中承担着许许多多的工作——从把美国无神论者协会的书籍安置到图书馆到宣传无神论的主张，他们都认真去做。

在国家最大的此类档案馆中保存着无神论的文献和历史，保存着时间跨度为三百多年的无神论思想。

二、他们为什么是无神论者

问：在我们的印象中，西方人都是信基督教的，为什么有人持无神论主张呢？

答：西方人并不都信基督教，近代科学与无神论的有关思想就是从西方国家产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宗教本身的认识，一方面也是对现实问题的感受。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的反科学性 (religion is anti-science) 美国无神论者用科学反对宗教。认为宗教的教条永远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得到证实。因此，科学是宗教的大敌。他们一一驳斥道：科学研究表明地球远远不像基督教所宣称的那样只有 6000 年的历史；而且，处女生育（意指处女玛利亚感灵而生耶稣）是不可能的；圣餐变体说（即信徒在领圣餐时，面包和酒即转变为耶稣的身体和血的说法）也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教会在阻碍着科学的进步。科学

方法不断地为人类问题增加着解释，并减少着用宗教信仰解决问题的需要。一个人利用科学的方法能够很容易地证明祈祷的无效性。因此他们呼吁关注孩子们，不要让他们由于宗教团体的引导而被拒绝进入科学的殿堂。

宗教的反生命性 他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宗教进入人的生活最坏的是它会给人以宗教性的、反对生命 (anti-life) 的教导。

生命并不重要，教会说，它只有为死亡和来生做准备时才有价值，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死后”。教会认为这个世界及其在上面存在的生命都是不重要的，它们没有价值。我们在尘世的努力只与我们将来所拥有的永恒存在有关系。

但是美国无神论者（协会）认为：如果你认为尘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应该最大程度地实现它的价值，那么，“你就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了”。而如果你仍然有某种感觉，认为你需要为某种超越的东西而做准备，那么你就仍然处在有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某个地方。社会学研究表明，在美国有大约 22 500 000 无神论者，他们拒绝把生命花费在为死做准备这种观念上，他们发现了最终的、根本的自由——精神的自由。

税的问题 有关税交的问题，也是美国无神论者反对教会、主张政教分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这里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他们认为宗教在干扰着他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在纳税方面。在美国，一般家庭每年至少付 925 美元的隐性税来使教会免于多种税目。教会不用交营业税、继承税、收入税、个人税等等名目繁多的税交项目。他们所拥有和运转的商业不用交企业税。

华尔街杂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合众出版社认为罗马教会的资产已经超过美国五个最大的资产者 (General Motors, Exxon, Ford, Mobil, and Texaco) 的总和。基督教新教徒所拥有的资产几乎和罗马教会拥有的一样多。据其国内税收部门报告每年教会的收入至少有 490 亿美元 (1991 年)，这还不包括教会的商业、财产、遗赠、股权、债券、报废和租借回扣等方面所得。所谓“租

借回扣”的把戏是一种教会利用其税收豁免权的十分要命的方法。教会做一个纸面的双方协议。比如 1 美元，它买了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所有权已经发生了转移，即转移给了教会，这桩买卖就使这个公司免去了财产税与公司收入税。然后教会按月租给它的卖主，即公司的原所有者。公司的原所有者付给新业主即教会的租金就以给教会捐赠的形式而获得免税了。这样，政府在这个公司的所在地本该入库的收入就以捐赠给教会的形式被偷逃诈骗了。教会赢了，商家赢了，但政府和普通纳税人亏了。

教会或商家避免的每一块钱的税收就得由别的纳税者来弥补。如果税收对合众国的运作必不可少的话，教会从税收中拿走的那一部分，就必须要有谁来填补上。

美国教会在各州平均拥有 20% 的私有土地。当这 20% 的土地从税基中抽掉时，其他土地和房产所有者就要补上这个差数。如果你所在的社区教会公平地交纳它的财产税，你的税单就会小得多，同时也不必为弥补财政赤字承担着每年上涨的税负了。

基于此，他们坚持认为人人都有信教的合法权利，但宗教的开支应该由那些教徒来承担，而不应由每一个公民来分担。

他们认为：“我们有权利不承担为支持一些人规律的教堂生活加在我们身上沉重的苛税。”在名目繁多的援助项目下，联邦政府每年为宗教的目的花掉 500 亿直接的现金和税收减免。美国有 250 000 000 人，每年每人用于资助教会的费用至少 211 美元。你家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就要支出多少个 211 美元！这还不包括信众个人和企业直接捐赠的款项，这笔款项达人均 196 美元。

他们认为那些并不关心参加有组织的宗教的纳税者和那些远离教会的纳税者，不应该被迫承受来自任何由政府组织者设置的名目、计划和立法的额外税负，不论这个政府组织是城市、乡村还是全民、国家。他们认为通过允许教会以税收免除的方式资助教会的行为是对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的违宪侵害。

信仰无神论 他们认为：

- 没有证据表明神的存在。
- 神的存在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处。
- 如果一位善良的神没有力量，它是毫无用处的。
- 一位有力量神如果不善良，他也不值得尊敬。
- 没有全能的（富有力量）善良的神，否则就不会有不完美。
- 如果这个世界就是神所能够造就的最好的世界，那么有关天堂的故事一定是谎言。
- 历史表明拜神主义（godism，信神并且把它“主义”化）总是伴随着无知与迷信。
- 没有任何东西像拜神主义者有那样的褊狭与困扰。
- 人类在科学、自由、革新上所获得一系列进步的同时必须同拜神主义做斗争。
- 拜神主义是远古时代人类无知的产物。每当一种新的事实被发现，拜神主义就后退一步。新的发现从来不会支持关于事物的有神论解释。
- 拜神主义与罪恶、残忍、嫉妒、怨恨、不宽容是一致的。基于此，他们自信地选择了无神论信仰。

三、无神论能够带来什么

问：信仰宗教，灵魂就有了寄托，并且死后还可以上天堂，无神论能给人带来什么好处？或者说，人们为什么要相信无神论呢？

答：灵魂，更确切地说是人的某种精神，需要有个“寄托”，但寄托要有个可靠的所在。假如寄托给一个并不现实的东西，那么这种寄托归根到底是自我的丧失。人们在超市，手提包要寄存在寄存处，因为那是个可靠的地方；没有人愿意把手提包寄托在空旷的大街上，因为那里不可靠。把自己的灵魂寄托给虚无缥缈的神，就像把手提包寄存在大街上却希望它安全一样，这实际上是把灵魂放在一个没有自信也不能自立的境况之中。

所以，美国无神论者认为，坚持无神论，有以下几个好处：

积极向上 我们即时即地，而不是在死之后想像的某个地方解决人的问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要，没有饥饿、贫穷、疾病，这是一个通过人类即时即地的努力和合作可以实现的目标。

博采众长 我们吸收周围各种不同的知识，选择其中最好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与有神论者不同，他们基于信仰给自己制订了一套不可超越的知识范围，而我们不给自己以任何限制。

内心自决 有神论者听从外界的指导，而我们则是依靠我们自己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逐渐认识到对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的、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指导原则来自于三个方面：自然史、人类历史和人类自身的交往。我们不能希望依靠超自然的东西来介入我们对问题的解决过程。

独立自由 在日常生活中，有神论者的生活的基础是一套详细的行为规则，他们依靠规则生活；而我们不需要僵硬教条的指导。

幸福快乐 无神论者选择了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没有选择在一种封闭的有神论的状态中生活，他们是幸福快乐的。这是无神论者摆脱有神论所拥有的令自己感到幸福与满意的生活方式。

承继自由 一个人天生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这种环境的大小直接与他所能够享受到的自由相关。我们每一个人负有责任，即保持住这种自由或者扩大它，而不是让它减小。如果我们听任这种自由的逐渐减小，那么后代必定要从一个自由更为狭小的环境中起步，去创造他们的生活。每一代人必须要保持住前代人所获得的自由，并尽可能地扩大它。每一份自由的获得都是朝向获得精神（智力）的自由——这种最终的、根本的自由迈出的一步；以此，无神论者对待宗教自然地持双重态度：宗教是站不住脚的，它甚至对于人类思考的进程是有害的。它贬低了逻辑与

理性。但是，逻辑地看来，相信宗教是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利。例如，如果一个人愿意相信他是一棵树，那么这是他的特权，别人无权过问，只要他不妨碍其他人。当宗教性的团体进行扰乱时，无神论者能够而且一定要反对。

这是一种具有真正个人自由，没有束缚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另外，他们认为无神论可以教人们懂得：

- 没有天父。
- 人类必须保护孤儿和弃儿，因为他们不能自保。
- 神不会回答祈祷者。
- 人类必须倾听自己的声音、必须自助。
- 根本没有地狱。
- 没有让我们去害怕或者模仿的有报复心的神或者恶魔。
- 通过信仰无法使人赎罪或者得救。
- 我们必须面对我们自己行为的后果。
- 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善意的或恶意的目的。
- 我们必须同那些可防止的或者不可防止的罪恶做斗争。人类的互相合作是这个世界的惟一希望。
- 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努力做我们分内的事。
- 必须现在就做，要么永远别做。
- 不存在具有神性的真、善、美和自由的监护者。
- 这些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必须守护住它们，以免它们从这个世界消失。

用科学的态度认识世界

——与一位基督教人士的对话

黄 炜

我曾有机会与一位基督教人士探讨过宗教的问题，回忆起来觉得颇有意思，现将我们的谈话摘录于下，希望能带给读者一点启发。

这位先生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问别人：“你相信神吗？”那人回答说：“我不相信那些我看不见的东西。”他接着说：“那你相信这房子内有无无线电波吗？”那人无话可答。

我沉思片刻说：“无线电波可通过实验来证实，神的存在通过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实呢？”

注：我不禁想起了欧洲的中世纪，那时候，许多有别于基督教的其他学派都被称为“邪教”，都要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各种书籍被焚，直至一些倡导者被送上绞刑架。现在人们有了相当的自由，不再受制于宗教组织，宗教徒们不得不开始研究自然科学，试图找出对他们有利的证据。这明显的对比怎能不叫人怀疑，由怀疑神的信徒到神本身，他的仁慈，他的真实性。

这位先生说道：“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不是混乱的。‘宇宙’一词在希腊语中的意义就是‘和谐的排列’、‘有秩序性的’。是的，这个宇宙中充满了秩序性，规律性，这秩序性、规律性难道会来自偶然的爆炸吗？爆炸不会产生秩序，只会产生无序和混乱；秩序来自于智慧，来自于思维。因此有一位伟大的宇宙建筑师、设计师。”

我答道：“我们的无序与有序的概念是人定义出来的，是对宇宙万物的一种认识、一种描述。这是相对的，从一些角度考察，我也可以说宇宙是无序的。从宏观（空间上、时间上）的角度看，无序是绝对的，有序是相对的；如果考察某一个局部，它则可能是在一定限制（总体有序情况）下做无序运动。比如我们常说电子在作无序运动，但它们在常规情况下又只在原子核附近运动，也算是一种有序；人类社会纷繁复杂，但它在很多方面也受一定的制约，遵循一定的规律。这些就是一定限制下的无序运动。从整个宇宙来看，又充满了无序性，即使在空间上是暂时有序的，在时间上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另外，宇宙大爆炸只是一种假想，并不是无神论者的全部理论。何况能将宇宙大爆炸和我们平常概念中的爆炸相提并论吗？”

规律的本质与来源

他说：“宇宙间各种精确的规律（我的注释：而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却是无神论者们发现和创造的）是一位充满智慧的规律创造者创造的。”

我说：“我认为，这些规律应该是在宇宙的运动变化中，在无数次的组合、淘汰中产生的。规律的建立有由大而小的可能，比如有了整个地球气候的规律，再渐渐有了生物生存的规律；也有由小而大的可能，比如由某种分子的运动特性形成了由其组成的物质的特性。也就是说，规则可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并且规律的产生也带有偶然性。偶然因素也具有建设性，比如好的基因变异；而不是像一些基督教徒所认为的那样：偶然因素只有破坏性，因而不可能产生规律。”

他说：“规律是有理性的，因此不可能是无理性的大自然创造的。”

我说：“规律只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客观存在的代表，并不

是什么理性的东西；规律是一个抽象出来的东西，是人类赖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规律也许只是人类思维中特有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这样来理解规律：宇宙在运动变化中、在组合淘汰中形成了大自然的某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时候世界就以我们人类认为是处于诸多规律控制下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状态要靠什么规律维持着。规律只是稳定状态的附属品，而且可能仅仅是人类经过思考、抽象后附加上去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可能只是宇宙当中某个局部的情况，所以所反映出来的规律也只是局部的规律。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规律的本质与来源。”

“状态改变了，规律也就改变了、消失了。大自然的状态是复杂多变的，因而规律也就显得错综迷离。可能一些规律在人类的眼中好像是持久的，但人的寿命才有多少年？整个人类的历史才多长？这些规律一直在管理着宇宙吗？不见得。恐龙时代的规律在人类时代还都能继续起作用吗？规律也不一定都是早就存在的，新的规律仍不断产生着，它们有的就产生于有了人类以后，甚至有的规律就是人间接或直接、无意或有意中创造的，比如市场经济规律、计算机制造与发展规律这些诸多的社会科学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还有道德、法律等。这些例子即说明了规律的时效性和变化性，而不是像基督教所认为的那样：规律是一成不变的。”

“宇宙规律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也是相对的，仅举一例：流星的碰撞。这说明，宇宙的法则也带有一些盲目性与偶然性，而不是像基督教所说的那样是由神精心设计好的。”这样，我就谈到规律的另一个特点——

规律是相对的

我们需要对此总结一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类的科学理论都不能被断定为是绝对的正确，人类所总结发现的理论和规律是相对的、局部的，相对的理论是不可能解释所有奥秘的，局部的理论也是难以解释整体的情况的。比如在宇宙起源和人类起

源的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们目前在这些方面所拥有的理论显然不是这些领域的定论，只是某一个阶段的理论水平。即使这样，宗教人士也不能用宗教观点甚至仅仅是一种信仰来作惟一的解释，因为它们也并没有得到确认。假以时日，更正确的理论会出现。但我认为，万事万物是多变的，甚至是随机的，也许宇宙间就少有或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与规律。我们亦可以这样来理解规律，它是某个局部范围、某一时间段里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情况的一个近似反映，人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用这个近似反映推理、判断一些问题，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在它的帮助下解决很多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近似反映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而且一旦超出了该范围，这个近似反映几乎就失效了，甚至会推论出一个悖论。所以人类只有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不断探索探索，采用新思路、新方法，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找到更准确的规律。

不管是规律的错综迷离、富于变化的特点还是宇宙的总体无序性特点，它们都给了我们这样一些启发：知识是无穷的，人类的知识只是人类未知世界的沧海一粟，因此我们在社会实践与科学实践中碰到各种难题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但我们也不要对认识、适应、利用、改造我们的世界的实践采取消极的态度，我们应该勇于探索、勤于探索，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研究并更多地掌握我们未知的世界。在这方面，先辈们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另外我们既要重视知识的继承与积累，也要具备批判地吸收的科学精神，这不仅指对待前人的知识，也包括对待自己的经验。

复杂多变的大自然就必须是超自然的力量创造的吗？

他说：“光、热、声、磁、电、万有引力等为什么具有如此惊人的特性呢？为什么能量会存在于如此不同的形式中呢？它们显示了创造中伟大的设计及其目的性，一定有一位超凡的物理学家

创造了这一切。”

我反问道：“既然《圣经》是神的教谕，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创造的，那么这些现代科学的概念在以前的《圣经》及有关教义中有没有记载呢？实际上当时只不过记载创造了人、动物、植物、天地等等而已。将来的科学内容在现在的圣经中有没有记载呢，是哪些呢？还是只为了迎合人们，随时将新东西都纳入圣经，说成是神的创造？”

他说：“如果地球离太阳近一点，那将会太热以至人不能生存；如果离得远一点，那将会太冷，也不能生存。如果地球自转慢一些，那白天日照时间加长，会变得太热，晚上散热时间加长，会变得太冷。地球上有大气层使我们能够生存。为了生存的需要，地球上也有水循环。地球倾斜了 23.5 度，使我们能够拥有季节性。地球上也有生活必需的氮气循环和氧-二氧化碳循环。所有这些生存环境在同一时间内因偶然发生从数学角度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地球让我们看到必定有一位充满智慧的创造者。”

我说：“概率小是事实，但它并不代表不可能或不存在。正因为条件复杂、苛刻，所以在人类的最尖端的技术能测到的庞大范围内，地球的环境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已经说明了地球环境产生的概率极小的问题。这种组合对人来讲是非常稀有珍贵的，对整个宇宙来讲或许并不是特别的了不起，确实只是一种偶然的组合。没有这种组合的星球上也能存在别的东西，可能也是稀有珍贵的，但并不一定是生命。生命这种存在形式对人来讲弥足珍贵，对宇宙来讲只不过是无数存在形式中的一种。我也可以说，也许火星、海王星的环境组成也是稀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因而是珍贵的。同理也可以用到其他星球上。都成稀有、珍贵的了，也就不珍贵了。分析自然现象时不要加入感情色彩（哪怕是很隐秘、很细微的感情色彩都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一种潜意识的影响），要强调客观性。以人为本的思想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往往是

一个潜在的障碍。每一事物的产生往往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促成的因素多就说该事物的产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就一定不是大自然产生的而是来自于某个超自然的源头。另外这些复杂的环境条件并不一定是在同一时间产生的，其中有一些条件可能是在地球的漫长演化中逐渐形成的。”

他说：“冰浮在水面上是因为水受冻后出现膨胀现象。水是自然界中惟一的降温受冻后膨胀的物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例外呢？如果冰比水重，那湖泊、河流、海洋在冬天将成为固态的冰，其中的鱼类都将死尽。然而冰是浮在水面上的，这就可保护冰下面的水免受寒风的侵袭。水是自然物质的例外这一事实显示了充满智慧和目的性的设计，显示了造物主奇妙的创造。”

我说：“在宇宙中，在地球上，出于人类所总结的自然规律的例外显然不只是水一种。这本来很正常。而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何况是人类总结出来的规律）本身也是相对的，并不适用于所有事物。从广义上来说，具有独特性质的物体相对于别的物体就是一种例外。我们不要对某种奇特现象大惊小怪，继而产生盲目的崇拜；应该给予客观、科学的分析，即使暂时找不到答案也不应盲目崇拜。”

他又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万物之美来自随机发生吗？随机和偶然只能导致混乱、盲目、破坏和朽烂，而不是美丽。因此，美是不是来自神的创造呢？”

我给他举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万花筒中的美就是随机产生的。我接着说：“可以说高山、海洋正是在混乱、盲目、破坏和朽烂之中产生的——地壳运动孕育了它们。火山爆发也能产生美的东西。岩洞、石林这些美景不都是在随机中产生的吗？还有一点很重要，人类的美的概念是人定义出来的。同一事物，有的人认为它是美的，有的人则认为它是丑的。”

他又说：“大自然是没有感知、智力的，因此它不可能创造美。”

我说：“大自然创造新事物/物种时并不需要感知与智力，它只是创造了事物，并不管它是美是丑、是聪明是笨拙。所以自然界的事物有的被人们认为是美的，有的则被认为是丑的。”

对生命创造的认识

他举例说：“活细胞是相当复杂的，由核酸，蛋白质等复杂的大分子构成。其中所有的都必须完全正确，否则细胞就不能成活。同样，那首先活着的细胞必须拥有一套完整的获得能量、利用能量的系统，而且必须拥有一套完整的繁殖系统，否则生命就会灭绝。现在要相信生命来源于偶然发生，是十分困难的。从数学上讲那是不可能的。相信物质随意组合创造了生命是不科学的。即使用我们所有的智慧、知识，并在实验室控制的状态下，人还是不能创造出一个活的细胞。因此这些只能来源于神的创造。”

我说：“我认为，第一个细胞应该不具备如此完整的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细胞就不能存活并繁衍下去，生物在不同的条件下自有其不同的生存方式；完整的系统是进化来的，生命的进化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人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难道这个组成部分一定要比它的全体更伟大吗？关于生命的创造，即使人类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说大自然就做不到呢？”

我又继续谈道：“你们由于绝对不相信有进化这样的过程，所以认为什么东西都是一下子造好并达到完善的，因而你们才会提出第一个细胞必须拥有完整的利用能量的系统和繁殖系统，第一只鸟必须是为飞行而被完美设计的，第一批蜘蛛应该具备完善的织网器官和知识等论断，然后迷惘于它们是怎样一下子拥有这些东西的，继而走向盲目崇拜。以蜘蛛为例，我认为，第一批蜘蛛应该不具备完善的织网器官与高超的织网能力，但它们应该会有别的求生的能力。基因变异、自然选择这些因素使它们的织网技能越来越高并形成一种本能，好的基因又传给了后代，于是产生了现在的蜘蛛。在对生物进化过程的理解上我们还需要明白这样

一个道理：0 到 1 的突破是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但 1 到 100、10 000……的量变过程相对就显得容易了。所以，原始生物在诞生之初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过程，而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物种及其各种高超的生存技能相对前者而言反而不值得我们为之大惊小怪。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后我们对生物的进化以及其他各种自然现象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了，并且这些现象在概率学上也就得到了更合理的解释了——因为各种情况（条件）并不一定是同时发生的。”

他又举了这样的例子：“但是你确实有一套相当完美的盒式立体声音响，且刚好设置在你的头上。你会相信这是基因突变的结果吗？如果这类事情可以发生，那制造音响器材的公司就应解雇它们的工程师，让随意变化来生产他们的音响器材。”

我说：“这样的言论亦反映出你们认为人、动物是跟一件产品、一幢建筑等一样的，是经过设计，然后制造出来的。但动物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有的古代陆地动物经过漫长的进化后定居水中，它们的腿就变成了鳍，这种鳍也是为水中生活设计好的么？产品制造怎能与人（生命）的进化相提并论呢？”

注：一些基督教徒常常对动物的一些特殊技能极为推崇，并归结为是智慧的神创造了它们。我则认为这些特殊技能中有很多只是动物的本能，是自然的造化、千万年进化的结果，并没有特别的了不起。只因人不具备、不熟知，所以觉得惊奇。而实际上有的技能并不是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神奇。举一例，候鸟的迁徙能力是人们所常常称道的，但我认为，鸟飞到一定高度之后视野要比人宽广得多，定位自然就容易多了，再兼其速度快，行动轻灵，因而数千公里的路程对它们来讲可能就不是极难的事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只要对比一下蚂蚁的视野与行动和人的视野与行动就知道了。还有，人类能够根据太阳、星星、地形判断方向，为什么别的动物就不能具备这种能力呢？人们总是自诩其智

慧，轻视别的生物，因而一旦发现别的生物也具备人类的某些能力就大惊小怪得不得了。

对于“宇宙规律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宇宙的有序性”以及大自然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比如某些动、植物的高超技能和反常规现象，我们还可以用一句话加以解释：存在即合理。而这个道理也是与规律的本质和来源密切相关的。这里的合理并不一定指合乎（人类的）情理，而是指合乎事物产生的道理，是指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实实在在地发生并存在于那儿。不少人包括基督教人士不愿意相信偶然性，实际上宇宙中充满偶然性，明白了存在即合理的道理后也许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偶然的東西确实是概率极小的东西，但概率再小也绝不是说它就不能发生，何况是在久远的时空条件下呢，这一点与概率学并不相违背；它一旦产生就是合理的，不管它本身有多奇特、有多惊人，不管人们多么难以相信和理解它。明白了这样的道理对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他说：“进化的总理论缺乏根据。突变是由于遗传密码中发生错误所致，并不能产生出更有发展前途的更复杂的组织结构，器官和动物种类……进化的总理论是不科学的，是伪科学。”

我说：“遗传密码传递时发生错误是会产生劣等（不能适应环境）的物种，但它极容易遭淘汰；也会产生好的物种。虽然产生新的、好的基因的概率可能要比产生劣等的基因的概率小得多，但由于新的、好的物种能够适应环境，因此就可能与原来（适应环境）的物种一起存留下来。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各种生物的优越特性并不一定是由一两次的基因突变一下子产生的，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生物的生理构造越来越完善，生存技能越来越强，物种的数量增多，大自然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如果基因突变产生的都是坏的结果，那现在的基因工程的研究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其产品也就没有销路了——事实并不是这样。进化不仅仅

由基因突变组成，基因遗传、积累也是进化的基础。日本人为什么越长越高？政府提倡喝牛奶等举措是直接的、外在的因素，好的基因遗传、积累应该是内在的因素。”

他又说：“很多物种（濒临）灭绝的事实说明历史显示了进化的反方向，就是退化和灭绝。”

我说：“你看问题没分主流和少数情况，也没从多方面考证以求得正确的答案。目前的物种濒危主要是人类作的孽。过度开发、过度繁殖必将造成灭顶之灾，类似的情况地球上可能早已发生过，那是大自然的调节。如果是神创造了万物，他为什么要狠心大灭绝再大创造呢？不会用温和的办法调节他的子民吗？”

他说：“你细胞的 DNA 分子中蕴藏有用于身体发育及组织器官功能运行的所有信息。每一细胞的这些信息都需用几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来收藏。相信一套百科全书是印刷车间的爆炸结果，与相信活细胞中 DNA 分子是偶然发生，比较之下前者可能更合乎逻辑。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

我沉思良久，对他这样说：“人类研究未知领域时会不会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呢？因知之甚少，只好将简单的信息人为细分，细胞的信息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很多理论都属于假设状态。分子、原子的模型更新了一趟又一趟，谁知道现在的模型就是正确的呢？那么对于细胞的认识是不是属于同样的情况呢？还需要指出的是，大自然的许多现象都只是在一定限制下的无序运作，我们就是用尽所有的理论、公式也表达不了，表达不清它们的情况。这样的话就不仅仅是信息多的问题了，而是表达的简单与复杂的问题了。另外生命是由简单到复杂的，是经过了漫长年月的进化的，即使 DNA 的信息很复杂也属正常现象。”

他说：“无意识、无理性的大自然不能产生出有意识、有理性、有思维的人类，无道德观的大自然也不可能创造富有正确和错误的道德感的人类，人如果仅仅是无责任的物质因素的结果，那人就不可能为其决定和行为负责。这一切只能用神的创造来解释。”

我说：“意识、理性、思维应该是生命的高级状态才拥有，而生命的高级状态是经过了何其长的时间的进化才形成的啊，所以从无意识、无理性的大自然产生出有意识、有理性、有思维的人类为什么不可能呢？思维只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之一，与其他动、植物适应世界的能力（比如微生物的化学反应能力、其他动物的本能）从大的方面讲应该属于一个范畴。这并没有什么尤其特别的，只是人类喜欢标榜自身与别的物种的不同，标榜自身超越于大自然的地位。大自然能够产生如此千姿百态的物种并赋予它们各种奇特的能力，为什么不能孕育人的思维能力呢？”

“聪明的事物并不一定由更聪明的事物创造。比如人创造的电脑在很多方面就比人聪明得多、强得多。当然，电脑也只是在某些方面比人强；同样人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他所处的大自然环境强。”

“分子、蛋白质是没有责任感和道德观，但当它们组合成了人，人又拥有了思维并形成社会后，就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则，其中就有责任感和道德观。而当人的个体适应了社会，他就能用责任感和道德观约束自己，使自己更好地生存于这个社会。在这里我们同样不能由部分的情况推论整体的情形。”

对宗教的认识

最后我想总结性地阐述一下我对于宗教的认识。

神总是被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描绘成不同的形象，中国有中国的神，印度有印度的神，希腊有希腊的神……并且这些神往往都是以人的形象出现（而且各种宗教中，地位最高的神肯定是人的形象）。有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基督教还宣称自己的神是惟一的，这不是互相矛盾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神的描述明显带有人的臆想的成分。宗教总是带着很多的神话、传说色彩，烙上了重重的人的影子；即使宗教教义中提到的一些历史证据、宗

教预言也并非确凿的证据——经历了这么久远的历史，谁能保证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宗教精英们的说法往往都不能自圆其说，又如何让大众相信呢？神直接现身于众人之前不是更可信吗？古今中外，如果有谁见过神，得到神的谕示，那么他应该能写出让众人信服的宗教教义，可惜这些教义只能让一部分人相信；如果谁也没见过神，那又怎么叫大众相信神呢？

写到这儿我忽然觉得，如果神确实存在且是万能的，为何他创造出来的人当中有很多却不信仰他，甚至让神失望并导致神要惩罚人类，最后需要“耶稣的死来使神、人和好”。请看这样一段话：

“主耶稣这位弥赛亚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升天了。他付上了赎价，要把你从罪的奴仆中赎出来，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背负你我的罪。这样你可以向罪死，向义活。你我已为自己在神公义审判的日子积聚了愤怒，但是耶稣这位弥赛亚为我们成了赎罪祭，他的宝血有赎罪的功。使神、人和好。”

神如果要他的子民们信仰他，按照他的旨意办事，那宗教徒们的布道全是多余的，因为神只要动一动意念，这些事就都办妥了。早一点让所有的人都受到教化不是更好吗？何必让他的信徒们做这些又麻烦又费力的事呢？难道是为了磨炼这一少部分信徒？不过这样的效率未免太低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宗教中关于神的描述。

（我仍举基督教教义中的描述）“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说：“地要发生青草……”

看到这段话，我觉得佛教徒还是比较谦虚的，他们倾向于尊重宇宙的客观存在，天地万物本身就存在那儿，佛祖是后来诞生

的，是通过修行得道的。佛祖只是一个法力无边的、道义的象征与维持者，他不包办一切，只管大事与突发事件。基督教徒的口气就大了，神是万事万物的始祖，他创造了一切，那么多事物、规则以及各种繁琐的细节都要一手操办，当时应该还是比较忙的，等全部造好后直到现在，神开始享清福了，连面都不露。偶尔子民们惹他不高兴了，就降下灾难惩罚一下他们。

这类宗教还是劝人行善、修身养性的；还有一类宗教则是引发部落冲突、局部战争的根源（当然，这些往往罪不在宗教本身，而是信奉它们的人们太痴迷、疯狂了）；最遭人唾骂的则是一些不断翻新的蛊惑人心、扰乱社会、引导人们集体自杀的邪教。对于这些我们必须一一加以辨识。

我们再去看看那些宗教教义，其中有很多言论很难让人信服。我仍然举基督教教义的一些言论为例。“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而蚂蚁是有君王的，即蚁后。神的话居然有常识性错误，还是没来得及将新的科学知识纳入到旧的教义中呢？再说“懒惰人”真的是懒惰吗？他们难道都不想自食其力吗？还是不愿意被官长和君王剥削呢？神是为谁在说话呢？

“神给了以色列人健全的法律，而对那些没有这一法律的人，圣经教导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比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神为什么只爱护某一个民族呢？还是只是这个民族臆想出来的呢？以色列人现在所用的法难道还是几千年前神所给的那“健全的法律”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修改这“健全的法律”呢？

更多的历史证据和社会实践说明，道德、法律来源于人的实践和思想，不是来自神。古今中外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

都强调现有的法制以及他们的权利都是神赋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尤其从中国历史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君王都是坚决维护旧有的法制（制度）的，决不允许任何人做哪怕稍微一点的改动。还有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用铁的手腕维护宗教教义和许多陈旧、错误的知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假如道德、法律真是神给的，那人类的道德、法律为什么总还在不断发展变化呢？而且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为大众服务，而不是像以前仅仅被少数统治者利用。这些变化当然是人为的结果，是大众努力的结果。这样说来，人岂不是比神更公正、更高明了？神为什么不好事做到底，起初就给人类一个完美公正的道德、法律呢？因为道德、法律是人类自己探索、奋斗的结果，而不是神给的。

从《旧约全书》到《新约全书》，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我从中觉得，这些教义都不是神的话，而是人的话。人在崇拜神的时候却不断暴露了以人、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潜意识：神的人格化、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人超越于自然……

神的存在与否，争论了几千年仍是谁也不服谁。我觉得，神是否存在并无须大家辩论，我们不如将重点由盲目崇拜神转向劝人为善、积德养年等等事情，这其实本是一些宗教创立者的初衷。如果有神，他见我们这样行善事，自会保佑、嘉奖我们；如果没有神，我们也一样活得自在，该怎么活就怎么活。

评《转法轮》

——兼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钟科文

《转法轮》是李洪志公开出版的一本布教的书，是“法轮大法”这个非法组织的成员必读，而且必须反复阅读的根本“经典”。

不过坦率说，如果不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一个思想健康的人，很难把这样的书看下去。因为它的内容只是些东拼西凑、陈腐久已的胡言乱语，信口开河，鬼话连篇；而且语言粗鄙，文字不通，既无逻辑，也无文采。像这种低下的江湖巫覡类书，在缺乏文化和科学常识的群众中会有一定的市场，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现有的材料看，对它尊之为“经文”，奉之为神圣，不仅自己崇拜有加，而且广为弘扬，以至教诫国家领导人也去专心诵读的，还有不少高文化层次的人。联系组成“法轮功”组织的成员，有些竟然是教授、专家，甚或名流，就值得认真思考了。

(一)

《转法轮》中的奇谈怪论触目皆是，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摧垮“常人”的意志和判断力，归命于“法轮大法”，依附于李洪志。为此，这本书确定和宣传了三种基本信念。

第一，确立和宣传“法轮佛法”是超越现有一切认识和理念的最高法门，是惟一应该信仰的根本道理。

李洪志称他的“法轮佛法”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是千古以来能够把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的道理。这种“最根本的佛法”，叫做

“真、善、忍”。“真、善、忍”是永恒不变、无所不在、“宇宙中最高的天机”，是“宇宙的特性”，也是一切物质和一切人必然共有的“特性”。“法轮大法”规定的修炼目的，就是回归于这种“特性”，与此“特性”相“同化”。因此，在“法轮大法”中，这个“特性”被视为李洪志开天辟地式的新发现，是最高教义。

事实上，这个教义本身就是拼凑，而不是什么创造。基督教文化提倡“真善美”，日本创价学会主张“利真善”，中国佛教禅宗主张“忍为教首”。这些说法，在不同的宗教体系中，有不同的意义。李洪志把它们抄来，变成了完全另外的东西。

按李洪志自己的解释，他所谓的“真”，是来自道教，即“修真养性”、“返本归真”的“真”。“修真”、“归真”的终极目的，是“修成真人”，即成为“神仙”。因此这“真”既指“元神”、“本体”等不灭的灵魂，也指修炼成神，达到神灵世界的至高境界。他有时也讲“真相”，主要是在显示“常人”没有通向神灵世界（真相）的认识能力。简言之，李洪志是把“真”作为宗教概念使用，而不具有认识论意义。他经常教人“说真话，办真事”，也是从“修炼”角度，要求人们说话办事得以他的“佛法”之“真”为准则。

“善”也是如此。它直接来自佛教的“仁慈心”，“看众生都苦”，为的是让他的信徒自卑人身就是苦与罪，以便依附他的“佛法”，从“人类”这个层次中解脱出去，“渡己渡人”。因此，这个“善”也不属于我们“常人”理解的道德范畴。

至于“忍”，李洪志没有说明直接出处、含义隐晦。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与“常人”认可的忍让或忍耐不是一回事，而是贯彻着李洪志所谓的“失与得”律：“失”的越多，“得”的越多；反之，若想“得”的多，必须“失”的多。此中的“失”，是要修炼者“失”去普通人的观念、情欲和需求；所谓“得”，则是得到李洪志给予的“功”与“法”。在这种“得失”的转化中，忍受屈辱与认可“佛法”是关键。因此，对于练功者是能量的聚积过程；对

于“法轮大法”，则是聚积或组织能量的手段。李洪志要求他的门徒经受“魔难”，接受“磨难”，准备“劫难”，也是“忍”的重要内容，其用心在增强信徒们抵御外来反对和批判迷信的能力，也在增加一旦被依法取缔时，思想上应有的应变能力。

一句话，真善忍的“根本道理”是颠倒常人的全部观念，特别是价值观。

第二，确立和宣扬创立“法轮佛法”的李洪志是惟一的真神，全世界的救世主。

《转法轮》把“真、善、忍”这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说成是大至天体，小到粒子，充塞物质世界每个角落的“特性”，所以又称“宇宙大法”。这个“大法”首先贬斥现有的一切宗教。据李洪志说，作为佛教创始者的释迦牟尼不行，道教崇奉的老子和基督教的耶稣，同样不行。尤其是现在，这些“神”都撒手不管人事了，“全世界很多正教都不能度人”，他李洪志在这个时刻出山度人救世，比先前的“神”高很多层次。在这个意义上，他宣布他的“法轮大法”是“超宗教”的，不是“宗教”。

李洪志本来是在“气功热”中以气功师的身份出现于街头的，到了后来，他一再声明，他的“法轮功”不是“气功”，而是“修炼”。在他看来，气功师的表演都是“小能小术，小得可怜”。所谓的“小能小术”，是指某些高气功师炫示的神功，即“特异功能”。而他的“修炼”，不止能开发通常的“六神功”，而且有“上万种功”。他常用的神功是给他的弟子辈“开天目”、“下法轮”、“净身”，并用“法身”保护他们，即重在做其弟子辈的“主”。他抄袭佛教的“业报轮回”说，说有病是“前世作业”的报应，气功不能治，医学也不能治，而修炼他的“大法”，能够“消业”，可以不治而愈，所以他反对他的门徒治病。据此，他比当前的“高功夫师”又高许多层次。他的“法轮大法”则是超气功的非气功组织。

李洪志一再贬低宗教和气功，与近20年来国内的宗教升温、

气功被日益神异化的趋势直接有关。他把“法轮大法”的发展对象，首先放在那些迷信特异功能和信仰神灵世界的人群中，同宗教和气功团体争夺市场。他把“法轮大法”定位为非宗教非气功团体，则是为了游离于二者之间，逃避国家对宗教和气功的依法管理。

但就大多数人言，科学比神灵更有权威。至少在近20年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科学是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也是人们通向真理和幸福、全面提高素质的基本途径。李洪志为了扩大“法轮大法”的市场，就用最大力量攻击科学。他说：“现在的科学……是站在一个错误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对宇宙、对人类、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修炼界的人根本不承认现在的科学。”他又说，现在的科学，已经“走到了极端”，人类掌握的知识，“已经到顶”。“因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只限制在人类的知识范畴”，如果再研究下去，就会“发现宗教所讲的是对的”，“完全是真的”，“高功夫师”们自称具有的“佛、天人所掌握的就是超出人类的更高的科技”。这种超人类的“科技”，相当于“超自然力的神通”；“没有电视机”，“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没有火车、汽车，人坐在那儿就飘起来”，像“外星人的飞碟，来去神速”。这样，科学已经无能，宗教全都不神，气功只是小术，人类剩下的惟一出路，就是信仰“法轮大法”，皈依李洪志麾下。

李洪志很了解执迷于宗教幻觉和“特异功能”者的心理易于受控这一现象，他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他认为鬼狐“附体”是真实的，而“附体”就是被外在精灵所占领，所控制^[1]。所以他一再告诫他的信众，不要被别人控制。而要免受控制，就不能执迷。对气功、对宗教、对世俗关系，从家庭伦理到社会规范，都不能执迷。现代科学不相信鬼神和彼岸的存在，也是一种执迷，统统都要破除，都要掏空。惟有他的“法轮大法”“博大精深”，“是世界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

常的科学”，应该填充进去，应该至死执迷。一句话，李洪志是非常自觉地在“改变常人的观念”，使用一切超常语言摧残人的自信和意志，剥夺人的理性和判断能力，以转化成“大法”的观念，李洪志的意志。这种实施精神控制的方法，在西方新宗教运动中，称之为“洗脑”^[2]。

“洗脑”的直接落脚点，是培植对李洪志个人的迷信和盲从。《转法轮》就是用于“洗脑”，培植迷信盲从的专著。李洪志说它是“一本超常知识的书”，是“一本上天的梯子”，是“一本天书”。在这本书里，“每个字都是我的法身”，而他的“法身”，能够监护他的每一个门徒，并通管“全人类”。因此，他告诫他的信众只许读他的书，听他的话，看他的录像，忠实于他的“大法”。此外不许接受任何知识和信仰，不许“混修”。其结果直接就是使“法轮大法”在思想上具有狭隘的封闭性、愚昧性；在组织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宗派性。

第三，确立和宣扬有一个在其他空间存在的“法轮世界”，是摆脱“常人世界”的“天国”。

李洪志宣布：“‘大法’的师傅只有一个，进门不分先后，都是弟子。”这话对了解“大法”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天地君亲师”，“师”的地位与“天地君亲”相同，是中国最重要的封建伦理观念之一，所以流传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历来的行帮、会党和其他民间秘密结社，大都以师徒关系为纽带组成。“师傅”或“师父”，就是这类帮会党社的领袖；其组织内部普遍实行家长制，“师父”就是家长；在思想上，多半迷信巫觋通灵，“师父”就是“神”或“神”的代表。它们的组织程度或松或紧，宗旨不全一致，社会作用各有不同，但大都与国家政权和正统宗教相对立，而其本身同样具有封建性，与近代兴起的学派和政党有根本的差别。

李洪志将他的“大法”内部的组织原则定为“师徒”关系，与历史上的会道门完全一样，而他作为“神”、领袖与家长三位一体

的“师父”，更加专制，更加独裁。例如，他关于“传法”的许多规定，全部是为了保证和强化他的独尊地位。据他宣称，他的徒众的所有“功法”，都是他李洪志给予的，绝对不许分权，不许有独立思想。他给每一个门徒在体内放置的“法轮”，左转右转，既能产生“特异功能”，又能“渡人渡己”；他的无数“法身”在他的徒众身后，时时处处进行监护，所以弟子说“法”，只是“法轮”或“法身”说“法”。弟子群只能是些行尸走肉的躯壳和传播“大法”的器具。

那么，李洪志控制和操作他的徒众想干什么？这要看他的组织势力可能膨胀到什么程度。至少在当前可以说，他是在虚构一个“法轮世界”，而实际地组成一个反现代社会的王国。在他东抄西拼中，凑了许多有关天体演化、人类起源、物质转化，以及什么“元神”、“本体”、“六道轮回”、“性命双修”、“消业去灾”之类的杂碎，把科学变成妖言，神话变成鬼话。他把这类妖言鬼话编织成一个体系，就是步向这个王国的思想阶梯。

李洪志说，“生命体”极多，“空间”也极多，其层次有高下等级之分。“人”是从圣洁美好的世界“一层空间一层空间”掉下来的，地球是诸空间中“最肮脏的世界”，人类就坠落于其间。他又说，人是“神”造的，神“只要一想就能把你造出来”。又说，人不是真正的生命，生你的也不是你的真正母亲，“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这类颠三倒四的呓语，主要说明：“人”是卑贱的，“人”生活的空间是低下的；“人”有“元神”，元神不灭，只要追随李洪志修炼“大法”就可以进入高层次空间，成为高层次生命的“本体”。这个高层次空间，有上百个“天国”，李洪志的“法轮世界”是其中之一。

李洪志说“人体”之内，小腹以下有个“丹田”，许多“生命体”都从这里产生，包括所谓“法身、元婴、婴孩”之类，如果按“大法”修炼下去，那个“元婴”变大了，就成了“金刚不坏之体”。“元婴”由“元神”主宰，可以自由离体，超越时空，“要

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时候，“身体已被高能量物质转化”，“神通大显，威力无比”。“看上去和正常人身体差不多”，但“可以进入另外空间”。就是说：只要修炼他的“大法”，就能够达到金刚不坏，肉身成仙，直接往来于“法轮世界”。据说，在这个“世界”，“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当人”，也不需要身体，而“可以飘起来”，变大变小。

根据此等妖言鬼话，李洪志将“人”分为三等：其一曰“常人”，就是生活在“最肮脏”的地球上的垃圾；第二曰“练功人”，指追随李洪志修炼“大法”，由他下了“法轮”，受他的“法身”监护的信徒；第三叫做“超常人”，虽以“常人身”出现于世，又具大神通，能直达“法轮世界”的“高层次生命”。从宣教的角度说，每个“练功人”功行圆满都可以被提升到这样高层次，而实际上，李洪志只容许他自己独占。

在给生命划分层次等级时，李洪志激烈地抨击“常人”和由“常人”构成的“常人社会”。在他看来，“常人”或者“人”都是“肉身”，而肉身就避免不了“苦”；“常人”都有“七情六欲”，情欲必然导向“自私自利”。所以说，人的本性是恶与苦。人类这种“生命体”本来“是应该销毁的”，到了今天，“人类比先知预言的还要恶劣”，是“十恶俱全”。由此等“常人”构成的“常人社会”，利害冲突，物欲横流，“道德极其败坏”。而这种“社会局面”又都是“现代科学”造成的。当前的中国，“比外国还凶”，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据此，他诅咒人类、诅咒社会，尤其是诅咒现代化和向现代化迈步的中国。他认为，当前“人类的堕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沿”，“人类社会即将发生周期性毁灭”，处在“末法时期”，所谓“末劫”或“末日”即将来临，谁都撒手不管，也管不了；世界的“正教”不管，任何政府管不了。乐于管并且有能力管的，惟有他李洪志。所以他许下大愿：如果人们按照他宣教的“大法”修炼圆满，他能够“给人类带来一个壮举，叫所有大法弟子都带着身体飞上天”。

妄想白日飞升、肉身成仙的梦，早在秦皇汉武时代已经破灭了。李洪志的许愿，只是巫覡方士剩余的欺骗。但有一点非常实在，那就是用妖言鬼话以惑众，在“常人社会”中组成一个反对科学文明，疏离现代社会，抗拒现有政府的特殊群体。李洪志的“法轮世界”，并不是像他说的存在于“其他空间”中，而是实实在在活动于我们现实社会中。这也是海外称之为“邪教”组织的基本特征。

(二)

妖言鬼话不需要科学证明，不需要理性思考。譬如李洪志说：“有一次我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 81 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李洪志是从哪里查来的，怎么“发现”的？《转法轮》只有独断没有论证；只需要迷信与愚昧，不需要科学与理性。因而就事论事，《转法轮》连受批判的资格都没有。问题是，李洪志的胡言乱语为什么会颠倒那么多人的灵魂？把“法轮大法”解释成一个骗子骗了一大群傻子，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李洪志没有那么大的创造力和号召力，那些虚妄的独断并非出自他的个人妄想，仅就《转法轮》这本书说，它的独见几乎都有出处，都是抄自他人。也就是说，它代表的不仅是李洪志个人的观念，也反映着一种文化思潮，一种不可忽视，不可小觑的文化思潮，有一定的文化背景。这里且举几个影响较大，人们相对熟悉的观念来看一看。

李洪志说，“修炼是可以出特异功能的”，而“修炼”就是“气功”，“气功就是干这个用的”，即“人坐在那里，不动手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

我们知道，把本来用于健身的气功，给以开发“特异功能”的功能，由此制造出种种奇迹，是广涉科教界、思想界和新闻界，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科学丑闻。“法轮大法”直接是从这种氛围中兴起的。

“人体特异功能”正名“人体科学”，它的基点是建立在生物意义上的“人体”上，所以有人也叫它“生命科学”。换言之，它不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是力图摆脱人的社会性质，把人还原为自然的人，动物性的人，甚或仅仅看做是由原子和基本粒子聚积而成的物体。因此，倡导者们或者从动物学的角度，把人当成是一种本能的积累和保存者，可以从中开发出现代仿生学不可企及的能力来；或者从物理学的角度，把人视为储藏无限能量、足供移山倒海、随意而为的活性物。二者又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的社会性禁锢了人的自然本性，从政治伦理到科学理性，都是强加在人性上的枷锁，也是人的无限“潜能”不得发挥的根本原因。此类观念普及率颇高，在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有人推波助澜。

《转法轮》的反社会趋向，实质上是这类观念的笨拙复述。科技界发起的“人体科学”后来还转成为哲学界的“人学”。人体科学、人学、法轮大法，在世界观上的联系，不是偶然的。

“人体特异功能”蔑视现代科学，发誓要发动一场“科学革命”，从而造成一股反科学和伪科学之风，波及面很广。《转法轮》宣称“西方的科学走到了极端”，那语言就是“人体科学”的。李洪志煞有介事地预言：“将来会出现‘人体科学’”。其实“人体科学”早于《转法轮》多少年就名闻全国了。“法轮大法”聚众闹事打出的惟一合法旗子，就是他们属于“人体科学”。这里需要指出，反科学反理性，在西方也是一种颇高的声音。它与反“科学主义”的思潮混在一起，显得声势很大，对我们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反科学主义与科学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端。它们或者称科学决定一切，或称科学为罪恶之源，都撇开了科学的社会属性，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科学掌握在谁的手里，为什么目的服务。电可用来照明，也可用来杀人，这是前人早已举过的例子。科技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是特定的社会机制造成的，而要免遭生态环境的破坏，更需要科技的发达，而这也是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才有可能。

在科学尚相对落后，急需奋起直追的当今中国，发出反科学的呼声，令人异常憎恶。《转法轮》之敢于向现代科学挑战，自称是另一种“科学”，是有例可援、有那么一种氛围容它猖獗的。在反科学的闹剧中，有一种令李洪志相当兴奋的议论，那就是说：“科学”也是一种“迷信”，称之为“科学迷信”。《转法轮》在讲到“修炼可以出特异功能”时说：“有些东西我们一讲，有的人就说是迷信。为什么呢？他们的标准就是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的……他就认为都是迷信。”

那些抨击“迷信理性”、“迷信科学”的观点，实际上涉及的是两个问题，第一是科学理性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问题，第二是未知的领域是不是一定就是神灵盘踞的世界。

应该承认，现实生活确实有“把科学达到的成果划上一个圈圈”，“只承认这个圈圈里边的东西。”但这不一定是一种很坏的“思维态度”。理性思维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和飞跃，必须借助概念才有可能。概念是认识的一种“成果”，因而也是“一个圈圈”。这个圈圈，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没有这种稳定性，认识就会陷入混乱，使思维成为不可能。概念是认识之由个别抽象为一般的产物，它把握的是事物的本质，它的抽象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着事物的真实，因此它来自经验而高于经验。运用概念的理性思维，是惟有人类才具有的高级思维形式。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把“承认这个圈圈里边的东西”，当做“迷信理性”，那就是直截了当地反对人类思维，同海外那种视理性为本能的枷锁的观点一样，与“迷信理性”毫不相干。另一方面，概念的运用是一门艺术。从唯物辩证法看来，概念只是全部认识之网上的一个纽结，是全部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如果不把它放置在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中去理解和运用，那就会导致思想的片面和僵化，如果进一步把这种片面和僵化的思想当成绝对真理，那就是自我封闭，无异于精神自杀。如果把这种情况指斥为“迷信理性”，也是驴唇不对马嘴。因为“理性”并不包含故步自封，而更多的要

求是不间断地追求真理。在这里，涉及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许多辩证关系问题，对哲学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继续探讨。但对于《转法轮》及其理论支持者来说，他们抨击“迷信理性”的目的，其实是很简单的：摧垮你的理性，抛弃你的理性。

关于“科学迷信”的思路，大致与此相同。“转法轮”称，“现代科学”有个“框框”（不叫“圈圈”），到了爱因斯坦，就走到了这个框框的“最顶点”；如果“再往下研究，发现宗教讲的都是真的”。而今“被目前科学水平的框框迷信僵化了的人一概都说成了是封建迷信”。换言之，“封建迷信”才是真理，不承认“封建迷信”的科学就是“迷信”。这是独断，不是论证。“圈圈”论者则提出了许多例证，其中说：“经典力学时期，谁也想不到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今天，包括爱因斯坦，又被新的理论所冲击。科学本身就是这样不断突破自己、不断深入未知领域。”这完全正确。一部科学史证明，人类正是通过科学和实践才把神秘莫测的未知领域变成人类可以共识的对象，那些曾被认为是神灵寄居的空间和神魔作怪的超自然力量，科学都逐一地揭示了它的本来面貌。因此可以说，科学所到之处，就是神秘退降之地。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用科学向未知领域的不断进军，当做未知领域一定就是神灵存在处的证明呢？这种逻辑方法，实在莫名其妙，但却为许多“特异功能”信奉者使用。

当科学帮不上忙时，就去找哲学。一位“从哲学上这样解释”的学者说：“人本身就是生存在多重时空，而不是一重时空里边的；我们那个思维的时空和肉体的时空不完全是一回事。”这哲学很难懂，因为这“多重时空”是“当代科学手段达不到”，“不能被当代科学所运用”，因而常人也是不可能懂的世界。这通过《转法轮》很容易解决，它叫“不同层次”或“不同空间”，总分两种，即“世间”和“出世间”，通俗点说，即“阴间”和“阳间”。那个与“肉体的时空”不同的“思维的时空”就是“元神”

可以自由往来的“阴界”，有什么需要再“在认识发展中解决”？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怀疑论到近代的不可知论，都讨论过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其中虽然也有把未知领域让给上帝的意味，但主要倾向是用来质疑于神的存在，曾几何时，这种哲学观念被颠倒过来，变成了支撑神灵世界的证明。中国东晋僧人慧远，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叫“神不灭论”，他用以说明神魂不灭的理由，就是人的认识范围有限，而未知的领域无限，不能用有限的认识去判定无限的未知。这种论断，从经验主义出发是无法驳倒的，今天的有神论，包括一切超自然论者，使用的还是这种看来不可驳倒的论断。但科学理性可以非常明确的回答：科学不断向未知的领域开进，已经以无数的事实证明，物质世界容不得神灵或其他超自然力的存在，而没有发现一事实足以推翻这个无神论的论断。从这个意义说，科学和理性确实划定了一个“圈圈”，就是不容许在科学和理性之外，容纳什么超自然的神灵世界存在，科学是迷信的天敌，理性是科学的伴侣。

《转法轮》说，现在的“科学理论”解释不了“特异功能”之类的神灵现象，所以常人就不承认“明明见到的事实”，从而背叛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为“人体特异功能”作辩中，这也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观点。但这里首先要弄清一个前提，所谓：“明明看到的事实”，指的是什么？是“高功夫师”的特异功能表演吗？表演不是科学实验。是媒体的广为渲染？渲染再多也不济于事实。那么是来自什么名牌学校机构的“实验报告”？是的，“科学实验”最具有权威性，但那得首先验证这些实验是否遵循了科学实验的程序，以及“报告”本身的真伪。根据全球迄今为止的统计，世界上还没有发现一例声称异常的现象，得到过真实存在的科学证明；我们有关“特异功能”的“实验报告”，有些甚至震撼海外。但最终证明，没有一件能够通过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验证。在猖獗的伪科学中，没有比发生在“人体特异功能”中的频率再高的了。如此等等，实际上最令

人佩服的，大约是“神功”治病。这比较复杂。“神功”是“气功”的神异化。气功对健身和医疗的效用及其心理和生理机制，是医学界的研究课题，与神异没有关系。西方有“信仰治疗”一派，中国有人相信香灰治病。临床上也使用安慰剂、催眠术。这都是科学可以解释的。“神功”神效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来自病愈者，尤其是虔信者自述的个人感受。人们不能怀疑这种自述者的诚实性。但从科学角度说，主观感受并不能成为惟一的根据。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听取病人陈述，只是诊断的方法之一。而西医或主要依靠科学仪器的观测和化验，对某种疗法和药剂的疗效，要排除其他可能发生影响的因素，要做对比实验和观察，动辄把“明明见到的事实”（实际是魔术）当成是实践已经检验了的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曲解。“眼见为实”之说，属于经验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转法轮》在谈及“修炼人”何以能够炼成“超常人”时，使用了一个相当超常的理论，即“思维就是物质”。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老在议论、争论……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

说“思维就是物质”这话是出自“现在科学家”，大约是诬陷。但“意识即物质”之说，在“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相当流行，而且确有某种哲学在给以论证，这是事实。因为苦恼“特异功能”论者，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是找不到“功能”的物质载体，发现不了它的物质属性。既然“意念”能够“制动”，那么确信“意念”是一种物质性能量，就顺理成章了。倒转过来，用“意识即物质”证明“意念制动”的真实不虚也就凿凿有据。

这样，勿需任何物质条件，意念所至，能量随到，只要想得出来，即可办得到，剩下的问题就看谁敢吹了。应该说，这种哲学认识论我们并不陌生。李洪志把他自己吹成全能的惟一真神，是

这种哲学认识论的一种极端。很难想到，庸俗唯物论与唯意志论合流，也会被“法轮大法”所用。

总而言之，《转法轮》盗用了不少宗教观念，利用了“人体科学”的一些说法，利用了“气功热”广为传播的群众基础。这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氛围。至于为什么产生这样一种文化氛围，当然与社会的巨大变动有关，确切些说，是社会进步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副产品。这里只举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可资对照的事件：1900年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号，力图用“神功”在身、刀枪不入的法术，保卫当时最落后、最反动的后党集团，成为反对维新，反对革命，反对近代化的工具。而支持义和团的人士中，有不少高层文化人，包括大学士徐桐和久居西方的辜鸿铭。“五四”运动前后，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掀起“灵学”运动，势力遍及全国，成为反对“新文化”的主要思潮。而支持它的则是复辟帝制的势力，包括安福俱乐部，其中影响最大的文化名人，是译介《天演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的严复先生。

在国外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也不乏此等历史现象。当沙皇俄国处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革命处于转折点的时候，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发生动摇，鼓吹建立一种新的宗教，被称之为“造神派”或“造神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中，有在中国也很著名的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当代日本的某些灵学家。以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晚年转信唯灵论为标本，说明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完全失效”，劝人赶快改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去崇信他们的“显幽史观”，改信“灵交思想”，以迎接“新时代的曙光”。这也是两面镜子，尤其值得迷信“法轮大法”而又有文化的共产党员鉴照。从动摇、颓废到转向，似乎也是一种轨迹。

至于科学家，那情况不全相同。早就有学人说过，科学家不等于科学精神。科学家犯错误是常事。其中探险觅奇，迷途难返，往往是导向迷信的重要原因。如果科学家自称他的话句句是真理，

那是误导；如果有人把科学家的话当成句句是真理，那是误释。也早有学者说过“名人”的话不一定是“名言”；专家讲他专业以外的话，并不带权威性。一些从事科学研究或技术工作的人，偏要做与其本专业完全对立的迷信活动，令人惋惜，尤其在科研人才匮乏的今天。但这并不稀罕。西方是近现代科学的发源地，它的一些起过开创、奠基作用的人物，也曾导致对巫覡的迷信。恩格斯写过一篇名论《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对于一些大科学家为什么会走上神灵世界的认识原因，有过深刻的分析，但不知为什么，在“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的科学家，只字不提这篇论文。这也是一面镜子，一面并不过时的理论镜子，至少能够知道人们是如何滑进唯灵论的思维方法。

(三)

形成“法轮大法”这个社会毒瘤，不是一日之寒；“法轮大法”聚众闹事，也不是两三起。但直到中央出面指出它宣扬封建迷信和从事非法活动，才引起我们的重视，组织对它的揭露和批判。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理应备感内疚。由此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更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主动和创造性作用。

第一，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对象问题。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分科很细，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分科还会有新的变化，总的来说问题不大。但这些学科所涉及的，只是社会整体和社会运动的某个侧面，某个要素，某个片断。如果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孤立和静止地进行，很容易导向狭隘和片面，影响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科学应该是以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社会也应该是所有分科共同的研究对象；从分科的特殊性中反映和把握社会的普遍性，通过对普遍性的认识 and 把握，凸现、丰富和提高分科自身的研究水平。“法轮大法”事件留给我们社会

科学工作者的教训之一,就是把社会作为关注和研究的共同对象,仍然需要自觉。

当然,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说到底是为了人的幸福和发展。其实,自然科学也是为人的。在自然科学中,不但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是为人的,把人作为研究对象,即使物理学、化学和其他科学技术学科也不例外。因此,社会科学理应关注和重视自然科学的进展,并善于同其合作,吸取和运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然而社会对于自然科学的制约与自然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相等的,因而也离不开这个由人组成并生活于其间的环境。所以自然科学也必然从社会科学那时汲取营养,获得支持。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把两大科学门类曲解为“人学”,也不能让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取代。自然科学着重研究人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科学着重研究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人的自然属性通过社会形态体现出来,人性是人的社会性的反映。因此我们坚持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关系的总和。”所谓对人的“终极关怀”、普遍的“爱”等,如果不是虚伪或幻想,那只有通过社会的合理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当前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迈向这种合理和文明的最现实的步骤。因此,我们反对人与社会的分离,主张人与社会的参与,做社会的主人。

改革开放只有20多年,取得的成就谁也没有我们国人自己体会得那样具体而深刻。数百年来,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如此强大,人民从来没有如此富足,社会从来没有如此安定有序而又充满活力,给个人发展提供的空间也从来没有如此广阔。但是,“改革”意味着社会体制的“转型”,同样也是翻天覆地的。从中央统一的计划经济,走向以竞争为机制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意味着所有制的巨大变化,社会财富的重新配置,社会阶层的重新定位,大幅度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

道德观念。当前社会的所有变化，都应该成为社会科学观察审视的范围，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从我们对“法轮大法”的忽视看，注意的程度依然不够。例如说，我们都知道社会“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是步履维艰，需要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它给人们带来的，不会都是理想的幸福和美满。离休、退休往往会伴同精神上的失落和寂寞；下岗失业，直接威胁着有关人群的生活和未来，焦虑是自然的；分配上的不公和消费上的畸形，令人愤慨不平；众所周知的种种丑恶现象，卷土重来。从根本上说，商品、货币、价值规律这类东西本身就有可能使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而严酷；而利之所趋，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也会出现假冒伪劣，毒害社会于无形。至于一些乘机暴富和窃得权势者，思想空虚、道德败坏，需求精神刺激和麻醉，也起着恶劣的作用。如何克服前进中的困难，铲除腐败，祛邪扶正，研究其中的规律，防患于未然，甚或化不利为有利；化消极为积极，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此中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一些现象：动辄算卦看风水，非法造坟盖庙，封建迷信泛滥成灾，从农村直扑大城市。从海外进口文化垃圾，苦心为之包装，以至于一些臭名昭著于全球的邪教著作，包括美国“科学教派”的头目哈伯德、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头目麻原彰晃、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印度奥修之类的著作，也当做时髦新潮推向社会。像这类历史渣滓、思想蛀虫任其流毒于社会，而社会科学长时间保持沉默，严格讲，是一种失职。

社会现象非常复杂，也许看来不屑一顾的小事有时也会反映着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气功”，它本来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挖掘出来并用于临床试验的一种医疗保健的辅助手段。就整个社会来看，这件事的影响实在微乎其微。但从70年代末，它突然升温，一直热遍全国，根据前两年统计，可以叫上名来的气功功法就有3000种左右，经常练功的人约数千万。它的影响几乎遍及

社会的每个角落，在科教界、文化界、哲学界都有相当的反应。影响的人口如此众多，波及的思想范围如此广阔，小事真的变成了大事。如果社会科学依然不屑一顾，那就近乎麻木了。

从表面看，“气功热”的爆发与存在的健身难、看病难、文娛难有直接的关系。它简便易行、经济节约，加上又提供了群聚交流的机会，所以能很快推广开来。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再深入考察一下，为什么在“转型”时期，这些“难”才突出出来并把群众挤向“气功”？这必然会涉及更深层次的一些问题。以健身为例，中国人曾经有过“东亚病夫”的绰号。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并把“身体好”作为优秀青少年的头条标准，促使健康卫生事业成为一项持久的群众性运动。与此相应，是发扬“大众的、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精神，提倡思想上的积极向上。但某些部门引入市场经济的结果，用竞技体育取代了群众体育，把全民的健身活动挤到了无处容身之地。以高收费、低疗效，提高了某些医疗部门的经济效益，而广大患者则视医院为畏途。文化娱乐设施的高档化、豪华化，包括公园的高票价，把大众性的娱乐和消闲场地，几乎剥夺殆尽，而文娛的内容，极少考虑精神健康的需要。“法轮大法”把“气功”作为诱饵，绝非偶然。

造成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一些部门和行业过度的商业行为。仅从部门和行业自身的角度看，经济效益可能很好，但从社会整体和社会发展来看，或许不很好，很不好，可能要给国家增加麻烦，耗费社会财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对象的研究，应该超越部门的行政和行业的经营的眼界，以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发挥稳定社会、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作用。

第二，社会科学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

从道理上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譬如，对于邪教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态度是，只要它的犯罪活动还没有造成足够的事实，国

家就可以置之不理，以至像人民圣殿教、大卫教派、太阳圣殿教、奥姆真理教等，非在造成大规模的流血惨案之后才着手处理。但是我们国家的政府不能这样做，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也不能仅做事后的学术考察和理论说明。政府对人民负责，要预防，要事前制止。社会科学承担社会责任，要把握社会运动的脉搏，敲警钟，作化解。为此，社会科学要发挥独特的社会作用，既需要与有关的行业 and 部门建立一种有协作有互助的机制，也需要具有把握历史与现状、国内与海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能力，从而能够预测未来可能的种种趋向。为此，提高社会科学为社会负责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关键。这里略提三点：

1. 要从经济上解决研究单位自我创收的问题，要从体制上解决研究人员急功近利的问题。高质量的学术产品，很难从糊口谋生中获得。因此，把社会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点，从单一的价值杠杆转移到学术质量的不断提高上是基础。

2. 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没有经济的自给，就没有学术的独立。俗语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口短，什么好卖钱，就写什么文章。学术到了这等地步，除了追逐商品市场、惟利是图以外很难谈什么科学尊严、学术良心、学者人格。当然，认为在市场条件下，就可以厚颜无耻，那也不能归诸商品和货币之罪。

因此，从全局考虑，不能不顾条件地把社会科学推向市场。这不是说，社会科学应该脱离市场或拒绝经济杠杆。社会科学首先面对的是社会，要对社会和人民负责，而不是看它能赚取多少利润。它产生的是精神产品，虽然要通过市场流通，但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商品。有一种议论，认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全看它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这很片面。衡量社会科学价值的尺度，主要是社会效益；而且是长期效益，不可能立竿见影。它的效益是无形的，可以影响人的素质，可以转化为社会行为，从而制约社会，产生的作用难于用短期经济尺度衡量。《转法轮》就是一个反

面的例证：它也是一种精神产品，它力图通过对人的思想控制，实现李洪志的个人野心，由此形成神秘的组织变成毒害人的心灵、破坏社会安定的实际力量。应该看到坏的精神产品起坏的作用，更要看到好的精神产品起好的作用。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价值就在于生产好的精神产品，起好的作用。

3. 提倡学术争鸣、发展学说争论，这也是“法轮大法”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如前所述，《转法轮》吸取了许多人体特异功能的思想，出版界和媒体宣扬了大量的封建糟粕，很少有不与人体特异功能挂钩的。在20多年来的迷信思潮中，“人体特异功能”始终是旗帜，是头脑。伪科学发生频率之高，伪造之大胆，也多出在这个领域。但学术界对此不是没有不同的意见。在早些时候，争论还相当激烈。这是学术探索的必由之路，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此后中央出于多种考虑，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意见，中宣部于1982年6月做出了四项规定。其中第一项就宣布“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科研的重点，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第二项说，“今后，不要再搞许多人去做特异功能表演”；第三、第四项容许“少数人”“继续进行研究”、“试验”，但对于乘机“弄虚作假、招摇撞骗”，“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可以适当给予批评或处分”。但不知为什么，这些清楚明白的规定后来被篡改成对于“人体科学”“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简称“三不”的“方针”；而以“气功”名义，散布鬼神迷信的言行，也莫名其妙地划进了“人体科学”的“三不”保护范围。

“三不”的推行，给宣扬鬼神迷信和神功奇能构建了一条宽敞的绿色通道，为对其怀疑者和反对者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1983年以来，神功奇能和封建迷信持续高涨，相关出版物惊人增长，而发表过怀疑和反对言论的报纸、电台则屡遭检查和处分，都与此有关。“法轮大法”敢于在全国各地闹事，头一条借口，就是有关报刊电台违反了“三不”政策；有关部门也以“三不”为“宣传

纪律”向闹事的“法轮大法”赔礼道歉，甚至斥责和处罚那些坚持科学精神的人士。

学术争论是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辨别是非真伪的重要途径。学术观点不是法规。也不是政策和指令，不具有任何法律和行政效能。但在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下，它可以对社会的任何问题及其决策发表自己的见解，有助于扩大视野，增多视角，也有助于认识的完善和全面的思考。它也是社会文化繁荣、人民思想活跃、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当然，任何学术观点，都不能保证一定正确。更切实些说，片面和极端、缺点和错误，或许要更常见些，这也正是学术争论之所以特别必要的原因。学术争论不是泼妇骂街，不能以势压人，它遵循的规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条规则上，人人平等，没有例外。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规则，所以要允许犯错误，允许修正错误。在这里，不给论敌随意扣什么极“左”或极右的帽子，非常重要。“左”右是政治概念，不是学术标准。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全国、全党、各行各业普遍需要坚持和学习的任务。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有特殊的意义，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广义上也是一项文化建设，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社会文化和思想状况，对于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的塑造，社会科学负有重大责任。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像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那样科学而适用于我们的国情，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中，理应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在参加“法轮大法”的人员中，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有些还是从事马列主义教学和宣传的教师。至于组织和参加一般的愚昧迷信活动，党员也占相当的比重。这对于党的干部而言，是一种思想堕落，精神萎靡，造成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

个原因是共同的，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摇和疏远。

由于诸多原因，在这类党员那里，也流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观点。但对照一下他们信奉和崇拜的“转法轮”或其他“高功夫师”的言行，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了，而是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洞察和剖析那些支持《转法轮》的“理论”错误方面，马克思主义依然是锐利的武器。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在《转法轮》一类出版物散布的种种愚昧迷信面前失去明辨是非、判别真伪的能力，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够的一个突出反映。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开放的体系。它是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结晶。因此，即使在纯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也不一般地反对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承认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成就，并把它们用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学说和内容。在当前，围绕《转法轮》等提出来的许多伪科学问题，尤其是用以支持这些伪科学的科学理论问题就值得全体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共同研究，联合解决。在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破除封建迷信方面，一切有关学科都有义务。

为把我们国家尽快地向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推进，当前的任务可以归纳为三项：第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第二，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第三，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康。“法轮大法”公然宣扬反科学思潮，蔑视公民权利，挑战国家法制，破坏社会安定，它的毁灭是必然的。就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而言，尽管社会责任重重，但都应该围绕这三项基本任务展开，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做出贡献。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妨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以勉励之：“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注释：

- [1] “附体现象”是精神障碍的一种，属于病态。李洪志不承认有精神病。他把精神病看成是不修他的“大法”的结果；由修他的“大法”导致的精神障碍，他解释为修炼者对“大法”的不忠。
- [2] 顺便指出，“法轮功”采用佛、道两教的许多修炼方法，特别是静坐默想，注意力集中和自我暗示等，诱发身心变异，以至产生种种超常感受和神通幻觉。其实用意是为“法轮大法”的神妙提供“实践”，在西方称之为“宗教经验”。它属于“非理性”范畴，在巩固人的信仰和强化对信仰的虔诚方面，作用之大，远非世俗经验和理性之可比，在一般情况下，很难逆转。

后 记

《二十年来辩是非（1979～1999）——法轮功何以成势》一文在《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连载后，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不少读者写信或打电话到编辑部，要求将这篇长文组织出版。

编辑部考虑过这些意见后，决定从给编辑部的投稿中，选出一些与该刊宗旨“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相一致的优秀文章编辑成此书。

20 多年来，愚昧迷信沉渣泛起，伪科学无孔不入，许多神秘现象借科学之名，公开登上科学的大雅之堂，致使邪教“法轮功”得以在社会上猖獗活动，为害一时。本书旨在通过人们关心的、影响人们正确认识的一些问题，如灵魂问题，神秘体验问题，气功、特异功能问题，鬼神迷信问题，未知现象问题等，采用追踪历史事件，尊重历史事实，让“史实”说话的方法，阐述 20 多年来，科学界与中国民众中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伪气功及邪教的论战和较量，有效地分析、揭露、解读在一部分人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和糊涂观念，增强人们防伪识假意识，提高人们的理性思维习惯和探索求真精神。力求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科学研究的东西，但要达到科学真理的境界，确也没什么科学以外的捷径；二是让人们追求一个健康、清新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理性的国度里，这就是我们想总结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出现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太多的不和谐音符的初衷。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正胜邪则治而安”。

本书的长文《对“特异功能”、伪气功、邪教论战 20 年纪

事》是根据作者在该领域工作 20 多年研究、积累、调查和查阅了大量资料撰写而成，所述内容，都有文献根据。因篇幅所限，不可能将文献一一列出；另外也还有可能由于文献搜集不全，将重要事件遗漏，或有个别错误之处。作者在此诚挚地向广大读者表示歉意，并希望提出批评指正。

编 者

2003 年 9 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解读神秘 捍卫科学尊严 破除愚昧迷信 反对伪科学

作者 =

页数 = 2 8 0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谈科学无神论宣传的必要性和意义 & 任继愈				
p s i 和它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 & 于光远				
对“特异功能”、伪气功、邪教论战20年纪事 & 申振钰				
酒不醉人人自醉，功不迷人自迷——神秘体验四人谈 & 何宏	孙倩			申
荷亮 申振钰				
灵魂是否存在——关于有神论与无神论对话 & 申振钰	李申	何亮		孙
倩 李东松 郑念				
追根溯源话神功——关于中国特异功能迷信的文化分析 & 申荷亮		秋实		
气功“外气”是人体特异功能的变种 & 申振钰				
中国现代灵学运动的三次浪潮——传奇、作伪、走邪 & 申振钰				
关于中国青少年对神秘现象态度分析的对话 & 秋实		申荷亮		
无神论在美国 & 王珍				
用科学的态度认识世界——与一位基督教人士的对话 & 黄炜				
评《转法轮》——兼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 钟科文				
后记				
附录页				